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红色文化

筑城红韵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筑城红韵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 9.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9158-8
I. K297.3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44ZX69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红色文化

筑城红韵

ZHUCHENG HONGYUN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龙娜
装帧设计 陈电
责任印制 黄红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1-19158-8
定 价 88.00元（精装）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版权所有，翻版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筑城红韵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 9.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9157-1
I. K297.3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A8Z116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红色文化

筑城红韵

ZHUCHENG HONGYUN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龙娜
装帧设计 陈电
责任印制 黄红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2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221-19157-1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胡忠雄 王 宏

主 任 赵国梁

成 员 戴建伟 邓 谦 汪延皓 刘丽先 李 波
宋庆松 何谋军 胡 琳 杨 菲 沈 兵
何 丹

总 审 订 史继忠 郑荣晴 文思宛 杨 青 彭文俊

办公室主任 邓 谦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 问 陈祖武 顾 久

主 任 史继忠 郑荣晴

《筑城红韵》编委会

主 任 汪延皓

副 主 任 杨 眉 涂 勇 李亚玲

成 员 刘素娟 崔 春 李国中 徐 伟 陈 婧

指导专家 彭文俊 史继忠 郑荣晴 杨 青 文思宛

《筑城红韵》编辑部

主 编 汪延皓

执行主编 涂 勇 彭文俊

副 主 编 杨 眉 李亚玲 徐 伟 陈 婧

撰 稿 彭文俊 田 坚 陈 婧 杨 蔚 徐 伟

编 辑 杨洪一 韩晓磊

图片提供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总序

胡忠雄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而镶嵌在云贵高原的明珠——贵阳，更是被一代代文人迁客所推崇和追捧。五百年前，一代圣贤王阳明初到筑城，便对贵阳山水发出“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的赞叹，后来龙场悟道又对贵阳气候给予“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盛赞。山水之城与避暑天堂完美邂逅，让人在如春凉夏的惬意中尽享如诗时光，爽爽贵阳就这样在夏日的徐徐清风中向我们走来……

徜徉于这座有着山水禀赋和文脉传承的城市，攀黔灵山，感叹“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的天地造化；游南明河，体悟“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的天人和谐；登甲秀楼，领略“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城市韵律；访文昌阁，见证“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的城市文脉，一山一水尽显气韵，一楼一阁各展风流。

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砧坐万竹中，凉风生静衣”，是黔中贤士竹林畅游对清风送爽的感慨；“虹霓蒸海气，烟雾洒春岚”，是明朝文人送友赴任对宜人生态的赞誉。大自然对贵阳格外偏爱、不吝馈赠。北纬26度、平均海拔1100米，最佳的纬度与高度在这里相拥，造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风

景和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夏季平均气温22.3℃、相对湿度76%至79%，最佳的温度与湿度在这里相遇，让人体机能良性运转、肌体活力充分焕发；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1万多个、平均风速每秒3米以下，最佳的浓度与风度在这里相逢，让人沉浸氧海、吸氧畅游。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这方独一无二的康养胜地，成就了贵阳蜚声中外的避暑美誉。

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四万年前，贵州先民在高峰镇招果洞建造了“洞穴家园”，创造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两千年前，秦通楚道，汉置牂牁，神秘的夜郎古国融入了汉帝国，成为汉文化天空中一颗灿烂星辰。一千二百年前，自唐代开始，开阳兴起丹砂开采，逐渐成为中国丹砂采冶的重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中国红”。一千年前，从宋代以后，青岩古道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形成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无数传奇故事、历史沉浮都在马帮的声声驮铃中回响不息。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远赴南京觐见朱元璋，化解了西南边陲战乱危机，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千古佳话。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无数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以身证道、改天换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一处处红色地标熠熠生辉，留给贵阳人民厚重的红色基因。六十年前，“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的“三线”建设者，以青春抒写家国情怀，铸就了砥砺前行、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古往今来，渊深厚重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贵阳儿女、浸润着黔中大地，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



共生。看扶风山泉清树古，茂林掩名祠，奇山藏书院，体悟“雨滋苔藓侵阶绿，露洗松阴满院清”的幽静雅致。看天河潭飞瀑流湍，水自天上泻，雾从云中生，沉浸“空山闻水声，碧潭衍飞瀑”的壮阔景致。看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立黔南首关，俯重峦叠嶂，饱览“一山高耸翠微巅，突兀穿云欲到天”的钟灵毓秀。看十里河滩水明如镜，流潺潺岁月，忧芸芸苍生，尽享“真山真水到处是，几步花圃几农田”的田园风情。看红枫湖一碧万顷，织河道沟汊，集旧沙湾洲，欣赏“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看高坡云顶碧草连天，草长莺飞绿，奔马驰浩瀚，沉醉“倚空千嶂横起，银阙正当中”的静谧灵动。还有弦歌不辍的孔学堂，碧水苍山的鸭池河，童趣盎然的云漫湖，浪漫温情的花溪公园，古朴幽深的青岩古镇，绚丽绽放的万亩樱花，玉水金盆的底窝八寨，烟雾缭绕的南江大峡谷……绵延百里的环城林带，穿城而过的南明河水，星罗棋布的绿地公园，缓缓铺展出“十里山水半入城”的美丽画卷。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居于闹市高楼也能品山水之味，游走林间田舍也能赏城市之美，寄身市井巷陌也能享湖草之乐。崇尚天人合一的贵阳人，早已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浸透血脉、融入灵魂。

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辣，构成了贵阳美食的底色。糟辣椒、糊辣椒、油辣椒、烧辣椒、糍粑辣椒，辣得酣畅，软糯香滑的辣子鸡、麻辣松脆的香酥鸭、行销全球的“老干妈”，成为无数游子的“乡愁”寄托。酸，勾勒了贵阳美食的特色。酸可与一切相溶，红酸、白酸、鱼酱酸、晒醋酸、杨梅酸，酸得过瘾；酸可与一切相遇，鲜鱼、牛肉、猪蹄、肥肠，热气腾腾的酸汤火锅，既开了胃又暖了心。奇，增添了贵阳美食的亮色。贵阳有数百种小吃，肠旺面筋道弹牙、牛肉粉汤鲜味美、糯米饭咸甜相宜，在每个早晨唤醒沉睡的味蕾；清新的丝娃娃肚容万物、热辣的豆腐果外焦里嫩，在每个小摊等待逐味的老饕；滚烫的糕粑稀饭甜糯香浓、冰凉的

玫瑰冰粉沁人心脾，在每个街角惊艳疲惫的心灵；爽脆的折耳根其貌不扬，却能在每碗蘸水中释放奇特的口味。鲜，体现了贵阳美食的绿色。最优良的环境、最洁净的土壤，造就了绿色生态的山野之味，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等“黔菇”，雷竹笋、方竹笋、楠竹笋等“黔笋”，香椿、阳荷、蕨菜等“黔芽”，与甘甜井泉不期而遇，完美诠释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辣、酸、奇、鲜，在此起彼伏的吆喝、摩肩接踵的喧嚣、流光溢彩的夜市中，绽放出“千家万户店铺开”的市井烟火。

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这里有贵酒黔茶。“贵山贵水迎贵客，好山好水出好酒。”酱香白酒醇香浓厚、手工米酒清香甘甜、生态果酒蜜香飘逸，“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贵酒已凝成时光的幽雅细腻，汇成岁月的回味悠长。“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黔茶“其味极佳”，滋味香浓的都匀毛尖、不疾不缓的湄潭翠芽、汤色红艳的普安红茶，在沸水升腾中奏响自然的韵律、释放大地的芬芳。这里有贵银苗绣。“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千年非遗历久弥新，“纹、珠、饰”美轮美奂，“绣、画、染”出神入化，千锤百炼的银饰，巧夺天工传“绝活”，银丝万缕间闪耀民族艺术之光；大美无言的苗绣，绣出时尚新“国潮”，飞针走线中编织民族无字华章。这里有黔药贵果。“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苗岭山脉间，孕育着一座“天然药物宝库”，56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5种黔产道地药材遍布黔中大地，成就了以杜仲、灵芝、天麻为代表的“贵州三宝”黔草名片。“奇山秀水出珍果”，猕猴桃、刺梨果、蜂糖李、红樱桃、火龙果……这些蕴山水之灵秀、领自然之神韵的绿色食品，是“舌尖上的贵州制造”，也是献给世界的健康礼包。

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纵情山水之间，没有案牍劳形、车喧

马器，只有逍遥自得、从容悠然。这里，让莘莘学子神往，革命圣迹、儒学基地、地质公园，是感悟精神、研学心修、探索奥秘的宝地，可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这里，让年轻一代心动，奇峰峭壁、清溪飞瀑、深涧幽洞，是攀岩探险、漂流露营、山地运动的天堂，可在“忽魂悸以魄动”中饱览鬼斧神工。这里，让不惑一族躺平，民族风情、古镇文脉、乡村民宿，是都市休闲、农耕体验、亲子游玩的乐土，可让“久在樊笼里”的身心“悠然见南山”。这里，让银发老人忘忧，天然药谷、生态氧吧、矿物温泉，是理疗康养、候鸟旅养、修身颐养的福地，可在“游目骋怀青山间，物我两忘绿水中”享受最美夕阳红。每一位旅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埋心底的诗和远方。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让我们通过《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穿越重重关山，冲破氤氲云雾，相遇“爽爽贵阳”，共赴心灵之约、共鉴山水之美、共品人间之味、共享“六爽”之魅！

编写说明

《筑城红韵》一书，作为《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分卷，重点向广大市民、外来游客、史学爱好者呈现贵阳的红色文化，是一本集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通俗读物。

一、本书本着“广征、核准、精编”的原则，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体例，形成纪实性与文学性相融合的写作风格。

二、本书叙述时限上起新文化运动，下迄贵阳解放，并设专章延伸至三线建设时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贵阳红色文化。

三、本书分为引言、正文、专章和后记四大部分。全书共5章，外加3个专章，并附相关图片，篇幅约30万字。

四、本书以贵阳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记载贵阳党组织的主要活动、主要人物、重大事件，展现其间蕴含的革命精神，以及与党的初心使命、精神谱系一脉相承的文化气质。

目录

引 言	01
-----	----

第一章 时代浪潮涌黔境	03
-------------	----

一、五四风云漫贵阳	03
二、马列思潮传筑城	09
三、抗日救亡逐浪高	15

第二章 黔中大地崛砥柱	23
-------------	----

一、党支部紧急转移	23
二、建立秘密联络点	25
链接：	28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简介	28
三、创建地下党组织	28
四、“九人工委”聚力量	31
五、省工委屹立黔中	32
六、勇担当特殊使命	36
七、革命征程堪险阻	44
八、威逼利诱若等闲	51

九、洒热血慷慨就义	54
链接：	57
林青就义处	57
十、“八月会议”励斗志	57

第三章 红流滚滚过贵阳 60

一、北渡乌江卫遵义（中央红军一过贵阳）	60
二、南下西进突重围（中央红军二过贵阳）	66
三、剑锋直指黔大毕（红二、红六军团过贵阳）	81
链接：	86
红军给我取名叫远富	86
义务船工渡红军	88
小红军吓退“活阎王”	89
红军标语至今留	90

第四章 抗战后方烽火炽 93

一、重新组建省工委	93
二、党组织势如春笋	99
三、文艺号角鼓斗志	114
四、红色坐标嵌筑城	140
链接：	145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简介	145

链接:	148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简介	148
链接:	153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简介	153
五、“临工委”临危受命	154
链接:	164
风暴中要向前走——李策诗作	164
寸心原欲拯危倾——肖次瞻诗作	165
预约那新生的太阳——凌毓俊诗作	166
我见到了光明——陈法轼诗作	166
六、集中营炼狱忠魂	168
链接:	180
息烽集中营简介	180
“小萝卜头”宋振中——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	180
张露萍——永不凋零的铿锵玫瑰	185

第五章 坚持斗争迎解放 190

一、省工委再度建立	190
二、团结青年建“新青”	194
三、“贵阳特支”与“新联”	199
四、民主斗争呼声疾	203
五、护城护厂保家园	211
六、万众欢腾迎解放	223
链接:	227
“双十一惨案”	227

卢焘——撑起危局，功在筑城	233
杜蓉——身居斗室，心系革命	236
王启霖——以笔为刀，字字锋利	240
刘家祥——一心为党，坚贞不屈	244
金芳云——严守秘密，掩护同志	247
宋至平——血沃金筑，长颂英名	249

专章一 解放初期贵阳地区的剿匪斗争 255

一、土匪作乱概况	255
二、剿匪斗争与镇反运动情况	257

专章二 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纪略 261

一、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树立必胜信念的教育运动	261
二、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确保全民参与的公约运动	262
三、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争取前线胜利的支前运动	262
四、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激励前线士气的优抚运动	264
五、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促使朝鲜停战的和平运动	264
链接：抗美援朝故事	266
一张带血的朝鲜纸币：两代人跨越 71 年的找寻	266
丁朝忠：从普通战士到彭德怀警卫营营长	269

专章三 贵阳市“三线建设”情况概述	273
<hr/>	
一、实施“三线建设”的原因	273
二、“三线建设”在贵阳的发展阶段概况	275
三、贵阳在“三线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	278
四、三线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概况	281
链接：三线企业	282
“黔鹰”蓝天任翱翔：国营黔鹰机械厂	282
一枝独秀冲锋枪：国营346厂	283
东方交响有振华：振华电子集团	285
克难制胜看新光：新添光学仪器厂	286
高原铝城：贵州铝厂	288
后 记	291

引言

这是一方热土。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的号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红军转战的足迹、抗日救亡的呐喊、人民解放的战旗，激荡着铿锵的音符，汇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恢宏乐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贵阳，黄齐生、田君亮等知识界先进人士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让新思想在黔中大地上得以传播。以林青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从外地转移至贵阳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35年1月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遵循党中央的指示，配合和支持红军转战贵州，在全省各地建立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发动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

长征途中红军三次经过贵阳，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等机构、团体，先后在抗战大后方——贵阳成立。大量作战情报、武器弹药、医疗物资、重要人员等经过贵阳转运到作战前线和安全区域。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得到广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贵阳进步人士、学生、工人及各界民众，围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主题，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教等形式的民主运动，为贵州、贵阳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成

为大西南地区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1月至1946年7月，国民党在息烽集中营秘密处决和折磨致死600余人，关押的1200余名革命志士无一人叛变。

仅1949年5月至11月间，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在贵阳先后5次秘密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志士42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双十一惨案”。一批批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生动诠释了“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铮铮誓言。

自解放以来，贵阳人民团结拼搏、奋发有为，将贵阳从“一穷二白”建设成了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西部陆海新通道节点城市。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今天的贵阳，正沿着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大踏步前进，以昂扬姿态，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阳贵安新风采贡献力量！

第一章 时代浪潮涌黔境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代先进知识分子、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一直在探寻救国救民之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志士仁人看到了中华民族打破桎梏的希望，他们乘新文化运动之风，以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为契机，掀起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偏处中国西南腹地的贵阳山城，在此时代潮流风起云涌之际，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又一批贵州贵阳籍先进人士纷纷走向时代的前列，让时代的潮流酝酿一场新的社会变革，让深受封建压迫的贵州、贵阳人民身处一个觉醒的年代。

一、五四风云漫贵阳

1919年，注定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年中，古都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巨浪漫卷，风靡华夏，由此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其时，偏处西南腹地的贵阳山城，就像一艘黄昏野渡中残破孤寂的旧船，在一派迷茫混沌里盲目地漂泊。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被云南军阀所颠覆，已成为历史的遗痕。此后，这座被大山重围的山城军阀自拥、政局无常、民生艰难、交通闭塞、信息不畅、风气极为落后。

是年5月上旬，当北京那场震撼华夏的惊雷激荡起反帝反封建的风云时，这艘残破孤寂的旧船，依然还在迷茫中沉寂着。对于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对于全国各界民众呼声激越的声援，贵州军阀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断然下令，严密封锁了消息。

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运动，其起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不但没有分享到胜利果实，反而面临主权被列强瓜分的危机。由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巴黎和会，断然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尤其是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等正义提案，反而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中国代表团在交涉无效后，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此消息传到国内，长期郁积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屈辱与愤恨，犹如火山般爆发，率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举行游行示威，响亮地喊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要求北洋政府拒绝签字，并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游行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号召营救被捕学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上街散发传单，进行演讲，要求释放爱国学生、惩办卖国贼。6月3日，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出近百名学生组成讲演团，北京当局竟下令逮捕了178名学生。6月4日，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当局此举，更加激怒了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作为革命新兴力量的工人阶级，在此关头立即投入这一洪流：上海日本纱厂两万多名工人于6月5日举行罢工，北京长辛店、唐山，以及山东济南、武汉等地的部分工人也起而响应。同时，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商人也举行罢市。这场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最终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让步：释放了被捕的爱国学生，并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北京学生联合会即向各省发出通电，号召学生起来响应。贵州军阀统治者认为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过激党”唆使，所以极力封锁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强令各报馆不得刊登北京及外地运动的消息。加之贵州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因此，在5月中旬以前，贵州对五四运动毫无反应。直到中旬以后，贵州多地才接到在京读书的家乡学生寄回的家信，信中多有讲述五四运动的情况，以及动员家乡人民起来声援的内容。北京学联的通电、传单等也在5月中旬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入贵阳。消息既达，贵阳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便自发地酝酿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贵阳学生暨各界群众日渐高涨的声援活动和爱国热情，震撼了贵州军阀统治集团，贵州当局意识到，若不回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将会陷于孤立被动的境地。外地和本地风起云涌的声势，迫使贵州军阀政府改变了态度，于是从5月19日开始，政府解除对《贵州公报》《铎报》《少年贵州报》等报馆的封锁，允许报道北京五四运动和全国各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消息。《贵州公报》自5月24日起，连续3天刊载“北京全体贵州籍学生的来稿”，详细报道五四运动的经过。5月下旬，上海各界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之后，全国多地也相继传来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于是，贵阳各界群众、学生奔走串联，积极组织成立了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此间，少年贵州会的负责人何应钦被推荐为贵州国民大会执行主席，负责集会的组织工作。

5月31日，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在《贵州公报》上向全市人民发出报告，称：“我国外交失效，险象环生，青岛乃至山东将被日本人占领，全国人民痛心疾首，抢地呼天，群起组织国民大会，表示我国人民全体一致之决心。勒马悬崖，以期挽救，其悲痛急迫之情，有不能不令人泣数行下者。吾黔非中国领土乎？七百万同胞非中国人民乎？当兹国本颠危，千钧一发之际，犹不能急起

直追，尚能谓为有人心乎？”该公告告知各界，决定次日在梦草公园（今恒峰步行街处）召开贵州国民大会。当日，贵阳数家报馆同时刊登了此通告，主要街道墙面上亦张贴了通告的抄件。

6月1日，贵州国民大会正式成立。贵阳各中等学校学生、达德小学部分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士数万人，聚集在梦草公园光复楼，召开贵州国民大会。大会通电抗议巴黎和会，力争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及其他不平等条约；要求惩办卖国贼，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爱国学生。

大会主席台上贴着两副巨大醒目的对联：“鲸吸东溟，回首中原方逐鹿；鳌断西极，伤心此日说亡羊”“朝避虎，夕避蛇，安得亿兆同心，效田横五百人长埋海岛；海如带，山如砺，莫使典图变色，降燕云十六郡终古沉沦”。会场的四周贴满了对联、警句、白话诗，还有山东、青岛的地图，让人看后心潮澎湃，激发起强烈的爱国心。群众指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画像，痛斥这帮卖国贼。中午12点，成立大会开始，各界代表先后登台讲话，一致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取国权，惩办卖国奸贼，挽回外交失败。大会通过了《致赴欧和会中国专使电》《致各省电》《致徐世昌电》。在这些通电中，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绝不承认日本强加的一切特权，并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北洋政府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谢天下；要求释放北京爱国学生。与会者一致认为：“吾国存亡，在此一举，务祈举国一致，誓死力争。”会后，各校学生3000多人走上街头游行演说。游行队伍行进中，沿途观看的市民纷纷加入，很快就扩展为万余人的示威游行队伍。为了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全市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宣传也随之兴起。市民纷纷通过商会和行业大会发表宣言、声明，有的爱国商人主动将日货销毁，不少店铺关门歇业。广东街（今中华北路）的一家理发店的大门上贴的歇业告示这样写道：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由此可见，反帝爱国已深入人心。

在省城贵阳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从8月中旬开始，遵义、安顺、铜仁、镇

远、毕节等地相继出现学生和群众自发的集会或游行。反帝爱国运动已向全省推进。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约之日。这一天，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的中国学生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驻地，强烈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出席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直接目标实现了。消息传到贵州贵阳，极大地鼓舞了各族青年的斗争热情，他们乘胜前进，使运动向反对卖国政府的方向深入发展。

7月的贵阳，天气已显炎热。贵阳各校学生的爱国运动热情，亦如这气候一样，日渐升温。月初，全国学生联合会派赴贵州的代表康德馨、聂鸿逵到达贵阳，与早于他们来到贵阳的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闵季骞会合。他们三人在贵阳各学校间奔走，讲述外地学生运动发展的情况，转达全国学联对贵州学生运动的期望。他们的奔走联络，增强了学生们摆脱当局控制、独立发展爱国运动的意向，各校学生迅速达成了成立联合组织的协议。

康、聂二人到达贵阳第三天，即7月5日，由政法学校学生代表团召集各校代表商讨，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筹备处，并决定在16日召开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大会。

学生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表现出要独立于事实上代表贵州军阀“新派”政治利益的贵州国民大会，这便同军阀统治集团产生了矛盾。“新派”在贵州学生运动兴起之初，就通过何应钦控制了贵州国民大会，左右全省的运动。

为了控制学生运动的领导权，7月6日，军阀政府把持的贵州省教育会致信贵州学联筹备处，提出要在支会内成立一个由省教育会职员和各校教职员组成的评议部，并责令学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得到评议部的批准。这无疑就是要把学联变成军阀政府的一颗棋子。此间，省教育会会长兼南明中学校长的张彭年，在督军、省长刘显世的授意下，派人到各校游说，企图说服学生接受省教育会的领导，但都碰了壁。张彭年便亲自到南明中学召开大会，指责学生停课上街是不务正业。他的话音未落，台下就有学生高喊：“国权一日不复，学生

一日不安”“不自由，毋宁死！”“反对学生爱国的人，就是与卖国者同流合污，甘当亡国奴！”学生的喊声此起彼伏，有的学生愤而出场。张彭年料知众怒难平，局面无法控制，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

事后，张彭年指使政法学校的校长刘敬吾出面，胁迫该校学生代表陈正才等人辞去学联支会的职务，被陈正才等人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恼怒之下，刘敬吾搬出校规，吓唬说：“想要离开学校的同学举手！”台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这一双双举起来的手，仿佛抽了刘敬吾几个大耳光。

张彭年、刘敬吾无奈地向刘显世陈述了这些碰壁之举，刘显世只好打出军警这张牌。令警察厅厅长李映雪动用警察，禁止学生上街游行。李映雪立即派人到各校传令：学联支会成立时，只准开会，不准游行。还放话说，如若不听劝阻，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北京抓捕学生的事难免会在贵阳重演。警察厅的训令激起了学生的愤慨。对此，学联支会筹备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讲武学校的代表站出来，请命保护各校同学。其时，讲武学校是由“新派”军阀王文华、何应钦把持，其中何应钦担任讲武学校的校长。王、何二人都是贵州实力人物，警察厅自然不敢得罪。讲武学校的学生当下便联络了政法等几所学校的部分学生，到警察厅求见李映雪。李见势不妙，只好派人出来圆场，并答应：不干涉学生的行动；所谓“不准游行”的训令，实乃误传。

学生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学联支会的成立大会冲破了当局的阻碍。7月16日，各校学生集合整队来到梦草公园，召开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大会。那天，梦草公园内人潮涌动，与会学生们情绪激昂。会上宣读了学联支会章程，发表了宣言，成立了学联支会的领导机构。

“争还青岛，诛除卖国贼，排除日货，提倡国货”是大会喊出的响亮口号，也是大会的目的，全体与会者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宣誓：“从今以后，我愿为国牺牲性命及种种权利！”学联贵州支会还向全国学联发了通电，表示愿在全国学联的领导下，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

大会推举陈正才为学联贵州支会主席，何维常、陈国栋为副主席；支会下

设文牍部、社会服务部、外务部。为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还成立了纠察股。

大会还致电贵州各地，号召全省工、农、商各界与学生一道“努力同心，奋勇前进”。

会后，贵阳各中等学校和部分高小学生举行了声势空前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大十字时，学生们捣毁了日商开设的小林洋行，赢得了路旁民众的一阵喝彩。大会安排学生们沿主要街道设立了十几个演讲点，爱国宣传直至深夜才结束。反帝爱国的浪潮冲刷着贵阳山城的混沌与迷茫，过往民众多有驻足聆听这些前所未闻的潮汐之声。

学联支会的成立，使贵州反帝爱国运动从过去一定程度上受官绅左右，变成了由青年学生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较统一的群众运动，从而也成了五四运动时期贵州青年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在学生运动的感召下，市民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商人，不久后成立了商界国货维持会，禁止买卖日货，与青年学生的行动相配合。

至1919年10月前后，学联贵州支会的分会几乎遍布全省。毕节分会在成立宣言中写道：“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山海高深，土壤细流，原不择耳，天日在上，取贡鄙忱。誓歼国贼，九死无悔，惟各界仁人君子实昭鉴之。”表达了青年学生以死报国之决心。

二、马列思潮传筑城

五四运动前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也把马列主义思潮带进了闭塞落后的贵州高原。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由他主编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通过种种渠道传入贵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贵阳知识界得以传播。

同时，贵阳的一些报纸，如《贵州公报》《铎报》等，在报道外界的时事政治中，也刊登了一些旨在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文章，但在字里行间透露了马列主义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况。这些文章把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进步政治主张的人称之为“过激党”，把俄国的社会主义称为“过激主义”。封建军阀更将这些视为心腹大患。主政贵州的军阀省长刘显世就曾说：“过激党既是为那些做工的撑腰的，要打倒有财产、有土地的人，我看并不是好东西，贵州万万不可有过激主义和过激党的市场。”直到五四运动结束，贵阳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正面报道和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更多的则是对它的攻击和污蔑之词。如把社会主义歪曲为“暴动”“捣乱”“反颜事仇”“卖国通敌”“妇人国有”等。虽然尽是负面的报道，但马列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观点，终究引起了部分对当局和现实深怀愤懑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成为他们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曙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是中外反动势力制造的白色恐怖寒凝大地。在军阀当政黑暗统治下的贵州，马列主义的传播是十分艰难的，不仅传播时间较晚，而且传播范围有限，作为贵州腹地的省城贵阳，亦是如此。其时，贵阳仅为县治，东南西北门管辖的贵阳城，城墙围着的面积只有5个多平方公里，人口七八万。新思潮大抵也只在城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且大多是输入式的介绍或统治者站在反对立场上的评价。但贵阳人民尤其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追求学习、宣传和实践马列主义，对贵阳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贵州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邓恩铭、周逸群、王若飞、龙大道、周达文等，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并对贵阳、贵州乃至全国青年产生过不同程度影响的重要人物。

在这里，仅以早年在贵阳生活和学习过的周逸群和王若飞为例，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出生于贵州铜仁的周逸群，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他少年时在铜仁家乡读小学，1914年考入贵阳南明中学，就读至1918年，少年时期便胸怀救国之志。

1919年3月，周逸群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学习期间，他读

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23年回国后，曾到湘黔边界一带策动过武装斗争。之后到上海，与在上海的贵阳籍青年李侠公等人创办了《贵州青年》月刊。他时常在这本刊物上撰写文章，抨击旧的社会制度，宣传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结合贵州的现实，写出了《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女子彻底自由在哪里？》等唤醒民众的文章，启发和引导贵州青年投入反对军阀的斗争。他把《贵州青年》月刊通过邮寄、同乡返黔传带等方式传至家乡和省城贵阳，在进步青年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刊物和文章的传入及其影响，使军阀当局深感惊恐、恨之入骨，周逸群也因此三次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贵州青年》

被誉为“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典范”的贵州安顺人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安顺一个地主家庭，是贵州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黄干夫、黄齐生的外甥。他小时候父亲离家出走，他和母亲遭受继祖母和伯叔们的冷眼与虐待，吃过很多苦。8岁时，他被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在舅父与他人创办的贵阳达德学堂读书。1918年，22岁的王若飞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资格，随黄齐生及20余名贵州学子共赴日本。这期间，他进一步接触到新的思想，尽力搜读关于十月革命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书刊，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深刻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举行集会、游行，黄齐生振臂高呼：“热血男儿，岂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闭门读书？”于是他与舅父及留日学友愤然回国，并随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辗转来到北京。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思想、文化十分活跃。王若飞广泛阅读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文章，思想更趋成熟。

1919年，为寻求真理，王若飞再度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先后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等职。1931年10月，他在内蒙古包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著作，如《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土地问题》《党的建设》《对过去母校教育的印象》等，研究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出呐喊。这些著述连同家书，通过各种方式从敌人的监狱中传送出来，传到家乡和贵阳他的母校达德学校，有力地启迪了家乡人民的自由解放思想，鼓舞了斗志。

在介绍和传播马列主义的先进人士中，贵阳的多名进步教师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小生活在贵阳的刘方岳，青少年时期在贵阳达德学校就读，1918年随黄齐生先生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后返回家乡，后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他与蔡和森、陈毅等同学组成先遣队，身先士卒，不畏生死。斗争失败后，他与蔡和森等104人被遣送回国。之后辗转回到家乡贵阳，到母校达德中学教书。在课堂上，他多次热情洋溢地向学生

介绍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巴黎公社革命者英勇斗争的事迹，宣传社会主义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授课之余，他还积极协办中华书局，发行、传送进步书刊，成为早期在贵阳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一名播火者。

在贵阳南明中学任教的进步教师田君亮，称得上是在那混沌年代的贵阳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1920年，他写了一首名为《求索》的诗：

肝胆心胸，众忧众乐，布衣草履，意气自若，
独往独来，幽探隐索，如何利世，心常琢磨。
天地荡荡，任我飞跃，东走扶桑，返不停脚，
奔走革命，险阻忘却，要把社会，由苦变乐。

字里行间，尽抒胸臆，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向往。

田君亮曾先后在贵阳南明中学、贵阳中学、贵阳女子中学、贵州大学执教，所授课程有经济学、国文和人生哲学。他在课堂上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社会主义运动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还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开创一代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贵阳知识界在接受、吸纳、保护进步思想方面，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不少教师结合教学，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授史地课程的肖家驹、李梦侠，结合当时社会实际，讲授社会发展史；朱穆伯老师教国文，他借题讲解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赵毓祥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课文，把每个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变迁，以及中国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造成的影响等，深入浅出地剖析得十分清楚。他家里挂着一块彰显门庭荣光的

“进士第”匾额，他不受此约束，经常在家里接待渴求进步的青年学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阳，虽然信息闭塞、交通不畅，但知识界进步人士利用课堂宣讲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和实践，并非个别。在教师们的启发引导下，到三十年代初期，省立高中、省立一中、毅成中学、达德中学等学校师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风气已悄然形成，“普罗”“布尔乔亚”“布尔什维克”等名词，已成为青年学生们交流谈论的口头语。

在潮涌山城，新文化运动的热浪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连绵不绝地传入贵阳的过程中，进步书店和学校的图书室成为十分重要的场所。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犀利的目光看到了学校图书室和一些进步书店在传播新思潮的活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他们与进步书商密切联系，谈货谈价，要求书商到大城市订购相关进步书籍，书商们虽有顾虑，但仍有一些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书商为了迎合贵阳乃至周边地区进步师生追求新事物的渴望，也能按要求从上海、广州等城市购进一批批进步书刊。

在那个思想禁锢、民风闭塞的时代，许多学校，尤其是重点中学的图书室，都储藏和陈列了相当数量的进步文艺期刊、小说和马克思主义书籍。

地处城中心的达德学校，有两间不算太大的图书室，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十大杂志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其间夹杂着不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

1926年6月，桐梓系军阀头目周西成入主黔政，他是一个有着浓厚封建性、保守性的地方军阀。在政治上，他采取愚民政策，查封进步书店、书籍，不准青年出省求学，还规定在省外读大学的学生不许返回贵州，闭关锁省，企图以这些手段阻挡革命思想的传播。但是，在省外读书的学生为了追求真理，不顾周西成的禁令，互通信息，把新思想、新文化传入省内。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同为贵州军阀的李燊的权力争夺中败死。毛光翔、王家烈相继执掌贵州政权，为了缓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情绪和民怨，在这二人执掌政权期间，思想风气的控制上迫不得已稍微放松。

1929年前后，秦天真先后在贵阳中学、贵阳高中读书。他和身边的几个同学丁树奇、饶博生、顾建中、贺登发、何广健等，经常聚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当时上海等大城市出版的进步书刊，贵阳也有出售。鲁迅、郭沫若、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他们几乎手不释卷。白天读了不过瘾，晚上挑灯夜读。还有《莫斯科印象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蒋光慈、丁玲的作品，他们也经常阅读。他们还从一些流传到贵阳的党内书刊中，得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各种消息，知道了一些从俄国沙皇统治到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通过阅读，他们开始思索我们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革命思想在这些进步青年心中萌芽。由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不断传播，一批要求进步、思考人生的青年学生便自发走到一起，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要使国家富强应走什么道路”“中国青年的社会责任”等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阅读进步书刊和相互间的思索与探讨，使许多青年学生思想日渐觉醒。秦天真后来成为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不少进步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走上革命道路。

在20世纪初那黑暗混沌的时期，五四运动清新的劲风、马克思主义强劲的思潮，渐渐吹拂弥漫贵阳，逐渐揭开了山城封闭落后的面纱，缕缕霞光穿过浓重的乌云，照临千年沉重的山国古城，为这一方土地上即将兴起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抗日救亡逐浪高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鲸吞中国，发动侵华战争，于当年9月18日，在沈阳制造了攻打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爆发，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也点燃了神州大地抗日救亡的烽火。

贵州虽地处偏僻，信息闭塞，且连年军阀混战和腐朽的统治，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贵州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前途是热切关注的。九一八事变的消

息传来，首先在省城贵阳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的贵阳，还没有无线电广播。最早知道九一八事变消息的是电报局的职员杨绍馨，他同时是省立第一中学的兼课老师。当天深夜，他收到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报。19日一早，他就匆匆赶到学校，一进校门就对刚到校的师生们大声叫喊：“国难！国难！昨晚日本军队武装抢占了我国东北的沈阳城。”师生们听到杨老师的通告，立即炸开了锅，议论开了。大家联想起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紧逼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桩桩暴行。这些深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优秀传统教育，且经历过五四、五卅运动洗礼的莘莘学子，怎能平静面对如此震惊的消息？大家都一群一伙地聚在走廊上、操场上、教室外，情绪激动地高声议论，表示要起来！要抗议！要组织示威！上课铃声响了几遍，但没有一个学生进入教室。

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的成员临时碰头，交换了意见，向校长聂膺识反映了同学们的要求，校长和其他一些教师表示要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在省立高中读书的秦天真，也是在19日早上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的。他来到学校不久，省立第一中学的几位同学就匆匆赶来找到他，请他和高中的另几位学生代表去参加各校学生的紧急联席会议。

贵阳10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很快就聚集到省立一中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省立高中的秦天真、丁树奇、顾建中、董熙仁；省立第一中学的何广健、吴庭光、杨天源；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蓝运臧、唐和、王启凤；贵阳师范的宋显达；正谊学校的姚代奎；达德学校的刘子期、贺登发、吕新民；电报学校的瓦伯谦；测量学校的吴承仁及志道小学的许承霖等20多人。会场的气氛非常悲壮，学生代表个个都表情凝重、神色肃然。一中学生会负责人何广健向大家通报了所了解的九一八事变的大致情况，说明了这次紧急联席会的意义和目的。何广健一说完，大家便热烈而激动地讨论开来。最后决定：贵阳的学生必须有所行动，立即组织学生大游行；以大会的名义拍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抵御外侮，对日绝交；决定全体罢课，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就在各校学生代表还在开会的时候，沈阳沦陷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贵阳。有组织的示威活动还在筹划中，各校便有不少学生自发地走上街头，搭台演讲，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同学在演讲中声泪俱下，场面十分感人。这些自发的宣讲活动，持续到20日午夜。

9月21日上午，贵阳各校师生数千人，浩浩荡荡来到曹状元街附近的新市场，在这里集会。省立高中的学生代表秦天真主持大会，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沈阳的消息；接着宣讲了贵阳学生代表联席会的精神和决定，代表联席会号召各校和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国家的危亡。会上，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纷纷登台演讲，慷慨激昂，气氛悲壮。

集会之后，人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挥动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高呼“抗议日本侵略”“反对投降”“洗雪国耻”等口号，从新市场出发，沿贵阳从南到北的主大道，经大十字、铜像台，一直到城北的六广门。沿街两旁挤满了观看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市民，许多人随着学生高呼口号，热血沸腾，情绪激动。贵阳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意志和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大规模集会游行之后的半个多月里，各种形式的演讲、宣传活动持续不断。学生们以校或班为单位，不间断地到贵阳各个街头进行演讲，得到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沿街的商铺、住户主动借出桌椅板凳，烧茶递水；夜间则尽量为这些演讲台提供照明。这样的演讲台在大街上几乎每隔一二十家便有一处，每个演讲台的演讲、宣传大多从早到晚，一直到深夜。宣传演讲时痛哭流涕的学生比比皆是。驻足观看和听讲的市民、行人，群情激愤，频发感叹，时而还发出低低的啜泣声。

“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家国民族情怀渐入人心。

以广大学生和进步青年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活动不能只停留在游行演讲的层面上，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使抗日救亡运动有组织、可持续地深入下去。

达德学校街对面有一家裁缝店，店铺楼上的一间屋子，是贵阳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他们中有各校的学生代表和进步青年，大致有秦天真、饶博生、孙师武、徐健生、李策、孟昭仁、吴绍勋等人，他们都称得上是后来建立贵阳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先行者。

经过几次商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全省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组织——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

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由各学校学生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从学生代表中选举以校为单位的干事会，再从干事会中选出主席团，负责救国团的日常领导工作。秦天真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何广健为副主席。为了便于工作，成立了办事机构，设训练、宣传、总务等部门。秦天真兼任训练部部长，顾建中任宣传部部长，丁树奇任宣传部编审组长，负责起草救国团的通电、宣言、文告。救国团成立后，借用贵州省党部的礼堂演出了抗日救国主题的话剧，安排组织各校学生会分别到贵阳周边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接着创办了救国团机关刊物《救国旬刊》。

《救国旬刊》编辑丁树奇、饶博生在刊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写道：“目前是伟大的革命前夜，先进的亚洲掀起了革命的怒潮……”发刊词的内容揭示道：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活动的加剧，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最终必将导致世界范围革命的爆发。这些论述明确地指明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青年所面临的任务。发刊词还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及中华民族危机必将导致革命风暴的高潮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进步的老师在《救国旬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什么是帝国主义”“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人民的区别”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就连一般有点文化的市民，也能读得懂。这些文章对于那些初经革命洗礼的青年学生来说，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此外，《救国旬刊》还转载一些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寄来的有关文章和通讯稿，向贵阳市民和学生报道全国各地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的情况，揭露日军的累累罪行。

《救国旬刊》发行不久，就遭到了国民党的忌恨。省教育厅厅长陈公亮亲自出马，对《旬刊》的言论大加指责，压制救国团的活动。在当局的打压下，《救国旬刊》仅出版了三期。但就这三期《旬刊》，在鼓舞青年斗志，扩大救国影响方面产生了独特的作用。

在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的倡导和督促下，贵州各界相继成立抗日救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贵州妇女抗日救国团。

九一八事变后，贵阳的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及数所女子小学的师生，都积极地组织宣传队，上街进行宣传活动。不甘落后的女子学校的师生和妇女界人士，在尹素坚、严金秋、何治华等人的组织下，筹建贵州妇女抗日救国团，由各女子学校推选代表参加。这年冬天，省城妇女界召开贵州妇女抗日救国团成立大会。除女校师生外，还有各界爱国妇女参加。该团成立后，即在《新黔日报》上创办了《惊蛰》副刊，每周刊出一版。登载的文章联系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九一八事变后至当年冬，贵阳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我国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是教育界广大师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别是学生成为这一时期也可说是抗日救亡运动初期的先锋。初期的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唤起民众的觉醒，呼吁政府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全境后，又于1932年初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日军疯狂进攻上海闸北、江湾、吴淞等地。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寇的入侵。淞沪抗战，振奋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人民，尤其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纷纷参加义勇军。此时，贵阳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和全国一样走向高潮，社会各界都参加进来，贵州省政府要员及各界知名人士，于1932年4月4日，在贵阳成立了“贵州省各界抗日救国会”。在此之前成立的学生与妇女两个救国团也加入了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当天，各界抗日救国会就致电呼吁，恳请国民政府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电文称：“值此

危急存亡之际，万祈我中央政府迅即准备全国总动员，作长期之抵抗……黔人枕戈，静候调遣。”表达了贵州人民抗敌的决心。随后又致电东北各路义勇军：“……东北愈急，望贯彻始终，殄灭倭贼，还我河山，使东北同胞早庆昭苏……”

这期间，各学校在救国团体的积极推动下，组织了以各校为单位的义勇军、义勇队，增加了军事训练课，由懂军事的教师上课。操练时学生们齐声高喊“永为忠勇国民”“誓雪中华国耻”“恢复中国领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训练热情极为高涨，都想在训练中练就强健的体魄与精神，以备从军上前线。

在青年学生们掀起的一波波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贵阳知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也闻风而动。身为省教育厅督学的尹素坚女士与其夫谷友庄，联络刘方岳、缪象初、蒋仲仁、王玉珑、严金秋等知名人士和青年教师何治华、何治贤、张文琳等人，于9月下旬的一天，以郊游的形式，邀约到黔灵山麒麟洞聚会，商量如何在当前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热潮中，做些实际的推进工作。

集会中，大家分析讨论世界局势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放弃抵抗任敌肆虐的政策非常愤慨。尹素坚说：“贵阳的青年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响如此之激烈，作为这帮学子的师长，我们更不能沉默不语，若此，我们有何颜面对国人。”她明确地告诉与会的同仁，这次集会的目的，就是要明确知识阶层的态度，就是要以自己的作为，表明贵阳知识界人士反蒋抗日的态度。大家也纷纷表示，决不在抗日救亡的激流中退却，要与广大青年学生一道，肩负起这时代的责任。商讨之后，大家决定建立一个以贵阳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社团，以不同的角度和形式，支持和参与贵阳学生所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确定这个社团取名为“江流社”。其意思就是，如江河激流一样，奔流不息，勇往直前。

“江流社”虽只是一个松散的无固定会议制度的民间社团，但它却体现了贵阳知识分子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和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热情。它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贵阳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

尽管贵州地处偏隅，山峦叠嶂，交通运输极为不便，但日货却大量涌入，充斥贵阳市场，地方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损害，爱国的市民、师生和商家十分愤慨。

1932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学生抗日救国团决定利用这个日子，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号召市民与学生抵制日货，号召有日货的商店自动交出“仇货”。大多数爱国商人积极配合支持，纷纷拿出店内日货当众销毁。但也引起了少数唯利是图的奸商的仇视，他们拒不交出所存日货，并纠集数百人，企图保住日货，还打伤了两名学生。奸商的暴行激起了全城学生的义愤。慑于学生们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贵州地方当局被迫下令追缉奸商郭嵩皋、黄厚斋、李友兰3人，没收其财产；同时对支持奸商的宪兵营长撤职查办；给缉捕不力的公安局局长袁锦文“记大过一次”的处分。这一回合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成为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又一个高潮。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形势下，贵阳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也逐浪而起。

知名人士谷友庄、刘方岳、熊铁樵、袁仲安是贵阳达德学校的校友，这几人虽都被遴选为国民党贵阳县党部的委员，但私下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科学与社会的书籍，在交流中，彼此透露出对地方政局腐败的不满。为批判军阀政府的庸懦、腐朽、贪婪，谷友庄办起了一张油印小报，取名《心评》，主要导向就是批评时政、揭露军阀劣行。当局对《心评》的犀利言辞恨之入骨。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办了一年多的《心评》被迫停刊。

1933年秋，贵阳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贵阳文艺》，该刊还远销安顺等地。负责筹划和组织稿件的是谷友庄和黄大陆。《贵阳文艺》发行后，黄大陆介绍谷友庄、尹素坚夫妇认识了从四川转移到黔军袁锦文部当参谋的中共党员邓止戈。邓止戈与参谋长黄大陆为莫逆之交，无所不谈。邓止戈也为《贵阳文艺》写过稿。

1934年夏，中共毕节支部的3个主要成员（林青、秦天真、缪正元）从毕节转移到贵阳开辟工作，经谷友庄介绍与黄大陆、邓止戈认识后，林青这个后来成为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的年轻人，对《贵阳文艺》极为关注，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九一八事变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激发了贵阳民众的爱国热情。“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深入人心。进步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学生扛起抗日救亡大旗，矛头直指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同时，被炮声惊醒的贵阳广大民众，也奋起投入抗日救亡激流，抗日救亡的旗帜把志同道合者凝聚在一起，为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第二章 黔中大地崛起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贵州各地创建了一批中共党组织——中共赤水（水）合（江）特支、中共卡法支部、中共罗甸县蛮瓦支部、中共毕节支部。这些党的组织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彼时的贵州交通闭塞、政治封闭，尽管如此，在数名从外地转移到贵州的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下，贵阳的党组织得以创建。

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占遵义，党中央肯定贵州地下党的活动，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从此，黔中大地的革命活动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党支部紧急转移

1933年冬，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林青、缪正元回到家乡贵州毕节，与秦天真、徐健生、邱在先、王树艺等为主要发起人，正式成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这是一个以文艺活动为形式，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为主张的革命团体。

林青等人还编写了《草原社歌》。歌词内容是：“草原青年，草原青年，努力、努力！光明在前，光明在前，向前进、向前进！”词曲简单好记、易唱，艺术性高，节奏感强，男女四部轮唱，唱起来扣人心弦。

林青要求“加入‘草原社’的人，必须首先学会《国际歌》，并拥护歌词内容”。在小文峰阁的吊脚楼、在川主庙戏楼、在陕西会馆的大堂……林青一次次挥舞着强有力的双臂，一句一句教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很快，他们的演出得到了广大进步教师、学生、社会青年的踊跃支持，就连当时深受封建家庭约束的女青年也有20多人毅然走出家门，参加到草原艺术研究社里来，社员发展到200多人。

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绘画、话剧、歌咏、读书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骨干，团结了进步力量，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毕节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4年1月，林青介绍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林青做介绍人，缪正元做监誓人，举行了秦天真入党宣誓仪式。并成立中共毕节党支部，林青任书记。

党支部确定了四条行动纲领：一、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创造条件建立毕节地方苏维埃政权；二、加强党支部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三、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四、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

毕节党支部的建立，犹如杲杲朝阳，使这片沉寂黑暗千年的高原，在寒冬腊月看见了曙光，黔山星火由此蔓延开来。

毕节城东边二三十里远的头步桥有个范家院，此处翠竹匝绕的山村，驻着一支四五百人的武装，官家说他们是“土匪”。为首的是从周西成军阀部队拖回一连人的头步桥人范建章。毕节城乡方圆百里的老幼男女都叫他“范营长”或“范大胆”。范大胆带领的这支武装专门“牵毛子”打富济贫。他们的口号是：“上等之人差我钱，中等之人莫招嫌（即莫管，不要干预之意），下等之人跟我走，一月给你块半钱。”听到这山歌，老百姓欢喜，地主豪绅憋气。闻听城里头有几个年轻人掀起波澜，“范营长”心欲去联系，但又想，“井水不犯河水”，自己有人有枪，自由自在，谁也不敢把我范大胆如何。可偏偏城里这3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踏破山寨之门。一来二去，范建章知道了

打头那个叫林青，另两个一个叫缪正元，一个叫秦天真。三个“书生”人虽年轻，但说古道今，谈吐不凡，句句话打动人，推心置腹，一片诚意，要与范建章交朋友。豪侠肝胆的范建章终于答应，听从党支部的指挥，愿把自己和所率的几百人、枪交给共产党。

不久，在东岳山古老的庙宇里，林青和秦天真介绍范建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支队伍在中共党员范建章的带领下，开赴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反蒋抗日，扩大了党的影响。

随着工作的开展，斗争越来越激烈。毕节党支部的活动，“草原社”的宣传演出，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县党部指使特务在毕节中学拉拢学生，培植暗探，发展线人，监视“草原社”成员的活动。特务在“线人”“暗探”的指认下，经常潜入进步学生、青年的住所搜查、监视。地下党支部的工作日益艰难。

一天午夜，国民党贵州省第25军防共委员会电令驻防毕节的犹禹九部须于3日内逮捕林青及地下党的同志。幸好这份电报被我党打入邮局机要室的值班报务员截获。天一亮下了夜班，他即刻把情况告诉了党支部的同志。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支部商量决定立马隐蔽转移。

二、建立秘密联络点

1934年仲夏时节，中共毕节支部的书记林青和两名成员缪正元、秦天真，带着几名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跃分子和进步青年，为摆脱毕节反动当局的搜捕迫害，向省城贵阳转移，以图开辟新的战线和局面。

当时，林青等人佯装成去赶乡场的样子，三三两两地说着、笑着，唱着山歌出了毕节东门，向头步桥赶去。在乡场上随便买了些山鸡野兔之类的山货野味，以作幌子，便又按事先约好的，前前后后过了头步桥场坝，一直向东而去。

林青一行数人昼行夜宿，经大方、黔西，过鸭池河，前往贵阳。不几日，到达清镇，一行人住下。当晚，林青与同行的缪正元、秦天真、萧世铤、熊蕴

竹在客栈那昏暗的油灯下商议眼前的工作。谈到几个人现时的处境和走向，秦天真提到在贵阳有几个可靠关系，安顺也有一些高中时的进步同学，其中一个叫龙文的，与他还有过金兰之交。于是他建议兵分两路，分别在贵阳和安顺落脚，安顿下来，再计议以后的事情。

建议得到林青的支持，于是林青安排大家分别去往贵阳和安顺落脚，相机开展工作。缪正元和萧世铤在清镇客店暂住几天。林青、秦天真、熊蕴竹到安顺，与安顺方面接上关系，将林、熊二人安排妥当之后，秦天真再回清镇，与缪和萧去贵阳。

计议已定，第二天一大早，林、秦、熊三人便往安顺去了。

没过几天，秦天真返回了清镇。安顺的事办得很顺利，林青决定暂留安顺，与龙文等人进一步联络，进行一些初步的活动。秦天真谈了安顺方面的情况，即与缪、萧赶赴贵阳。

清镇至贵阳约四五十里路。3人健步疾走，大半天工夫就赶到了。入得城来，天色已暗，他们径直到甲秀楼对面的贵阳电厂，去找在厂里当会计的高言志。

高言志是高家大院“言”字辈的长子，他诙谐豪爽，能言善道，交游甚广，常以助人为快乐之本，是高氏后代中很旷达的一位。秦天真在贵阳读书时，便与高言志交往甚笃。

说到高言志和高家大院，就有必要把当时在贵阳声名显赫的高家大院简略介绍一下。这高家大院是高家先祖高廷瑶于清乾隆年间乡试得中“解元”，出任皖省（安徽）通判时，在贵阳大坝子置下了大片土地，建造庭院。府城，谓之“解元府第”。这“解元府”地势颇高，坐北朝南。到了民国年间，高廷瑶之后裔高可亭执掌家政时，“解元府”以及后花园屋基宅院已达十万余平方尺。其时，大坝子已起了街名，叫作文笔街。文笔街1至6号皆为高氏家族之房产。

高家花园，仅是庭院的一小部分，它是这“解元府第”的后花园，在高家

大屋第四进之后。由第二进可直通花园小巷，此小巷将四进四院的大屋左右分开，小巷设有7扇小门，隐于第二进茶房一侧。不熟知高家地形者，踏入横院，院院相通，若将所有小门关闭，便不能出入。坐落在后花园内的怡怡楼是高家的藏书楼，上下两层共8个开间。楼上楼下清一色排列着竹制书架，搁满了线装大书。在怡怡楼上层凭栏，可窥前院高家大屋全景。怡怡楼右边有一栋木楼叫船屋。所谓船屋，是一座建造在花园池塘之上的两层楼房。该楼四面走廊，有木栏围住。坐于楼中，四周园景尽收眼底。在此聚会，若有人接近，便能立即警觉，三面门窗一开，就可迅速散去。故高家大屋及花园后能成为中共贵州地下党的联络点和秘密机关，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很快，秦天真3人便走到了贵阳电厂。恰好，高言志正在厂里，秦天真找到他，略述来意，高言志便道，徐健生和孙师武都住在他家后街。徐健生（本名邱照）与孙师武都是毕节人，在贵阳就读，与高言志也是开诚相交的朋友。

不多时，他们就在高家后面的忠烈街8号一姓吴的裁缝店的楼上与徐、孙二人会面了。三人叙起秦天真离开贵阳以后各自的情况和贵阳的社会政治情况，秦天真得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起的一批进步关系，虽没在社会上搞什么大规模的抗日宣传，但仍然在学校、学生中进行了一些分散的活动。在贵阳开展活动，发展组织，是有一定基础的。徐健生和孙师武假期回毕节时已知道了秦天真的党员身份。秦天真估计高言志可能也已从他二人那里知晓了。高言志虽是位富家子弟，但对外乡来的这一帮穷同学朋友却是肝胆相照。他便把从毕节转移出来的原因与经过大体向他们讲了讲，并提出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秘密联络点。

大家想了好一阵，一时想不出比较安全可靠的地方做联络点，学校显然不宜，而有几个进步群众的家也略嫌窄小，况且当街不太隐蔽。此时高言志却在心里盘算起来，他想自己家宽房大院，合家上下几代虽然几十口人同住，却是各在各的小院隔房中，相安无事。各自的熟人朋友来了，各自接待，一般互不干涉，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如若把自己的家设为联络点，倒是一个很

安全的地方。于是他就将想法向众人说明，大家便找寻机会亲自前往高家花园察看，从后门出去几步就可穿过小巷至徐健生和孙师武租住的裁缝家。出了后门，顺忠烈街往东头走，顶多三五分钟便可到城外，的确是一个隐蔽的地点。

初步落实了联络点，秦天真即赶往安顺，向林青汇报了贵阳的情况和准备在高家设立秘密联络点的事。林青颇为高兴，这几天在安顺摸了摸情况，觉得在安顺建立组织有一定的基础。听了贵阳的情况，认为在贵阳站住脚也是有把握的，便安排了安顺的工作，与秦天真返回贵阳。

回到贵阳，林青在秦天真的陪同下又到高家后花园仔仔细细察看了一番，也认为这是一个既安全又隐蔽的地方，正式将高家大院的后花园确定为贵州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毕节党支部的3名成员——林青、秦天真、缪正元也分别在这里和紧邻的忠烈街8号吴裁缝家隐蔽起来，筹划和开展贵阳以至全省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和其他革命活动。

链接：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简介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文笔街11号（原高家花园），始建于18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家“言”字辈长子高言志思想进步，毅然投身革命活动，将家中藏书楼“怡怡楼”及“楼外楼”提供给省工委作为秘密工作机关和指挥中心，掩护其组织领导全省革命活动。

旧址内设“中共贵州省工委斗争纪略展”，面向社会免费开放。1982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7月1日（建党七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三、创建地下党组织

端午过后的贵阳山城，天气已炎热。

高家花园里，树梢上的知了热得“吱儿吱儿”一个劲地鸣叫着。

晌午时分，暑气蒸腾，大街小巷少有行人。怡怡楼内，三个身穿灰色短衫、布鞋，教书先生模样的人，正在秘密商量着什么。这三人，便是林青、秦天真、缪正元。

从国内形势看，其时，蒋介石正调遣他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兵力，全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贵州这块土地，山重水复，偏僻落后，地方军阀自成一统，虽对蒋的那一套噤若寒蝉，但因天高地远，有时也对蒋的指令软磨硬拖。这样的形势和气候，倒给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留下了些许缝隙。毕节党支部建立以前，邻近四川的赤水河畔建立了赤合支部，黔桂交界的望谟山区有过卡法支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支部的活动和影响都未能延伸至省城贵阳。倘若毕节支部在黔大毕地区的活动未引起当局的警觉与镇压，那么也许贵阳地区党的活动还会滞后一些。火种，已悄然播撒到山城贵阳。

鉴于眼下全国和省内的形势，三人一致认为，创建贵阳地下党的工作，必须抓紧去办好四件事：

一是要设法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接受上级的指示和任务。

二是为建立贵州地下党组织奠定基础，抓紧发展一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过考验并有入党要求的进步青年入党；在有条件的学校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壮大基层党组织；同时要开展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的学习。

三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展军事工作，一方面争取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可靠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部队，了解军情，分化瓦解并争取敌军官兵，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来重组党的武装队伍。

四是全力保护好高家这个秘密联络点。

议定这些亟待要办的事情后，林青提出了三个人的分工与配合的问题。因秦天真对贵阳进步青年，尤其是进步学生的情况了解多一些，便由他负责组织发展工作；缪正元想办法尽可能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部队，争取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林青则去外地想办法寻找党组织。他们之间的联络就由徐健生负责。

之后三人便按分工开始工作。

林青负责寻找党中央和红军的任务进行得很不顺利。他几次欲从湘桂黔边界出省境，都被挡了回来。湘赣边红军与白军正打得难分难解，一切寻找红军的途径都被国民党或地方军阀武装严加控制起来。硬碰显然是不行的，即便置生死于不顾，也于事无补，只好静待时机了。

秦天真在这段时间内，把在贵阳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的情况，逐个摸了个遍。这批青年中有十多个人一直向往加入共产党。他分别找到他们，恳切交谈，掌握了许多情况。

十多天后林青又从黔东返回了贵阳，秦天真逐一将徐健生、李中量、李策、孟昭仁、蓝运臧、吴绍勋、夏之纲、王平等十来个人的性格爱好、思想追求等向林青作了详细的汇报。

缪正元也把他开展工作的情况向林青作了汇报。

缪正元通过一位进步女教师严金秋认识了贵阳的知名人士谷友庄、尹素坚夫妇。又经谷友庄夫妇介绍，认识了为躲避四川军阀杨森通缉而逃到贵州，混入黔军第二师的地下党员邓止戈和在第二师任职的云南文山山人黄大陆。黄大陆是黔军驻防安顺这个师的少将参谋长，身在军阀部队，却倾向革命。缪正元与他俩见过几次面，并商议过在贵阳搞革命的问题。黄大陆颇有见地，认为在贵州搞革命必须有武装，而且这个武装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缪正元绘声绘色地说着，林青亦感到很兴奋。到贵阳不久，各方面的工作虽有不少困难，却都进行得有声有色。他要缪正元尽快与邓止戈联系，他想见见这位外省来的同志，同时再了解了解黄大陆的情况。

第二天中午，缪正元约来了邓止戈。林青和秦天真与邓止戈虽未见过面，但通过缪正元的介绍，就如故友重逢。聊到黄大陆，邓止戈话语中透出对黄大陆的信任与赞赏，并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最后几人约定，下午一起去东山观音洞看一看黄大陆，他近来在那里养病。大家又谈了一阵组织发展的问题，都认为有一部分进步青年和学生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可在近期发展几批党

员，建立起一些支部或小组。

下午，四人装作去游山的样子，来到观音洞。一见到黄大陆，林青和秦天真顿感亲切。黄大陆宽眉大脸，给人一种谦和朴实之感，又有一种良好的军人气度。谈到建立革命的武装，黄大陆一腔热忱溢于言表，言谈中露出在适当时候安插一些同志打入黔军部队的想法，大家都觉得这思路很好。

1934年8月，党支部决定吸收徐健生入党，这是在贵阳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不久，邓止戈也正式介绍黄大陆加入了党组织。接下来，又陆续吸纳了李中量、李策、孟昭仁、支轴、蓝运臧、吴绍勋、夏之纲、王平、邱应根、李长青等十多人入党。同时，还吸纳了在安顺、黔东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和组织农村武装力量的王芸生、李光庭、喻雷、丁沛生、宁仿陶等加入党组织。

过了8月，贵阳一中、贵阳高中、贵阳师范学校都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徐健生、夏之纲、李中量分别担任这3个支部的书记。达德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也分别建立了党小组。各个支部和小组积极开展活动，分别在校内组织秘密读书会、文学艺术研究社、社会科学研究社等，进一步联络进步青年和发动群众。

通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到年底，已发展党员40余人，群众工作也更加深入且有了较好的基础。军事方面也有了一些进展，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安插了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开展兵运活动。

林、秦、缪、邓等人冒着危险东奔西走，把各方面工作逐步理出了头绪。贵阳和安顺之间的联络也得以加强。两个地方的地下党的同志亦有了来往，工作不断得以拓展，活动区域也愈渐扩大。

革命火种在黔中大地悄然生根、发芽。

四、“九人工委”聚力量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与汇合，林青认为贵州的革命工作应形成一个核心，以便在更大范围更深入地讨论问题，拓展局面。思考再三，林青、秦天

真、邓止戈商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机构——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亦称“九人工委”），由林青、秦天真、缪正元、邓止戈、高言志、李逸生、萧世铤、王石安、赵促成组成。主要任务是：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委员会成员分别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培养进步青年，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

按林青的意见，“九人工委”做了具体分工：林青与高言志到三合县开展少数民族武装工作，并伺机寻找红军与上级党组织；缪正元到安顺；秦天真留在贵阳，同各地进行秘密联络；邓止戈仍留在黔军搞兵运；黄大陆因在黔军中任要职，为更好地隐蔽下来，没有加入工作委员会，由林青与他单线联系，其他人也都一一做了分工。这个“革命工作委员会”不是党的一级组织，只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林青主持协调各方面工作的一种形式。

恰巧，黔军第一师要招几个搞报务的人。“九人工委”通过黄大陆，把邓止戈、缪正元、萧世铤等人安插进了第一师。缪正元懂一些电讯报务，师电台的毕节人糜某是缪正元父亲的徒弟，缪正元利用这个关系，又打入了师电台这一要害部门。

五、省工委崛起黔中

林青与高言志意欲去三合县发动和开展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实际上这只是他们想做的事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在湘桂黔边境多逗留一阵子，这样就能有更多的机会东出黔境，与党的上级组织或红军取得联系。设法找到党的上级组织，这是当前贵州地下党的中心任务，也是他日夜思虑的问题。贵州地下党自年初在毕节建立支部起，至今不到一年，就在毕节、贵阳、安顺、织金、遵义、炉山（凯里，下同）等地发展了党员四五十名，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革命的力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都是自己想着法子在干，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得不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一步该如何走，才能使贵州的革命活动与全国的革命形势紧密接合？这一系列的重大问

题，都亟待上级党组织的明确指示。

入冬后，林青与高言志到了三合（今三都县，下同）。

三合县是贵州境内一个与湘桂接壤的小县。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当地多是水族和侗族。高言志的父亲就在此当县长。林青选择这个地方开展民族武装斗争并伺机由此出境寻找上级也就容易一些。

有了高县长的关照，他二人谋得了县政府财务会和出纳的职务。

白天，他俩坐在机关里敲算盘、数票子。晚上，他俩走村串寨，四处活动。此间，听闻红军在湖南境内打了几场大仗，但红军将往何方却不得而知。林青几次试图出境，都因广西、湖南的关卡把守甚紧，未能成功。

转眼到了年底，民族武装倒是做了一些发动工作，但寻找上级党组织之事却还没有着落。这天，高言志从父亲口中得知，红军已从湖南通道进了贵州，有往黔北一带活动的迹象，省里下令要各县加强防范，阻遏红军。

闻听此言，林青十分振奋。正好林青有个姨妈在遵义，有落脚的地方，于是决定马上前往遵义。高言志建议再等两天，等他从父亲那里再打听点确切的消息再说。

第二天傍晚，高言志还没打听到什么新情况，秦天真却从贵阳托人带来消息说：“三兄弟放寒假，要跟人家到遵义那边去玩。”这是暗号，意思是缪正元所在的第一师将开往遵义防堵红军。得知此消息，林青再也待不住了，一夜不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便离开了三合，向北寻找红军。他取道平越、瓮安，过乌江，不几日到了遵义。他在遵义丁字口一刘姓开的京果店找到了姨妈，对姨妈只说想在遵义找点事情做。姨妈安排他先住了下来。

这段时间，遵义城加岗加哨，如临大敌，城中显得非常混乱。林青猜想，从敌人的防务和遵义乱糟糟的样子看，也许红军就要来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林青急切地在外四处寻访，无意间碰见了两年前在上海西牢的狱友吴亮平。吴亮平此时已是红军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双方交谈了这一两年各自的状况后，林青就把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和

活动向吴亮平报告了一番。次日上午，林青随吴亮平来到遵义城北的一个普通农户家，见到了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罗迈（李维汉）。

林青极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向领导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他从小在上海被捕入狱，与吴亮平关押在一个牢房说起——说到了他和同乡缪正元一起回到贵州，在毕节发展脱离军阀部队的营长范建章入党；组织进步团体“草原艺术研究社”，建立毕节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说到党支部从毕节转移到贵阳、安顺，发展党员，在贵阳的一些学校和全省十来个县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说到了贵州地下党的骨干邓止戈、黄大陆和刘茂隆等，以及“九人工委”开展工作的情况，罗迈对贵州地下党的工作表示了肯定。

两天后，罗迈再次约见林青。还是在那个农户的厢房里，罗迈郑重地宣



林青在遵义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报贵州地下党工作情况（场景雕塑）

布：党中央肯定了贵州的地下党所开展的工作；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邓止戈、秦天真3人为省工委委员；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后，罗迈大致向林青讲了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撤离准备北上抗日的意图，并交代了省工委要完成的一项特别任务，约定了接头的暗号及有关事项。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第一次建立了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这也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成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

红军在遵义期间，林青兼任遵义县委书记，来回穿梭于遵义城内城外，联络当地的党员、群众和进步人士，把大家组织在一起，主动为红军办事，动员黔北的山民踊跃参加红军。

省工委建立没多久，红军就离开了遵义。红军离开后的第二天，黄大陆所在的部队乘虚开进了遵义。缪正元也随军抵达，他按接头地点，通过林青的姨妈在遵义一家照相馆找到了林青。得知党中央批准建立省工委的经过，缪正元很是兴奋，说要立马告诉黄大陆。林青叫他尽快把黄大陆约来，一块商量配合红军行动的问题。

当晚，缪正元与黄大陆又来到这家照相馆。

招呼二人落座后，林青交代，地下党在黔军中的力量不够，不可能拉出队伍投奔红军。要黄大陆充分利用王家烈、何知重怕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吃掉的心理，以保存实力为理由，说服何知重，不要与在黔北境内活动的红军直接交火，暗中支援红军。

碰头会后，林青即赶赴贵阳。向秦天真传达了党中央批准成立省工委的决定。因自己还兼任遵义县委书记，很快要赶回遵义，把遵义县委的工作开展起来。他要秦天真坚持在贵阳，以便掌握各条线的情况。由于邓止戈在部队，省工委面临的任务重，人手少，刘茂隆有党的工作经验，有一定能力，可以让他先参加省工委的有关工作，之后再向中央报告。

六、勇担当特殊使命

林青离开贵阳前，向秦天真交代，尽快在党内传达中央决定，尽快想办法把这些情况告诉邓止戈，并决定由徐健生担任省工委交通联络员，负责省工委成员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最后，林青告诉秦天真，罗迈同志要求省工委完成一项特别任务，中央红军一个叫杨涛的特派员近期要来贵阳，要求省工委负责保护和转移杨特派员去上海。接头地点定在夏之纲家，并交代了接头暗号。

1935年2月的一天，贵州省工委设在大井坎夏之纲家的秘密联络点，来了个年约三十开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的男子，遇见夏之纲的爱人罗朝秀，询问这里是否是大井坎夏家。罗问陌生人找谁，答找林先生或秦先生。罗不敢贸然答复，又不能拒绝，只好声称自己不清楚，托词要去问问家里人，请他稍坐片刻，转身回到内室叫人赶紧给秦天真报信。

秦天真得知信息后，猜想是中央特派员杨涛到了，决定前去试探接头。与来人见面后，秦天真按约定的方式，并不通报姓名，寒暄了几句，便约来人“到城外走走”。这“到城外走走”是接头的方式。听了此话，来人也不多言，便随秦天真出了门，朝大南门外走去。二人一路闲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第二天二人在一家餐馆吃中饭时，秦天真这才问道：“老板贵姓？找秦先生有何贵干？”来人答道：“我叫杨涛，老板叫我来找小开。”接头方式和暗号吻合，秦天真这才放心地说了自己的真名，告诉杨涛，林青已返回遵义，并向杨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当听到黄大陆、邓止戈、缪正元现在黔军中任职时，杨涛显出兴奋之色。他要秦天真立即与他们联络，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搞到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密电码，以及飞机与地面联络标识图。他请秦天真设法找一辆出境的便车，并安排一个可靠的人陪他同行。杨涛告诉秦天真，他的真名叫潘汉年，此次离开正在黔北转战的红军，是要到上海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出了饭店，天已全黑。二人又约定了搞到情报之后见面的地点，便分手了。这项特别的任务，是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第一次接受中央特派员直接部署的任务。秦天真深知责任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

第二天一大早，秦天真一身教书先生打扮出了大西门。他这是要赶往郎岱岩脚，找随军驻扎在此的邓止戈，传达党中央批准成立省工委的决定，并完成中央特派员部署的任务。

（一）智取情报助红军

1935年3月初，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畔黔川边界迂回转战，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部队前堵后追，都没能阻拦住红军前进的步伐。

这天，一支红军队伍正行进在茅台往中枢的崎岖山路上。突然，天空中一阵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高山深谷都被震得瑟瑟发抖。不好，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然而行进中的红军队伍并不躲闪，依然阵脚不乱地行进着。稍后，只见队伍中跑出几名身背包袱的红军战士，迅速冲到邻近的山头上，从包袱里抖出一匹匹白布，沿着山坡很快地铺出一个大大的“十”字形。盘旋在头顶的飞机见状，在空中晃了晃翅膀就飞走了。

敌机见到这白布铺出的“十”字符号怎么就打道回去了呢？

这话还得从秦天真到岩脚（今属六枝）找邓止戈说起。那日秦天真一大早出发，昼夜兼程赶到岩脚，找到在黔军师部参谋处任参谋的邓止戈和在师部电台工作的缪正元，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和布置的任务。

经过一番谋划，因电台密码本在电台台长兼译电室主任黄俊生手中，便决定让缪正元利用在电台工作之便，尽快想办法搞到手。

黄俊生此人工作敬业，对埋头工作、精通业务、能帮他出主意的人倍加信任。缪正元自从打入电台后就靠努力工作获得其信任，知道黄俊生掌握的密件都是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锁着。

这天下午，黄俊生把缪正元叫到办公室，说他要到省城开会，要一两天才能回来，要缪正元认真盯着电台的工作，并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缪正元代为保管。黄俊生的办公室与电台间仅一墙之隔。是晚，正好又轮到缪正元与另两名报务员值班。为避免行动被发现，缪正元心想，得想个招数把这两个人稳住，

才好动手。

晚上，和两名值班员一起值班的缪正元，趁人不备在发报机上拨弄了几下。顿时，发报机像耗子打架似的发出一串串刺耳的声音。那两人不明白缪正元的机子出了何故障，忙围拢过来。缪正元装作手忙脚乱的样子，哀求道：“请两位别跟黄台长告状，谁要能帮我把这电台修好，便请大家舒舒服服地喝一顿。”

听说有酒喝，两名值班员十分欣喜，保证一定将电台修好，并催促缪正元赶紧去打酒买菜。见他俩中计，缪正元佯装外出，却来到黄俊生办公室门口，掏出钥匙，轻轻打开房门。进了屋后，漆黑一片，他凭着感觉摸到黄俊生那张厚实的办公桌旁，用事先准备好的细钢丝钩子，打开了右边第三个抽屉，摸索着拿出那个早已看熟了的公文包，蹲到办公桌下，用衣角蒙着电筒，凭着一点点光亮，找出包里的密电码本和几份紧要的密件，揣进怀里。急忙跑去找到秦天真，与他一起把密电码和密件都誊写了一份，便赶紧回到军中将密电码等还回去，回到值班室。

就在缪正元寻机智取密电码的这一两天，邓止戈通过秘密渠道联络到了黄大陆。黄大陆通过军界的朋友，从在赤水一带追堵红军的黔军侯之担部搞到了军用地图。

邓止戈也在这一两天想法弄到了黔军西线布防图、国民党军飞机联络标识图和国民党头面人物的通讯代号等情报。原来，地面标识图是国民党在军政重要据点的露天空旷处绘制的一些符号图案，国民党的飞机只要看到有这种地面标识的地方，就不会轰炸。

秦天真拿到这些高度机密的東西后，用废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捆成一卷扎紧，依旧是身穿长衫，手提雨伞，一副教书先生的打扮，清早离开岩脚，过普定县境，顾不上歇脚休息，黄昏时分赶到安顺北门城外时，却遇当地民兵设卡检查，秦天真机智巧妙地躲过搜查。

赶回贵阳的当晚，已夜阑更深，秦天真直奔高家花园，在花园的一棵树下刨个小坑，把情报埋好。次日去旅馆找到潘汉年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并把情

报交给了他。潘汉年得到军用地图、密电码和飞机联络标识图，非常高兴，一再称赞贵州地下党的同志，并叮嘱尽快安排启程去上海的事。

（二）乔装护送特派员

在去岩脚前，秦天真已把护送中央特派员出贵州去上海的任务作了部署。去广西方向的汽车由高言志负责联系。高言志门路广，人又精明，只要他答应去办的事情，从不多问缘由，只管尽心尽力去办。秦天真回到贵阳后，高言志就把联系出境车辆的详情原原本本向秦作了报告。

护送和陪同中央特派员的人选，秦天真心中早有打算。考虑到路上可能出现的盘查和突发情况，秦天真打算安排一名女党员蓝运臧与潘汉年假扮夫妻。蓝运臧是黔西打鼓新场人，曾在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曾以女师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过秦天真等人组织的“贵州学生救国团”，领导女师的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贵阳知识界的名流尹素坚、严金秋等筹组“贵州妇女救国会”，并兼任理事。她常以“问耕”为笔名，在《新黔日报》副刊和妇女会刊物上发表时评文章，颇有见地和影响。她还积极组织和参加女师同学的街头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抗日救亡。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尹素坚介绍她到一所公立学校暂做代课老师，兼做一些校务工作。

蓝运臧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和组织才能，受到林青、秦天真等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信任与赞赏。1934年冬天，秦天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秦天真找到蓝运臧，说明中央代表身负的重任、假扮夫妻的目的和必要性，并没有作为硬性任务向她提出，只是征求她的意见。然而，蓝运臧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尽最大努力去做好这个“杨太太”，完成掩护和护送任务。秦天真交代，让她这两天尽快做些准备，对家人和亲友都要保密，只说是要到北平读书。

在约定启程的那天清晨，秦天真陪同假扮的一对“夫妇”，准时到达大西

门，高言志已经在那等待了，一辆红色车头的载货商车停在路旁。高言志向司机介绍杨、蓝两人的“夫妇关系”和与他的“至交好友”身份，要司机一路多关照，给了些钱，请杨、蓝一同坐进驾驶室。汽车朝都匀方向驶去了。

潘汉年离开贵州之前，向省工委指出贵州要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并给秦天真留下八十块大洋补贴省工委活动经费，又把广西、香港、上海的几个秘密联络地址告诉了秦天真，以备必要时以“找小开”为接头暗号，同他联系。

林青再度赴遵义，正值红军第一次离开遵义，迂回转战黔北，佯攻贵阳，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和改编的贵州军阀旧部沿路阻击，断绝交通，限制通行。林青受阻滞留途中多日，未抵遵义，不得已折转贵阳时，中央特派员已安全离黔。秦天真向他汇报了完成这项任务的详细情况和同志们的突出表现。

（三）巧斡旋阻滞黔军

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为了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一方面纠集西南三省军阀，拼凑了180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火急火燎地向黔北扑来；另一方面令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进占贵阳后，派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分别由贵阳、息烽和清镇、黔西左右两路向遵义推进。同时，还急调上官云相部入川集结，兵屯川黔边界。此一系列动兵部署，旨在对红军采取包围态势，窥视红军的动向，伺机消灭。

在蒋介石的合围计划尚未完全形成之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兵分三路，挥师北上。黔军何知重师亦在红军撤离遵义后，呈“追剿”之势，尾随红军部队之后，行进在乌江往北的山路上。

此时，黄大陆（中共地下党员）任何知重师少将参谋长，随军北去前，黄

大陆在贵阳与秦天真道别。秦天真告诉他，省工委书记林青因身兼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正在遵义一带活动，此行随军到了遵义，务必要与林青联系，以听取如何配合红军行动的指示，并告诉了他林青的姨妈在遵义的地址和联络暗号。翌日，黔军何知重的部队进驻遵义，驻扎在遵义城南门关外。黄大陆按接头地点通过林青的姨妈，在城里一家照相馆找到林青，得知中央批准建立省工委的经过，并提到在黔军中，由于党的力量单薄，不可能拉出队伍投奔红军，要求黄大陆在军中尽量设法阻滞黔军，避开与红军交锋。

红军一渡赤水前，为了聚歼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畔，蒋介石从四川增派优势兵力，向赤水河一线的隆兴、土城等地逼近，致使红一军团攻占赤水县城、构成“桥头堡垒”、夺取北渡长江渡河点的计划受阻。为了集中全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红军总部决定首先消灭前来阻拦红军北进的川军。

1月28日，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在土城青杠坡一带与川军郭勋祺部接火交锋。川军据险而守，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颇重，形成对峙局面。且因敌情报告有误，土城东西两面川军援敌源源不断，倘若久战，红三、五军团和中央纵队将损失殆尽。土城之战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革军委在紧急之中果断决策，放弃原定在赤水县城地域北渡长江的计划，各军团改从土城、元厚等处就近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县境。

土城战役打响前的几天，黔军何知重部才从遵义南门关一路拖拖拉拉地向桐梓地区进发。土城青杠坡枪声最激烈的时候，本该赶到战斗之中来的何知重师，在黄大陆的影响下，师座何知重出于自保心理，似乎也装聋作哑，把部队停在桐梓一带，没有赶去土城参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红军在土城战役中的压力。

红军西渡赤水进入川南之后，何知重师却加快了脚步，一两天便赶到了温水、良村、东皇一带驻扎。从桐梓赶来的这一路上，黄大陆、缪正元利用特殊身份，收留和安置了一些掉队的红军战士，安排他们到电台当勤务兵或做其他工作。

在红军二渡赤水时，黔军军长王家烈曾电令何部在二郎滩等要害处防堵红军，命令落入缪正元之手，缪正元通过联络员杨逸民转告黄大陆，黄大陆以“兵无宿粮”为由说服何知重，反将部队停滞于习水、土城间，未向二郎滩集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军受敌的压力。

（四）发展壮大党组织

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促进了全省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开展。

1935年3月，中共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支部建立；4月，中共贵阳县委成立，县委书记先后由李中量、汤幼新担任，县委委员是吴绍勋、孟昭仁；5月，高昌谋、陈廷维、石蕴尧组成中共贵阳中学支部，高昌谋任支部书记。其间，贵阳地区中共党员已发展到50余人。遵义、安顺、毕节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县委或县工委，有的县成立了党的支部或党小组。全省党组织的发展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为了开展武装斗争，省工委建立了军事领导小组，由李光庭任军事领导小组组长，成员有喻雷、王芸生、丁沛生、张恒兹、宁仿陶。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单线领导该小组，不同地方工作发生联系，其工作重点是在安顺、凯里一带做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军事小组成立后，主要工作是利用国民党排挤贵州军阀部队、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在121师开始策反。此期间的武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作用，配合了红军的行动。

同时，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贵阳文艺》、《新黔时报》《惊蛰》副刊、《芒种》等传播党的声音的媒体更加活跃，先后发表了《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告劳动大众书》《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等文章，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在贵阳，光懿小学、达德学校……林青通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社等群众学术团体，组织进步师生，亲自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发动广大妇女参

加活动，林青对骨干积极分子严金秋等人耐心地培养，给他们逐句逐段地讲解《共产党宣言》，有时一讲就是几个钟头，直到他们弄懂为止。贵州《新黔日报》副刊《惊蛰》，为发挥这个阵地的作用，林青亲自出面指导贵阳的妇女会，在《惊蛰》副刊上发表针砭时弊、提倡妇女解放的文章，在文化界和广大妇女中引起过很大的震动。

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林青把秦天真、刘茂隆、徐健生、高言志和几个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邀约到郊外东山头“踏青”。一行人来到山上，找个清爽的地方席地坐下之后，便议论起即将要做的事来。过几天就是“五四”了，在纪念“五四”的日子到来之际，党组织该做些什么事，一行人各抒己见地讨论了一番。见大家的想法大体一致，林青便站起来道：“5月份有三个值得纪念，也是我们借此广泛宣传和鼓动群众的机会，那就是五一、‘五四’和‘五卅’。适合我们贵阳搞较大规模一点的活动的是‘五四’和‘五卅’。我们的学校支部不宜出面，而要通过党员隐秘地联系各个外围组织，尽可能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光荣历史的传统教育，鞭挞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在活动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和当局的冲突，在造声势的原则下，注意党组织和党员的隐蔽性。”从山上回来，众人便分头去联络，落实自己所应联系和组织的学校、团体和人员。

由于党员和群众骨干的高涨热情，积极带头，广大进步青年和一些社会人士，围绕“五四”“五卅”主题，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和讨论会；各校进步师生还组织了各种宣传队，到街头、学校进行演讲和文艺表演，开展宣传活动。在此期间，贵阳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都有学生宣传队在活动，整个贵阳山城随处都可听到“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的激昂呼声。

在遵义，地下党组织领导进步青年成立了“反帝拥苏大同盟”。为扩大影响，会员们还集资开办了“黔北书店”。书店出售的书籍中不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进步书刊。到“黔北书店”购书、看书的进步青年和社会人士络绎不绝。

在安顺，进步青年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创办了刊物《晓鸡声文艺社》，由于“左”的倾向，刊物编辑部的个别同志提出要提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反对在刊物文稿中出现“三民主义”之类的言辞。这就引起部分人一时接受不了而提出退出文艺社。林青和秦天真及时赶到安顺，把党内和编辑部的骨干人员约到一起，讨论斗争策略。经过讨论和指导，大家明白了要注意斗争策略，以避免暴露阵地、自己和同志。在商讨中达成了共识，安顺的同志遂将《晓鸡声文艺社》改名为《安顺文艺半月刊》，并纠正了过去一些过“左”的倾向，保护了刊物和组织的相对安全，亦有效地通过该刊物指导和宣扬了安顺地区宣传和发动群众的运动。

在广泛动员的同时，省工委始终把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整个斗争过程。林青经常强调要在斗争实践中善于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加强对他们的锻炼和教育，采取积极慎重、个别吸收的方针，不断地发展党员，以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因此，从毕节党支部1934年夏天转移到安顺、贵阳至党中央批准建立省工委配合红军在贵州的转战到红军挥师西去云南，这大半年的时间内，在贵阳就有高言志、徐健生、黄大陆、李策；在安顺就有谢速航、龙文、杨逸民；在遵义就有杨天源；在炉山（凯里）就有李光庭等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在贵州各地区又分别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党小组，已形成一个从上到下、初具规模的统一领导体系，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领导贵州各族人民进行各项斗争。

省工委成立伊始就在短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红军部署的获取国民党密电码、布防图、地空联络图，以及护送特派员等几项特殊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红军长征，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革命征程堪险阻

1935年前，贵州还处于地方军阀统治下，黔军虽然接国民党中央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然只是流于形式。1935年，吴忠信就任贵州省主席，国

民党中央势力渗入贵州，挤掉地方军阀势力，在党政军警方面实行全面统治，贵州从这时起才真正成为国民党中央统治下的行省。其特征之一就是强化特务活动，建立特务组织。

为了实行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实行改组，实施“党特合一”的方针，把国民党党政的公开工作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1938年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的特务秘密活动合为一体，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属调查处，亦称特工总部，指派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高级职务、后叛变投敌的陈惕庐为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肃反委员。陈惕庐亦叫陈资平，原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职务不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被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后，禁不住利诱，未遭酷刑就变节投蒋。江苏省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远比贵州要早要深要广，陈惕庐在其中既为相当的领导，想必也是颇有能耐的，因此，他对共产党的工作思路、方法、规律，十分了然，投敌后，便作为蒋介石的鹰犬，极尽其能，在破获江南数省的中共党组织中，罪行累累，颇得蒋介石和中统特工总部的器重。

陈惕庐头天踏上贵阳土地，第二天便下指令成立中国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亦即“中统黔室”或“贵州特务室”。陈惕庐还从其他省区抽调一批中统特务骨干分子随其入黔。山东籍的中统特务牟希禹和湖南籍的程剑声，是陈惕庐委任的“中统黔室”第一任正、副主任。“中统黔室”成立之初，机构简单，主任之下，分股办事，大致分为一、二、三股。其中第三股的职责是负责收集中共及其外围的一切活动情况并汇编上报和下达。另外还有一个贵阳区行动队，专门负责对中共人士的侦查活动，包括盯梢、守候、监视、逮捕、审讯、看守等职能。程剑声是第三股行动队的第一任股长兼队长，此股（队）下属的特务人员有近20人，遍布全省。在贵阳的有李少白、刘小鹏、孙庆禄、陈明仙、谢锡芸等。

乍到贵阳，陈惕庐便吩咐手下四处打探摸查。他很快就大致掌握了几所中学进步学生所办的“读书会”“研究社”的基本情况。他随即采取以外围对外围、以核心对核心的一套方法，立马在贵阳建立了一个叫“读书竞进会”的团体，吸纳青年学生参加，也派了“中统黔室”的一部分人混入其中。当时的贵阳男师、女师、贵阳高中、贵阳中学、贵阳县中，还有私立正谊、达德、西南、豫章、大夏中学等校的学生既参加了地下党外围所办的读书会，也为了交友和多学参加了读书竞进会。这些学校大都有一到三个读书小组进入“竞进会”。平时这些学生就聚集在飞山街“竞进会”负责人陈明仙家，学习政治、时事。陈明仙是女师高年级的一名女学生，陈惕庐一到贵阳就通过下属的打探而盯住了她，禁不住陈的利诱威逼，陈明仙一方面参加进步读书会，另一方面又主持“竞进会”。她也曾听过林青、秦天真、刘茂隆等人的演讲、教导。

在特殊时期，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为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传播进步思想和主张，指导和参与青年学生举办的各种读书会。广大青年学生，在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认识了真理，明了了世事，倾向于进步，以致相当一部分人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鱼龙混杂，国民党特务也佯装进步，混入其中，刺探情报。更有甚者，就是陈惕庐熟悉地下党行事之风，也随形就势地办起了读书会，其狼子野心蒙蔽了多少青年学子。

1935年5月，中统黔室的特务孙庆禄、高大璜在邮电检查中发现一封化名“矛戈”，由遵义寄到贵阳的信，似有嫌疑，便把此信上报到陈惕庐手中。陈惕庐似乎从信中嗅到了什么味道，便把陈明仙传唤到他办公室。陈惕庐利用曾参加星光读书会活动的陈明仙害怕失业的弱点，施加压力，迫使陈明仙供出领导人系严金秋。不久，陈惕庐又发现陈明仙的日记上载有：某天上午，到严金秋家，看见一位男青年在洗脸，严介绍说是刚从上海回来的刘茂隆先生。

1935年上半年，特务罗增映发展其外甥王桂培和王的结拜兄弟孙克武、牟剑秋等男师学生加入特务组织。陈惕庐要他们伪装进步，混入群众中搜集情报。王桂培利用同乡关系，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文焜接近后，发现肖的领导人是

刘茂隆，住在万宝街（今公园西路）开缝纫铺的李中量家。

1935年7月19日，林青一大早就从南门大公巷地下党员吴绍勋家出城，到郊外的村寨去了解社情、发动群众。这几天来，他都是早出晚归，在城外的乡村东奔西走，着实做了许多工作。每天都是拖着疲乏的身子，顶着星星伴着月亮才回来。省工委的其他成员秦天真、刘茂隆，都是分头干着所负责的事，或组织学校支部的人商谈时事，或参与到各个读书会指导学习。

上午10时许，刘茂隆着一身薄纱衣裤，一派洋先生打扮，来到位于国民党贵州警备司令部旁中山公园西侧的万宝街中的裁缝铺。这裁缝铺是地下党贵阳县委书记李中量的父亲开的，也是省工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刘茂隆到此，是来安排布置当晚省工委将在此召开的党内会议。一路走来，刘茂隆透过他那高度近视的眼镜片，恍惚看见街口有一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娃娃在探头探脑地东瞄西看。四五月份以来，贵阳大街小巷这样打扮的人，是屡见不鲜的。党内同志和一些进步人士心里都知道，这些都是国民党省党部和特务室安插的小特务和所谓的眼线。开始大家都十分警惕。一两个月下来，似乎还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大家也就不以为然，警觉性也就降低了。刘茂隆也没有察觉这两个学生娃娃的异样，径直走进了裁缝铺。

谁能料到，此刻，陈惕庐已指挥众多特务，悄然向中共贵州省工委所属的几个联络点和学校支部扑来了。

万宝街裁缝铺，是特务们行动的第一个点。

刘茂隆前脚刚跨进裁缝铺，盯梢的人便立马回去通风报信。没多久，特务室行动股股长李少白就带着一队人直奔万宝街，一千人把裁缝铺堵得死死的，李中量刚想张嘴问个缘由，就被一个特务用枪把捶得眼冒金花躺在地上，三下两下被捆了个结实。刘茂隆在里屋听到有响动，撑起身子刚走到里屋门口，就与冲过来的几个特务撞了个满怀，眼镜也撞掉了，还没看清是什么人，也被一下击倒在地，让人反扭着双手绑了起来。

李少白令几个特务将刘茂隆和李中量拖进里屋，把嘴堵上，以防他们喊

叫。接着采取“蹲点守候”的伎俩，迫使李中量的父亲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铺面上继续缝衣服，当汤幼新、严金诚、陈克勤、凌毓俊赶来，向刘茂隆报告特务到男师捕人的消息时，误入陷阱被逮捕。

晌午时分，地下党员李策来到李中量家。刚一进门，几个特务便扑上来。李策稍一矮身，摆出一副功夫架势，扑上来的特务吓退了一两步，呼一声齐刷刷地掏出手枪，对着李策。李策见状一激灵，忙道“是自己人”，又假称是陈先生（陈惕庐）派来查看情况的，从容应对，不露分毫破绽。守捕的特务不相信，扭着李策到隐匿在街对面一家店铺里的李少白处查对。李少白曾在陈惕庐家中见过李策，当即说他是自己人，未作深究，放了李策并表示歉意。

原来，自从陈惕庐到贵阳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公开的青年阵地社，监视学校师生和社会进步势力，阻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窥探我党活动。林青、秦天真就认为这样的大叛徒必是懂得我党的地下活动方式的，必须及时掌握他的动向，只要有办法就设法除掉他。林青和秦天真多次商量，严密挑选，决定派党员李策设法接近陈惕庐，相机暗除这个无耻的败类、险恶的敌特。

选择李策担负这一艰巨复杂的绝密任务，是因为早先派他到贵阳武术馆学习拳术时，已停止他参加我党组织的一些公开活动，减少与其他党员的来往，有意以灰色的政治态度与贵阳师范学校的丁慰慈和耿心泉这两个反动学生接近，利用同他们一起学习武术的机会刺探情况，了解他们在学生中策划的反动活动。李策与丁、耿“称兄道弟”，十分“亲近”，被他们认作同伙。也正因为这样，当时一些不了解实情的同志对李策怀有戒心，许多人还以为他是个反动学生。李策接受林青和秦天真交代的任务后，通过已同中统特务室挂上钩的丁、耿两人引见，在贵阳崔家坡陈惕庐家中见到了陈。李策表现出对陈的“敬佩”，而又不过分。陈以为李策是丁、耿多年的“知交”，必也是可利用和操纵的爪牙，未起疑心。李策蒙过了陈惕庐。李策事先提出了可利用的关系，事后又立即向林青和秦天真汇报了与陈接触的经过，秦天真还通过黄大陆为他搞到了一支二号盒子枪。立场坚定、机智善断的李策，时时密切注视陈的行踪，

伺机行动。而李少白也曾在陈惕庐家中见过李策，这才致使李策在万宝街能够避开李少白的陷阱。

走出万宝街街口，只见三三两两的特务在中山路两头的过街楼下躲太阳看行人。李策心头很着急，却又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朝大坝子方向走去。他想脚下生风，飞到大坝子高家花园。但所看到的情势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慌张神色。在确定没有特务盯梢的前提下，李策从东门文昌阁绕小巷来到文笔街高家花园。从后门进园，在怡怡楼见到秦天真，李策把所见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秦天真顿感事态严重，情况危急。晚上要在李中量家开会的事已通知了相关人员。而大家都不知道李家已被特务控制，设了陷阱。而且当下好些要来开会的党员同志都分散在各处，短时间内还找不到他们告知此险恶情况。更关键的是，吴绍勋一早也来给他汇报过，林青一早出城，现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中午发生的变故林青肯定还不知道，他一定会在约好的时间赶来开会。必须想方设法在天黑前找到他，阻止他前往万宝街。情急之中，秦天真与李策简短地商量了几句，便决定让李策到南门大公巷吴绍勋家，叫吴绍勋赶紧出城四处寻找林青，并尽快找到相关与会人员。他自己则到忠烈街找徐健生，安排徐健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通知出席会议的人员采取紧急隐蔽的措施。

李策前脚出了高家花园后门，秦天真也心急火燎地到忠烈街找到徐健生，把情况和任务向徐健生做了安排。接到指令，徐健生到大井坎夏之纲家找到他妹妹（女师的进步青年夏之楣）和她的同学支轴，安排她二人分别到万宝街两头去值岗放哨，还特意吩咐太阳落山前就要到位。他担心个别与会者提前到李家去。接着，又满城去找那些将要与会的同志。

天色渐暗，在万宝街前街口担任值岗的夏之楣见万宝街似乎平静得很，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特务暗探。天全黑下来后，也未见有开会的人来。心想，组织上是不是已经把要来开会的人都通知到了。于是警惕性也就松懈了，认为不会有事了，便悄悄地撤离街口回家。而在后街口担任岗哨警戒任务的支轴看

见天黑尽了，整条街也没有动静，开会的人也没一人再来，她便放松警惕，贸然前往李中量家打探虚实。刚推开裁缝铺的门，便被躲在房内的特务一下子擒住，嘴里塞了一团碎布，押到了后屋。

就在支轴被抓不到十分钟，不知已发生事变的林青赶赴李家赴会。走到裁缝铺门前，林青警觉地侧耳细听，无什么动静，虚掩的门缝还透出柔和的光线。没有多想，他就推门入屋。门刚打开，未及迈步，就见几个汉子凶猛地扑来。转身跑是来不及了。林青料想是出事了，迅疾反应过来，与扑上来的特务打斗起来。他只身与几个特务搏斗，没过几招，头部被什么锐器击了一下，顿时失去知觉，扑倒在地。几名特务围上来，把尚在昏迷中的林青绑起来，拖拽着撤离了万宝街。

到了下半夜，秦天真还未得到林青的消息，顿感林青肯定出事了，便叫吴绍勋赶紧回大公巷的家去收拾一下，立即转移。之后，秦天真又让李策到万宝街去打探一番，李策把埋藏在花园树下的枪取出，悄然向万宝街奔去，到李中量家，问明情况，便赶回向秦天真汇报。二人分析，林青和刘茂隆肯定被抓了，其他几人还不知道是谁，眼下也无法打听，只好等天亮后再出去打听。

再说这吴绍勋当晚回到大公巷，巷前巷尾转了几圈，见无啥异常，也就放心回到家里。他处理完自己和林青留在这里的有关东西后，没有按秦天真的吩咐及时转移，和衣在床上躺了下来，想等天亮再走也不迟，没多会儿便睡着了。就在天刚透出一点白亮时，忽听得砸门声大作，门便被一伙特务撞开了。吴绍勋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被特务用枪指着，束手就擒了。特务也不急于把他带走，而是把门重新关上，把他押到另外一间房内，以此为点，埋伏守捕。天刚放亮，先后到吴绍勋家找林青的地下党员、女师学生何群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孔文、罗朝秀亦遭守候的特务逮捕。接着，特务们又四处进行抓捕，短短几个小时，雪涯路男师、大坝子女师和一些学校都遭到袭击，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和进步学生何冠群、严金诚、陈光勤、赖新民、史继祖、石蕴尧、朱世芬等十多人先后被特务抓捕。

中午以前，秦天真和徐健生、李策分头出去打听。昨天以来的一个个坏消息相继传到三人耳朵里。正午时分，三人在高家花园碰面，讲述了各自了解到的情况。四名省工委成员中，就有书记林青和后增补的成员刘茂隆落入敌手。邓止戈随军在毕节一带，估计不至于暴露。秦天真幸好较早得到李策的告急，不然也会在昨晚陷入魔掌。吴绍勋、肖文琨、何群、李中量等数名党员被捕。严金诚、朱世芳等十余名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及数名被无辜牵连的群众也被先后抓捕，贵州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一九”事件。

中共贵州省工委从成立之初，发展组织，动员群众，配合红军转战贵州功不可没。但地下斗争的经验还不够成熟老练，组织发展和外围保密尚欠审慎，致使事件在不经意间骤然发生，措手不及，无法挽救。

事件发生后，秦天真即安排李策、徐健生等共产党员到乡间暂避，并下令停止了外围组织的一切活动。而他仍留在贵阳，谋划营救被捕的同志。

八、威逼利诱若等闲

万宝街与国民党贵州省警备司令部中间也就隔着一个中山公园，直线距离还不到五百米。林青和刘茂隆等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在万宝街李裁缝家被抓捕后，很快就被关押到了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根据陈明仙提供的线索，陈惕庐知道李裁缝的儿子李中量是贵阳地下党的头目。白天，陈惕庐看着与李中量年龄相仿的被抓来的几人，心想，这还是一群学生娃儿，不费什么工夫，这些学生娃肯定就乖乖地招供了。故此，陈惕庐就先把李中量押到警备司令部临时刑讯室。虽说是临时刑讯室，却也是刑具俱全，阴森恐怖得很。还没动刑，李中量就吓得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招供了。李后曾任国民党贵阳县委、市党部书记长。

林青和刘茂隆被捕后，陈惕庐自鸣得意，亲自审讯，软硬兼施，试图从他们口中挖出整个贵州地下党。敌特并不掌握林青和刘茂隆在省工委内的任职和

工作，只认为他们是“共党要犯”。陈惕庐无耻地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国”“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年纪轻轻的何必为了共产党去上断头台”，一再“规劝”林、刘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交出组织，宣布脱离中共，为“党国效力”，并许以高官厚禄。林、刘不为所动，大义凛然。林青指着陈惕庐说：“陈先生不也曾经是个共产党吗？”痛斥陈的叛徒行径和反动谰言。林青和刘茂隆在威逼利诱之下，表现出坚定的共产党员气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陈惕庐恼羞成怒，行刑逼供。惨无人道的酷刑加身，一遍又一遍，轮番摧残着这两位从贵州毕节、六盘水郎岱走出来的年轻人的身体。打手们声嘶力竭的打骂声时紧时缓，一直在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回荡。几个小时的酷刑拷打，打手们只赚得了一身臭汗满脸血水。备受酷刑的林青、刘茂隆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字未吐。斑斑血迹雕塑出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风采，铮铮铁骨凸显了贵州儿女山岩般顽强的精神。威逼利诱在他们面前统统失去作用。连续个把月，时时血与火。陈惕庐和他的特务室对软硬不吃的林青、刘茂隆，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收获都没有。抓来的这十几个人，除了一两个人变节招了供，小有收获，其他那些人，陈惕庐知道也只是些受蒙蔽的学生娃娃，根本榨不出什么情报。而林青、刘茂隆这两人是教唆者，是贵州地下党组织里的关键人物，只有让他们开口，才能使自己的功劳册再加上一笔。然而一个多月来的刑讯、利诱，都不奏效，陈惕庐只好请示南京，对此案所涉及的人判以不同的刑罚。分别为：将林青、刘茂隆判处死刑，秋后执行；支轴、肖文焜、汤幼新、郑成诗、吴绍勋、孔华、罗朝秀、严金诚、陈克勤、史继祖等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对凌毓俊、何冠群、赖新民、朱世芳及几名无辜受牵连的群众，准予通过社会关系取保释放。在此次事件中被抓的李中量、何群则当了可耻的叛徒，永远被钉在了革命历史的耻辱柱上。

林青等同志被捕后，党组织在秦天真的主持下迅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一面对未被破坏的机关和一些党支部进行转移，党员与骨干深入农村分散隐蔽，开

辟新的活动；一面设法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利用送书、送饭等方式与狱中同志取得联系，设法做通狱卒看守的工作，一旦有越狱的机会就做好越狱及接应准备。

狱中一个多月，林青与刘茂隆同看守董亮清（原系在上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多有接触，董的态度平和，流露同情，当宣判死刑后，董暗地里表示愿舍身帮助他们越狱。林、刘无从核实董的真伪，但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敌特授意布置的圈套，总是判死刑后的一线生机，无论成败，决计试闯。根据监狱的规定，同案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必须分别关押，每个号子各派一名看守，因此，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人有越狱机会。林青自知伤重，担心三人同时行动势必拖累刘、董两人，不利于越狱计划的实现，要求刘随董越狱；而刘茂隆又以林青是省工委书记，肩负重任为由，执意首先保证林青越狱。两人互推相持不下，林青就以党的决定要刘与董先行一步，自己伺机紧随。他们与董亮清暗通了行动方案。8月20日夜，董亮清值班，刘茂隆提着马桶在董亮清的“监管”下走向厕所，临近厕所旁边的断垣残墙时，刘翻墙而出，董亮清把长枪丢到草丛中，自己也翻过墙去。狱外同志闻讯，及时将二人护送到进步青年孙静华家隐蔽起来。

林青身陷囹圄、斗志难酬，在中秋前夕，心中涌出《合唱》诗行，寄托对党、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用我心声的音波，
 传给我的母亲，
 就是这样，
 你在东头我在西头，
 我们都是这时代教成的牢囚。
 当着这中秋是一年一度呀，
 人间天上毕竟有条鸿沟，

见着这污屎桶，
仍旧精神抖擞，
我们这儿没有眉毛一弯、唇儿一绉，
当月影拖着尾巴倒在这墙角的时候，
最好是起来合奏一个合唱曲。
尽你所有的歌喉，
凭着西风的遥送，
传到母亲的心中！

九、洒热血慷慨就义

刘茂隆越狱后，敌人十分震惊，布置全省严加追缉并加强警戒。并在贵阳街头贴出了“处决共党要犯刘应生”的布告，刘应生便是林青。是林青被捕受审中一直使用的化名。1935年9月11日，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从中山公园旁贵州省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口涌出来，沿着通向大十字的街两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排列开来。几名军警押着一辆黄包车缓缓地出了警备司令部的大门，林青被反绑着双手捆在黄包车上，褴褛的衣衫透出已经干涸的伤痕血迹，蓬头垢面的脸庞痛苦中透着刚毅，人显得分外憔悴，可那双眼睛却放射出犹如鹰隼般的目光。

捆绑着林青的黄包车刚一走出警备司令部大门，林青就高喊着“打倒出卖国家民族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揭露和痛斥敌人的罪行。又唱起《国际歌》。铿锵的音符如滚滚沉雷，在山城贵阳的中心街头回荡。惊恐万状的敌人竟凶狠地把枪刺从林青的左嘴唇直穿过右嘴唇，鲜血一下淌满了林青的前襟。歌声被刺刀强行压住了。但不过几分钟短暂的停顿，林青含刀忍受着巨大的痛楚，流着血的头颅昂然抬起，双腮嚅动，喊着口号，刀刃从嘴角两侧切入面颊，血流不止。沿街目睹的人们，无不敬佩叹息。

罪恶的子弹射向这位遍体鳞伤、腮边还在滴滴着鲜血的年轻的中共贵州省

工委书记的胸膛。阳光惨白，光晕刺得人睁不开眼，9月间贵阳的日头晒得人冒油。红石崖上空划过三声惨厉的子弹的啸声。枪响之后，刑场上寂静得如同一切都停止了似的。林青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林青是被国民党贵州当局在贵阳公开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国民党的报纸在9月14日报道处决林青的消息时说：林青“悍不畏法”，亦足以证明林青临刑前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林青牺牲了，却留下了光耀后世的诗句：“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林青的牺牲是初建的中共贵州党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却让广大群众对共产党人更加敬佩，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愤恨。一些被欺骗参加青年阵地社的人，在林青就义后有所悔悟，后来退出青年阵地社，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

若干年后，一位湖南籍的老人，不知从何处知晓了林青的事迹与遇难时的境况，感慨赋诗曰：

闹翻世界穷光蛋，
 轰动山城“小暴徒”。
 革命飙歌沿路唱，
 惊人口号遍街呼。
 望尘莫及新人物，
 殊死方休大丈夫。
 地狱无边天国远，
 血痕魔影两模糊。

林青就义后，陈惕庐企图以此为诱饵，抓捕前去料理遗体的人。他责令手下的人，但凡去给“刘应生”收尸的，不管男女，一律抓起来。

一天、两天过去了，林青的遗体还在红石崖下躺着。地下党组织的同志

去看过，见周围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转悠，眼睛都盯着那里。同志们知道，一旦过去料理林青的遗体，必将落入魔掌。怎么办呢？党组织内两种意见反复争论，有的同志说贵阳地下党组织的力量本就很弱，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应该强忍悲痛，暂不能去收遗体，等等再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决不能让林青的遗体再弃之荒郊了，即便不被豺狗咬吃，这大热的天气，也禁不住腐烂难收。组织内的同志不宜去料理，更不能叫外围的青年去冒这个险。但怎样才能免遭损失，又能让林青同志入土为安呢？

林青一到贵阳就经秦天真介绍认识了贵阳教育界的名流尹素坚，尹流着泪请求大家再想想办法，并把仅有的几块银圆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料理林青烈士遗体的费用。

商量下来，党组织把安葬林青同志遗体的任务交给了高言志和喻雷。

为了躲过特务们的监视和抓捕，高言志和喻雷在远离刑场的地方转了几大圈，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当时贵阳有个慈善组织叫“乐善堂”，专门给没有依靠的死者施舍棺木。“乐善堂”的主持人是贵阳知名的大夫吴济康，住在大西门三元宫。高言志找了个借口，找吴大夫开了一张条子，要了一口棺木，解决了第一步。高言志和喻雷转到老东门外的义园时，假装走累了，在路边歇脚。其实他二人是看到了一个在捡垃圾的老婆婆。歇了片刻，他便走过去和老婆婆攀谈，有意无意地谈起红边门枪毙人的事，并直言自己想做个好事，出钱请人去安葬一下。老婆婆欣然答应，接过高言志递过的五块银圆，小心翼翼地用一块布包好，揣进怀里。看着老婆婆揣好钱，高言志嘱咐，安埋好后，只需找根棍子什么的做个记号就行了。

第二日一大早，高言志和喻雷相约来到江西坡，瞅见四周游荡的不三不四的那伙人不见了踪影。远远望去，红石崖下林青的遗体不见了。高言志和喻雷嘀咕着，是不是老婆婆已经把林青的遗体掩埋了呢？二人在附近转了转，不见老婆婆的身影。顺着江西坡四处瞭望，走着走着，喻雷忽然发现距红石崖不远

的一片乱葬岗新添了一个土包，二人走近一看，上面似乎还插了一根细细的棍子。于是心头明白，这是老婆婆按他们的要求特地做的标记。高言志和喻雷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链接：

林青就义处

林青就义处位于贵阳环城北路江西坡。1983年，林青同志被杀害的地点被贵阳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拨专款修建了“林青就义处”，后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时常到这里来凭吊先烈，回忆过去。

十、“八月会议”励斗志

刘茂隆越狱后，国民党当局下令全城戒严搜查。为防止意外，党组织把刘茂隆从孙静华家转移到石岭街尼姑庵里，继而又先后转移到城郊宅吉坝中共党员李光庭家、乌当北衙寨唐植民家，董亮清则隐蔽到邱天庭（邱闵）的朋友牟酮祥的姐姐家，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林青牺牲后，中共贵州省工委为了总结教训，重整旗鼓以利再战，省工委委员秦天真通知在外县工作的邓止戈回贵阳，在宅吉坝李光庭家召开省工委会议。这次会议是公历9月下旬召开的，而此时正值农历八月。而今修史者，都以此次会议作为贵州党史的一个节点，称为“宅吉会议”或“八月会议”。

悉因秦天真在党内、外关系的掌握和联系，便成了这次会议当然的组织者和召集者。参加会议的除省工委成员秦天真、邓止戈、刘茂隆外，还有邱照、高言志、李光庭、喻雷等。李光庭和喻雷是秦天真单线领导的省工委军事小组的成员。红军在贵州转战期间，省工委军事小组组织了多次配合红军行动的武装斗争，主要地点在黔北和黔东南一带。红军入滇后，军事小组收缩力量，主要做一些兵运工作。

会议上，刘茂隆向组织汇报了他被捕的情况、狱中表现和越狱经过，介绍了林青等同志狱中斗争情况。省工委同时对董亮清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和审查。同时，对“七一九”事件做了深刻的讨论与检讨。

“七一九”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贵州人民革命运动、破坏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一次既快又狠的行动。这次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地下斗争的复杂性、严酷性，林青同志的牺牲，客观上就是地下党的力量还很弱，各方面的条件，包括武装力量都不具备。加之贵州地下党组织还很年轻，虽然在活动的方式、措施和纪律上不断规范、细致、严密，但仍有许多疏忽之处，加上敌人特务的狡诈、凶残，尤其是出现了陈惕庐这样熟知我党内幕和行动规律的变节投敌的特务头子，种种因素造成了这次事件的发生，使贵州地下党遭受了不轻的破坏和打击。所幸这次事件除万宝街茂隆的住处和大公巷吴绍勋家两处活动点被破坏外，设在高家花园、大井坎夏之纲家、忠烈街8号的三处活动点和联络点均未遭毒手。在贵阳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大多数也安全隐蔽下来。省内其他地区，安顺、织金、毕节、遵义、凯里等地的党组织和打进黔军的地下党亦未受牵连，多数党员未出问题，破坏从总体上看只是局部的。事件发生后，省工委采取了紧急措施，依据具体情况，组织疏散和就地隐蔽，党员的发展工作也暂时停止。这些做法，及时有效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为等待时机，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保存了力量。以陈惕庐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借此机会将贵州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的美梦也破灭了。

会上，省工委深刻总结了“七一九”事件的教训，号召全体党员不要在挫折面前低头，要吸取教训，把工作做得更好。为此，省工委“八月会议”作出七条决议：

- 一、向林青同志学习，英勇战斗，战胜敌人。
- 二、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方法，变集体活动为单线联系。
- 三、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做一段巩固工作，避免造成破坏，看准了再发展。

四、刘茂隆转移去上海。

五、尊重董亮清同志的选择，帮助他转移出去，转回山东老家。

六、秦天真到西路视察丁沛生领导的游击队以后，到上海、香港寻找党中央的联络点，汇报贵州党组织工作和贵州社情。

七、邓止戈到毕节一带继续在黔军中搞兵运工作和执行党中央特派员杨涛年初传达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组织武装的任务。

“八月会议”后，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成员按照分工，先后离开贵阳。贵阳地区党的工作交给李策负责。鉴于“七一九”事件的教训，中共贵州各地各级党组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活动更分散，斗争更隐蔽，为此后的革命斗争保留了生生不息的火种。

第三章 红流滚滚过贵阳

1934年秋，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整个中央苏区根据地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被迫作出放弃苏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定，即长征。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离开“红都”瑞金。11月底，在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蒋介石料定，剩余红军将会沿湘西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蒋介石集结重兵，张网以待，志在尽剿红军余部。全权负责指挥红军的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坚持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如此，必将使中央红军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极力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行进路线，立即转向西，到国民党军力量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军情万分紧急、意见僵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作出通道转兵、进入贵州的重大决定。12月12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从湖南通道进入贵州境内，使蒋介石张网围歼红军的部署落空。

红军西进贵州后，边走边打，连攻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不断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的防线，进入贵州腹地。

一、北渡乌江卫遵义（中央红军一过贵阳）

贵州中部的清水江，西岸森林覆盖，植被茂密，江水清澈。流往黔中开阳

县城的这一段江流，是乌江的一条支流，其下游的乐旺河渡口，是红军北渡乌江必先抢渡的第一道河流关口。乐旺河渡口河面宽阔，流急滩险，水中怪石忽隐忽现，令人望而生畏。

1934年12月3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率领下，由黔南的瓮安县进入开阳县东北的花梨地区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渡过乐旺河。蒋介石在得知红军已西入贵州的消息后，电令黔军军长王家烈加强兵力部署，以防堵红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剿。其时，在乐旺河渡口把守的是王家烈部侯之担师的一个营，协防的是开阳县的地方武装。敌军沿河修筑碉堡工事，并将居住在岸边的乡民的渡船强制载上石头沉入水底，收缴、破坏了所有渡河工具，以阻止红军渡河。

岁尾年头，贵州的深冬，寒风凛冽。当晚，驻扎花梨的红三军团指战员都衣着褴褛单薄，穿的大多是草鞋。大家扎堆相偎，抵御严寒。午夜，担任军团先头部队的4师12团的7连悄然出发了。他们要趁夜赶到渡口，伺机渡河，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7连抗战员冒着寒风冻雨，找了一个当地老乡带路，向乐旺河摸去。20多里路在暗夜风雨中走了五六个小时，天未亮时，赶到了渡口。当地一个叫李洪顺的船工，得知这些当兵的是从江西过来的红军，要渡河，他就乐意地帮助红军从河底捞上了沉船，还自告奋勇地要为红军摆渡。

元旦这天一大早，雨雾朦胧中，7连七八十人快速顺利地抢渡到了乐旺河西岸。在连长的带领下，全连沿着河岸陡峭的山路，向山上摸索前进。走到莲花山半坡的大塘时，与从山上下来的一队敌军相遇，两队人接上了火。敌军居高临下，密集的枪弹压得背水而战的7连指战员抬不起头。这时天已大亮，后续的红12团也已赶到河东岸，架起机枪，集中火力，压制莲花坡半山的敌人。7连指战员趁势猛打猛冲，山上的敌人顷刻间乱作一团，狼狈地向山后溃逃。7连冲上山头，占领了敌人的阵地，控制了山脚下的乐旺河渡口。

随后，红军一面用木船渡河，一面架搭浮桥。由于架搭浮桥缺乏材料，待把浮桥搭好，已到了1月2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大批人马辎重才开始由浮桥

上过河。此时，尚还留驻在花梨街上的大队红军，听闻了乐旺河渡口才开始过河，担心大部队涌到这一个渡口，定难迅速渡过乐旺河。立时决定，从花梨走营屯，下到另一个叫龙坡的渡口渡河。到了龙坡渡口，由于渡船小，每次只能摆渡十来人，一些老百姓送来桌凳、门板，帮助搭浮桥，但久久未能搭成。于是，一部分红军部队又只好分兵到水口渡口搭浮桥。水口渡口周边竹木茂盛，在老乡的指引下，砍来竹子、树干，很快就搭起了一座扎扎实实的浮桥。这样，红三军团各师团营连指战员，分别从乐旺河、龙坡和水口3个渡口，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渡，跨过了开阳境内的清水口，向乌江南岸疾进。



龙坡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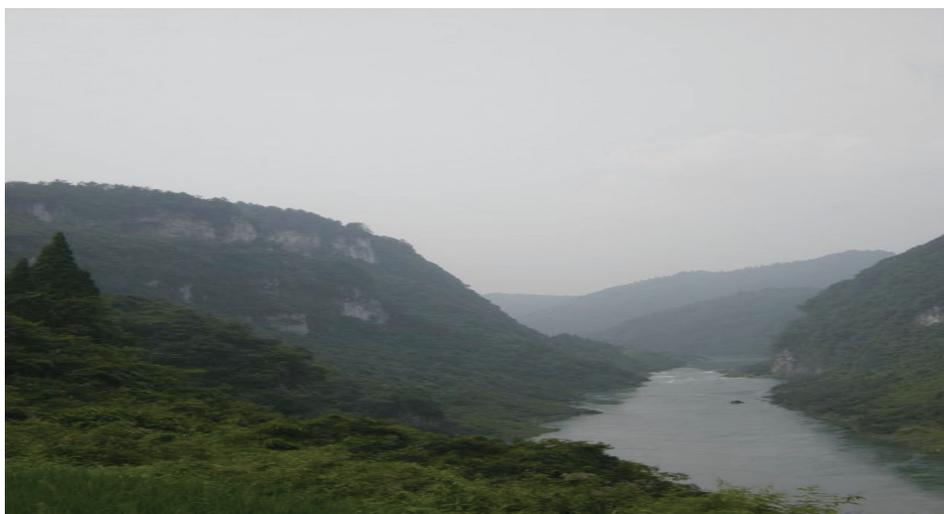


水口渡口

渡过清水江的红三军团大队人马，随即沿着河岸高处的长坡枞杠岭向北行进，来到毛坪附近的干溪一带，又分兵两路：一路走毛坪（今司毛村）到光里沟，再走王必、佘家湾、临江（今马场）；一路走马家山（今冯山）、安坪、两路口、中火炉，直奔开阳境内乌江南岸的桃子台、茶山关、楠木渡渡口。



桃子台渡口



茶山关渡口



楠木渡渡口

两路大军一路疾行，当晚就赶到了这几个渡口南岸。茶山关守敌是王家烈第25军的一个营，营长叫刘翰吾。半个月前，刘翰吾就抓夫拉丁，在茶山关北岸修筑了碉堡，桃子台和楠木渡也派兵驻守，加修了工事，意欲凭险据守。而且，把几个渡口南岸的渡船、民船统统强拖到江北岸，沉入江中。

在红三军团渡过清水江，通过乌江南岸时，在乌江流域瓮安、余庆地段的红一军团，突破了乌江天险，正向遵义方向推进。1月2日、3日，红军突破瓮安、余庆回龙场、江界河、孙家渡乌江防线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到刘翰吾耳中。刘翰吾深知，乌江防线已全线崩溃，自己这一个营守的这两三个渡口，已被红军截断了退路，再不跑，必定被红军包抄歼灭。他率先领着茶山关的守

军向南龙方向逃命，茶山关渡口不攻自破。桃子台、楠木渡的守敌也是闻风而逃，不战自败。

红三军团到达乌江南岸后，先在桃子台渡口组织渡江，但因渡船小，且水流湍急，一时又无法找到合适的搭桥材料，一整天才渡过了一个团。红三军团所属的几个师，随即转赴茶山关、楠木渡渡口，在这两个渡口附近找来了好些搭建浮桥的竹筒、木材，迅速抢搭浮桥。到1月4日晚上，渡口上的浮桥搭好，红三军团大部和驮马、辎重开始过江。到6日下午，红三军团全部由桃子台、楠木渡、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天险。一上岸，红三军团所部便迅速迎击从江北岸赶来增援的敌人。红四师进抵桃子台、大塘渡口驻守；红五师一直打到刀靶水、三合一线，控制了贵阳至遵义的所有乌江渡口。紧接着，又驱逐乌江北岸的黔军，进占遵义县的尚嵇镇，为红一军团向北夺取遵义，扫除了左翼之敌的阻碍。

红三军团渡过开阳境内乌江没两天，红一军团就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纵队也开进了遵义城。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子尹路的柏公馆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红三军团部队布防于开阳乌江北岸的尚嵇至遵义懒板凳（南白镇）一线，为拱卫遵义、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枕戈待旦，防敌袭扰，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二、南下西进突重围（中央红军二过贵阳）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按原定的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推进、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于1935年1月19日，兵分三路向川黔边界开进，计划从川南的宜宾至泸州一线北渡长江，与在川陕一带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而自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也已料到红军将会北渡长江。所以他一方面督令中央军薛岳所部尾随红军向北追剿；另一方面责令四川军阀部署重兵于川黔边境，严守长江，力阻红军北渡。

鉴于蒋介石重兵防堵追剿的紧急战况，要一下子打过长江去已不可能。于

是，中央红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重要指挥权的毛泽东的运筹下，自1月19日至3月22日两个月零几天的时间内，在川、滇、黔边界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周旋转战，进行了毛泽东自认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3月21日晚至22日上午，中央红军以隐蔽、神速的行动掉头东转杀了个回马枪，从四川古蔺县二郎滩至贵州习水县淋滩，沿赤水河长约数十公里的几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全部东渡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一下子把蒋介石督师的数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再一次跳出了敌军将要缩小的“包围圈”，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歼战略部署。

眼见红军又打入黔北，蒋介石在重庆捶胸顿足，坐不住了。24日，他与夫人宋美龄率陈诚等高级将领、幕僚从重庆飞抵贵阳，下榻贵阳城北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府邸“毛公馆”，亲自坐镇，指挥围剿入黔红军。



蒋介石在贵阳的住处——城北毛公馆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见蒋介石入套，决意将计就计，制定了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示形于敌，迷惑敌军的战略决策。其目的是使蒋介石调出部署在川滇一线的滇军，为红军空出西进云南的大路。毛泽东对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随即，中革军委发出指令，中央红军急速南下，直扑乌江北岸……

（一）南渡乌江 兵临贵阳

3月2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乌江北岸，红军指战员站在江岸上，感慨万千。年初才从乌江北渡，三个月来在黔北和川黔边界的山川间艰难转战，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仗，极度困难和疲倦的红军，没有被拖垮打败，反而在极端困境中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今天要南渡乌江，指挥员和广大战士尚不明就里，但他们相信，有毛泽东的指挥，不会错。

南渡乌江，首先进入的是今属贵阳市下辖的息烽县。

息烽县位于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东南西北分别与开阳、修文、遵义、金沙诸县毗邻。乌江自西向东流经息烽县西北端。乌江天险名不虚传，江水咆哮奔腾，掀起阵阵波澜，击打着江岸突兀的岩石，犬牙交错的巨石暗礁遍布江中，江面各段宽窄不等，窄处数十米，宽处上百米。红军尚在黔川边界与敌周旋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91师，就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在息烽流长乡境内，巡视封锁江面和各个渡口。沿江五公里的梯子岩、大塘、江口3个渡口均派有重兵把守。

担负渡江先遣任务的红一军团1师3团和军团工兵连当天午后急行到达金沙县后山乡沙土一带的乌江边。稍事观察，下午4点左右，3团1营前卫伪装成黔军在渡口实施偷渡，被南岸守敌发觉，双方火力隔岸对射，偷渡已不可能。1营又派出一队人进行强渡，3只竹筏从北岸划出，向南岸冲去，但南岸守敌火力甚猛，而且江中流急浪大，划出不远就被风浪和火力挡了回来，几名被击中的战士坠入江中，被急流卷走。第一次抢渡未成功。

天黑后，突然暴雨倾泻，此时渡江，难度更大，但南岸防守之敌也可能因天降暴雨而放松警戒。1营1连连长朱日亮认为机不可失，请缨带领突击排再次抢渡。得到批准后，朱连长率领突击排，顶着暴雨黑暗，登上竹筏，沿江边向下游划出北岸。在风雨浪涛和暗夜的掩护下，经过一番与暴雨浪涛的搏斗，成功到达江口渡口南岸。江口渡口南岸是悬崖峭壁，仅有一条人工开凿而成的“天梯”，完全要靠手一把一把抓着才能爬上去。正因如此，崖顶驻守的敌军才放心躲在防御地堡里睡大觉。突击排悄悄顺岩攀爬，摸到地堡前，敌人尚未察觉。突击排突然攻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一个班的敌人梦还未醒就被歼灭了。占领了这处险要关口后，朱连长立马向北岸发出登陆成功的信号。随后，先遣团后续部队登上江边数只竹筏向南岸进发。不一刻，与突击排会合，沿着山后的小路绕道到乌江下游，击溃大塘和梯子岩渡口的守敌，全部控制了乌江南岸的江口、大塘、梯子岩渡口。



江口渡口



大塘渡口



梯子岩渡口

当晚，先遣团和工兵连架起三个渡口的浮桥。第二天凌晨，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红军主力部队迅速南移。红一军团首先开始由浮桥上渡过乌江。

息烽县政府代县长毛钺接到红军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境内的告急电话，他一面命令各渡口死守待援，一面向坐镇贵阳的蒋介石告急。毛钺接到电话时，红军都已占领了乌江南岸各渡口，守卫渡口的敌人已作鸟兽散，逃得没了踪影，哪还有啥死守待援。

蒋介石闻报，急令早被红军甩在黔北的第93师、第53师火速赶往息烽，“追剿”红军。

31日，中革军委电令林彪，由红一军团“先遣团向息烽侦察前进。如息烽无敌或少敌，应趁机占领之，否则监视之，并封锁息烽消息”。作为先遣团的红师3团接到命令，迅速由潮水地域进至黑神庙，向驻守在此的敌93师590团的一个连发起攻击，战斗半个小时，就击败敌连。先遣团乘胜进击，往盘脚营、马当田，进抵响水桥，在此兵分三路向敌53师354团在县城北面的蚕桑坡防御阵地发起围攻，摧毁4个小碉堡，击毙敌连长及士兵10余人。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死守蚕桑坡坚固且配有轻重机枪的大碉堡，红军两次攻击都未拿下，还牺牲了一名营长和一名连长，伤亡10余名战士。打了近4个小时，只好撤往潮水、底寨一带。

当天8点、10点、14点，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先后从3个渡口渡到了乌江南岸。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随军委纵队渡过乌江，进入息烽流长乡。军委纵队过浮桥时，突遭敌机轰炸。曾被周恩来誉为中共特工“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时为军委二局副局长，奔到南岸后，在疏散隐蔽躲避敌机轰炸时失踪。周恩来得知后，派了一个排沿途找寻未果。后经查实，钱壮飞是在疏散之后与部队走散，被当地反动民团杀害。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进入息烽后，分左、中、右三路由北向南开进，形成攻打贵阳的态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军委纵队在流长乡街上住宿一天后，随即南进。4月2日晚8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青山乡中寨发出紧急电令，

令各军团迅速“通过息烽，向东南前进”。这两三天内，红军各部在息烽县的潮水、黑神庙、蚕桑坡、阳朗坝等地与驻守敌军交战，阻击南下“追剿”的国民党93、53师，掩护红军大部队离开息烽，至4月3日，红军各部分别甩掉敌军的追击，进入开阳、修文地界。

中央红军先遣团4月2日从息烽猫场经枳槽坡进入修文县境，继续向东南部的省城贵阳方面挺进。中途占领了狗场（今久长），旋即取道三里，赶往牛渡河架桥，以备后续大部队通过。

4月3日，兵分三路的红军，一路伪装“主力”，东进开阳，做出意欲往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样子；另一路进攻龙里县；主力红军和军委纵队为一路，顺南而进，直入修文。行至修文腊蚌坝，为迷惑蒋介石，朱德总司令向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军的红九军团致电说：“我今天在扎佐东北地区。”扎佐离贵阳不过40来公里，蒋介石在贵阳得悉朱德电令，神志慌乱的他强作镇静，立马给滇军孙渡发电令：“兼程推进……万勿延误。”叫孙渡火速赶至贵阳保驾。同时责令各路中央军加快南下，又严令贵阳警备司令急速修筑、加固贵阳城防工事。

红军在修文打了几个胜仗。仅龙兴寺一仗中，就活捉敌军30多人，还把寺庙中敌人抢来的粮油肉菜分给寨上的老百姓。

“红军是干人的军队。” “取消一切高利贷。”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大木寨是修文县边远的一个寨子。那天，一队红军来到大木寨，稍事休整后，有几名红军就拿出毛笔墨盒，到寨子里写标语。前面所列的几条标语，就是至今还保存下来的红军墨迹，虽然字迹已有些模糊不清，但几十年来这里的穷苦老百姓口口相传，知道了红军，知道了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是为“干人”打天下的。大木寨附近的长田村有一个联保分防所，所长叫于华丰。这家伙平时对乡民们一唬二吓，凶神恶煞，欺男霸女，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却拿他没办法。红军得知这家伙的劣行后，在乡亲们的指引下，把于华丰抓了起来，当着曾受他欺凌的几十个老乡的面，把他公开处决了。红军还将于华丰的家

产、粮食分发给乡亲们，乡亲们一致拍手称快。

这一路红军在修文只停留了一两天，便转往东，向修文东南的开阳进发。红一军团大部队向开阳转进，而有一队红军则向贵阳方向推进。行至贵阳以北近郊的扁山布依族山寨，侦察员了解到沙文蒙固营的山上驻扎着地方武装的联防队四五十人，队长是当地的一个地主。蒙固营山势陡峭，关卡控制着南去贵阳的山路。要顺利地推进贵阳，就要拔掉这个关卡上的联防据点。

一个在联防队长家当过帮工的布依族青年听说过红军，一心要参加红军。红军便让他送盐上山引路，混过了沿路的哨卡，智取蒙固营盘，一袋烟的工夫，就拿下了山头上联保队的据点。拔掉蒙固营据点后，这一队红军马不停蹄，直插贵阳。



黄泥哨观音山上的敌碉堡遗址

当晚子时，这队红军从贵阳西郊绕道赶到位于贵阳南郊的图云关。图云关是扼守贵阳东南方向的重要关口，号称“镇南雄关”。由图云关下到山脚的油榨街，便有两条便道直入贵阳南门和东门，快走也就二三十分钟。红军趁夜隐蔽在关外茂密的树林中，集中火力向关上一阵猛射。这阵射击只有方向，没有具体目标，不伤人、不攻关，搞的是故意示警的“疑兵”之计。守关敌军龟缩在据点里，“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关外山下到底有多少红军，还击也看不见目标，更不敢出来追击红军。

关外的红军放了一阵枪之后，就悄悄地向西面运动，离开了图云关。

6日晚上，正风急火燎地向贵阳赶来“保驾”的滇军先头部队，在沙子哨一带遭到一队红军袭击，双方一阵火力激战。这队红军边打边走，时断时续地向滇军射击。滇军不知到底有多少红军，不敢恋战，只顾向贵阳城急进。红军也不追击，只在滇军屁股后放了一阵枪。那阵势就是要撵着滇军往贵阳方向跑。



（二）调出滇军 挥师西进

南渡乌江后，一直走在前面的红一军团的一支部队，在实现中革军委“佯攻贵阳”的意图中，行动迅速，神秘莫测，短短几天之间，在贵阳北面，拔除了蒙固营关卡；袭击了兼程赶赴贵阳“保驾”的滇军；在贵阳城南的图云关排枪齐放，疑兵诱敌，撒放了攻打贵阳的烟幕。使在贵阳城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毛骨悚然，云里雾里，连令滇军孙渡部火速救驾。

而红一军团另一支部队，又率先经息烽、修文，快速进入贵阳东北角的开阳县境，实现“佯装东进”的作战意图。进入开阳后，部队放慢了行军速度，在开阳东南，龙里以北的清水江一带集结、徘徊，偶尔故意暴露部队的行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以迷惑敌军。

贵阳城北街，毛公馆。蒋介石在惊悸之余，故作镇静，亲自前往贵阳周围的几个布防据点查看。回来之后，又令空军派出飞机四处侦察。派出的飞机第4队队长前来报告说：“开阳牛渡以北至小河口约10里的清水江段，搭有浮桥两座；浮桥附近有高地，约有匪两千余，有东窜模样。”

连续三四天，红军各部先后在开阳、乌当等地营造了向东出黔入湘的战略态势。

蒋介石在“毛公馆”数次召集陈诚、薛岳、顾祝同等高级将领开会分析红军意图。他们认为，红军在贵阳周边及各县的动作，不外乎两点：一是趁机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之贺、萧部会合。

4月3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开阳禾丰底窝坝，前卫部队红二师在底窝坝宿营。第二天，红军左路纵队由北面干溪、新场方向和西面修文县桃源方向，陆续进军底窝坝。红一军团在底窝坝会合后，又向大石板、羊场方向前进，傍晚到达羊场。

红一军团所部抵达羊场没多久，据守贵阳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也尾随追击而来。当晚午夜，中革军委决定第三天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相应部队，全力与尾随而来之敌作战，目的在于保证“佯装东

渡”“声东击西”计划的实施。

4月6日凌晨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一、三、五军团：以全力伏击的态势，力敌吴奇伟纵队的欧震、梁华盛两师于羊场地域。红一、五军团为右翼队，红五军团隐蔽集结于羊场以北及其西北地区向南攻击；红一军团隐蔽集结于羊场东北、正东向西进击；红三军团隐蔽集结于羊场以南及西南向北打；红13团在新场坎子东北山地，钳制敌人后方梯队。

下午4时，担任后卫，准备参加对欧、梁两师包围的红五军团39团、37团与从堤坎一线较早追来的敌99师（郭思演师）遭遇，双方即在羊叉坳、杨柳冲、马鞍山一带接上了火。激战1个多小时，在红一军团一部的支援下，打退了郭思演师，俘虏了该师先头部队的一个连。这次遭遇战红军伤亡10余人，以较小的代价，阻遏了敌人的追击。从4月3日至7日这几天，开阳县的羊场、龙岗镇、平寨区域，红军在此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有效地迷惑了敌人。此后，红军离开开阳县境，向龙里进发，继续“示形于东”。

就在红一军团与敌99师所部在开阳遭遇激战的前一天，红三军团从修文行进到贵阳东北郊区的乌当百宜的几个村寨。红军前脚到乌当，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梁华盛师的3个团的追兵，也尾随着到了乌当。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临时设于百宜街上的军团指挥部，命令所部第12、13两个团在百宜的腊蚌、徐家院一带占领山头，构筑掩体工事，迎面阻击尾随追来的敌军。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敌军后续部队也陆续赶到。彭德怀命令投入战斗的两个团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主动撤到了百宜附近的牛石坡至云盘坡大约四五公里的一溜山坡高地，再次沿贵阳方向布阵阻击尾追之敌。百宜阻击战，是红军二过贵阳时，在乌当境内打的一场较大的战斗，从4月5日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4点，百宜这个大约15平方公里的战场，枪炮声响了五六个小时。尾追的敌军轮番攻击，硬是没能越过红军阻击线。下午4点左右，红三军团大部人马已安全转移，百宜阻击战达到了预期效果。彭德怀遂命令阻击部队撤出战斗。整个红三军团从百宜拐久村抄近路进入龙里县的洗马河一带。

随即，红三军团在龙里境内的清水江沿岸的水尾等几个渡口架设浮桥，部队毫不掩饰地不断在浮桥上来来往往，故意做出要东出龙里向黔东南方向行进的意图。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在乌当羊场一带与追敌打了一仗之后，为迷惑蒋介石，红一军团又折转行进路线，向开阳开去，从开阳县渡过顺岩河，进入龙里县。为了继续造成红军要进攻贵阳的态势，红一军团留下了两支小部队，每队大约200人，仍旧在乌当偏坡、永乐一带活动。部队小，机动性强，忽东忽西，矛头都指向贵阳方向，搞得敌人摸不着头脑。

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红军各部“示形于东”的演绎，使蒋介石获得的情报都表示红军的走向非东莫属。“毛公馆”作战室里，蒋介石盯着墙上的军用地图，面露得意之色，对顾祝同说：“毛泽东也就这两下子，我料定他们必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校长料事如神，朱毛此番完矣！”顾祝同阿谀地对蒋介石说道。说罢，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旨谕，向各路敌军下达了赶赴黔东、合围红军的紧急电令。

当由黔西方向赶来保驾的滇军到达贵阳西郊时，蒋介石立马又令孙渡率领所部滇军马不停蹄地向东追击，实施围歼红军于黔东的部署。孙渡的滇军连日来昼夜行军，已是疲惫至极，蒋介石亲自下令，又岂敢违背，只好连夜启程，率领疲于奔命的部队，绕过贵阳城，向龙里方向进发。

4月8日清早，滇军先头部队龚顺璧旅行进到贵阳与龙里交界的观音山至黄泥哨倪儿关一线时，与红三军团42团遭遇。滇军在倪儿关一带布阵阻挡红军，红军以思丫大坡制高点为掩护，双方凭借陡峭的山坡据守，火力交织，时断时续，双方的据险对射持续到第二天，红军将滇军堵在了倪儿关东侧，迅速控制了龙里观音山至谷脚大约10公里的湘黔公路。

早在4月7日，中革军委就已下达命令：红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须从龙里、贵阳间穿过湘黔公路南进。同时令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佯攻龙里，掩护全军转移。据此，就有了8日这天红三军团先头部队42团与滇军在倪儿关的战

斗。这场双方对峙的战斗还在进行中，蒋介石命令孙渡连夜驱车前往督战。孙渡的车行至谷脚时，与向西南方向行进的一队红军相遇，孙渡的指挥车成了红军开火的目标，一阵猛打，车内滇军一死三伤，孙渡跳车逃脱，差点丢了小命。

控制了贵龙之间的湘黔公路这一通道，中革军委随即下令，红军主力部队按计划行动，兵分三路，从此通道向西南转兵，进入贵筑县（今花溪区）境内。第一路由红五军团和担负后卫的第13团，往小碧、孟关向青岩镇挺进。第二路由红三军团主力经龙里县比孟场进入花溪黔陶一线，与第一路会合。第三路由红一军团与军委纵队组成，经龙里县鸡场堡、朵花冲向花溪高坡进发。

红军进入花溪境内的青岩周边，在镇北的狮子山与敌军打了一仗。狮子山位于青岩镇北，山势险峻，是扼守贵阳至定番（今惠水）公路的重要关卡。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大部已从龙里转南进入花溪后，为拦截红军，火急电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从贵阳西北面的滇黔公路以最快速度横插到花溪。吴奇伟的先头部队，分乘几辆大卡车，抢先到了青岩狮子山、望城坡、豺狗坡一线，火速在这一线修筑工事，摆出一副要与红军决战的架势。

狮子山西南面紧靠歪脚村的大水块一带，山高林茂，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先期到达狮子山西南方向的红军，分析敌情后，决定把主战场摆在这一线。为了便于指挥，团首长将作战指挥部设在离主战场不远的高寨河边的刘家碾房内。按照指挥部的安排，红13团在各险要地段迅速开沟挖壕，修建掩体工事，张网以待，与敌军激战。

时值初春，春寒料峭。傍晚，阵阵寒风袭来，使人不禁打冷颤，但红军战士们始终紧盯着敌军阵地。夜幕降临时，敌军企图趁夜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敌人蜂拥而至，向红军阵地扑来。100米、80米……当敌军离红军阵地大约只有50米时，高寨河刘家碾房上空升起3颗红色信号弹。进攻的敌军还不知咋回事时，红军阵地就射出了一排排密集的子弹，打得敌军丧魂落魄，鬼哭狼嚎，丢下一片尸体，又一窝蜂似的往山脚退去。

敌军第一次攻击被击退后，大约半个小时，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吸取第一次攻击的教训，第二波进攻前，敌军对红军阵地纵深进行了十多分钟的炮击，炮火过后，便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呈扇形向红军阵地扑来。见此阵仗，红军指挥部急派后援梯队紧急增援，集中主力正面打击进攻之敌，使敌军首尾难顾，再次败退。

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吴奇伟恼羞成怒，命所有火炮集中向红军阵地猛轰，之后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红军迅速集中所有手榴弹，连续向进攻的敌军队伍中投掷，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就连几名已经冲到红军阵地前沿的敌人，也掉头往回逃窜。之后敌军不敢再组织进攻，只在远处用冷枪冷炮进行骚扰。战斗持续到后半夜才停下来。这一战，敌军丢下了百来具尸体，红军队伍也有7人光荣牺牲。吴奇伟见占不到什么便宜，不敢与红军对峙，只好趁着夜色暗，命令部队沿贵惠路向贵阳方向撤退，收缩防线，以防止红军攻打贵阳城。狮子山战斗结束后，红军赶紧打扫战场，集中部队，转向青岩镇开拔。

就在狮子山战斗胶着的时候，红军第一、二路军已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了青岩镇南门，此时夜幕已降，城门紧闭，不知镇内情况。一天的急行军，部队也有些疲惫了，不能贸然进镇，便在南门外休整待命。镇内守城的乡丁把城外的状况报告给国民党青岩区区长彭仁斋。彭仁斋登上城楼，看见城外红军乌泱泱一大片，没有打进镇的动静，却听到狮子山方向枪炮声激烈。下了城楼，便趁夜带着家眷及心腹手下，悄悄出了北门，向花溪方向逃去。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进了青岩镇。下半夜，红13团从狮子山战场撤下来，从青岩北门入城，与一、二路红军在镇内会师。虽然数千红军进到了青岩古镇内，却井然有序，没有惊动镇内民众，自觉露宿于沿街屋檐下。

第二天，恰好是赶青岩场的日子。青岩镇内商家照常开门营业。红军派出宣传队，在场坝上向群众宣讲，并在主要街口和场坝周围刷写了许多标语。不多时，“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北上抗日”等言语和口号深入老百姓心中。红军打开镇上地主的粮仓，向穷苦百姓分发粮食。四面八

方的百姓闻讯，都涌入了青岩城。下午，红军在场坝上召开了一次大会，部队和群众人数过万。一整天，青岩古镇像是沸腾了一样。红军只在青岩休整了一天，11日清晨，红军就开拔出镇了。

红军离开青岩，便兵分两路：一路走水塘、达夯一线，向南进入定番（今惠水）县境；另一路则从新哨、小山一线往定番再转西行进入广顺县（今长顺县内）。原从龙里进入高坡乡的红一军团主力与中央纵队，在高坡又分兵两路：一路经地坝、翁西进入定番县境；一路走大小长寨、石板寨入定番县境。

当红军大部离开花溪境内后，担任佯攻龙里县城的红一、三军团各一部分队伍，也就撤出佯攻战场，迅速向南转移追赶大部队。

中央红军各部离开花溪后，兵锋直指黔西南。原来驻扎在这个方向的滇军已被调往贵阳以东，红军西进的阻碍大大减少。

挥师西进。红军连克定番、广顺、长寨（今长顺）、紫云、望谟等县，渡过北盘江，往兴仁、兴义、贞丰等县，突破了贵州军阀犹国才的防地。于4月下旬，红军调整部署，再分为三路兵锋，直入云南。

中央红军长征第二次经过贵阳地区，虽未打什么大仗，但对蒋介石、国民党军统帅部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和震撼。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在黔东“围剿”红军的打算，正中毛泽东预先设定的“声东击西、调出滇军”之计，为中央红军跳出敌军包围圈，挥师西进，直入云南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先决条件，获得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佯攻贵阳，成为战争史上弱军智逼强敌统帅调动部队的典型范例。

正如长征亲历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肖华在20世纪60年代所创作的词中所道：“……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三、剑锋直指黔大毕（红二、红六军团过贵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跋山涉水二万五千里，一路征战，冲破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和西南、西北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后，胜利到达陕北，历时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结束。这一年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英勇作战，歼敌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100多个团的围攻，有效牵制堵截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转战西南时，蒋介石就利用湘鄂两省军阀部队“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急转兵锋，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意在集中兵力对付红二、红六军团。蒋介石委任宜昌行辕参谋长陈诚代行他的职权，督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

宜昌行辕成立后，其辖区扩大到安徽、江西、贵州等省。陈诚把30万兵力部署在北起宜昌，南至黔阳，东迄南昌，西到贵州毕节，横跨数省的广大区域内。企图阻止红二、红六军团向东进入原中央苏区，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向北则不能渡过长江入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杀回洪湖苏区。而将红二、红六军团“聚而歼之”在这个庞大的“口袋”之中。同时，陈诚还下死命令，对湘鄂川黔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红军经济来源，以使红军“生机灭绝”。

面对严峻的态势，红二、红六军团首长决定，突破封锁与包围，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黔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初，红二、红六军团集结到湖南的桑植县，进行突围转移前的准备工作。桑植是贺龙的家乡，群众基础颇好。11月19日，两个军团分别召开了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红二、红六军团下达了突围命令。当晚，部队即开始了突围行动，实行战略转移。

突围部队由东向西，边打边撤，异常艰难地于1936年1月8日进入贵州玉屏县境内。之后，占江口、进石阡、克镇远、夺黄平，到1月21日，突破了敌

军在余庆龙溪设置的纵深堡垒线，继续向西转移。在西移途中，军团首长两次接到中革军委由陕北发来的电报指示：令贺、萧两军团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因为该地区的群众基础和地形均适合作根据地。军团首长据此对黔西北地区的各种条件斟酌分析，认为中央红军于去年多次转战于此，播下了革命火种；中共贵州省工委及其地方党组织亦在此地区有过许多工作和活动，人民群众要求革命的愿望是很迫切的；中央红军过境时，组建的一些地方游击队在川黔滇边活动频繁，可以策应红军部队的行动；同时，因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川黔滇军阀之间貌合神离，相对而言，黔西北是敌人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据此，军团首长决定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向黔大毕地区运动，争取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方略既定，红二、红六军团迅即挥戈西进。24日，攻占瓮安，26日，又占福泉。敌驻军参谋长刘继炎在红军的攻击中坠城而亡，国民政府的地方专员兼县长聂汝被红军战士活捉。红军乘势而进，在马场坪击退了国民党第99师，随即西取龙里县的洗马河。

其时，贵阳城兵力空虚，奉蒋介石之命到贵阳督阵指挥的“重庆行轅”主任顾祝同、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急忙下令国军第99、23师向贵阳收缩护城。又急调国民党中央军郝梦龄纵队由黔北湄潭南渡乌江以截击红军。如此一来，敌军在贵阳以西及乌江口岸的防务便显空虚了，这也就给红军西驰创造了条件。

1月29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6师，在师长周球保（周仁杰）带领下，架桥渡过顺岩河，进入开阳。军团的其他部队也在当天陆续从浮桥通过顺岩河，进驻开阳县平寨、高寨一带。第二天，红六军团兵分两路：一路往杠寨、羊场（龙岗）、水口往贵阳以东的乌当开进；一路往坝子向乌当百宜开进。30日，进入乌当的红六军团两路人马在百宜会合。同一天，红二军团所属部队也兵分两路，从龙里县的苦竹寨和上谷耳，进发到乌当境内，两路人马在新堡的马头寨会合，当晚在新堡布依族乡的各个村寨宿营。

从1月29日红二、红六军团大队人马分为数路进入乌当，仅仅一两日，便迅速地完成合兵集结。坐镇贵阳的顾祝同得到贺、萧大军集结于乌当的情报，他脑袋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贺、萧军团必攻打贵阳无疑。于是，顾祝同急令东面的各路追剿部队加快进军速度，尤其是驻扎在贵阳以西及乌江口岸的23师和99师紧急向贵阳收缩，加强省城贵阳的防务，以抵挡红军对省城的攻击。其实，贺、萧军团只是摆了一个“佯攻贵阳”的架势，目的就是迷惑敌军，调虎离山，让敌军调开贵阳以西方面的防守力量、为西进黔大毕减轻压力。

待敌军防守贵阳以西的23、99师拔营向省城贵阳收缩之际，31日，红二军团分为多路经乌当新场乡的达古、尖山一带村寨，离开乌当，往修文县方向挺进。红六军团则从新场乡的青杠坡、保寨一线，出乌当，也向修文方向开进。当日，两个军团的部队就顺利地离开了乌当。

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出乌当后，从北面绕过贵阳城，往西北方向的修文急进，在经过贵阳北郊的白云地区时，顺带端掉了驻扎于此的守敌。原来，敌人为了堵截红军，不久前就在白云地区的沙文扁山、柳丝村、磨盘山、阿塘坎、蔡家坟一带修筑了数座碉堡和防御工事，并驻兵200多人，以扼守这几个地方的关卡要道。红二军团的前锋连队经过时，敌军开火拦截，企图阻止红军过关。怎知红军的攻击勇猛无比，连遵义娄山关那样重点防守的险关都拿了下来，何在乎这几座碉堡？一个冲锋，红军前锋就打掉了扁山上的云盘关碉堡。邻近几个山口要道碉堡的守敌恐怕早已听闻红军的威名，见势不妙，纷纷弃堡而逃。红军收拾了这一线的碉堡，砍倒敌人相互联系和通往贵阳的电线杆，破坏了白云通往贵阳的通信设施后，又继续前行。

红二军团进入修文县境三重堰、罗家寨时，修文县政府县长黎纯一料想红军如把修文县打下来，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于是带领县政府一干人员仓皇弃城逃跑了。红二军团顺利进占了修文县城，在县城驻扎休整了两天。这两天，红军将城内地主豪绅的粮仓打开，分给老百姓，还派了几个宣传队沿街宣传，

号召贫苦百姓起来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欢迎他们参加红军队伍。

在红二军团占领修文县城的当天，红六军团也在军团长萧克的率领下，从乌当的百宜、新场一带直插行进到修文董家湾、牛角湾、龙王寨等地，这几个村寨都离修文扎佐镇不远。扎佐镇是川黔公路靠近省城贵阳的一个门户，算得上是贵阳北面的一个重要屏障，扼于交通要道。所以年初省城保安司令部就派了所属保安团的两个营的兵力驻守扎佐，并在扎佐镇城边及周围的一溜村寨道口和山头上修建了十七八个碉堡，加固了工事，形成了围绕扎佐镇长达十多公里的“碉堡防线”。每个碉堡都有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驻守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镇里黑神庙内。

董家湾后山上有个山脊叫懒龙背，敌人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大碉堡，控制着红军的必经之路。红17师参谋长刘转连指挥一个连的红军，包围了懒龙背上的碉堡。天刚放亮，红军便由四面迂回包抄，接近碉堡。只听一声令下，数十枚手榴弹“嗖嗖”投向碉堡，这一迅猛如雷的攻击，炸得碉堡内的敌兵鬼哭狼嚎，没被炸死的纷纷缴械投降。红军乘胜追击，一举打掉周边数座碉堡，从扎佐镇北门进入镇上。镇上守敌有的还在蒙眬睡梦中便做了俘虏。打到黑神庙敌指挥部，敌营长顽固督阵反击，怎架得住红军猛虎般的攻势。敌少校副营长被击毙，保安团营长韩进头被打伤，捡了一条命，带着残余士兵钻进庙后山林逃命。

镇外的红军多路出击，一连拿下了10多座敌碉堡，摧毁了敌人在扎佐的环形防御工事。此一仗击毙敌军官5人，士兵数十人，俘敌300多人，缴枪300余支。这一仗，是红二、红六军团过贵阳时打的一场较大的仗。

攻破敌人的扎佐防线，形成了围攻贵阳的态势，而红二军团暗地里从各师抽了120多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侦察队，在队长王绍南的带领下，侦察队连夜向贵阳以西的清镇赶去。在修文与清镇交界的猫跳河，侦察队一个接一个从猫跳河上仅有的一条索道上溜到河对面，急行军于当天深夜到达鸭池河渡口。



清镇鸭池河渡口

侦察队从老乡那里得知，鸭池河东岸除鸭池河渡口外，上游还有一个渡口叫陇上渡口，这两个渡口都由国民党的保警队驻守。鸭池河水面虽不宽，但河水湍急，河岸峭壁耸立。西岸属黔西县管辖，驻守着敌军300多人，把守大关、小关两个要隘。

天刚亮，侦察队在鸭池河东岸渡口老街后的一片林子里隐蔽下来，把从渡口保警队俘虏的一个保警兵押到河边，令他向河对岸喊话，说有长官叫送紧急情报，赶快划船过来接。不一会儿，对岸划着小船来到东岸，快靠岸时，突然岸上蹿出一个头戴瓜皮帽的家伙，纵身跳上小船，用脚一蹬，小船又离开了岸，那家伙大声朝西岸喊叫：“红军来了，红军……”话音未了，被侦察队长一枪打翻到河里。这叫声和枪声惊动了西岸守敌，一下子枪声大作，两岸隔河

对射。

双方枪战正酣，红二军团前卫队6师赶到了河东岸，架起几挺机枪，压制河对岸大、小关渡口敌人的火力。此时，从上游陇上渡口偷渡过河的部分侦察队在解决了陇上渡口的守敌后，从后山绕到了大、小关鸭池河渡口西岸，从背后一阵猛打，敌人禁不住这前后夹击，又看见红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忙丢下河防关口，往黔西方向逃遁。

先到鸭池河东岸的红军部队，动员老百姓集中河沿岸能找到的船只，船与船连接延伸到河西岸。老百姓又自愿捐献出门板、木板床等材料，铺在船上，不久便搭成了一座两米宽的浮桥。

2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18000余人，从鸭池河渡口浩浩荡荡过了鸭池河，一路雄风向黔大毕挺进。7日，攻占大定县的第二天，在大定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9日攻占毕节，基本完成了到黔大毕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没多久，黔大毕许多乡、村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播下的革命星火，像百里杜鹃一样，在黔西北熠熠开放。

1935年1月、3月，1936年2月，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三次过贵阳，总历时不过20天，红军的铁脚板却走过了今贵阳市10个区（市、县）中的8个区（市、县）的80多个乡镇170多个村寨，总行程上千公里；红军在贵阳地区经历大小战斗战役21场，近千名红军指战员血洒这片热土，青山巍巍处处坟莹，彪炳了红军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红军三过贵阳，广播革命火种，唤醒了沉睡的山野，使深受压迫的贵阳各族人民看到了希望，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将在贵阳这片热土世代薪火相传。

链接：

红军给我取名叫远富

1935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渡过乐旺河的一队红军，经过冯三镇毛粟联保的水口寨，几名红军来到寨口的宿远富家。

当时宿远富才七八岁，看见这几个衣着破烂，衣领上缀着两片红布，帽子上像是钉着一颗红布五角星的士兵来到家门口，他也不吭声，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盯着这几个人看，倒是他爹宿仲明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一个年龄稍大的士兵走到宿仲明面前，笑着问：“老大哥，还认识我吗？”宿仲明看了看，摇头说：“长官，我哪会认识你啊？”士兵又一笑，问道：“老大哥姓宿，名仲明，对吗？”

宿仲明有些惊讶：“长官咋个认得我哦？”“大哥不要叫我长官，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叫红军，叫同志。”士兵伸手过来握住宿仲明冰凉粗糙的双手，说道：“年前我在你家院坝里耍过猴戏呀！”“哎呀，是你呀，快屋里坐，屋里坐。”宿仲明仔细看清了来者，连忙让几人进家，但红军士兵说，不进屋了，在院子里摆一摆就行了。

原来，那是去年的12月29日，有两个穿着长衫的外地人，牵着一只猴子和一只狗来到水口寨，看见宿家院坝宽敞，得到宿仲明的同意后，就在院坝里耍起了猴戏，寨子里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

耍得正精彩，看得正高兴时，站在人群里的联保主任蒋士安突然大声吼叫道：“给我把他们两个耍猴的绑起来！”几个乡丁闻声跳出来就要动手捆人。

宿仲明人很善良，见状赶忙上前劝解道：“蒋么爷，这两个人是我答应让他们在我家院子头耍猴戏的，人家远方外乡人出门求生不容易，我们不能搞门槛猴，欺负人家。有啥子不周到的地方，我给你赔个不是就行了嘛，何必要无头无脑地绑人家呢？”

蒋士安又凶神恶煞地吼起来：“宿仲明，这阵子你听说没得，从江西那边窜过来的啥子红军，都进贵州半把个月喽！你少管闲事，不要给老子找麻烦。看哪样猴戏，这是老子的地盘，赶紧收起家伙滚，快点滚！”几个乡丁也附和吼起来：“快点滚，不然老子们捆人喽！”

两个耍猴人顺势收起东西出了寨，临走时对宿仲明拱手道：“大哥，对不起，给你添麻烦啦！”

要不是第二次来到家里，谁会知道前几天那两个耍猴的人会是红军先头部队派出的侦察员呢。

红军和宿仲明在院子里摆谈了好一会，宿远富过来喊父亲吃饭，为首的红军爱抚地摸着他的头问这问那。那时他还没有上学，连名字都没取。宿仲明说：“那就请红军叔叔给这娃儿取个名字吧。”

为首的红军略一思索，高兴地说：“好，谢谢高看，他是‘远’字辈，就叫远富吧。”

“远富，好！”宿仲明连声叫好，又道：“还请老兄把‘远富’的意思说明白点才好。”

红军笑眯眯地说：“就是愿天下穷人都永远富裕呀！”

接着，红军请宿仲明指路，把联保主任蒋士安抓了起来，并把寨上的人召集起来，叫蒋士安低头保证：以后不再做害国害人之事。

红军走时，把蒋士安带走了。半个月后，蒋士安回来，说是被带到遵义管教，才放回来，往日凶神恶煞的派头收敛许多，再也不敢乱来了。

义务船工渡红军

红三军团先遣队行进到马场镇茶山关乌江南岸关上时，由于保甲长的反动宣传，关上寨的穷苦百姓大都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只有世代靠在渡口摆渡为生的船夫李玉德、李树斋、李树民叔侄三人没跑。

李树斋两兄弟，前几天到外地走亲戚时曾听说：进贵州的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回来后给叔叔说了，于是三叔侄决定不跑不躲，想看这些叫红军的军队到底是像保甲长所说的“赤匪”，还是真的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

那天，一队红军攻占了茶山关关上的哨所，随后控制了茶山关附近的乌江南岸，并在关上的碑亭内设立指挥所指挥红军渡江。

李玉德叔侄见红军到茶山关后并没有什么烧杀抢掠的行为，甚至连老百姓的家都不进，心里想去接近一下这支队伍。



叔侄三人左顾右盼地来到碑亭前，一个腰挎盒子枪的红军和善地跟他们打招呼道：“老乡，有么子事呀？”

李玉德壮起胆反问说：“人说天下农夫苦，谁知最苦是船夫，长官，我们船夫算不算是人啊？”

红军笑答：“怎么不是人啊？天下的穷人，你们和我们都是平等的。”

李玉德面露喜色，又道：“听说你们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是穷苦人中最苦的人，想来找点事做，可以不？”

眼见红军说话和气，叔侄三人不觉心头暖暖的，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把黔军“双枪兵”（步枪和烟枪）沉船，在江北岸修筑碉堡的详细情况告诉了红军。接着，又潜入江中，把沉入江底的4只渡船拖出水面，还建议红军从茶山关、桃子台等江水平稳的地方搭桥过江。

1935年元旦，叔侄三人主动摆渡红军先遣队过江，引导红军炸毁了乌江北岸敌人的暗堡工事。

之后，叔侄三人又分别到山里找回了一些寨邻乡亲，在几个渡口帮红军搭建浮桥。

那几天，李玉德叔侄三人都出现在摆渡和搭建浮桥的队伍里，帮助红军顺利地抢渡到乌江北岸。

红军渡过乌江，向尚嵇方向开去，李氏叔侄三人站在茶山关北岸山嘴上，目送红军远去，久久不愿离开。

小红军吓退“活阎王”

从孟关牛打场过来的另一路红军，由河西小路经黔陶直上打铁寨后山的大坡顶休息。

黔陶乡乡长、恶霸蒋恒昌将红军误认为是中央军，立即叫家里奴仆打扫客房，摆好烟盘烟枪，还令乡丁将青天白日旗插在乡公所房顶上。

红军见了非常气愤，派出三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乡公所，其中一个爬上

房顶，连旗带杆一起扔下房来。

蒋恒昌吓得大汗直淌，以为部队要来包围乡公所，连忙带狗腿乡丁从后门躲进后山密林之中，十天后才敢回家。

其实，红军当晚就离开黔陶，进入青岩镇的歪脚村了。

红军一个小小的举动，把活阎王吓得三魂掉了两魂。

红军标语至今留

红军过乌当时，打富济贫、惩办恶霸、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了不少文告和书写了很多标语。

至今，乌当区百宜乡红旗村村民邓月明家的墙壁上还保存着一条“红军绝对不杀敌方投诚官兵”的红军标语。

邓月明介绍，红军在他家房子墙上写标语的情况，他和弟弟邓月清都不知道，只是他的父亲邓丙寅在世时给他们讲过。

邓丙寅老人说，那是在1935年4月初，听说红军要经过，国民党反动派到处进行反动宣传，说红军是“共匪”，一路烧杀抢掠。

4月4日，寨子里的乡亲们说，红军已经到羊昌了，于是全家人就跑到住房后面的山上躲藏起来。

太阳正当头时，邓丙寅在山上看到大队红军队伍从白腊塘方向往自己的寨子过来。到寨子后，有的队伍就停下来做饭吃。下午日头偏西时，红军全部离开了寨子，往百宜方向去了。

邓丙寅从山上下来到家里，知道红军在自己家里做过饭吃，还在自己家的碾房墙壁上写了一条大标语“红军绝对不杀敌方投诚官兵”，其他东西秋毫无犯。

当时邓丙寅心里想，红军部队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种队伍，而是一支好队伍。后来听人说，红军一路上打富济贫，惩办土豪恶霸，从这里经过是为了北上抗日。听了这些，邓丙寅认定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队伍。他心里



乌当百宜红军标语

向往红军、热爱红军，决心把红军标语保护好。

第二天早上，国民党中央军追赶红军路过寨子，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路上派款、拉夫、抢东西，就像土匪。

红军走后的第4天，国民党中央军又返回寨子里四处“清乡”搜查，发现邓丙寅家碾房的墙壁上有红军标语，两个士兵就用刺刀逼着他刮掉。他磨磨蹭蹭，东摸摸、西擦擦，只擦墙壁，不擦标语。

把国民党中央军骗走后，邓丙寅就拿一些稻草把红军标语遮盖起来。

过了几个月，稻草喂牛用完了，红军标语显露出来，被腊鲊保的保长发现了。保长带了几个乡丁把邓丙寅抓了去，先是把他毒打了一顿，然后威胁说，他同情“共匪”，限令他当天把标语刮掉。

邓丙寅热爱红军，热爱红军标语，死也不肯刮掉红军标语。他从山上砍了很多柴草堆放在写有红军标语的墙角，把红军标语遮盖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墙上的红军标语才显露出来。

十年动乱中，在那打、砸、抢横行的日子里，有一天，一群下乡知青到邓丙寅家，指责说墙上的标语是封、资、修的那一套，要作为“四旧”砸掉。邓丙寅得知此事，从寨子里赶快跑到家里，质问说：“你们看清楚，这条标语是什么内容，这是当年红军路过时写下的标语。”这才阻止了这群狂热无知者砸标语的行动。

事后，邓丙寅把这事反映给知青的领队和当地政府部门，组织上对这群知青进行了批评教育。

邓丙寅老人临终时，还再三叮嘱儿孙们要保护好红军标语。邓月明说，在邓家兄弟分家时，写有红军标语的这间房是他分得的（已经没有作碾房）。

这间房子，房顶通风见亮，没有几片瓦了，桁条、楼枕都朽了，其他三面的板壁也坏了，根本不能住人。为了保护这条红军标语。他一直没有拆掉这间房子，只是在旁边另修了一幢房子住。

几十年了，红军标语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红军爱人民，人民爱红军。

第四章 抗战后方烽火炽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悲壮序幕。中华民族不忍侵袭，僻处西南抗战大后方的贵阳亦燃起了炽烈的抗日救亡烽火。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其间，贵州各地党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大有发展。作为全省中心的贵阳，此间先后建立了八届中共贵阳县委和22个党支部，发展中共党员一百多名。

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大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掀起阵阵反共浪潮，制造反共摩擦，中共贵州省工委再度遭破坏。众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含冤罹难，血溅黔中。

一、重新组建省工委

1937年9月，在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际，为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黄大陆从延安回贵阳。出发前，张闻天就贵州的现状和工作向黄大陆作了交代。

黄大陆此行是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按照中央的指示，与在贵州坚持工作的李策等同志清理、整顿党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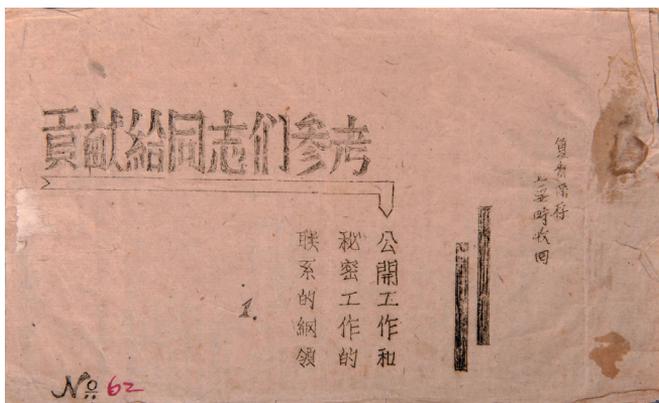
1936年，黄大陆进入南京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37年5月毕业

后，以“探亲”之名赶赴延安，受到了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参加了中央白区工作会议。

抵达贵阳后，黄大陆找到隐蔽在贵阳郊区的地下党员李策。李策激动地抱着黄大陆，颤抖着嘴唇，把贵州地下党两年来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逐一向组织汇报。

黄大陆有条不紊，按照延安方面的安排，向各地党员传达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清理、整顿全省党组织，迅速组建起省工委工作队伍，并以省工委的名义印发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要》《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于小组生活》等文件，为贵阳和全省党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要》中，对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别作出了七项规定，强调要严格把握好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原则，做公开工作的同志要用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要争取群众的拥护，要在公开的社圈中争取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但不要过激、不要出风头，不必处处摆出革命的架子，吸引敌人的视线，就等于泄露秘密。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时常反思和检查秘密工作的痕迹，要把警惕性提得比别人高，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遇到大危险不改常态，要坚守秘密；联系方式必须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否则就是破坏组织，就要流血。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要》

这些文件的形成和实施，说明贵州地下党已从幼稚期步入成熟阶段，探索形成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在黄大陆的主持下，中共贵州省工委先后成立了毕节县工委、织金县工委，以及贵阳文学研究会、贵阳社会科学研究会两个党支部，同时与安顺县工委、遵义县工委取得联系、布置工作，使贵阳乃至全省党的工作渐趋活跃。

同时，全面发动进步群众、学校师生及社会名流，办刊物、搞戏剧、开演讲，持续不断地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1937年7月，黄大陆、李策等人发起成立了贵州省学生联合会，创办了进步刊物《贵州学联》，将一批又一批爱国学生和进步教职员引领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贵阳的抗日氛围日益浓厚，一批经过考验的进步人士被吸收入党，党在贵阳的力量逐步壮大。

1937年11月，黄大陆化名李瑞卿，向党中央提交了《贵州一般情况》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一般人感觉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痛苦，要革命才能解决自身的痛苦”“认定只有党才能解决他们的痛苦”，并请求党中央派干部到贵州加强党的领导。

报告送达延安，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8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正在延安学习的邓止戈、秦天真派回贵州，组建中共贵州省工委，明确由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

临行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在向邓止戈、秦天真部署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时特别指出：“要利用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不要在蒋管区搞武装活动。”

然而，黄大陆、李策在贵阳及周边地区的活动，特别是领导开展的贵州省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他们害怕进步思想的传播，恐惧会失去民心，遂以多种借口监视和破坏学联活动。

在1937年12月举行的贵阳各校寒假工作团分团长和干事选举会议上，国民党贵州当局看到各校选出的分团长和干事绝大多数为学联成员，其妄图通过

寒假工作团控制学生的阴谋破产后，恼羞成怒，于1938年2月19日一手炮制了抓捕学联领导及各校寒假工作分团负责人的“二一九”学联事件；2月21日，又以“托派”“汉奸”的罪名，将黄大陆、李策等人抓进了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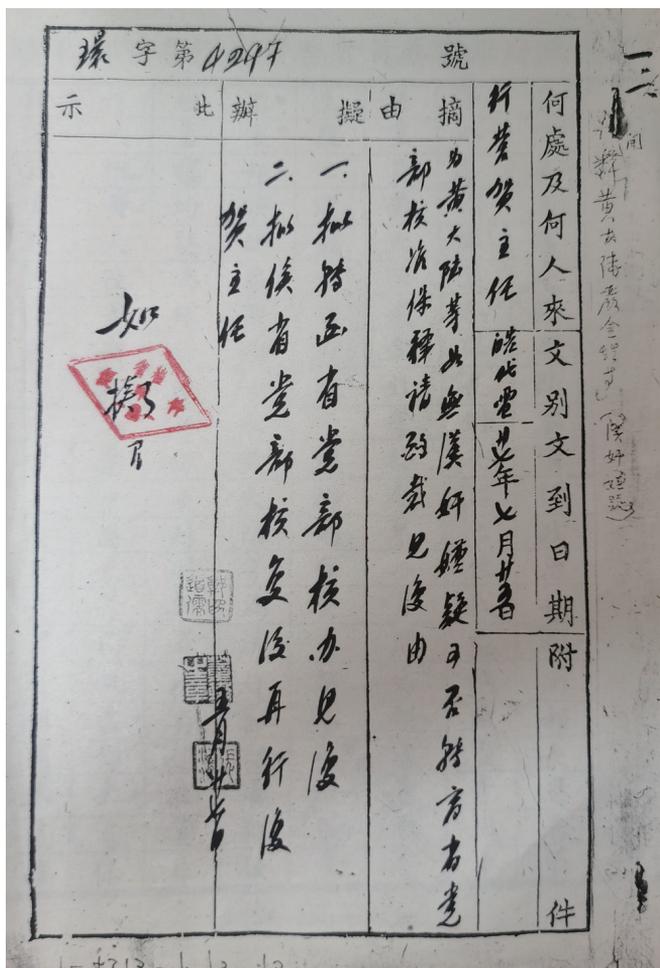


国民党贵州当局污蔑黄大陆、李策欺世惑众的文章《贵阳又破获反动首脑部》



此时，邓止戈、秦天真正在返回贵阳的途中。

1938年3月，邓止戈、秦天真抵达贵阳后，立即展开了营救黄大陆、李策等被捕人员的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时间向国民党贵州当局发电，叶剑英亲到贵阳，证明黄大陆等人系爱国抗日分子、中共党员，绝非“托派”“汉奸”；贵州各界硕彦名儒联名具保，冯玉祥将军也积极营救，但均无结果。



周恩来、叶剑英以代电致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行营主任贺国光，敦促释放黄大陆、李策的文电复印件。

在日寇入侵、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不敢公开杀害共产党人，却始终将黄大陆等人羁押不放。

1941年1月19日，公开打起反共旗帜、掀起反共高潮的国民党贵州当局残忍杀害了黄大陆、李策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黄大陆等人在被关押的3年间，始终把监狱作为战场，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

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屠杀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

中共贵州省工委在邓止戈、秦天真的领导下，心怀抗战大局，一方面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持续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省工委主持完成对贵阳地区党组织和党员的清理和考察，成立中共贵阳县委，大力开展农村工作，将抗日救亡活动扩展到广大农村；利用国民党贵州当局农村合作委员会开办的合作助理员讲习所招生的机会，派遣共产党员考入讲习所，并秘密成立讲习所党支部，团结革命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省工委主持建立中共贵州苗夷委员会，联系少数民族进步青年，利用少数民族节日，用苗族语言和布依族语言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贵阳四方河、半边山、北街、水田等地办起民办小学，在开展少数民族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收到了显著成效。威宁、毕节、贞丰、黔东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纷纷聚拢在党的旗帜下，党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工作蓬勃开展。

着眼大量工厂从前方迁至贵阳、产业工人大量增加的实际，中共贵州省工委适时发动工人运动，主持建立了中共贵阳县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及西南公路运输党支部，并先后发起成立了贵州省邮务工会、电机业职业工会等工人组织，迅速扭转了贵阳工运万马齐喑的局面，使广大工人阶级成为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

193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悍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及一系列反动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打压和破坏，形势急剧变化。

为应对这一反共逆流，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贵阳县委先后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和干部培训班，明确形势和方针，并持续深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全省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100余人发展到500余人。

二、党组织势如春笋

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建立后，将建立和发展党在贵阳的各级组织作为重要工作，并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锤炼党员队伍，发现和培养进步青年，扩大党在贵阳的影响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贵阳地下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力量最为壮大的一个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及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大批工商企业也陆续迁入贵阳。1938—1939年，迁入贵阳的工商企业达101家，并不断有新的工厂和企业成立。在随企业迁来的工人中，不乏具有工运及地下斗争经验的进步分子，且这些进步分子主要集中在公路运输、邮政、电信等系统内，为贵阳工人党组织的建立和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中共贵阳县委、贵阳各学校的党支部、贵阳工人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贵阳革命运动的发展。

（一）八更迭贵阳县委

1938年4月下旬，中共贵阳县委正式建立，由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谢凡生任书记兼青年委员、丁树奇任组织委员、高言志任宣传委员、熊蕴竹任妇女委员，负责领导贵阳地区党的工作。

一个月前，邓止戈、秦天真自延安回到贵阳后，由于黄大陆、李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党领导下的贵州学联工作严重受挫，党决定建立中共贵阳县

委，以便在省城贵阳这个国民党贵州统治中心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4月上旬，邓止戈、秦天真等人对贵阳地区的党员特别是原贵阳县委的骨干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结合其公开身份和所处的区域，确定了县委组成人员。

中共贵阳县委成立后，迅速展开工作。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在贵州省立高中、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中学，以及由“左联”成员肖之亮发起成立的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由民主进步人士谢奎等人发起成立的筑光音乐研究会（后改为“筑光音乐会”）等大中学校和社会团体中建立起了党的支部或党的小组，团结带动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有力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贵阳的开展。

6月，鉴于贵阳县委及其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为确保安全，省工委指示贵阳县委暂时停止活动。

9月，全国的抗日战争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主席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了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方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国统区党的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贵州省工委决定恢复贵阳县委，仍由谢凡生任书记。贵阳县委将党的方略与贵阳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工作重心放在学生工作上，充分发挥各学校党组织的作用，提出了党在学校的六项方针：一是加紧对党员及进步青年进行党的理论教育；二是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建立大量小型的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三是对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对认识不清者进行说服争取；四是将校外的群众组织扩大或改为单独的青年组织；五是在生活上肃清消极因素，培养高尚情操，提倡互助互爱，从生活上团结青年；六是注意养成富有朝气、有进取之学习精神，在学校中以学习模范来影响和教育民众。

通过这六项方针的贯彻实施，贵阳的学生运动蓬勃兴起，60余名进步师生被发展入党或确定为积极分子。

1939年1月后，国民党制定并推行一系列反共政策，对贵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破坏，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

2月中旬，贵阳县委书记谢凡生、筑光音乐会艺术指导常学墉被特务偷袭打伤，并赤裸裸地警告他们不得再从事“赤色活动”。

为保护他们，省工委决定将谢凡生、常学墉及贵阳县委的几名领导骨干分别转移至重庆、成都等地，并任命由延安回贵阳的陶信镛为贵阳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暂时主持贵阳县委的工作。

2月4日，日军出动18架战机对贵阳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投下重磅炸弹和燃烧弹100多枚，炸死炸伤1200多人，炸毁和烧毁街巷42条、房屋1334栋，造成万余市民无家可归的惨剧，这就是贵阳“二四轰炸”事件。

贵阳县委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迅速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三条决定并迅速付诸实施：一是派出人员参加难民抚恤工作，并在志道小学（今贵阳市省府路小学）设立难民救济站；二是组织开展募捐救济宣传活动；三是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广泛发放、宣讲《新华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分别以《莫忘此仇——敌机疯狂肆虐，贵阳惨遭浩劫，弹落火起，文物精华惨付一炬，数万难民风餐露宿哭声震天》《大轰炸后的贵阳》为题的新闻报道，用血与火的事实，揭露和声讨日寇侵略罪行，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

“二四轰炸”发生后，贵阳城区各大中学校陆续迁往城郊及外县，贵阳县委以此为契机，相继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团结带领贵州省女子师范学校、贵州省立高级中学、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女中、贵阳达德学校等大中学校进步师生，驻贵阳运输、邮政、电信等系统的广大职工和各方青年，组成一支支小分队，面向全社会广泛教唱救亡歌曲、举办救亡演出、开展救亡宣传、组织抗日募捐、壮大进步力量等活动，有力推动了贵阳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开展，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9年4月，省工委任命吴绍勋为贵阳县委书记，孟昭仁为组织委员，陶信镛为宣传委员。

6月，吴绍勋、孟昭仁受命参加省工委在安南（晴隆）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贵阳县委书记由周凤逸担任。

8月，贵阳县委根据省工委指示，利用贵阳各学校放暑假期间，连续举办了3期培训班，每期10天，共培训党员70余人。为应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培训班先后设在贵阳南郊滥田坝和图云关附近的布依族村落木头寨。

培训班主要设置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省工委委员秦天真讲授形势发展和党的基础知识；二是由贵阳县委宣传委员陶信镛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统区的斗争策略；三是以读书和讨论的方式进行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教育。

培训班没有教材，不准记笔记，所有参训党员自带伙食费和行李，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整个学习任务，有力提升了党员素养，明确了形势任务，增强了贵阳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39年10月，省工委再次对贵阳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任命陶信镛为书记。

1940年2月，由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兼任贵阳县委书记，陶信镛任组织委员，王锡祯任宣传委员。

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应对愈加严峻的斗争形势，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决定撤销贵州省工委，另行组建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组织贵阳及全省各地党组织开展疏散隐蔽工作。秦天真撤出贵阳，由临工委秘书长肖次瞻兼任贵阳县委书记。

7月，肖次瞻在执行任务时被捕，随后被挖去双眼，残忍杀害。

9月，临工委决定由贵阳地区的工人党员组成贵阳县委，任命唐培（唐贵）为贵阳县委书记，雷光远（雷正光）为组织委员，熊寄萍（李明）为宣传委员。但仅仅几天后，唐培等人就遭到敌人的追捕。临工委当即指示贵阳县委全面停止活动，并安排唐培转移至重庆，雷光远、熊寄萍转移至昆明。

（二）山城贵阳党旗红

贵阳县委在健全自身机构的同时，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根据贵阳党员分布的实际，首先从学校党支部的建立抓起。除女中支部继续保留外，从1938年3月开始，相继在贵阳中学、贵阳师范学校、贵州省立高级中学、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私立达德学校建立党支部。学校党支部的隶属关系从1938年3月至8月由省工委领导，省工委建立总支联领导各学校党支部，总支联由贵中支部李进忠为书记，男师支部唐范宇（唐树楷）为组织干事，高中支部乐恭彦为宣传干事。5月，总支联改为学校总支委员会。9月，各学校支部的隶属关系由贵阳县委领导，学校总支委员会被撤销。

为适应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贵阳县委在几个有影响力的救亡团体内建立了党支部，推动了抗日救亡宣传，壮大了党的组织。1938年7月，沙驼话剧社党支部成立，先后隶属省工委及贵阳县委领导。1939年9月，沙驼话剧社被国民党贵州当局勒令停止活动半年，其间，沙驼话剧社党员由筑光音乐会支部领导。1940年春，沙驼话剧社恢复活动，同年6月，沙驼话剧社被国民党贵州当局强行解散，党支部停止活动。支部书记先后为于蕴、李登瀛，组织干事冉隆英，宣传干事王绍仲。筑光音乐会党支部1939年3月成立，支部书记先后为聂奇慧（聂静涵）、黄奇鑫、尹克恂，组织干事余启德，宣传干事饶元祚（饶焰）。1940年6月，筑光音乐会被国民党贵州当局强行解散，支部停止活动。1939年4月，合群体育会艺术部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胡世雄（胡骑）、储兆龙，组织干事聂志德、文焕琼，宣传干事王绍仲、卢先甲。这些团体的党组织通过公开的干事会出面进行领导，较好地贯彻了党的统战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宣传。

抗战期间，贵阳地区党的活动取得较大发展，在学校、社会团体、邮电、运输等单位建立党支部22个，发展中共党员100多人。

（三）抗日救亡主力军

1. 多所学校建支部

1938年3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把在贵阳地区各大学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壮大党的力量、团结社会各界的重要一环，根据贵阳党员分布情况，迅速在贵州省立高级中学、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中学、贵阳女子中学、贵阳达德学校等学校建立了党支部。

1938年3月至9月，各学校党支部由省工委成立的联合总党支（简称“总支联”，5月改为“贵阳学校总支部”）领导。9月贵阳县委恢复建立后，省工委贵阳学校总支部撤销，贵阳各学校党支部由贵阳县委领导。

贵阳各学校党支部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原则，组织党员和进步师生参加筑光音乐会、骆驼话剧社等社会团体的公开活动，使之成为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

“二四轰炸”后，贵阳各大中学陆续迁往城郊及外县。中共贵阳县委当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学校党支部要把群众对日机轰炸贵阳的仇恨化作动力，充分发挥进步师生的作用，注重结合所在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把抗日救亡工作开展起来。

贵阳女子中学党支部在学校迁至花溪后迅速行动，在学校发起成立了“筑光音乐会女中队”，按照当地村寨划分活动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农民当中教唱救亡歌曲，并利用话剧、漫画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党员骨干和进步学生与当地布依族女青年广交朋友，学说布依族话，在布依族青年中举办“识字班”，在互教互学中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思想传达并普及到群众中。

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在城区内直接接受贵阳县委书记谢凡生的领导，搬迁到青岩镇后，由时任贵阳县委宣传委员陶信镛直接领导。

2. 勇斗三青团分子

贵阳女师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重点监管的学校之一，在学校内安排有大量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并由三青团分子掌控学生自治会，对进步师生予以严密

监视，对进步活动大肆破坏，反动行径十分猖狂。

面对这一情况，贵阳女师党支部所属7名党员每人牵头在学生中建立一个公开的读书会组织，团结和带动进步同学学时事、论抗战、搞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启发学生思想、壮大进步力量。至1938年9月，贵阳女师的共产党员从7人发展到19人，党小组由1个发展到6个，并定期到贵阳县委汇报工作，或由陶信铺到青岩接头。

1939年上半年，根据贵阳县委的安排，贵阳女师党支部和全体党员配合《新华日报》发起的为抗日将士募捐活动，在校园内积极开展宣传，并以抗日义演、小型集会等多种形式募集款项，得到了包括校长章益三在内的广大师生的支持。这时，校内的三青团反动分子跳出来，诬蔑师生们的捐献是为共产党募集经费，“谁认捐就与共产党有关系，就会受到惩罚”，部分教师和学生受到威胁，取消了认捐款物。

贵阳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贵阳女师党支部与校方交涉，迅速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并邀请当地群众参加，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日前线将士们的英勇事迹，唤起师生的爱国热情，在会场上掀起了募捐高潮。师生们的行动感动了青岩民众，民众也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混入现场欲行破坏的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看到这种场面，徒呼无奈，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贵阳女师党支部团结带领广大进步师生，利用星期天、防空日或农忙时节深入当地农村，一边帮助群众干农活，一边开展抗日宣传，使民众的抗日热情逐步高涨，不少群众自觉捐献钱物支持保育院、难民站的生活需要。

贵阳女师的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诬告宣传抗日的学生不守校规，诬告在课堂上讲授人类发展史的教师言论越轨，不断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制止学生行为、解聘个别教师，但没有得逞。随之，他们又联合国民党贵阳县政府，派出人员对女师进步师生进行公开监视，还跟踪到农民家进行调查，妄图

抓住进步师生反对国民党的“罪证”。女师党支部及时将情况报告给了贵阳县委。

为保护贵阳女师党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安全，贵阳县委决定女师党支部暂时停止活动。

3. 呐喊救亡多样式

贵阳达德学校搬迁到城郊的摆郎后，学校党支部坚持以公开和隐蔽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党的活动。一方面发起成立了筑光音乐会达德中队，以各种文艺方式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先后在筑光音乐会的部分进步学生中建立了3个读书小组，启发、提高成员觉悟，壮大党的力量。

贵阳中学搬迁到乌当后，学校党支部根据贵阳县委的指示，以党员为领导核心，以参加过贵州省学联、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等进步团体的同学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歌咏队、话剧队、绘画研究会，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同时，还派出党员到贵阳中学附近的“大友织席厂”与工人交朋友，开展社会调查，并利用业余时间教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唱救亡歌曲，加深了与工人的感情，传播了进步思想。

贵州省立高级中学搬迁到修文学宫后，学校党支部利用校舍为当地群众开办了扫盲学校，教授文化知识，传达抗日前线信息，传播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给修文人民带来了一股爱国主义的清流。学校党支部还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说服学校增设了“时事课”，并由教师中的党员承担教学任务。在课堂上，他们选取前线捷报反复对学生进行救亡宣传，不断坚定“抗战必胜”的精神信念。

1940年8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贵州当局也加紧了反共活动，省工委及时将被特务监视的贵阳中学党支部书记李正裕和40多名进步学生转移到了省立高中，并恢复了党支部。

省立高中党支部充分发挥“时事课”的作用，把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作为授课内容，组织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

的战略问题》等，还创办了《处女地》壁报，报道抗战时事，宣传鲁迅文艺思想，组织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战戏剧，使省立高中成为修文县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

（四）坚强的战斗先锋

1. 补习班团结工人

1939年初，中共贵阳县委成立由县委组织委员孟昭仁负责的职工工作委员会，担负在工人队伍中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

4月，贵阳县委选派县委宣传委员陶信镛、党员骨干高大瑶以招工的方式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修械厂当工人，以求更紧密地与工人接触。陶信镛、高大瑶进入工厂后，很快在工人中开办了文化补习班，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传播革命思想。

9月，陶信镛先后发展张贵良、赵福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央修械厂建立起直属贵阳县委的党小组。与此同时，贵阳县委通过黄炎培、蔡元培等爱国人士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中华职教社”）贵阳通讯处，在贵阳创立了由地下党员陶涵春负责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以举办工人补习班的方式，将众多工人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补习学校由杜守敦、田伯萍等多名共产党员任教，自编教材教授数学、国文、会计、簿记等课程，并选编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和《新华日报》社论等作为国文读本，邀请筑光音乐会进步青年来教唱抗日歌曲，培养出了一批高素质的工运骨干。

在贵阳县委的统一领导下，补习学校与贵阳的抗日救亡团体互相协作支援，在得知筑光音乐会、骆驼剧社缺少活动场所时，无偿将自己的教室借给他们作为排练和活动场所；在生活书店、读新书店来贵阳开分店时，补习学校协调中华职教社贵阳通讯处，为书店在租赁门面、仓库及发行书刊等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

与此同时，利用中华职教社贵阳通讯处的特殊地位，补习学校对一些因身份暴露而亟须转移的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多次开出身份证明和介绍信，从而使他们得以安全转移。

2. 确保书刊进贵阳

在贵阳“二四轰炸”中，贵阳邮政系统的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毁，不少邮工住房坍塌、无家可归，加之贵阳物价暴涨，广大邮工陷入生活极其困难的境地。

根据省工委和贵阳县委的指示，受命进入贵阳邮政系统工作的贵阳县委组织委员孟昭仁和负责中华职教社职业补习学校的地下党员陶涵春，与邮政系统中的党员陈法轼（1939年1月从黔东南邮政系统调入贵阳邮政系统）、沈天生（1939年初从上海撤退到贵阳的邮政系统职工）紧密联系，决定成立贵州省邮务工会，代表邮工向国民党贵阳当局要求救济，以此来维护邮工的合法权益。

1939年2月5日，在贵阳县委的秘密组织下，陈法轼、沈天生、王泽萸代表邮工向国民党贵阳当局正式发出请愿，最终迫使当局对每名邮政职工“暂借”50元救济费，很好地缓解了邮工的困境。

请愿的胜利，使邮工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作用和力量，加速了邮务工会的成立。

3月26日，贵州省邮务工会正式成立，陈法轼、沈天生、曾启周、王泽萸等人被选为常务理事，贵阳的邮政工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工人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工会，国民党贵阳县委部和邮政当局深感不安，遂向工会理事会提出“改组”要求，并接受由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全国邮务总工会的领导。陈法轼、沈天生等人果断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国民党贵阳县委部和邮政当局不甘失败，一方面以提升职务为诱饵分化工会成员；另一方面将工会骨干一个个调离贵阳，以达到破坏工运的目的。

4—7月，沈天生被调往龙里邮政局，王泽萸被调往黎平邮政局，陈法轼被调往镇远邮政局，其在工会内的职务逐步被国民党分子接替，贵州省邮务工会被国民党邮政当局控制。

尽管如此，在省工委和贵阳县委的组织领导下，邮政系统的抗日救亡活动始终不曾停止。贵阳县委在进步邮工中组建了“黔邮歌咏队”，每天组织邮工练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剧目，并适时开展读书活动，启发邮工觉悟、激发爱国热情。5月1日，“黔邮歌咏队”走上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并现场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有力展示了进步邮工的精神风貌，推进了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同时，邮政职工为贵阳抗日救亡作出的巨大贡献，就是抵制和规避国民党特务的邮检，保证进步书刊在贵阳顺利发行。

在省工委和贵阳县委及邮政系统地下党员的统一组织下，装有进步书刊、报纸、宣传品的邮包一到贵阳，提前得到消息的邮工便立即安排提货，从而规避国民党特务的检查；若时间来不及，则把新来的邮包做上标记，混放在已被特务检查过的邮包中，然后再通知提货。

贵阳读新书店、生活书店的大量进步书刊和抗日救亡宣传品，便通过这些办法源源不断地传递到读者手中。

3. 维护工人的权益

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是1938年上半年由贵阳电信、贵阳电厂、贵州省建设厅电话总机室、贵州省公路局电话总机室、贵阳防空司令部电话总机室及威清门至大西门一带的机器修理店的部分工人组成的，并在国民党贵阳县委正式备案，具有合法身份。但会员只有五六十人，组织力量薄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939年春，中共贵阳县委领导下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成立后，将众多电机业系统的职工吸引过来。负责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共产党员陶涵春，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交通部驻贵阳的电报部门的地下党员罗启珂密切配合，团结带领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的会员，对工会组织加以整顿，拟定了工会章程及理、监事会工作细则，召开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理、监事会。

罗启珂当选为理事会主席，陶涵春、雍鸣阶、雷鸣、罗志清、周荣华、马

宗林等当选为理事；蒲馥镛当选为监事会主席，傅顺文等当选为监事。通过改选，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成为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

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划分为3个区，电信局为第一区、电厂方面为第二区、机器修理部门为第三区，每区设书记1人、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1人；各区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下设会员小组，从而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架构。

贵阳电信系统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由此逐步开展起来。工会发起成立了“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歌咏队”“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话剧队”，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歌曲和短剧，定期在整个电机业系统和街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同时，工会充分发挥职能，尽最大努力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贵州省建设厅厅长办公室内的电话机被偷走，该厅长将当晚在总机室值班的工人王汉章抓捕关押。得知消息后，罗启珂、陶涵春当即找到该厅厅长，据理力争，迫使其释放王汉章并恢复他的工作。

贵阳电厂一位线务员履行职责剪断了市内一家偷电住户的线路，这家人倚仗权势将线务员抓了起来，电厂负责人竟不敢出面交涉。工会派出代表与贵阳电厂几经协商，最终由厂方出面将线务员救了出来。

多起为工人说话、帮工人维权的行动，提高了工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了300多人。

1939年5月1日，工会组织全体会员，高举“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横幅上街游行，沿途张贴标语和宣传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轰动了贵阳城区。

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的活动引起国民党贵阳当局的注意，当局派出特务对工会骨干进行监视，并多次对工会组织的活动横加阻挠。1940年4月，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经省工委批准，贵阳县委将罗启珂、陶涵春转移至外地，工会日常工作由蒲馥镛负责。当年秋，蒲馥镛在组织会员骨干会议时被捕，工会由此暂时停止活动。

4. 运输支部保运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将西南地区的运输管理机构从湖南长沙迁移

至贵阳，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

西南运输管理局在贵阳、重庆等城市设有15个车站，拥有700余辆汽车和2400余名工人。在这些工人中，有的曾在其他城市参加过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具有较高的觉悟；有的是肩负着组织使命的共产党员。

1939年初，受省工委指示，杜守敦深入公路系统开展党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员陈济民受派遣来到贵阳，并通过在西南公路运输局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楠进入贵阳汽车修理厂担任职员。随后，陈济民和陈楠又介绍西南公路局检查站副站长胡钦曾（胡庆生）加入了党组织。

1939年4月，由省工委直接领导的西南公路运输党支部正式成立，陈济民任支部书记。在西南公路运输支部的领导下，贵阳公路运输系统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他们以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贵阳汽车修理厂为活动基地，联系和团结贵阳车站、车辆保养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车辆修理所等单位的进步职工，秘密传阅革命书刊，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党的秘密活动，并先后发展龙有光（龙绍昆）、雷正光、马天定（马聚福）、罗万平等加入了党组织。

在省工委的统一组织下，西南公路运输支部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贵阳的发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新华日报》总社设立在重庆，在贵阳发行的报纸全部从重庆运输。国民党当局虽然同意《新华日报》公开发行并在贵阳设立分销处，但暗中却百般阻挠，派出大量特务对重庆、贵阳两地邮局进行监控，给《新华日报》进入贵阳带来了很大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省工委通过西南公路运输党支部，在川黔公路建立起秘密运输线——在重庆海棠溪车站工作的共产党员陆自诚、陈丽淦等，利用筑渝之间的定期班车，以托运包裹的方式避开国民党检查站的检查，保障《新华日报》安全上车；抵达贵阳后，胡钦曾便利用其管理客车总站行李房的便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报纸传递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同志。

从1939年9月至1941年春，《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撤离，贵阳运输支部共安全运输《新华日报》六千余份，向贵阳广大民众有力地传达了党的声音，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40年8月以后，国民党先后掀起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也对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而残忍的抓捕和迫害。根据临工委的指示，西南公路运输支部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全力疏散转移已暴露的党员和进步人士。

8月，支部党员雷正光受命担负临工委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联络任务，抓住贵阳汽车修理厂派遣一批工人到安南（今贵州晴隆）抢修汽车的时机，将7名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编入安南的队伍，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在贵阳的搜捕。此后，这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头疏散到各地。

12月，按照临工委的部署，西南公路运输支部的党员分头隐蔽。支部书记陈济民离开贵阳汽车修理厂，转移到贵州资源委员会运务处工作。为完成临工委赋予的“负责转移到各地的党员和进步力量的联络任务”，陈济民在金井街（今贵阳市富水中路）开设了一家叫“亨昌”的杂货店作为联络点，由从黔北转移到贵阳的地下党员陈光碧当店员，尚未暴露党员身份的胡钦曾负责采购，坚持开展革命活动。

1942年初，西南公路运输支部的党员雷正光、马天定、龙有光、罗万平等先后转移到云南昆明，与云南地下党员李勃生、金惠霖取得联系，落实自身工作、获得合法身份，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转地不转党”的原则，继续接受临工委委员杜守敦的领导。

1944年，杜守敦离开昆明到重庆工作，西南公路运输支部的同志在没有上级领导的情况下，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指示，立足工人和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党员肖维亮在昆明四区公路局、雷健民在昆明公路局第四运输处均团结了

一批进步青年；党员雷正光与国民党陆军后勤总队的进步青年军官俞舜民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俞舜民担任汽车连连长后，与其他两名党员成功进入汽车连担任司机，逐步控制了连队10多辆卡车；党员龙有光利用开饭馆常与附近的煤矿矿工及少数民族群众接触的机会，启发群众思想，播撒革命种子，取得了较好成效。

西南公路运输支部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支部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是一支隐蔽较好的队伍，在皖南事变前后的艰苦岁月里，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工人阶级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护转移贵阳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文艺号角鼓斗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阳处于大后方，远离战场，受战火波及程度小。全国各地沦陷区、半沦陷区的工厂和大批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图书出版发行单位，以及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贵阳，著名文化人士蜂拥而至，一些在省外工作的贵州籍学生、作家和艺术人员也纷纷返回贵阳，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

这批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在抗日救亡的主题下纷纷成立社会组织，用自己的才华和爱国热情去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在贵阳掀起了一波波抗日救亡热潮，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贵阳抗日文化。

（一）筑光音乐会

筑光音乐会（下称筑光）原名筑光音乐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4月，系由一批音乐爱好者发起组织的公开音乐团体。得到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同意，其会址设在四川会馆，杨森担任名誉会长，贵阳音乐名家刘佩南为会长。

筑光成立之初，以研究乐器演奏技巧为主，对音乐爱好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成立不久就发展了一批会员。

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中共贵州省工委决定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筑光，以便将这个合法的音乐团体，改造成受党影响的抗日救亡文艺团

体，运用音乐富有感染力的特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有50余名党员和进步学生加入筑光，对筑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7年8月，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常学墉从上海回到贵阳，任贵阳高中、正谊学校、达德学校等教育机构的音乐教师。他在学校广泛教唱抗日歌曲，得到师生们的好评。

省工委派学联党团书记陶信镛去看望常学墉，邀请他担任筑光的音乐指导，常学墉欣然同意。常学墉在筑光不仅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还教授了合唱、轮唱、重唱等多种演唱形式，使救亡歌曲更具感染力。

在党组织的努力下，筑光从人员到活动形式、演唱内容等都有较大改变，逐步由一个单纯的音乐组织，转变为进步的抗日救亡文化组织。1937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6周年，筑光不仅参加了各界的游行示威，还赶排了《九一八小调》《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亡国奴当不得》等5首救亡歌曲在街头演唱，用音乐鼓舞民众的抗日救亡斗志，用歌声唤起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



筑光音乐会会员赴花溪演出途中合影

1938年贵阳“二一九”学联事件发生后，省工委采取措施，把大批学联成员转入筑光，并选派党员谢凡生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加入筑光，加强党对筑光的领导。

1938年5月，谢凡生介绍常学墉加入了党组织；6月，由常学墉、聂奇慧、陈祉颐组成筑光党小组。1939年3月，成立筑光党支部，受中共贵阳县委领导。在党的领导下，筑光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贵阳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活动中，筑光组织了百人大合唱，演唱了《流亡三部曲》《慰劳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歌曲。1938年12月，在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成立大会上，筑光受邀派出歌咏队演唱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及《国际歌》，向全社会有力传达了贵阳人民的抗日斗志。

贵阳是个多民族聚居之地，人们惯用山歌对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为了使抗日救亡歌曲普及到广大城乡群众中，1938年夏，筑光深入乡间采风，集体创作了山歌剧《送郎打日本》。剧本由高言志构思、李良广执笔写出初稿，谢凡生润色定稿，常学墉完成音乐创作。

在正式排练前，中共贵阳县委邀请筑光骨干成员召开座谈会，省工委领导秦天真参加了会议。秦天真结合山歌剧的编写，谈了筑光的工作方向，要求筑光面向工农，深入农村，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5月28日，筑光音乐会、黄钟音乐会、贵医歌咏队、达德中学歌咏队、贵阳联合口琴队、儿童联合歌咏队共500人，在贵阳群新电影院举行了联合音乐演奏会，演出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节目22个。

1938年12月，筑光联合黄钟音乐会、贵阳青年会和社会名流共同组成的贵阳合唱团，与迁往重庆途经贵阳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的部分师生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慰问抗战将士演奏会。

在演出前，他们在报上发布了《筑光音乐研究会劳军演奏前奏曲》的报道，指出：“这次中国的抗战，是争取全民族解放的战争。动员全国民众参加

抗战，是战胜日寇的主要条件。”“筑光是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极愿意贡献其一切力量于这次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演出中，他们满怀激情地演唱了《追悼阵亡将士》《武装保卫中华》《流亡三部曲》《热血歌》《中国男儿》《抗敌歌》《旗正飘飘》《淮河船夫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歌曲。演员们深情的表演，感染了观众，达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布了这次演唱的部分抗日歌曲的歌词。



筑光音乐会编辑的抗日歌曲

1939年1月，贵州广播电台成立。筑光会员每星期六到电台演唱抗日歌曲，每当电台播出他们的歌声时，听众都被深深地吸引。

筑光会员在贵阳音乐团体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会员发展到400余人。

筑光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国民党贵阳当局的关注，当局遂采取种种手段加

以阻挠和破坏。

1940年6月18日，筑光干事会在花溪麟山小学举行改选大会。会议刚开始，大批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和所谓的纠察队员就包围了会场，声称筑光的集会未经国民党贵阳县党部批准，是非法集会，并绑架了筑光总干事文学芬。

次日，早有预谋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登报污蔑筑光进行非法活动，勒令其解散。随后，临工委为确保筑光会员和进步艺术家的安全，指示筑光停止活动。

（二）沙驼业余话剧社

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下称沙驼）成立于1936年12月，创始人肖之亮系贵州遵义人，曾在上海参加过爱国话剧活动，是“左联”成员。

肖之亮返回贵阳后，在贵阳中学和毅成中学教美术，授课之余，与部分教职员排练并演出《江村小景》《银包》《诗人》等独幕话剧，影响很大，在贵阳各校引领了一股话剧热潮。



沙驼话剧社部分队员合影

肖之亮等联合贵阳教育界知名教师田君亮、李俦元等发起成立沙驼业余话剧社，并取得合法地位。经社员选举，肖之亮为社长，蒋蔼如、贾叔华、毛仁学、唐和、何广健等为理事。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贵阳党组织的支持下，一批爱好戏剧的学联成员和秘密读书会成员加入沙驼话剧社，给沙驼注入了新的进步力量。

1937年12月，成立沙驼街头演剧队，使话剧走下舞台、走上街头，以其生动的情节、活泼的表演、真实的道具，直接诉诸观众的感官，受到群众的欢迎。

1938年三四月间，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党员于蕴、冉隆英、吴同尘等加入沙驼，并建立沙驼党小组，于蕴任组长。

党组织要求沙驼党小组积极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社员，动员更多的爱国青年参加沙驼。7月，建立沙驼党支部，于蕴任支部书记，吴同尘、王绍仲、冉隆英任支部干事。沙驼党支部通过沙驼干事会开展工作。

沙驼的演出活动遍及贵阳城乡，演出的剧目主要有《有力出力》《死里求生》《生死关头》《打鬼子去》《二升米》《张家店》《夜摸营》《九一八以来》《炮火中》《察北的风》《烙印》等独幕剧，《升官图》《狐朋狗党》《代用品》《包得行》等多幕剧，《难民曲》《募捐的时候》《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剧目立足于广大民众，通过戏剧演出使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人心。

抗战期间，沙驼话剧社与贵阳民众话剧社、青年会抗敌剧团、狼火话剧团一起成立了贵阳抗战戏剧协进会，联合进行了多次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尤其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贵阳深入人心，很多年轻人随口都会唱出：“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鬼子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呐，恭恭敬敬地让出了沈阳城……”

贵阳青年教师赵毓祥在报上以《放下你的鞭子》为题介绍了这个剧目的内容和情节，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的思想根植于每个民众的心中。赵毓祥在报上说：“我七岁的女儿最近学会唱《自由神》影片中的

歌：农工商学兵，大家一条心。不分男女，合力奔前程，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我们是中国的主人，按住你的创伤，挺起你的胸膛，争取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沙驼话剧社演出公告

沙驼在做好自身剧目排练、演出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指导其他抗日救亡团体排演抗日剧目。1940年，在沙驼的支持下，贵阳合群体育会艺术部排演的《台儿庄之战》轰动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书报供应社排演的《夜光杯》《抽水马桶》《当汉奸的下场》等剧目，也让贵阳人民受到很大的教育。

然而，沙驼在贵阳广泛的演出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贵阳当局的不安，他们就制造事端破坏沙驼的活动。

1939年秋，沙驼参加贵阳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募捐义演，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即借口“账目不清”，勒令沙驼停止活动半年。

沙驼停止活动期间，其成员大都参加了筑光、合群体育会的救亡宣传活动。1940年春，几经交涉，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勉强同意沙驼恢复公演，但又规定不准在闹市区演出，剧目必须送审。

沙驼党支部为避免国民党贵阳当局节外生枝，决定举行隆重的复社大会，并在报上刊登广告。沙驼复社后的首次公演，决定排演正在重庆、桂林等地上演的剧目《人民总动员》《包得行》，哪知在剧本送审后竟被禁演。当局的阻挠破坏，使沙驼难以开展活动。

1940年6月30日，国民党当局勒令沙驼解散，沙驼由此被迫停止活动。

（三）“民先”贵阳地方队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是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93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并命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其成员共300余人，分为36个分队，分赴全国各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曾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先”、1937年9月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益珊，受党组织派遣，到贵阳工作。

在从延安赴贵阳途经武汉时，张益珊与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领导于光远会面。张益珊向于光远汇报了到贵阳成立民先地方队部的设想，得到了于光远的同意。

4月，张益珊抵达贵阳，在贵阳履三小学任音乐教员。由黄齐生介绍，结识了李良康、凌毓俊等进步青年，共同发起了筹建“民先”贵阳地方队部的工作。

由于张益珊的组织关系尚未转到贵阳，故未能与贵州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民先贵阳队部筹建工作得到了省工委的大力支持。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

召集贵阳师范学校、贵州省立高中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乐恭彦、钟林、李德邦、李良康、周树楹、周兴仁、李登瀛等人开会，要求他们积极支持“民先”的工作，并派出部分党员以群众身份参加“民先”，协助“民先”走上正轨。

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民先”贵阳地方队部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由黄齐生介绍，张益珊到国民党贵阳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教唱抗日歌曲，团结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贵阳“民先”第一队。至6月底，贵阳“民先”队员发展到300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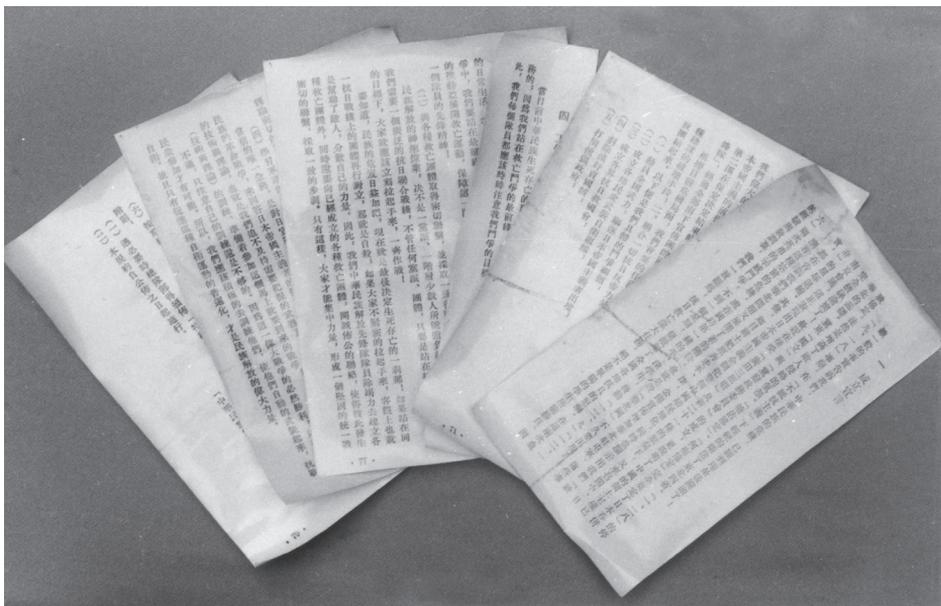
7月初，“民先”在鹿冲关举行民主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民先”贵阳地方队部负责人，张益珊任队长，凌毓俊任副队长，乐恭彦任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储兆龙任康乐部部长，谢群英任妇女部部长。“民先”贵阳队部下设6个分队、2个区队，饶元祚为第一区队区队长，方为策为第二区队区队长。当月，由于饶元祚离开贵阳，乐恭彦兼任第一区队区队长。

“民先”贵阳地方队部建立后，即以他们“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坚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积极参加筑光音乐会、骆驼话剧社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把演唱、教唱抗日歌曲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采取散发传单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方针，宣传“民先”的性质和任务。

“民先”贵阳地方队部在饶元祚家中设立了小型图书馆，收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著作和进步书刊供队员学习，还专门邀请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刘方岳和贵阳生活书店的邵公文等人给队员讲授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及后方群众的任务等内容，提高民先队员在抗战后方仍要随时准备参战的认识。

“民先”把组织队员学习军事技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每个星期日以分队为单位分别在贵阳城郊的杨柳湾、华家山、鹿冲关等地集中，训练基本的军事技能。他们以木棍作枪支，以树枝当刀刺，练习打游击、捉汉奸，训练十分严肃认真。队部还聘请专人给队员作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报告，提高队员们对敌后游击战争在全民族抗战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民先”贵阳地方队部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贵阳当局的注意，当局专门派



“民先”成立宣言

特务学生打入“民先”，伺机破坏生事。

1938年7月23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借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凡爱国团体必须公开申请正式成立组织”的公告，在《贵州晨报》刊登通告，要求一切组织与团体必须于8月1日前办理申请立案手续，否则将依法取缔。

国民党贵阳当局估计“民先”不会申请登记，他们便可宣布“民先”为非法组织。通告登出后，“民先”队员在华家山3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申请登记问题，最后决定申请登记，争取公开，并推举张益珊、周兴仁代表民先办理登记手续。张益珊在会上表示，为应付不测，若二人受到羁押，“民先”贵阳地方队部由凌毓俊、乐恭彦继续领导。张益珊、周兴仁去办理登记手续时，国民党贵州当局一面表示答应登记，要“民先”造名册报国民党省党部；一面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民先”的登记。

8月1日，“民先”将有50余名队员签名的名单交省党部。8月6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惕庐把张益珊、周兴仁、凌毓俊、乐恭彦找去谈话，要“民先”停止活动，听候贵州省精神动员委员会的批示。张益珊等人当即加以反驳。

8月10日，“民先”散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全体队员为请求立案争取公开告社会人士书》。这份有159名民先队员签名的《告社会人士书》，详细介绍了“民先”的立场、观点和任务，批驳了国民党贵州当局对“民先”的诬蔑，表明“我们民先是永远忠实于统一战线的，而且我们的组织，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民族，为了忠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誓死争取爱国救国的自由”。

然而，国民党贵州当局不顾民众的反应和抗战的需要，镇压“民先”的决心已定。8月12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在《贵州晨报》刊登通告：“兹定于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在本市民众教育馆大礼堂召集左列、张益珊等一百六十人训话，并予编队，实施训练，充实抗战力量。”同时，还纠集党棍、特务等对民先队员的家长进行威胁恐吓，要他们管好自己的子女。有几位家长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下，在报上替子女登出“退出民先紧急启事”，特务还冒充民先队员之名刊登退出声明，企图分化瓦解“民先”。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民先”贵阳队部决定率队员按时赶往贵阳市民众教育馆，与国民党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省工委得知这个消息后，于8月12日晚，由秦天真向“民先”中的共产党员黄慧珠传达了省工委的两条决定：

- 一、地下党员尽量不要去参加国民党当局指定的8月13日下午的活动。
- 二、建议张益珊不要把“民先”队员都带去，只带少数人前去应付。

黄慧珠将秦天真的意见向张益珊转达后，张益珊认为问题没有这样严重，决定还是按计划行事。8月13日中午，“民先”队员在甲秀楼集合后，在张益珊的带领下打着“民先”横幅、唱着“民先”队歌赶到贵阳市民众教育馆。当



“八一三”民先事件的发生地——贵阳民教馆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激起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特别是教育文化界的不满。在社会舆论的谴责和狱中“民先”队员的斗争下，国民党贵阳当局被迫于8月26日将“民先”队员释放，但仍然对张益珊、凌毓俊予以羁押。“八一三”事变，使贵阳人民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1941年1月19日深夜，张益珊、凌毓俊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国民党贵阳保安司令部的防空洞内。

（四）战时“社座”倡救亡

1938年5月，受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委托，生活书店经理、中共党员邵公

文利用书店开业之机，邀请贵阳各大专院校教授和知名教师数十人到书店座谈。

邵公文说，希望能有一个组织，大家彼此交流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对政治理论的研究，书店愿意提供资料等。邵公文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经讨论，一致同意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下称“社座”）。

参加社座的成员均为贵阳知名人士，在贵阳文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有大夏大学的谢六逸、梁园东、吴澄华，贵阳医学院的郭一岑、向午华、武行生、何战白、丁晓光，以及贵阳各个中学的教师肖家驹、蒲安定、王启澍、高滔、田君亮、肖之亮、王诗农、何锡周、赵毓祥、刘熏宇、刘方岳等45人。邵公文自发起成立社座后，为避免暴露，就没有再参加社座的活动。

省工委在社座内建立党小组，由王启霖、武纡生、蒋蔼如组成。1939年2月，武纡生离开贵阳后，何战白参加小组活动。社座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学习和讨论，轮流在成员的住宅和办公场所举行。联络工作由王启霖、蒋蔼如负责。

鉴于社座成员大多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党组织对社座成员不做硬性约束，思想上求同存异，只要求集中于抗战救亡这个中心，把工作更多地放在同与会人员的诚恳接触上，如全民抗战问题、抗战与民主的问题、战时教育问题、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问题等都是座谈的题目。

面对抗战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社座成员都要到《新华日报》中去找答案，把《新华日报》的报道拿来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报刊的有关报道相对照，从中看出问题，加以分析，进行研究，以提高对抗战的认识。

这样的座谈，一般是每月至少一次，多则三次。

社座成员并不只是坐而论道，他们寻找机会利用各种条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何战白利用贵阳医学院公开出版的院刊，开辟“时事述评”专栏，先后发表了《希特勒手掌中的捷克》《北方大熊的吼声》《张伯伦演说露出了尾巴》等多篇述评。其中，在《怎样伸出第二期抗战的铁拳》一文中，他提出：“亲爱的中华儿女们，更进一步地努力吧！应遗予我们后一代以永远的独立、自由、幸福！纪念我们彻底英勇伟大的史迹！”这些文章，提高了贵阳医学院师

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鼓舞和激励了他们的抗日救亡热情。

社座为扩大宣传，由王启霖、蒋蔼如编辑油印刊物《会报》。

《会报》以报道各个论题、各组座谈情况、重要发言摘要等为主，还附有讨论提纲。《会报》印制好后不仅在内部发行，还送至民先、沙驼、筑光等抗战团体，受到大家的普遍好评。

1938年，徐特立从湖南去重庆，途经贵阳时，社座便邀请徐老来与大家座谈。讲话中，徐老介绍了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一些方针政策，勉励大家加紧学习，提高认识，并交流自己学习《资本论》的方法和体会。座谈会开了5个多小时，大家受益匪浅。

1939年，国民党当局公布了“五五宪草”，扬言要还政于民，准备实行宪政。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社座多次召开讨论会，揭露了国民党用宪政欺骗人民的诡计，决定发起促进宪政的运动。

6—7月间，社座在贵阳医学院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宪政运动会议，由郭一岑主讲。国民党贵州当局原以为社座只是个小团体，不过是几个文化人坐而论道而已，当社座开展促进宪政运动时，便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根本利益，于是便对社座活动大肆阻挠，给社座开展活动带来了极大困难。

1940年上半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路过贵阳，社座邀请他为大家上有关《资本论》的课，使大家再一次受到了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

1940年下半年，贵阳白色恐怖加剧，社座成员先后离开贵阳，社座即停止了活动。

（五）“中苏分会”促“统战”

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下称“中苏分会”）是中共贵州党组织通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出面建立的从事抗战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文化组织。

1938年，共产党员武纾生得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王漱芳是孙科派系的人，而当时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会长即孙科，并且武纾生在总会有熟悉

的人。

于是，武彜生便萌发了建立中苏分会以开展统战工作的设想。经请示秦天真同意后，武彜生便与总会联系，得到总会同意，并由总会通知王漱芳和武彜生负责筹建贵州分会。

在讨论会长、理事名单和成立大会等事项的筹备会上，武彜生拿出与秦天真拟定的主要由贵阳文教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理事名单，几经协商，得到了王漱芳的认同。

1938年12月3日，《贵州晨报》刊登了《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成立大会特刊》。

第二天，贵阳各界代表500余人聚集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大礼堂，召开了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成立大会，在省党部门前悬挂苏联国旗，并邀请筑光音乐会到现场演唱了苏联国歌和《国际歌》。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苏文协贵州分会领导成员，主要由国民党军政人员、文教界名人组成。不过国民党军政人员主要是挂名，主持协会实际工作的是共产党员王启霖。

会后，王启霖以漆林为笔名，于12月14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贵阳的一个盛会》，报道了中苏文协贵州分会成立的情况。

12月，中苏分会在贵阳民众教育馆举办了苏联画报版画展览会，展出苏联版画500多幅，并展示有100多本中、俄、法、英、日等文种的书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军事、教育、心理等方面，贵阳民众得以了解社会主义的苏联。

王启霖在日常工作中，常常将苏联文协寄赠的书籍和刊物，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细致地包上书皮，写上其他书名投递给进步人士，以免碰上国民党特务的邮检，给收件人带来麻烦。

中苏文协贵州分会中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中苏文协的招牌，与社座和其他进步团体广泛合作，开展党的工作和抗战文化宣传，取得了良好成效。

（六）贵阳群众革命社

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贵阳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部分党员向邻省和新四军转移，少数党员就地隐蔽。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贵阳地区的党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

在国立贵州大学的学生中，以蔡之诚、车祖尧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不惧黑暗和恐怖，向往光明和进步，以举办学生补习班的名义，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和进步青年，于1944年8月秘密成立了进步团体——贵阳群众革命社（下称“群社”）。他们定期组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书刊和进步小说，传播革命思想，不断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44年秋冬之际“黔南事变”爆发后，蔡之诚与车祖尧、刘瑞模、陈启宇（陈明道）、杨光文、邱天庭（邱闵）等人联系贵阳大中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筹集经费置办了一批物资和弹药，一方面积极寻找共产党组织；另一方面准备上山打游击抗击日寇。后因日军侵黔不久后便撤出，才改变了这一计划。

1945年初，群社成员马腾骧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注意。

为了群社的安全，蔡之诚立即安排马腾骧与其女友袁淑娥转移到了重庆。马腾骧到重庆后，结识了贵阳籍浙江大学进步学生安粤（安毅夫），并将群社的活动和正在寻找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告诉了安粤。安粤通过自己的同学吴作和（赵江）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并介绍马腾骧认识了吴作和。

1945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委员会负责人刘光根据安粤提供的信息，派吴作和到贵阳了解蔡之诚等人秘密组建群社的情况并做接收工作。吴作和在贵阳与蔡之诚等人见面后，了解了群社成员及组织建设的整个经过，认为符合接收条件，决定群社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接收，由南方局派回贵阳工作的沈守鸿（沈伯乐）负责联系和领导。

然而，马腾骧也在这时从重庆返回了贵阳，并被曾监视过他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映贤撞见并抓捕。在国民党中统黔室党派情报科科长赵促成的拷问下，马腾骧供出了吴作和及其所了解的群社成员的情况。

赵促成是我党的叛徒，曾担任过中共黔北特委负责人，1941年被捕关押于贵阳，1942年叛党投靠敌人，成为国民党职业特务。

赵促成勒令马腾骧带路，率领一帮特务前去抓捕群社成员，恰巧在街头遇上了吴作和。由此，吴作和被捕，并从其身上搜出了群社成员名单。随后，群社成员沈守鸿、张恒、聂奇婉（聂群）等人被捕，蔡之诚、车祖尧、刘端模被特务严密监控。

国民党中统黔室对群社采取“破案留根，羁縻首领，控制群众”的手段，企图将这批青年加以控制利用。

蔡之诚等被羁縻于贵阳后，利用赵促成抽大烟、贪婪腐化的弱点，施计贿赂，使赵促成逐渐放松了对他们的控制。1945年7月，群社成员杨光文、刘端模、邱天庭等人秘密转移到了重庆，蔡之诚则勇敢地留下来继续与中统周旋。

群众革命社是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在抗战后期党的地下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之时，以蔡之诚为代表的这批革命青年积极行动起来，阅读马列著作，寻求革命真理，追随共产党组织，还在日本侵略军进犯贵州黔南、屠杀同胞之时，秘密购买枪支弹药准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行动，充分展示了贵阳青年大无畏的革命激情和战斗意志，也有力配合了党在白区的工作。

（七）繁荣的抗战文艺

抗战前的贵阳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内陆小城，受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许多文化教育科研机构纷纷迁至贵阳，大批文化艺术界人士来到贵阳。

机构和名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思想的鼓舞下掀起了文化救国高潮。同时，贵阳文化教育界亦抓住时机，主动加强联系与合作，兴办和成立了众多学校、社团组织，开展教育科研文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以抗日救亡为主体的贵阳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抗战后方文化重镇的形成。

1938年，贵阳陆续出现了一些文艺社团，如“七七”文艺社、中国诗艺社、贵阳文艺界联谊会、狼火文艺社、大夏笔会、中国写作协会大夏分会等。

这些社团在全民动员、团结抗战的感召下，发挥文学艺术的作用，以文艺刊物为宣传阵地，唤醒民众，在贵阳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时贵阳主要有近二十种文学刊物。如“七七”文艺社的《七七》半月刊，创刊于“七七事变”一周年，先后发表了齐同的《血的训诫》、玄瑛的《抗战进行曲》、王启霖的《由自杀到自杀》等不同体裁的抗战作品，还附有贵师学生自治会主编的《“七七”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

中国诗艺社办的《中国诗艺》，在抗战初期较有影响，除发表诗作外，还有译诗和诗论专栏，著名诗人和作家徐迟、袁水拍、冯至、郭风、邵帆、李广田等曾在该刊发表作品。

在抗战时期具有一定影响的刊物有《西南风》周刊、《自强》月刊，抗战后期还创办了《新流》《新年代》《知识》等期刊，这些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鼓舞民众抗敌精神、培养文学青年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贵阳文通书局主办的《文讯》月刊，曾发表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袁水拍、洪深、端木蕻良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大西南和全国都很有影响。

还有《贵州晨报》的《每周文艺》、《中央日报》的《前路》、《大刚报》的《阵地》等几家报纸的副刊，都发表过反映抗战前线动态和后方社会面貌的文学作品，是发表抗战文学的又一园地。

抗战时期，一大批著名作家、教授、学者由沦陷区陆续迁到贵阳，他们中的许多人耕耘过贵阳的文坛，为贵阳的文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上海回到家乡贵阳的文化名人谢六逸，是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翻译、撰写过多种著作。著名作家茅盾到贵阳写下《贵阳巡礼》一文，记述了他在贵阳中华路上的见闻，为贵阳留下了难得的历史真实资料。

另外还有大夏大学中文系主任李青崖，教授齐同、曹未风、张梦麟，贵州

大学文学副教授蹇先艾，文学院院长潘家洵，外文副教授方敬等人，都是贵阳地区文学界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为贵阳抗战文化的兴起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抗战时期，音乐成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强力武器。

抗战爆发后，贵阳的音乐团体除著名的筑光音乐会外，还有许多音乐团体，如黄钟音乐会、贵阳医学院歌咏队、口琴队、黔邮歌咏队、基督教青年会歌咏队和省民教馆歌咏队，都纷纷演唱过抗日救亡的歌曲。

1943年以后，贵阳音乐团体掀起了以大力普及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进步作曲家创作的抗战歌曲为主要内容的新音乐运动，新音乐的普及使贵阳的抗战歌咏活动进入了高潮。

1944年夏，抗敌演剧四队在贵阳演出期间，推出该队音乐指挥舒模创作的歌曲《你这个坏东西》，愤怒声讨了囤积居奇的米蛀虫，获得广大听众的共鸣，当即在贵阳大街小巷广为传唱，成为讨伐那些败类的檄文。

抗战时期，贵阳的戏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纷纷上演进步剧目和宣传抗日的新戏。

贵阳话剧界影响较大的除沙驼话剧社以外，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如韦布、程漠等。他们曾以省立民众教育馆作为活动基地，约请本地演员共同演出《原野》《日出》《雷雨》等剧，给本地演员创造了一个学习示范的机会，为观众提供更高的艺术享受，也以进步话剧和抗战剧目影响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地演员也注意向外地演员学习，在演出中改方言为国语，并开始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在舞台布景、表演艺术上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除沙驼话剧社外，贵阳话剧界颇有名气的还有合群体育会艺术部、青光业余话剧社、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话剧队等。

1944年秋，田汉及其夫人安娥与四维儿童剧团一道由桂林到达贵阳。适逢省妇女联合会出面发起“十万双布鞋劳军义演”“慰问抗日将士演出”“救济留筑难童演出”等活动。

田汉亲自执导上演了自己编写的《江汉渔歌》《新雁门关》《双忠记》等剧目，同时还参加吴祖光编写的《少年游》的演出，他满怀激情地在台上演讲，使贵阳观众受到深刻感染。

随着一些外来戏剧团的进入，京剧、川剧、评剧、越剧等剧种也逐步在贵阳安家落户。

抗战文艺的蓬勃兴起，话剧运动的普遍开展，让贵阳一度孕育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在抗战宣传的需要下，话剧既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较其他艺术形式更能使观众获得亲切具体的真实感，它的形式与内容又较能和现代人的生活契合，而且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戏文的影响往往胜过学校教育。

1939年，著名相声演员欧少久携其弟子来贵阳演出《大闹公堂》《卢沟桥之役》，以相声的形式宣传抗日，让贵阳人耳目一新，成为相声传入贵阳之始。

抗日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流亡到贵阳的许多学者经过战火的洗礼，来到这个远离战场的后方，发挥自己的专长，参与到贵阳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中去。

著名画家徐悲鸿、关山月、叶浅予、吴夔等来到贵阳，促进了贵阳美术活动的发展。国画家徐悲鸿、油画家倪貽德、剧作家熊佛西等人的书法、绘画展览和讲座，先后在贵州省立艺术馆举行。

1943年7月，战地写生队队长、画家沈逸千在贵阳举行画展。1945年5月，王渔夫举办画展，将各种绘画流派介绍给贵阳市民，丰富了贵阳抗战文化的内涵。

1938年，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迁入贵阳后，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等先后迁入贵阳，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大学里秘密建有党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大夏大学有一批治学严谨、思想进步的知名教授，如文学教授谢六逸、李青崖，史地学教授翦伯赞、周谷城、梁园东，社会学教授吴泽霖，政治学教授湛志远等，也有力推动了贵阳教育事业的发展。



大夏大学学生在铜像台（今喷水池）进行抗日救亡演讲

由沦陷区疏散内迁贵阳的一批高等院校和文化团体，汇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给抗战时期的贵阳带来了新的文化知识、新的科学技术。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客观上为党在贵阳的抗战文化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者云集，给贵州文化界带来蓬勃生机。

谢六逸教授，除担任大夏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贵阳师院文学系主任外，还参与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活动，与蹇先艾等发起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积极从事贵阳文通书局的编辑出版工作，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活动。

乡土文学作家、遵义人蹇先艾，先后担任文艺副刊《每周文艺》和《新垒》的主编，为培养业余作者做了大量工作。

著名长篇小说《新生代》的作者、东北人高滔，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兼贵阳中学初中部语文教员，在培养和提高青年学生文学兴趣方面作出可贵贡献，同时还积极参与了中苏文协、社座等社会活动。

贵阳人王启霖，抗战初期从日本归国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既是作家，又是一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

抗战时期贵州汇集了专家学者、正副教授近300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全国的工业、航空、建筑、农业、生物、数学、物理、化学、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教育、心理、政治、经济、法律、医学、外国语文等方面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全国一批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画家、导演、舞蹈家、音乐家、新闻记者、编辑等，也纷纷来到贵州、贵阳进行创作、授课、演讲、办报刊、办画展和开展新闻采访、演出等活动。主要有著名科学家苏步青，著名作家茅盾、巴金、叶圣陶，诗人闻一多等。

当时的贵阳，聚集的名人学者之多，涵盖学科之广，在贵阳历史上是罕见的。

1938年初，全国的抗战形势出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抗日宣传工作和革命文化工作蓬勃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是抗战时期闻名于国统区的进步书店，直接联系人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负责人，文委委员胡绳任生活书刊主编和总编。为了更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生活书店总店决定派出党员干部到各地，尤其是国统区开设书店。

贵阳的生活书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总店派来的共产党员邵公文等建立的。生活书店设在中华南路达德学校对面，经过积极筹备，1938年4月1日，生活书店贵阳分店正式开始营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当天就卖出2000多册书。

贵阳生活书店成立后，通过销售进步刊物，与贵阳文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促进了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及《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建立，支持了

《十日》旬刊的编印发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相继从武汉撤离，迁往重庆和桂林。

中国共产党为了开辟抗日和革命的宣传阵地，决定在原有分支店的基础上，另在国民党统治区后方的主要城市增设分店。通过革命书籍为全民抗战而呼吁，为革命进步而呐喊。

贵阳读新书店是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贵阳联合经营的书店，1939年2月在贵阳创办，店址设在达德学校左侧，与生活书店隔街相望，抗战期间与生活书店一道积极投入贵阳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化事业中。

1939年4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了书店党支部，熊蕴竹任书记，领导两个书店中的党员开展工作。两书店的党员领导则由省工委直接联系。

贵阳读新书店发行的图书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以及延安编辑的《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刊物，都由读新书店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读新书店还秘密发行《支部工作纲要》，该书介绍了党的性质、纲领、任务、纪律和基层组织工作等有关知识。

1939年，读新书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举办读者向抗战前方将士写慰问信活动。书店张贴致读者的公开信：“前方将士正浴血抗战、英勇杀敌。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欢迎你们给前方将士写信致以亲切的慰问。”

公开信贴出后，读者络绎不绝地到书店写信，活动10天，征集到慰问信几千封。

两家书店还为贵阳的自力书店和遵义、毕节、安南（今晴隆）、平越（今福泉）、镇远等县的进步书店提供图书，将革命文化运动扩展到全省，为贵州的抗日救亡活动作出了贡献。

读新书店和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设立，给贵州知识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了

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的贵阳，除原有的省立高中、贵中、贵师、女师、女中、县中、达德、毅成、正谊等中学外，还有外地迁来的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这些学校的进步师生，渴望得到进步书刊，与书店建立了密切联系。

书店门市部有二十多平方米，按当时条件来说，已经相当宽敞了，但书店内经常是挤得满满的，三面书架，中间摆陈列台，读者可以任意翻阅选购。有的青年索性站在店堂里如饥似渴地捧读书刊，一站就是几个钟头。

读者们在学习中遇到了问题，常向书店工作人员询问。因此，书店曾定期举办学习座谈会，邀请部分读者参加，并指定专人担任学习辅导员，将读者提出的问题在学习会上进行探讨，找到通俗易懂的答案，再向读者讲解。这种辅导学习的方法，不但帮助读者解决疑难问题，宣传革命道理，还帮助党员同志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团结更多的进步读者。

读新书店还同《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不少“禁书”通过地下党建立的《新华日报》发行渠道送进了贵阳，并由贵阳发行出去。

生活书店和读新书店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生活书店和读新书店在贵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打击。

1941年2月，两家书店遭到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查封，孙家林等5位工作人员被非法拘捕，其余人员被迫撤离贵阳。

1941年2月23日，邹韬奋得知生活书店贵阳分店和贵阳读新书店已在2月22日深夜被国民党查封，且店员被捕的消息时，非常气愤，他说：“被逼到这样的田地，我伤心惨目，想到为抗战文化而艰苦奋斗的青年干部遭到这样冤狱惨遇而无法援救，任何稍有心肝的人，没有能抑制愤怒的。我愤怒得目瞪口呆，眠食俱废！”

2月25日凌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邹韬奋由胡绳陪同愤然离开

重庆，奔赴贵阳。一到贵阳，胡绳把韬奋先生安顿在城边旅社住下，便连夜到中华南路巡看已被查封的生活书店和读新书店。面对国民党封条封住的两个书店，胡绳心情难以平静，并将这一情形记入了当天的日记。随后，胡绳陪同邹韬奋转移到香港。

抗战期间，各种文化社团的大量涌现对贵阳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贵阳增设了电影院、图书馆、广播电台等文化设施，随着流亡人口的大量迁入，读者群和作者群的扩大，也促进了报业和出版业的发展。这些文化载体的发展，也为党在抗战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和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抗战以前，贵阳的书店（书局）仅有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中华书局贵阳分局等几家。

抗战爆发后，一些国内知名的书店（书局）迁到了贵阳或在贵阳开设分店（分局）。从1938年上海的开明书店在贵阳开设分店开始。整个抗战期间，贵阳新增书店（书局）15家。这些新迁入或新成立的书店（书局）公开出售的书籍有《辩证唯物论入门》《大众哲学》《中国妇女》《高尔基选集》《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全集》《德国步兵操典》《战术问题一千问》《立信会计丛书》《短篇英语背诵文选》《算术辞典》《几何辞典》《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等，涉及的学科齐全、内容广泛，为抗战时期的贵阳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于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贵阳的图书出版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当时国内著名的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都在贵阳开设了分馆、分店，总计15家。这些书店发行大量的社会科学、进步书刊、文艺和通俗读物，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

贵阳本土的文通书局更是兴盛一时，进入全国七大书局的行列，大量发行哲学和社会科学读物，出版进步书籍，并于1941年成立编辑部，聘请国内知名学者谢六逸、马宗荣等百余人为编审委员，组织专家撰写科学著作、科普读物及教育课本等。

作为贵阳文化实体的典型代表，文通书局在此间先后出版数百种书籍，其涉及范围之广、学术水平之高、影响面之大前所未有，对于宣传抗日、繁荣抗战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是贵阳抗战文化的一大壮举。

四、红色坐标嵌筑城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至西南。

贵阳作为重庆近邻的贵州省省会，北通四川，南连广西，东达湖南，西接云南，是重庆连通大后方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唯一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开通后，贵阳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更加突出。

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大后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在贵阳建立起了多家抗战机构和团体。尤其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中共红会特支，在当时犹如红色坐标，引领和团结广大民众不遗余力地为前方提供服务，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唤起贵阳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而艰苦奋斗，形成了贵阳独有的抗战记忆。

（一）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1938年10月，中共驻武汉代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总馆决定西迁重庆。12月，撤离武汉的周恩来、叶剑英赶赴重庆途经桂林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任命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严金操）为站长。

1938年底，袁超俊率领工作人员到达贵阳，着手筹建交通站。

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借用达德中学校舍开始办公，正式启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印章及信函，并完成在国民党驻贵

阳滇黔绥靖公署的备案。交通站建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把与中共贵州省工委联系的方法告诉袁超俊。在与省工委取得联系后，省工委先后派地下党员丁树奇、高言志、雷正光作为省工委与交通站之间的联络员。

1月底，在省工委和贵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交通站租用六座碑的一家民房作为站址（今民生路92号）——这是一座木结构的居民院落，由正房、厢房构成。正房是一座三开间的矮楼，分为前后间，房前有一个约15平方米的天井；厢房后院东侧有一口小水井，院外有一条宽约1米、长约10米的小巷通往民生路。

“二四轰炸”发生后，交通站为保证物资和资料的安全，又在威清门外租用了一家住户的房屋，自己动手建起了停车场、车库和仓库。交通站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方式，公开工作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和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

人员，秘密工作则是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交代的与一些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的联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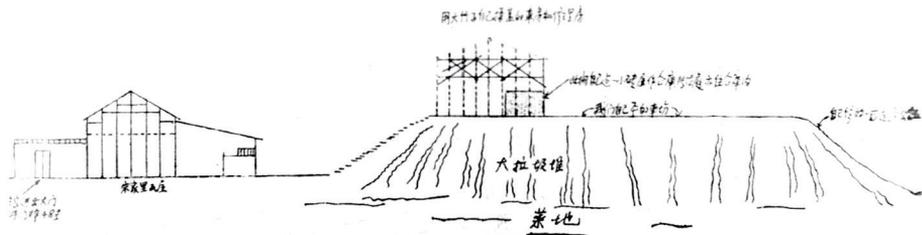
自1939年上半年开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的人员、物资和档案材料，同时向重庆、延安转运从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等军需物资。

1939年5—6月，交通站派出两名副官和警卫员到黄平国民党军需署弹药库领到弹药及TNT炸药10吨，从国民党军驻贵阳的一个汽车团交涉到10辆军用卡车，将弹药和炸药押运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继而将这批物资由重庆转运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总部。

7—8月，交通站派人从香港购进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卡车，经越南海防转到贵阳，继而抢运到重庆、延安。

在这期间，交通站还将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人从香港和海外华侨中募捐来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毛毯，救济儿童的物品、无线电通信器材等，一一安全转运到了延安，保证了抗战后方中共南北交通线的畅通，经交通站运送的物资达150多车。

威清门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房屋地势大意图
(从去头桥公路，往威清门方向看)



袁超俊手绘的威清门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房屋地势大意图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设立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部分领导人的家属撤退到贵阳，其中有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博古的女儿秦新华，以及李克农的父母、岳母、弟侄，共20余人。

交通站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妥善安置。他们在贵阳居住将近两年，直至1940年秋才陆续离开贵阳。

与此同时，交通站还先后接待了叶剑英、李克农、李涛、石磊、于刚、高文华、徐特立、李达、叶挺、袁国平、饶漱石、张云逸、张鼎丞等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光（即胡志明）经常往返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到贵阳亦住在交通站；他还委托交通站的同志帮助解决一些越南人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及汇款等问题。

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交通站秘密转运了一大批贵阳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以及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到重庆、昆明、延安和新四军中，并动员一批医疗人才、文化人才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贵阳的一面公开旗帜，统战工作也是交通站的重要任务之一。

交通站除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定的官方接触、办理必要的交涉外，还特别注重利用同各界人士接触的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形势。

袁超俊应邀到达德学校为师生们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到抗日根据地服务。袁超俊还通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女士（美国记者，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其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资料），说服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林可胜为八路军解决和输送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1939年冬，英国牛津大学巴吉尔教授率“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又将这批物资送给了八路

军，并派红十字会车队运送到西安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袁超俊积极开展对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吴煜恒的统战工作，多次将党的刊物送给吴煜恒，并与其交流时事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使吴煜恒对我党更加亲近。通过吴煜恒，袁超俊又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读书会，适时开展活动，为党在贵阳的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工作期间，不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及贵阳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只是通过省工委的联络员，为贵阳党组织的活动提供支持。其联系的党组织是活动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特别支部，联系的党员有隐蔽在贵州企业集团的王新元，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沈静芷、吉珈夫等人。皖南事变后，中共贵州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张述成、杜守敦从四川、湖南来贵阳时，即通过交通站联系的党员关系隐蔽在龙里机械厂和贵州烟草公司工作。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处境艰难，遂将所有人员集中在威清门外仓库处工作，并将大部分人员转移至重庆，留守交通站的只有袁超俊和其他7位同志。

1941年1月5日深夜，交通站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袁超俊立即转移到重庆。袁超俊表示把工作安排好再动身，对方不同意，要求他马上动身。

当晚，袁超俊布置好工作，于次日清晨乘车赶往重庆。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

1月21日，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的特务和宪兵团、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贵阳警察局侦缉队、中统黔室行动队、军统黔站行动人员等，派出重兵将交通站团团包围，逮捕了交通站留守的7名工作人员，查封了站内全部物资。

1月22日，交通站被国民党查抄的第二天，受交通站聘请的司机郭嘉和李德富从桂林运送物资返回贵阳时，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数日后被秘密杀害。交通站被捕人员经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于8月获释。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就此撤销。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存续期间，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贵阳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共同为抗日作贡献，并担负与一些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的联系工作，同时对贵阳地下党给予支持和帮助。

交通站是联结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为党和八路军转运了大批军需物资，转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到延安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链接：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简介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民生路92号。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贵阳的战略地位凸显。周恩来、叶剑英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即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作为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

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袁超俊任站长。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交通站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运输军需物资、转移重要人员、联络统战对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1月21日，该交通站被国民党贵州当局查封。

1982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新华日报》分销处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同时也反映其他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一切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意见和主张。《新华日报》创刊于1938年1月的国民党统治区武汉，武汉沦陷后迁往重庆。

《新华日报》在贵阳的公开发行，是从1938年4月由生活书店贵阳分店零售开始的。

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新华日报》虽然可以在国统区公开销售，但国民党特务却随时对购买报纸的人进行跟踪监视，对报纸的来源进行监控和破坏。为扩大读者群体，保护读者，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共产党员吴同尘专职为订户送报。至1938年冬，《新华日报》贵阳订户已超过200户。经与《新华日报》总社联系，决定设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地址在贵阳中华中路慈善巷8号，并启用重庆总社送来的“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椭圆形橡皮图章。

分销处建立后，吴同尘怀揣公章和订票收据，边送报边宣传，如有读者订报，立即开具订票单，不断开辟《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发行业务。

1939年8月，省工委先后派共产党员郎德服、陶祖铭到分销处工作，并建立了分销处党小组，吴同尘任组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新华日报》在贵阳的发行量一度达到每天500余份，有力传播了党的声音，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为保护订户，分销处的送报人员将订户的信息牢牢记在脑子里，从不留任何文字记录；送报人员每天都要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设法摆脱盯梢跟踪，才能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其中的艰苦和危险可想而知。

1939年8月，香港的汉奸报《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的工人发起反汪（精卫）罢工运动，这两家汉奸报被查封。

面对两报工人的爱国行为，《新华日报》发表《援助香港反汪罢工工人》的社论和号召各界支持罢工工人的文章。贵阳分销处立即响应《新华日报》的号召，购买油墨、蜡纸、草粉纸印成募捐启事，呼吁读者为罢工工人捐款和声援。募捐启事写道：“盼望大家都来响应和号召一切爱国的、同情的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输，给八十余工友以极大的援助，俾使工友们早日回到祖国为抗战服务。”

贵阳读者踊跃响应，分销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1400余人的捐款1000余元。很多读者还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对反汪工友的支持和慰问。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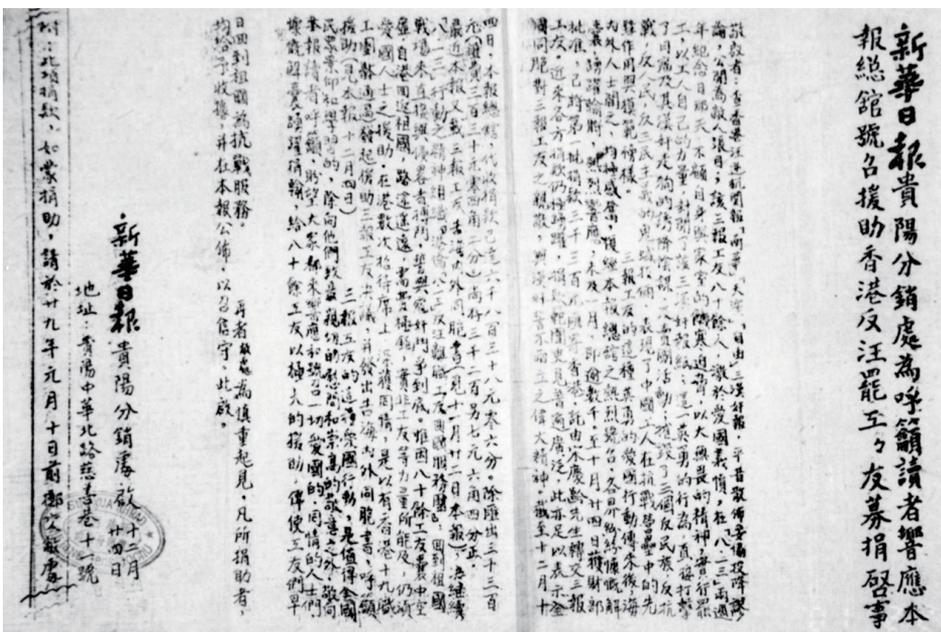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

销处把捐款和捐助名单寄到重庆《新华日报》总社，《新华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对贵阳分销处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贵阳，《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受到特务的重点关注。临工委为保存力量，停止了分销处的工作。

1941年春，分销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贵阳。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在贵阳的建立和《新华日报》在贵阳的公开发行，是贵阳地下党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贵阳党组织运用《新华日报》，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广大民众，促进了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呼吁援港罢工启事

链接：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简介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富水北路12号（原慈善巷8号）。1938年冬，经中共贵州省工委与《新华日报》总社联系并取得同意，建立了《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抗战时期，其日发行量最高达500份。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贵阳。为保存力量，中共贵州省工委于1941年春停止了分销处的工作。

1982年，该旧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红会特支”响图云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

1937年冬，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随迁至武汉。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以下简称救护总队）在湖南长沙成立。

中共中央从抗战需要出发，与回国参加抗战的新加坡爱国华侨、生理学博士、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队长的林可胜取得联系。林可胜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同意中共派员到救护总队工作，在医务人员和卫生人员训练班学员中开展政治宣传。

1938年夏，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成立中共红十字会特别党支部（简称“红会特支”），隶属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郭绍兴为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毛华强为统战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

“红会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公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由先进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组织）队员，壮大党的力量，并积极动员医务人员投入抗战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并输送医药物资到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服务。

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并得到了林可胜博士的赞助和支持，“红会特支”在救护总队中先后发展党员20余人、民先队队员20余人，并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移至贵阳图云关，总队汽车运输队、机械修配厂、发电厂、假肢厂、药品器材库及总队医院，均安置在图云关一带。郭绍兴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介绍信，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39年4月至5月间，袁超俊以医治胃病为由，住进图云关红会医院，秘密主持召开了“红会特支”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

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为总支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3个支部，由郭绍兴、高忻、章宏道分别兼任书记。

会议决定“红会特支”的主要工作是：

一、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博士，在卫生训练所内设立组织科，由高级教官、爱国民主人士马家骥任科主任，毛华强、黄群、李壬炼、查立平任教官，在学员中进行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以《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中共中央文件为主。

二、利用运输股汽车队来往于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社”，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约70个医

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和《新华日报》，向群众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广泛争取群众。

三、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特别注意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疗器械到党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

四、积极发展党组织。在“红会特支”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红会内大多数专家、学者、医务人员和职工的赞赏，先后有20余支医疗队被动员到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外国医生、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工作，一大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医疗器械、药品被运送到党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

1939年5月，红会书报供应社（以下简称“书社”）正式成立，其宗旨是通过提供进步书刊，组织传阅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为抗战出力。

书社成立时，在救护总队召开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职工大会。书社建立了图书馆，馆藏图书达五六千册，其中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延安出版的《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也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胡绳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以及徐懋庸、何干之等编写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激发了红十字救护总队内医护人员和广大职工的极大兴趣。

书社持续向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几十个医疗队寄送进步报刊，并组织歌咏队、话剧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每星期出一期板报，刊登书社同仁所写的时事评论、抒情小品、总队动态等，还办起了青年英语夜校，以加强与外国援华医疗队医生们的交流。

1939年夏，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后返回重庆路过贵阳时，书社专门邀请她到救护总队召开青年座谈会。史沫特莱在青年座谈会上发表了演讲，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扬新四军官兵一致、作风民主，与当地老百姓亲密无间，为贫苦农民做好事，深得人心；认为中国人民只要能够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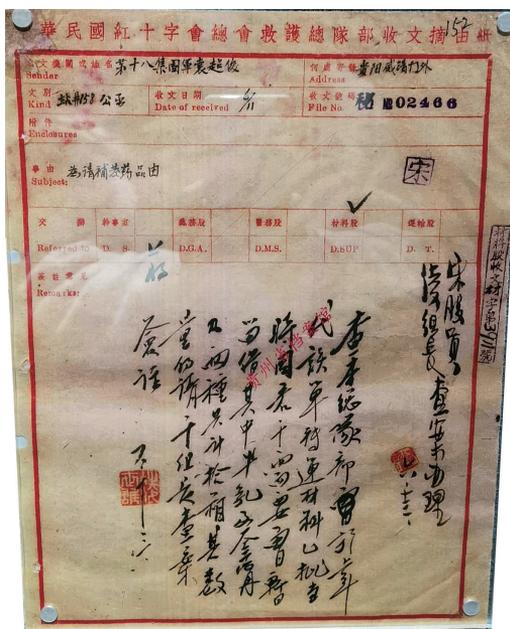
受毛泽东提出的抗日主张，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同心协力，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使大家深受教育。

由于党在救护总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忌惮。1940年冬，国民党在救护总队成立特别党部，对党的活动加以限制，并于1941年4月，蛮横地查抄封闭了书社。

“红会特支”对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的统战工作也是非常成功的。林可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态度开明，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颇为赞赏。对党在红十字救护总队的活动从不干预，即使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加压力，他也不为所动。

1939年底，郭绍兴受救护总队委派，担任第70队队长，赴陕、晋、豫做军队卫生工作。经袁超俊同意，“红会特支”总支书记由毛华强担任。

1940年夏，任命章宏道为“红会特支”总支书记。袁超俊要求章宏道利用担任救护总队运输股代理主任的便利，在运输股安置和招募了一批思想进步的



关于请贵阳交通站派员持单赴指定库地洽取药品的函

青年担任汽车押运员、加油站站长等，为建立党领导下的交通运输线奠定了基础。

从1940年起，国民党加紧对救护总队的控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和逮捕进步职工活动。

鉴于形势的恶化，袁超俊指示章宏道，“红会特支”的党员应注意隐蔽精干，改变活动方式，进行单线联系，并先后将毛华强、李壬炼、查立平等共产党员转移到外地。

由于措施得力，“红会特支”没有遭到破坏，一直坚持工作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链接：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简介

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森林公园北门入口处。

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于1939年至1945年间驻扎贵阳图云关，在此指挥全国各战区的战地救护、医疗及防疫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其参与域外战地救护，为中国远征军的胜利提供了医疗保障，还推动了亚太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发展。这里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救护体系中最系统、最具规模、分布最广、技术最强的战地救护组织枢纽。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遗址，是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人物故事最丰富、历史档案最完整的重要活动地之一，兼具人道性、国家性、国际性、唯一性等鲜明特点，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不可复制的珍贵文化资源。

2018年，旧址被列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建成开放。

五、“临工委”临危受命

（一）挽狂澜紧急疏散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顽固派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941年1月6日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全国的国民党统治区一样，伴随着反共高潮，国民党贵阳当局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的逮捕与屠杀也达到高潮。

面对国民党掀起的公开搜捕共产党人的反共高潮，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尽量将党和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保存了党和革命的基本力量。

1940年3月，邓止戈赴重庆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4月回黔安排秦天真、陶信镛等离开贵阳去延安，与陈于彤、张述成在龙里聚会，商量落实中央指示，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即将到来的反共逆流，正式组成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临工委由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组成，邓止戈任书记，肖次瞻任秘书长。临工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国统区实行的十六字方针，组织暴露的党员转移。后因邓止戈撤离贵州和肖次瞻被捕，省临工委工作即由陈于彤、杜守敦、张述成负责。临工委建立期间，将工作重点放在将已暴露的党员及群众骨干进行隐蔽或陆续转移到省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保护了党的一大批干部，避免了较大牺牲。

尚未暴露身份、在贵阳隐蔽斗争的中共西南运输支部党员胡钦曾，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职工中秘密发起成立了“革命青年互助会”，随即又更名为“贵州革命青年自助会”（简称“自助会”），主要成员为救护总队的车辆驾驶员、修理工和车务管理人员，核心任务是利用所掌握的交通工具，为贵州地下党的疏散转移提供保障。

在胡钦曾、李铭三等地下党员的努力下，至1941年初，救护总队的张宗

麟、朱枫（朱效坤）、庄群、徐震生、刘昭、蒋亚民、文雪亭、王首远、熊国华、卢可、赵岳军、杨枫、周邦立、刘载铭等人先后加入了自助会，并由张宗麟具体负责组织成员活动。

1941年，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共输送转移了杜守敦、陶涵春、刘跃能、李正裕、文宛丽、杨文英、杨世贤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同时，自助会的同志将每月的工资除留下基本生活费外，其余均上缴用于革命活动的开支。

1941年5月，临工委委员张述成通过自助会成员的车辆转移到桂林。临行前，他组织成立了自助会贵阳分会，由胡钦曾、李铭三、刘载铭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贵阳地区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疏散转移工作。

1941年7月，胡钦曾由西南运输管理局检查站副站长调任驻昆明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运输股十五分队队长，鉴于转移到昆明的人员较多且有些人员在贵阳时就加入了自助会，经请示张述成同意，他又发起成立了自助会昆明分会，担负对贵阳转移疏散人员的组织、联络、考察等工作。

为筹集分会的活动资金，分会成员一方面踊跃捐献，另一方面利用工余休息时间承接为客商开车、修理汽车、销售汽油、销售汽车配件等业务，自觉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组织，从而支撑了分会的运行。

1943年，自助会昆明分会筹集资金，派员回贵阳在威清门外开设了“亚光蓄电池行”，徐震生、吴震华、卢可等自助会成员在该店工作，该店实际为一个接待地下党员及进步革命同志的秘密联络点，并先后接待了由昆明、重庆来贵阳开展工作的10余名同志。

与此同时，张述成也在桂林建立了自助会桂林分会，张述成任分会会长，李正裕负责组织，宋大鸣负责宣传，陶涵春负责总务，丁荣端负责妇女工作，主要工作是为转移来的同志做好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1943年春，国民党广西南宁特务机关欲通过变节分子诱捕转移到桂林的贵州地下党员。张述成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做了转移布署，张述成、陶涵春等人也立即撤离了桂林。自助

贵州公路运输处输送转移党员和进步人士



会桂林分会由李铭三、华德芳、黄奇鑫领导。

1943年5月，张述成和胡钦曾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了贵州完成疏散转移工作的情况。

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贵州革命青年自助会已完成任务，全面停止活动；张述成到成都工作，不再与贵州转移出去的同志联系；此决定由胡钦曾去各地秘密传达。南方局的决定作出后，自助会桂林分会立即停止了活动。

但胡钦曾在赴自助会昆明分会传达决定的途中遭遇车祸，决定没能传达到自助会昆明分会。分会因而继续工作，直至1945年春与南方局接上关系后，分会方停止活动。

分会成员卢可、杨枫、严霭、熊国华被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担任司机，熊国华将分会结余下来的法币20万元、黄金5两无私地交给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钱之光；分会成员刘昭、蒋亚民被派往山东解放区，由冀鲁豫行署安排工作；分会成员庄群调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

贵州革命青年自助会从1940年成立到1945年昆明分会停止活动，在西南各省坚持工作达6年之久。到1947年，还有自助会的成员与党组织对接关系。临工委在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下使疏散转移贵州地下党员的艰巨任务顺利完

成，为保存党的实力，坚持党的信念，进行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陷囹圄不屈不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进步力量和支持同情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国民党一方面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战，另一方面又暗地对支持和参与团结抗战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进行打击和迫害。尤其是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贵州当局以限制救亡运动、解散救亡团体为先导，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全省范围内肆意逮捕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以省城国民党贵州保安司令部防空洞为主要刑场，杀害大批革命者。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 策反狱卒卫兵，传出革命诗篇

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省工委机要员严金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队长张益珊、副队长凌毓俊，地下党员王栻等6位同志是在1938年“二一九”学联事件和“八一三”民先事件中先后被捕的，辗转关押于贵阳模范监狱、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保安处看守所。

在黄大陆、李策的领导下，他们把监狱当课堂，不灰心、不气馁，持续加强学习，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与监狱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十分注重做好统战工作，用光明磊落的情怀、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教育和影响狱中的看守和卫兵。

卫兵班长卢某、卫兵张某和狱卒陈启明都被争取了过来。通过他们，狱中的共产党人得以相互传递信息，并建立起了监狱内外的联络通道。狱中革命志士临终前的许多诗篇，也是通过他们带出去的。特别是狱卒陈启明，每逢革命者家属探监时，他都给予各种方便，从不在一旁监听，一有特务来查看时，他就故意提高嗓门喊“快走，快走，时间到了”，给予提示。

在狱中，省工委委员黄大陆给自己定了两条要求：一是要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理论，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二是做好狱中同志的工作，让大家认清形势，努力学习，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黄大陆还写下：“一切都是学。人生要学，革命的人生更要学。自由时可以学，不自由时也可以学；坐牢应该学，不坐牢一样应该学。”并传递给狱中战友共勉。

黄大陆对党忠诚，恪守廉洁，同时也严格要求家人。他在被捕前，由于家中实在贫困，妹妹结婚需要嫁妆，万般无奈，父母打发弟弟黄大程徒步近千里上贵阳找到他。得知弟弟来意后，黄大陆语重心长地说：“我的手里边是有钱，但那是公家的，不能挪用。”出于对革命保密的需要，黄大陆只能巧妙地说到这里。他要求家人自食其力，给弟弟回文山的盘缠都是找朋友所借。

黄大陆的挚友高言志，看到这样的情景，实在过意不去，悄悄送给黄大程一匹大马当作脚力，使黄大程能顺利回到文山。

2. 写下《“青料”报告》，总结学运特点

省工委委员李策用绿豆般大小的字，写下了《“青料”报告》，对贵州的学生运动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可惜，残暴的敌人未等李策完成此稿，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青料”报告》中指出：“我的报告只是我个人对过去青运历史的回忆做系统的叙述，再没有一点过去青运历史的文件来充实它。”“自然，这一缺点并不是我愿意的，而且也不是诸位愿意的。不过在别人封锁下使我们找不来材料，别人罪有应得外，本人未能克服别人的封锁得到材料来充实这报告的内容，面对着诸位是很抱歉的。”

由于被捕而得不到必需的参考材料，李策在报告中表示了自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认真负责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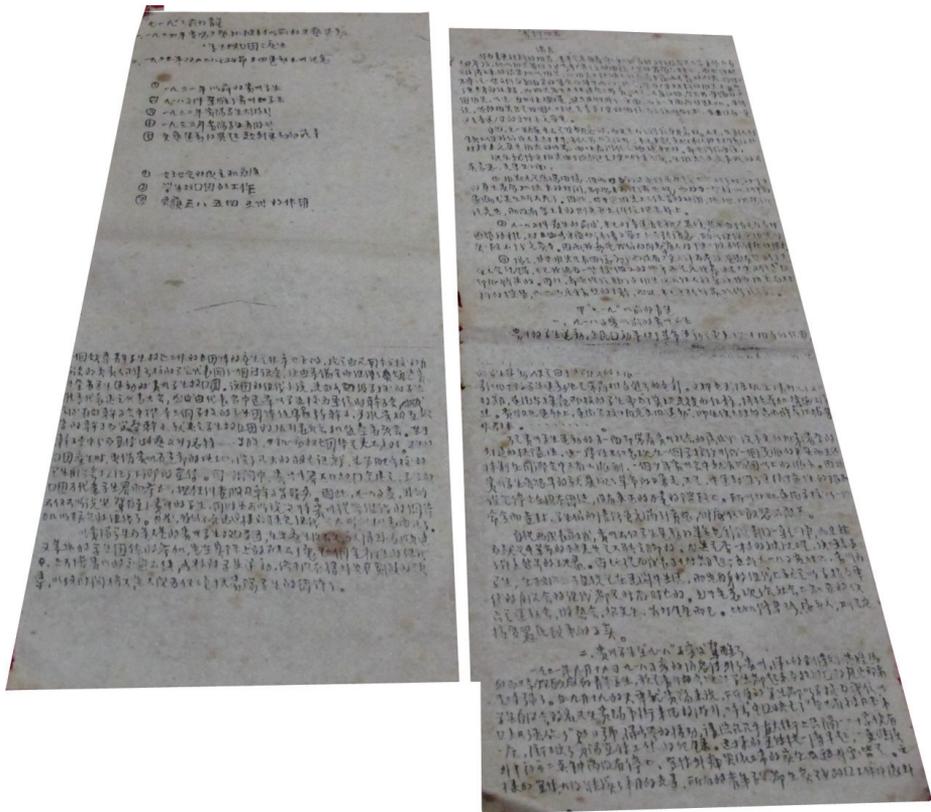
李策在狱中所写下的《“青料”报告》，按照他所拟定的提纲，只完成了序言和第一部分“‘七一九’之前的青运”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剩余部分还



未完成就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

报告中总结了“七一九”以前贵州学生运动的特点，特别强调了九一八事变对贵州爱国学生的震动，李策用一个标题直截了当地表示“贵州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惊醒了”，同时对贵州青年早期组织“贵州学生救国会”的过程及其活动做了详细的表述。他肯定地说：“九一八事变，我们不仅可以说它惊醒了贵州的学生，同时也可以说，它将贵州（学生）从无组织的个体加以联合地组织了。”

这一报告，给党组织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李策狱中撰写的《“青料”报告》

3. 狱中发出吊唁，《新华日报》刊发

1938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的部分人员在撤离武汉途中，所乘的“新升隆”号轮船在嘉鱼燕子窝被日机轰炸，李密林、潘美年等16人不幸遇难。

消息传至狱中，张益珊、凌毓俊含泪写下了吊唁文。通过狱中关系送出后，《新华日报》以《从监狱里发出来的吊唁》为题，全文刊发。

文中控诉了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我们自从今秋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地方队部的立案事被拘戴镣以来，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一次也没有被讯问过。当局且告诉我们无罪，只不过要我们安心在牢里休息休息。同志们，这还有什么可讲的呢？既然无罪（真是爱国还有罪吗？）又不释放我们，而要我们在抗战趋愈严重的时候‘休息’‘休息’！这真是使我们不安。”

这篇文章体现了监狱生活并没有使狱中的革命者停止对抗日救亡运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

4. 门缝借光执笔，总结狱中斗争

长期的牢狱生活、恶劣的监禁环境，使黄大陆患了风湿病。贵阳的冬天阴湿寒冷，黄大陆为御寒在牢房原地小跑，不过几分钟便疼得直冒虚汗。他的身体日渐消瘦。李策的情况也很不好，在狱中肺结核复发了，咳嗽、咯血、低烧、盗汗，而且也跟黄大陆一样患上了风湿病，全身浮肿，身体越来越差。张益珊与凌毓俊也身患疾病。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任凭敌人的残酷折磨，始终不曾停下顽强的斗争。他们一面坚持锻炼身体，一面坚持学习革命理论。

1938年岁末，黄大陆、张益珊与凌毓俊被关进了一间暗无天日的黑牢。这间牢房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他们借着门缝中透进的一点微弱的灯光，共同写下了《移进油库（地下室）原因的检讨》。他们在文中以坚定的信念，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总结了在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他们强调：

一、我们不因为局部的特殊现象，而怀疑中国的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

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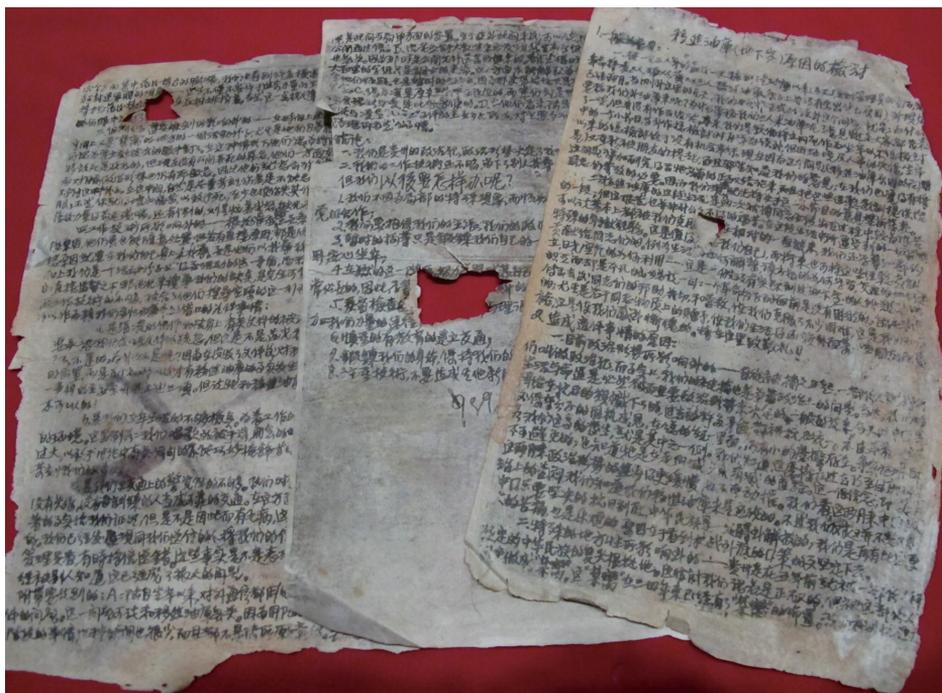
三、暂时的拘禁只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环境而已，我们要好好利用，安心坐牢。

四、在狱中的这一阶段，努力学习，武装自己，加强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学习马恩列斯理论成为我们目前主要的课题。

五、严密检查自己过去的修养与对理论的了解，工作上的优点和缺点，是增加我们力量的途径。

5. 贵阳多处监狱，展开狱中斗争

1939年，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李



黄大陆狱中写的《移进油库（地下室）原因的检讨》

配之等7名工作人员被捕，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贵阳读新书店、贵阳自力书店孙家林等5人被捕。

1940年，贵州全省被捕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达92人，仅贵阳地区就有25人，其中包括临工委秘书长兼贵阳县委书记肖次瞻；从各地押来贵阳的共产党员有思南县委书记熊大瀛等33人。

1941年，贵阳公路运输支部书记陈济民，贵阳高中支部书记邱纯和，黔邮歌咏队负责人瓦兆鷄，贵阳地下党员赖玉铭、邵光勋，毕节县工委书记王芸生，金沙县总支书记李绍夫、林正良及所属地下党员陈德琪、余宗铭、李亚群，还有贵州地下党早期的地下党员王定一、蓝运臧及其丈夫寇述彭、妹妹蓝运铮等先后被捕。

1942年，地下党员叶楚青，大夏歌咏队队长张诗隽及进步青年莫德蓉、殷尚骏、许世雄等被捕，大夏歌咏队被强行解散。

为了关押革命者，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贵阳设立了许多或公开或秘密的监狱，规模较大的有贵阳保安处看守所、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警察总局看守所、第一监狱（模范监狱），还有堰塘坎唐家花园军统黔站办事处、大井坎12号贵阳区行动队、和平路91号和仓后街屋顶花园等。

在党的领导下，被捕人员在狱中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虽与外界音讯阻隔，但从来不曾放弃重获自由的念头，不断寻找出狱的机会。

1941年2月，被捕后被关押在贵阳保安司令部监狱的读新书店经理孙家林及员工周积涵、张志新3人，虽经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先生出面向蒋介石交涉放人，并有“请予释放”的电令，但贵州当局顽固反共，不予开释，继续长期关押，只是关押条件相对宽松了一些。

1942年秋，3人被转押至战时青年训导团贵阳收容所。他们常被派出去做体力劳动。孙家林借此机会，观察地形，与同伴共商越狱脱险的方法。1944年4月中旬的一天，孙家林等3人再次随队去城外洗衣服，便趁监管人员不备，逃

出虎口，脱险后转移至重庆。

筑光音乐研究会党支部宣传委员饶元祚被关押在仓后街屋顶花园。某日凌晨，对其施以刑讯的中统特务疲惫不堪地倒头睡去，饶元祚趁机逃出，在贵州地下党的帮助下转移到了重庆。贵阳女中党支部的地下党员丁文溪被捕后，被关押在大井坎11号秘密牢房，她在难友郭诗昭、顾文淑的掩护下，机智地从厕所越狱。

6. 皖南事变前后，仁人志士蒙难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打出了反对共产党的旗帜。国民党贵州当局随即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屠杀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

贵州省地下党负责人黄大陆、李策于1月19日被秘密杀害于保安司令部地下防空洞。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严金牲、张益珊、凌毓俊、王栻。1月18日，中共大定支部负责人蔡应达被秘密杀害于贵阳东山脚下。4月，陈济民被杀害于贵阳大井坎监狱。5月19日，寇述彭、蓝运臧、蓝运铮、王定一被杀害于贵阳市东山脚下。6月，李亚群、瓦兆鷄被杀害于贵阳保安处防空洞。8月，李绍夫、林正良等被杀害于贵阳保安司令部防空洞。

1942年3月，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被杀害于照壁山脚下。6月17日，原贵阳中学地下党员、被派到望谟从事电台工作的王发善和施秉进步人士、偏桥小学校长邱肇业同时被杀害于贵阳保安司令部防空洞。6月22日，地下党员傅以平被特务用毒药杀害。

在皖南事变前后近三年时间里，先后有28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害于贵阳，失去自由的先烈们把监狱当作战场，以各种形式与敌人作斗争，表现了他们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革命情操。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链接：

风暴中要向前走——李策诗作

1939年9月20日，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李策在狱中给一位同志的题词中写道：

风暴中要向前走，
才能站立得起来。
侧面袭来的寒气，
只能吹僵那——
卧下了的老人！

李策被捕时妻子丁毅已怀孕在身，孩子出生六个月后，妻子带孩子去探监。李策第一次见到孩子，心中充满了对孩子的期望之情。后来，他在给丁毅的信中写道：“当爸爸的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抱自己的孩子，感慨万千！”他在给妻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孩子的爱和期望：

年轻的妈妈呀，
我们新生的婴儿不满周岁，
要教育她成为一个坚实的人。
她的岁月，
将是光辉灿烂的！
记住鲁迅先生的话：
自己肩住因袭的负担，
顶住黑暗的闸门，
把孩子放到宽阔的地方去，
光明地生活，
合理地做人。

这首诗写得平易而又感人，充满真诚的信念，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寸心原欲拯危倾——肖次瞻诗作

1940年7月，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贵阳县委书记肖次瞻在贵阳被捕，关押在贵州省保安司令部监狱2号牢房。这是一间单人牢房，与其他牢房完全隔绝，终年见不到阳光，比别的牢房更加阴暗、潮湿、肮脏。肖次瞻的身体很差，吃得又差，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然坚持在狭窄的牢房来回走动，或做体操，以抵抗残酷环境对人的折磨。

狱中的难友平常是看不到肖次瞻的，只有在天气特别好的日子里，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透过木条的窗孔，才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他须发满面的脸孔和坚毅的目光。趁看守走开的空当，肖次瞻用手势跟同志们交谈，鼓励他们坚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肖次瞻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他托狱中看守给党组织捎信，坚定表示：“不幸被捕，决不屈服，以身殉党，同志放心。”

在狱中，肖次瞻总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战友们。深秋时节，监狱围墙下生出几株黄菊，傲寒竞放，肖次瞻借物咏志：

历尽崎岖路几程，
寸心原欲拯危倾，
黄花寂寞锁深院，
浓雾迷漫罩古城。
忍受折磨堪励志，
相关痛痒见交情，
劝君正向光明面，
心自安详气自盈。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肖次瞻在香烟盒上写下了《新正气歌》一诗，传送给狱中战友——

大义须舍身，慷慨亦何辞。
不恋我生前，陈账一笔除。

不虑我生后，后事有人继。

人生持久战，小败大胜利。

1940年1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肖次瞻秘密杀害于贵阳保安司令部地下防空洞。

预约那新生的太阳——凌毓俊诗作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部队副队长、共产党员凌毓俊在敌人的监狱里写下了《炼狱》一诗：

祖国辽阔的原野上，

艰苦的搏斗还在继续着。

为着要在这被屈辱的被奸污的土地上，

生长起自由来，

祖国优秀的子民们，

将献出自己的鲜血。

而我，

也将以自己的受难，

去预约那新生的太阳。

凌毓俊正是以这种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实践了他在诗中写下的誓言。

我见到了光明——陈法轼诗作

共产党员陈法轼被捕后，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托付朋友：“我死后，请将尸骸焚烧倾河。”他在狱中以棋为乐，常作诗自励，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一切表现着悲痛，

我内心没有悲哀。

天天沉沦在恐怖里，

我没有感到惧怕。

祖国到处是黑暗，
 我见到了光明。
 在黑暗里，
 我听见同志们临终的惨呼，
 也听见无数革命人民的咆哮。
 鹊巢样的小屋，
 加上层层的大门和锁，
 范围着我的行动，
 但控制不了我的心。
 我不说这里是乐园，
 也不说这里是愁城。
 这是一座高度的熔炉，
 锻炼我的意志成钢，
 锻炼我的决心成铁。

1942年6月20日，当一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来到牢房门口，看守打开牢门呼唤陈法轼的名字时，他镇定自若地挥笔写下了《就义诗》：

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
 壮志犹未折，热血拼将流。
 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
 多情唯此月，再照雄心酬。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虽与外界音讯阻隔，面对着国民党狱警荷枪实弹的日夜看守，仍然相互鼓励、相互保护，他们以诗言志、以歌咏情，表达了他们对理想的坚定信念，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

六、集中营炼狱忠魂

距离贵阳50公里的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的一所秘密监狱，由设于息烽县阳朗坝的本部和玄天洞囚禁处组成。

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秘密党员黄显声、宋绮云、徐林侠等被关押于本部，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被囚禁于距本部约两公里的玄天洞。

息烽集中营从1938年11月建立至1946年7月撤销，先后关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1220余人，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杀害。

在被关押期间，罗世文、车耀先等发起并成立党的秘密支部，以坚定的革命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同敌人展开了长期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灿烂的英雄诗篇。

（一）监房冠以美名，妄图精神软化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在国民党设立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内部设置秘密监狱进行关押。1937年，这所秘密监狱搬入一所新修的规模更大的独立监狱，称“南京新监”，内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大监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犯，南京岌岌可危，蒋介石仍不改反共初衷，令军统将关押在南京新监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武装押送到武汉。不久，又迁至湖南益阳，最后转移到贵阳息烽。

1937年11月，息烽集中营正式设立。1938年11月，搬迁至距县城6公里的阳朗坝猫洞，监房沿用南京新监八大监号，并增设了玄天洞特监。

当时的贵州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息烽地处黔中腹地，闭塞而隐蔽。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军统在息烽设立了国民政府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直属第二无线电通信总台、中美合作所第十特种技术训练班等12个机构，加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直属特务第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轅

团和特务队、宪兵队、保安队等驻军，在仅有2000多人的息烽县城里，国民党军、宪、特人员竟达1万余人，就连息烽县政府的县长也是由军统局少将担任。息烽成了军统的大本营。

息烽集中营分本部和玄天洞特监两个部分。本部围墙内占地57124.4平方米，里面又有一道内围墙把监房和军统人员生活区隔开。集中营内共有9栋52间监房，其中“义”字号监房为女监，著名巾帼英雄张露萍等就关在这里。集中营对监房不称监而称为“斋”，如“忠斋”“孝斋”“义斋”等。集中营的管理机构为主任室，前后两任主任分别为何子楨、周养浩，均为军统少将。下设四个组：秘书组，组长李祖慰，军统少将；警卫组，由30多名军统校尉级以上军官组成，负责监管、刑讯、追捕、屠杀等任务；总务组，管理集中营的供给、医务；生产组，管理集中营开办的14个生产单位。

息烽集中营对外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轅”，在军统内部则称之为“大学”。国民党企图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以精神软化来解除革命者

的思想武装，达到其“溶共、限共”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痴心妄想、一厢情愿罢了。

（二）秘密支部领导，狱中斗争卓绝

1937年11月，息烽集中营由军统少将何子桢担任主任。此人暴戾专横，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极为仇视。对共产党人采取完全封闭式管理，一年365天不允许走出牢房半步；牢房的窗子都用黑纸糊上，终日不见一丝阳光，送饭都只能从门上的一个小孔递进去。

“犯人”关在里面不久就面色苍白，且浑身長满虱子和干疮，再加之不间断的刑讯逼供，很多人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对病倒的“犯人”，采取的“治疗”办法就是放出来晒太阳，但不是让人自由地沐浴阳光，而是关在和人体大小基本相匹配的木笼里——人本已十分虚弱，久不见阳光，被太阳一晒就有可能昏死过去，但木笼紧箍着身子，即便昏过去也不会倒下，有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木笼内。集中营内有一天然溶洞，名为“猫洞”。集中营的刑讯室就设在洞内，里面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在里面接受刑讯的“犯人”，死亡后就直接被埋在洞窟深处。新中国成立后，贵阳市人民政府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挖出尸骨几十具，有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

何子桢的残酷和野蛮，受到狱中难友的反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军统为缓解其压力，撤销了何子桢的主任职务，由周养浩接任。周养浩是国民党的著名特务，与戴笠和毛人凤是同乡，深受二人器重，与沈醉、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周养浩外号“书生杀手”。周养浩上任后，摆出一副儒雅和善的样子，大搞“狱政革新”，提出所谓的“监狱劳动化，监狱学校化”，明确要求所有的被关押者不能称“犯人”，要称“修养人”。“修养人”白天可以出牢房参加劳动和学习。

周养浩的“狱政革新”，使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人有了相互接触的机会。

具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突然产生了组建狱中秘密党支部

的想法。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狱中的各种人物，逐步发现并结识了许晓轩、韩子栋、宋绮云、张露萍等一批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中共党员。罗世文是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犯，在戴笠处挂了号的要犯，监狱当局不敢随意加害。他们抓住时机，通过秘密传递纸条，向狱中的中共党员传达了党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斗争策略，鼓励同志们坚持气节，坚决而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经过几个月的秘密活动，1941年7月上旬，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正式成立，由于狱中条件限制，掌握和了解的党员有7名。经过秘密协商，由罗世文担任支部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并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三）利用“狱政革新”，扩大党员联系

被囚在息烽集中营的中共党员从来没有活着出去过，针对这一严酷的现实，秘密党支部通过反复酝酿，拟订出五条工作计划：1. 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抵制反动监狱当局的腐蚀软化，同内部的叛变行为作斗争；2. 团结党外难友，壮大自己的力量；3. 从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入手，恢复体质，以便争取出狱；4. 利用敌人给予的学习讨论和写作、演出等机会，采用合法的形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5. 尽快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争取援救，在条件成熟时暴动越狱。

息烽集中营的“狱政革新”启动一段时间后，周养浩自以为取得了效果，开始找一些有影响的“犯人”谈话。

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修养人”中担任一定的职务。罗世文坦率地说：“因为我参加共产党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都是共产党方面的，长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也和你们不同。因此，我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什么工作！”

周养浩又问车耀先：“你给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直未暴露身份的车耀先理直气壮地说：“我什么党也不是，但我的朋友多，他

们中有共产党员是真的。”周养浩在碰了一鼻子灰后，便要车耀先出来当“修养人”。车耀先说：“我是个军人，少年家穷，读书不多，很想借此机会读点书。如果真要我工作，最好让我去管理图书。”

对中共党员去不去当“修养人”的问题，党支部进行了秘密的研究。有的人认为，让囚犯当“修养人”是敌人加强软化革命斗志的手段，不能去；有的认为，如果敌人不附加政治条件，可以去。根据党的地下斗争原则和监狱的特殊环境，党支部认为，监狱里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不去当“修养人”，很容易被敌人孤立，从而脱离群众；反之，这是团结同志、了解情况、改善处境、进行斗争的机会，共产党员可以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修养人”，这对支部开展工作是有利的。

随着“狱政革新”的推进，被囚在息烽集中营的“犯人”相继被提出来当“修养人”。他们分别被安排在卷烟厂、印刷厂、缝纫社等十多个生产单位参加劳动和学习，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党员之间、党员同难友之间联系的机会。

（四）将军咫尺天涯，此生再无见面

黄显声，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被捕前历任东北陆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中将军衔，1939年被押解到息烽集中营后，监狱主任何子楨、周养浩见了他都有所畏惧。

在狱中，黄显声坚持真理，乐观奋发，蔑视监狱当局，受到难友们的尊敬。他常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决不灰心丧气。咱们是不怕他们的，只能让他们怕咱们。”他虽然没有暴露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他一直支持狱中秘密党支部的工作。党支部通过黄显声向监狱当局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早上六点、晚上七点要打开牢门；二是不准打骂犯人；三是改善犯人伙食。这三个条件符合息烽集中营的“狱政革新”，周养浩只好同意了。这是党支部成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斗争胜利，从而鼓舞了革命者的斗争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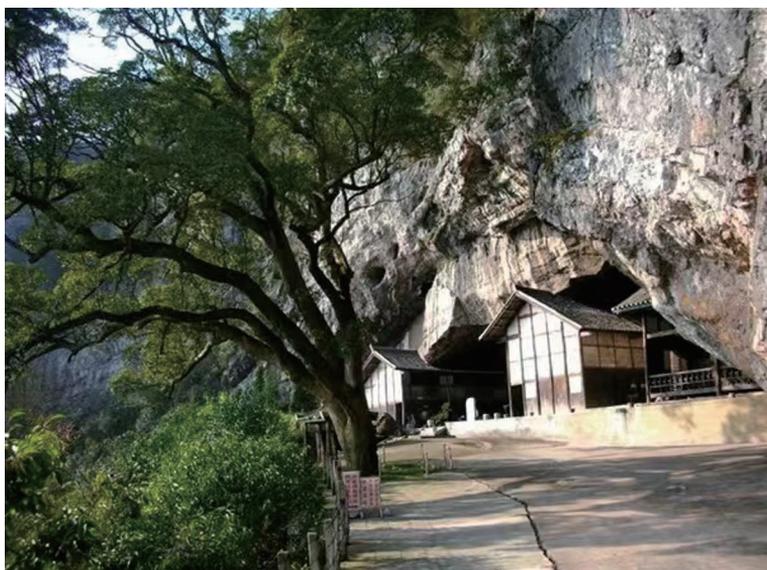
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夫人谢葆贞、幼子杨拯中被关押在息烽县城以东

的玄天洞。他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专门为杨将军买了一件皮衣，准备送到狱中为杨将军御寒。阎、张在南昌被捕后，几经辗转也被押送到息烽集中营，给杨将军御寒的皮衣也随同他们被带到了息烽集中营。

黄显声了解到阎继明和张醒民的心愿后，争得在周养浩的陪同下去玄天洞探望将军的机会。

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当时杨夫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刚出生不久的幼子杨拯贵无人照料，杨将军孤寂苦闷。在玄天洞，黄显声当着周养浩的面，把阎继明、张醒民的情况向杨将军做了介绍，并要求周养浩成全阎、张送皮衣之事。周养浩为讨好杨虎城和黄显声，当即表态同意。回阳朗坝后，周养浩派勤务兵把皮衣送到玄天洞杨将军手中。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在国家危亡之际，与张学良将军共商民族大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中共中央周恩来等人的多方工作，迫使蒋介石同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



玄天洞

日”的主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杨虎城将军身陷息烽国民党特务大本营，仍时刻不忘国家安危，在狱中写下了“晋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誓摧铜马尽，还我旧山河”的慷慨悲歌。

从1939年1月至1946年3月，张学良将军被先后囚禁于贵阳修文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贵阳开阳刘育乡和贵州桐梓。但是，咫尺天涯两将军，始终不知道对方就被关在仅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尽管彼此心中牵挂，却无从见面。

（五）狱中提出抗议，敌方阴谋破产

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其妻徐林侠也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同丈夫一道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丈夫一同被捕，同为集中营地下党支部成员。

随母亲徐林侠一起入狱的宋振中，入狱时才8个月，因在狱中缺乏营养，被难友们怜爱地称为小萝卜头，成为息烽集中营中最小的难友。

小萝卜头长到7岁，党支部为了让他能读书识字，向狱方提出抗议，在地下党员们的争取下，几经交涉，监狱才同意由“犯人”担任老师教他认字。于是，狱中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罗世文担任了小萝卜头的第一个老师，小萝卜头上下课便可以在集中营内独自往来，时常为狱中同志传递口信和消息，成了狱中党支部的小小交通员。

为营造“狱政革新”气氛，周养浩杜撰对联“养天地正气，浩清白家风”贴在主任办公室大门两旁，在“爱斋”后侧的沙棠树上题写了“天堂地狱唯人自择，生死两途权操我手”这样的对联。

周养浩还要许晓轩在狱内的部分树干上刻写“先忧后乐”“忠党爱国”等标语。“先忧后乐”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好反映出许晓轩“宁关不屈”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许晓轩在“忠斋”旁的一棵核桃树上刻完“先忧后乐”四个大字后，故意蹬倒梯子摔下地，拒绝刻写其他文字标语。

监狱的“狱政革新”刚开始时，狱方要各牢房的“犯人”填写一份表格，保证不逃跑、不违反监规，如一人违反，全室连坐。对此难友们十分气愤，许晓轩、谭沈明两名党员发起反对监狱当局“一人逃跑，全室连坐”的斗争。黄显声拿着表格大闹监狱主任办公室，直言“我不填这种表，更不按什么手印，把我们长期关在牢房里好了！”周养浩无可奈何，只好停止推行“连坐”法。

（六）对敌步步为营，斗争针锋相对

围绕党支部提出并经周养浩同意的三条要求，特别是在打骂“犯人”问题上，狱中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3年，党员尚承文因顶撞生产组长郑星槎而被打得口吐鲜血，站在旁边的黄显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郑星槎痛打了一顿。郑星槎原是海军特务站站长、军统分子，因违反纪律被囚在息烽集中营，受周养浩倚重而仗势欺人，难友们十分痛恨他。

事情发生后，在星期一集中受训会上，周养浩要黄显声上讲台当众认错赔罪。黄显声昂首阔步走上台去，挺胸而立，一言不发，怒视着台上的周养浩，台下几百双愤怒的眼睛也怒视着台上的周养浩。黄显声环视了会场一周，迈步走下讲台，难友们都向他投以胜利的目光。

会后，“修养人”纷纷要求狱方严惩郑星槎，周养浩只好忍痛撤销了郑的生产组长职务，并将其关入监房。

一次，党员陈策因不满敌人的残暴，拒绝外出参加劳动，因而遭到特务毒打，昏倒在地。许晓轩见状义愤填膺，挺身而出，斥责特务的野蛮，特务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

周养浩是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级特务，同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打交道的资历较深，而且颇有心计。他在息烽集中营推行的“狱政革新”，就是妄图以“攻心为上”，让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像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的主人公那样，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中忏悔自己的罪恶，实现心灵的“复活”，从

而解除其思想武装，以达到“反共、溶共”的目的。因此，狱中所办的刊物起名为《复活月刊》《养正周报》，所开办的图书馆命名为“复活图书馆”。

为配合搞所谓的思想感化，息烽集中营设立了教务所，把一些有知识、有影响的“囚犯”安排在教务所当“工作修养人”。教务所的主要工作内容：一是思想感化，实施读书指导、笔记解答、学术演讲、集体训话、文艺宣传等项目；二是思想考核，设有个别谈话、修养报告、奖励报告、日记、笔记审查等项目。

车耀先作为“工作修养人”在教务所图书馆管理图书。图书馆坐落在明心湖旁，是一间小木房子，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书籍，灰尘满地。经过车耀先的清理，这些书籍中除了大部分内容反动外，还有一些是从“囚犯”的行李中搜出来的进步书刊。通过车耀先的努力，把书籍归类修补并编号后，开放了图书馆。久禁监牢与世隔绝的难友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借阅书刊。

为了监视车耀先的行动，狱方派杨文富到图书馆“帮助”工作。杨文富是阳朗坝的一个贫苦农民，被监狱抓来当勤杂兵。在接触中，杨文富见车耀先平易近人、光明磊落，慢慢地对车产生了同情和尊敬，并秘密为车耀先传递纸条和信件。每逢报纸上载有重要消息，车耀先就把它摘要地写在纸上，将纸条放在线装书的夹层里，然后通过杨文富转送到有关牢房，交到指定的人手中。狱中党员通过借阅书报的机会，互相传递消息、交换意见，小小的图书馆成了党支部的地下联络站，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严批反动教材，讴歌抗日主张

息烽集中营推行“狱政革新”的主要内容是以灌输反动思想为目的，以组织在押人员学习讨论、撰写心得体会为形式，把在押人员的思想统一在“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之下。

为了从思想上进行感化，主要学习《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中国之命运》，辅以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戴季陶的反共著作，并配备《曾文正公全集》之类的书籍作为参考资料。

在特殊环境下，“修养人”在发言、写心得体会和文艺演出等方面有了一点自由。狱中党支部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开展宣传与反宣传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团结和教育了广大难友。

在学习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时，罗世文在小组讨论会上，严厉地批判《中国之命运》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和攻击，用充分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说：“中国的命运不是哪一个人能左右的，它是由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确定的。有的人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还没有搞清楚，却要来写什么书，怎么不漏洞百出呢？”监狱要求犯人写心得体会，罗世文发动难友们以“领袖”著作只能学习，不敢妄加评论为由加以拒绝。

在《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上，共产党员罗世文、张露萍、赵力耕分别以史迷、晓露、力更笔名发表论文《一月的世界与中国》、诗歌《七月里的榴花》、小说《冷区长》，爱国民主人士李任夫以力朗笔名发表论文《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检讨》《论干部人才》等文章，或锋芒毕露，或借物抒情，以尖锐的笔力和巧妙而委婉的手法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八）利用文艺晚会，编写抗日话剧

4月1日，是军统前身——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纪念日。在息烽集中营的“狱政革新”时期，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在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军统局长、国民党息烽县政府官员都要到会庆祝。

文艺演出的节目需“修养人”编排，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号召党员积极参与。罗世文启发难友们要利用好这个阵地，既可活跃身心，又能宣传抗日，并亲自编写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在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监号为253的张露萍扮演《女谍》中的女英雄菱姑，监号为672的侯仁民饰演表哥。当台上穿着军装、手持钢枪的表哥在出征前与菱姑话别

时，台下难友激动得热泪盈眶。赵力耕在《反正》中扮演一名爱国士兵，当全剧进入高潮时，他用那悲壮而洪亮的东北口音慷慨激昂地喊出：“大队长，反正吧！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再给日本鬼子当亡国奴了！”在那抗日战争的残酷年代，在身陷囹圄的难友面前，他那铿锵有力的陈词，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张露萍是一名爱好文艺的活跃人物，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时，每当学员集中，同学们都喜欢推选她出队指挥唱《拿起刀枪干一场》这首歌曲，因此，大家为她起了“干一场”的雅号。

在息烽集中营大礼堂的戏台上，张露萍装扮成《日出》中的女主角陈白露，演得栩栩如生，连监狱的管理人员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才多。

（九）胜利前夕暗夜，中共党员殉难

1944年12月，黔南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打到贵州独山，贵州军民奋起抗击。

由于西安看守所发生牛子龙越狱事件，1945年夏，戴笠受蒋介石的密令到息烽指使周养浩取消“狱政革新”，控制囚犯行动。息烽集中营的管理又恢复到前任监狱主任何子楨的酷刑和杀戮政策。至此，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党员已经扩大到15人，支部的秘密活动虽受到一定限制，但仍未中断。

不久，国民党下达“将张露萍等人秘密枪决，报本局备案”的密电。周养浩把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刑场定在息烽县城南郊3公里处的快活岭。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与在重庆从事秘密工作的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被特务押赴刑场，张露萍带领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吓得行刑的士兵惊恐万状，行刑队长荣为箴慌忙从士兵的手中夺过卡宾枪，朝着张露萍等猛烈射击，中共党员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英勇牺牲，这是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重大损失。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狱中秘密党支部的罗世文、车耀先、韩

子栋、许晓轩、宋绮云、徐林侠、陈策、谭沈明等8名中共党员，同其他64名难友一起，被敌人转囚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重庆，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难友们继续开展狱中斗争。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敌人杀害。除韩子栋逃出外，许晓轩、宋绮云、徐林侠、陈策、谭沈明均在1949年敌人制造的“11·27”大屠杀中殉难。

息烽集中营先后关押过共产党人、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1200多人，屠杀和折磨致死600多人，400多人下落不明，幸存者不足100人。集中营成立后的8年间，先后有两任主任在此任职，第一任主任是军统少将何子桢，他从1938年上任到1941年，此人以“屠夫”著称，主要采用中国封建时期的监狱封闭式管理办法，在何子桢的管理下，天天有人死，有时一天要死好几人，有些连蒋介石和戴笠认为应该留着的也被折磨死了。这种情况连戴笠都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决定撤销何子桢的职务，改派自己的同乡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

周养浩原名周文豪，上任后大搞“狱政革新”。“狱政革新”有两个内容：一是“监狱学校化”，他把“监房”改为“斋房”，“犯人”被称为“修养人”；二是“监狱劳动化”，他在狱中办了“卷烟厂、肥皂厂、印刷厂”等生产单位，逼迫“犯人”劳动，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周养浩的手段与何子桢管理时期相比，显得更隐蔽、更有欺骗性。其实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尽管在集中营中被关押的人员受到残酷迫害，但革命志士们在狱中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息烽集中营中共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共产党员团结难友同监狱当局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改造与反改造、软化与反软化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连周养浩也不得不承认所搞的“狱政革新”遭到在押共产党员的抵制而收效甚微。息烽集中营设立的8年间，国民党军统从生活上虐待、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剥削在押人员，但所有在押人员在中共秘密支部的领导下，坚定信念，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没有出现一个共产党员叛变。

在息烽集中营，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诗篇，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

链接：

息烽集中营简介

息烽集中营旧址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阳街道猫洞村。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专门囚禁共产党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监狱，也是国民党在全国设立的集中营中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级别最高的秘密监狱，对外挂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军统内部称为“大学”，由阳朗坝本部和玄天洞杨虎城将军囚禁处组成。从1938年11月设立到1946年7月撤销，先后共关押了1200多人。

1988年，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旧址一期工程修复并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旧址被评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5年，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二期工程完成“烽火不息”主题展馆建设，并正式对外开放。

“小萝卜头”宋振中——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

宋振中，小名森森，是宋绮云、徐林侠夫妇最小的儿子，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

1940年3月15日，小振中出生在西安城外30多里的长安县蒲阳村。他出生时，父亲宋绮云正在中条山第四集团军任少将高参。

1941年9月17日，父亲被特务用假电报骗回家，进门即遭逮捕。母亲为了打听父亲的消息，带着几个月大的小振中在西安到处奔走，寻找父亲的下落。11月的一天，一个自称《西北文化日报》工人的人送来一封父亲的短信，信中说要去重庆培训，需要几件换洗的衣服。第二天，母亲带着他到约定的见面地



点，被送信的人带到小雁塔胡宗南的总部后，即被关进黑屋。

不满一岁的小振中，一下子变成了“囚徒”。

在黑屋里，小振中又怕又饿，整日哭闹。母亲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泪水滴在他的脸上。哭累了，他才昏昏地在母亲怀里睡着。一个多月后，他和母亲被押送到重庆，关在白公馆监狱中。日夜牵挂他的父亲此时也被囚禁在这里，但母亲和他都不知道。

在白公馆被关押了一年多，1943年3月，小振中和母亲一起被送上一辆卡车，在路上颠簸了一天，天黑了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和母亲被送进一处有一排房子的院子里的一间屋里。屋里住着几个阿姨。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来这里。他长大后才知道，这里是贵州息烽，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叫息烽集中营，是军统最大的秘密监狱。

刚满两岁的小振中已经能听懂大人的话了。母亲整日和同监的“女犯”们做针线活，从不停歇，他就在地铺上或院子里玩。同室有一个比他小一些的小女孩，成了他幼小的伙伴。

集中营里囚犯们的生活非常苦，伙食实在太差，饭里沙子、老鼠屎，杂质多得连大人都难以下咽，何况一个两岁的孩子。母亲只好把每天做早餐的稀饭留下来给小振中吃。零食更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有。母亲和阿姨们把每星期才能吃一次的煮黄豆省下来，晒干后留给他，这就是他的“零食”了。

由于营养严重不足，他的身子非常瘦弱，脑袋却长得较大，额头大但下巴尖，难友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小萝卜头。随着他渐渐长大，“小萝卜头”这个称呼在集中营内几乎无人不知，反倒少有人叫他森森或宋振中了。

有一天，两岁多的小振中手拉着“义斋”院子前的竹篱，从孔中看见不远处有一些人在干活。妈妈忽然走到他身边，用手指着干活的人说：“快看爸爸，那边那个穿灰色衣服在干活的就是你爸爸。”他不知所以地望着远处干活的人，不知道妈妈说的什么。

过了几天，这个叫作爸爸的人出现在他面前，这是地下党支部通过努力为

宋绮云夫妇争取到的每周见一次面的“特许”。爸爸紧紧搂着他，叫着他的小名，这时他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爱他的人叫爸爸。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小振中一天天长大了，3岁时他已不需要妈妈随时照顾，能和小伙伴一块在院内，有时也在院外草地上玩耍，扯狗尾草、采野花。

他最喜欢张露萍阿姨。张阿姨每天晚上都给他讲故事，讲哪吒闹海、讲孙悟空打妖怪。张阿姨绘声绘色地讲，他听得眼睛都不眨。在张阿姨讲的故事中，他开始慢慢懂得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和坏蛋之分。后来他慢慢意识到屋里的（犯人）是好人，屋外那些（特务和看守）是坏蛋。他将来长大了要当好人，不当坏蛋。

有一天，小振中觉得背上又疼又痒，想用手去抠又够不着，他叫妈妈给他抓一抓。妈妈掀开衣服看了看，说是长疖子了，是因为没有多余的衣服换，常穿脏衣服，又不容易洗一回澡才长的。第二天疖子疼得更厉害，妈妈说爸爸有办法，便请看守带话给爸爸，让他来看一下。爸爸来了，看了看说不要紧，接着就给妈妈谈起什么罗……什么膏药……他听不懂。后来他见妈妈含着泪把头转过去了。爸爸让他伏在腿上，轻轻吹了吹他背上的疖子，忽然爸爸双手一用力，他背上钻心地疼，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爸爸又用凉水浇在他的疖子上。妈妈一把把他从爸爸手里接过去，用嘴不断地给他吹。

当天晚上，他疼得无法入睡，妈妈一直抱着他坐在地铺上，张阿姨也来哄他，给他讲故事，但他还是疼，睡不着。到了下半夜，他觉得身子冷，妈妈说孩子发烧了。

第二天爸爸托看守送来了药，妈妈让他吃了，又擦了一些在背上。过了好多天，他的背才没有疼和痒了。他怎么也不会知道，爸爸为了治罗世文叔叔的病，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办法，故意把他的疖子弄穿头、化脓，然后借口给他治疖子，实际在为罗世文熬膏药，治好了罗世文叔叔。

小振中一天天大了，到了4岁时，已能在集中营内到处乱跑了。“犯人”都认识他，对他熟悉了，特务和看守对他的到处乱跑也见惯了，不干涉他。

有一天，他跑到图书室后边的水池边去玩，跛脚的车耀先伯伯叫住他，告诉他不要在池塘边玩，怕掉下去会有危险。车伯伯把他牵进图书室，拿了本小书给他翻，书上花花绿绿的，他看不明白是些什么。他要走了，车伯伯拿出一本线装书交给他，要他亲手交给张阿姨，再三叮嘱他不许交给别人，更不能拿给看守。叫他不要再去别处玩，马上把书给张阿姨送去。他一溜烟跑回“义斋”，把书交给了张阿姨。

自那次以后，车伯伯常叫他把书送给认识的伯伯叔叔，他都能顺利地把书送到。他当然不知道，这些书里夹有车伯伯写有重要消息的纸条。他实际上已成为“狱中秘密支部”的小交通员。

小振中5岁了，爸爸说孩子应该“启蒙”了。他不懂什么是“启蒙”，爸爸告诉他，他应该读书了。说到读书，他高兴了，因为他听张阿姨说过，书里有许许多多好听的故事，她讲的故事都是从书里看来的。要先学习识字，然后才能看得懂书。这些话都被他记住了。

宋绮云白天要在《复活月刊》编辑室工作或参加劳动，晚上小振中又不在身边，所以没有时间教儿子读书。罗世文因严重关节炎行动困难，他是中共党员，不能作为“全修养人”参加非体力的工作，身体状况又不能从事体力活，他每天只在“忠斋”看点书或写点东西。所以宋绮云请他当儿子的老师，罗世文欣然同意了。

小振中由爸爸带到“忠斋”，把他交给罗伯伯，罗伯伯给他讲好了，每天中午来这里上一个钟点的课。第二天，他背上妈妈用一块旧布缝成的小书包，里面装着爸爸找来的两小截铅笔和旧本子，还有从图书室车伯伯那里借来的一本《平民千字文》，兴冲冲地跑到“忠斋”，正式开始“上学”了。

罗伯伯教他认字：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聪明的小振中一学就会，进步非常快。不到半年，他已经能认不少字，还能听写、默写。后来又从图书室借来一本画书，罗伯伯让他照着上面的动物画。从此，他每天除学习认字、写字外，还增加了美术课。他照样子画牛、羊、小鹿、鸡、鸭……

通过读书写字，小振中明白了许多东西，他似乎长大了许多。

5岁那年，一天早上，小振中刚醒来，看见张阿姨在收拾东西，然后妈妈给张阿姨化妆。他问张阿姨要去哪里，张阿姨说她要去她该去的地方。随后他和妈妈，还有其他阿姨把张阿姨送到下边停着车的地方。张阿姨上车时抱着他亲了亲说：“要听大人的话，好好读书。”

车开走了，他忽然一下坐在石坎上哭起来：“我要张阿姨！我不让她走……”他怎么知道，再也见不到喜欢他、给他讲故事的张阿姨了。

1946年7月，小振中6岁多了。息烽集中营这段时间有些不同往常，白天特务们不许他去罗伯伯那里上课了，“义斋”的院子也不能出。晚上不断有警报声和枪声，他怕，紧紧依偎在妈妈怀里，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因为集中营要撤销了，特务们每晚都在杀人。

7月22日这天，小振中和妈妈还有几个阿姨被押上了车，他看见爸爸也上了后面的车。他问妈妈这是要去哪里。妈妈说不知道，妈妈当然也不知道将去何处，虽然特务们说是转移去重庆，但这段时间多少人说是转移，结果车子没多久就回来了。张露萍她们不也说是去重庆吗？结果不是被杀害在快活岭了！

车在路上没有停，晚上渡江到了重庆后，小振中一家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过了几天，罗伯伯和车伯伯被特务押上一辆吉普车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问妈妈，妈妈也不说。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振中和爸爸、妈妈一起被转押到白公馆。妈妈说他一岁多时曾在这里“住”过。在这里，黄显声伯伯当起了他的老师，他每天到楼上黄伯伯住处上课。黄伯伯除了教他认字、写字外，还给他讲一些历史上英雄的故事，给他讲岳飞、文天祥，给他讲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事，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后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1949年，刚过年没多久，小振中又和爸爸、妈妈一起被送回了贵州。这次不是回到息烽集中营，而是被关到贵阳的黔灵山麒麟洞的庙里。杨虎城伯伯一家在十几天前就已被先送到这里了。在这里，他和杨伯伯的小女儿杨拯贵很快

成了好朋友，他们在庙里到处玩，有时也到洞里去玩，但他们不敢进去太深，里面太黑了。

在麒麟洞住了半年多后，他们又被押上车，说是送回重庆去。小拯贵因为不想和他分开，便和他坐在一辆车上。已经大半夜了，车子在船上渡江，这条江他前次去贵州时也曾渡过，他知道重庆到了。

车子过了江，一直朝着山上开去，到了山上一块平地前停下了。特务们说到了，叫他们下车，先到前面那间屋子里休息一会儿。爸爸和妈妈走在前面，他牵着小伙伴杨拯贵的手走在后面，刚一进屋，眼前发生的事把他惊呆了。几个特务把刀刺进了爸爸、妈妈的身子。

爸爸、妈妈倒在地上，鲜血直流。他忙转身紧紧抱着小伙伴，似乎是想保护她。两个特务冲过来猛地把他和杨拯贵拉开，特务用手紧卡着杨拯贵的脖子不许她喊，另一个特务紧紧箍着他。他大声喊：“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

两把明晃晃的尖刀刺进了两个孩子的身体，他们倒下了，血流出来，和父母的血交融在一起。

幼小的生命就这样在特务的屠刀下消逝了，年仅8岁。特务们把他和父母的遗体，还有小拯贵的遗体埋在他们被杀害的地方，还在上面打上三合土。

敌人的血腥残暴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失败，两个多月后，山城重庆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找到了他们的遗体，重新入殓。

1950年2月7日，小振中和父母被安葬在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杜公祠新建的烈士陵园内，他的坟在父母的左侧。墓碑上刻着：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之墓。

张露萍——永不凋零的铿锵玫瑰

1921年7月3日，张露萍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苦的家庭。

张露萍的原名叫余硕卿，又名余家英、余慧琳，在延安时改名黎琳，张露萍是1939年叶剑英同志亲自为她起的化名。

1935年，张露萍和姐姐余家俊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改名余硕卿，在学校

结识了同班同学、亲密好友周玉斌、杨梦萍、车崇英等人，按照当时的风俗，她们四人结为金兰之好。由于车崇英的关系，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即地下中共党员、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

张露萍经常到车耀先家中玩，得到了车耀先的亲切关怀、教诲和培育，思想境界不断升华。

1936年，经车崇英介绍，张露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编入西城支队建国中学小队部，并担任主持、组织和交通工作，积极投入由四川地下党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抗日歌咏队、抗日演剧队等。编写宣传抗日稿件送到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和蜀华中学进步学生创办的《民党》周刊上发表。

1937年，张露萍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在背面写了这样的自勉诗句：“前程似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卿：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1937年10月，经车耀先同志和民先队的推荐和安排，张露萍、刘玉丰、彭为工、程德仁等10名进步学生离开四川奔赴延安。

由成都到西安的途中，他们经常遭受沿途国民党军警设立的关卡的检查和刁难。党组织事先为他们准备好护照，一次又一次地应对国民党检查站的检查，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他们才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来，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安排，张露萍暂时留在西安，在办事处搞了一个月的妇女工作。

1938年2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张露萍送到延安。初到延安的张露萍，对延安的一切都倍感亲切。并把自己的原名余硕卿改为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后于1938年5月转入“抗大”，编在3大队5队，被选为小组长。

在“抗大”学习期间，她擅长唱歌、演剧、写诗，喜欢游泳、骑马，是“抗大”女生队众口称赞的积极分子。每次集合，同学们都热情欢迎她指挥唱歌，尤其欢迎她指挥演唱当时在延安流行的抗日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



况，她就大方地站起来，挥动那有力而灵巧的双臂，指挥大家引吭高歌。这样，同学们都称张露萍为“干一场”。

1938年10月20日，17岁的张露萍经郑继斯、杨馨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延安抗日文联做秘书工作。在这期间，她与在马列学院工作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部长）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于1939年秋结为革命伴侣。

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社会部决定派张露萍回四川。通过她大姐夫的社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告别延安，告别新婚不久的爱人，她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会回来的。”

1939年10月，18岁的张露萍回到成都看望了车耀先、车崇英、杨梦萍和日夜思念的父母、三姐后，迅速赶往重庆到中共南方局报到。

本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社会部派张露萍回四川是做统战工作，根据当时情况，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对她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派她到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去做地下工作，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建立秘密党支部，负责领导在国民党军统电台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冯传庆，向南方局安全传递情报，伺机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要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

南方局军事组曾希圣、雷英夫同志给张露萍讲明了任务，严肃地说：“你们在敌人心脏里战斗，随时都有被特务识破的危险，千万要小心谨慎。万一被抓住，就要坐牢、坐老虎凳，被杀头牺牲，你想过没有？”张露萍说：“我想过，请组织放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并通过他们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进步青年报务员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4人经她介绍，由中共南方局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7名共产党员形成一个战斗

集体，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特殊身份、特殊手段进行斗争。

在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眼里，张露萍是聪明机智而沉着的带头人。他们配合默契、工作出色，对军统设在全国300多个电台的呼号、波长情况都了如指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事业和对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张蔚林到中共南方局报告时，电讯总台发现他没有上班，也没有请假，以为他病了，于是派人去牛角沱找他，结果在那里发现张蔚林的抽屉里有密码本，还发现一张表和党员名单。他们7人的身份暴露了，张蔚林一回军统局就被逮捕了。戴笠借张蔚林的名义发电报给张露萍，电报说张蔚林病了，叫张露萍急速返回。

张露萍从成都返回重庆就被敌人逮捕了。被捕后，敌人“放长线、钓大鱼”，假意把张露萍“释放”，两个军统女便衣紧跟在她的身后，看她跟谁说话，看她进不进周公馆。如果发现她同谁说话就抓谁，如果她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张露萍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看见同志并没有讲话，经过周公馆门口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张露萍的行动保护了同志，更保护了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7人先后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在看守所，戴笠亲自出马对张露萍进行审讯，他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张露萍不吃这一套，继而戴笠用百般酷刑，也没有从张露萍口中得到一点真实材料。戴笠暴跳如雷，用尽各种手段，毫无收获。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戴笠，“对张露萍等7人长期监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3月，张露萍和她的6名战友，被敌人由重庆转押至息烽集中营监禁。作为死囚，她先被关在重禁闭室，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后来被关进了女监“义斋”，和徐宝芝、徐林侠、宋振中等关在一起，监号“253”。

一天晚上，关在“义斋”另一牢房16岁的周大泉偶尔听到哭泣声，以为是新关进来的张露萍在哭，第二天周大泉问张露萍：“萍姐，昨天夜里是你在哭吗？”张露萍微笑着说：“好妹子，我不会哭，哭是弱的表现，我是革命者，活着是为了同敌人作斗争！”她还对周大泉说：“你还很年轻，如果将来能活

着出去，一定要把息烽监狱的情况告诉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在这座人间地狱里，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先辈们是怎么同敌人进行斗争的。”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与6名战友被杀害于息烽快活岭。临刑前，她和战友们放声高唱《国际歌》，特务们狂呼：“不准唱！不准唱！”但怎么也制止不住。特务趁他们不备从背后开枪，6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她转过身来面对特务大骂：“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顿时，鲜血染红了衣襟，接着她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1983年10月27日，张露萍被追认为烈士。

第五章 坚持斗争迎解放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着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愿，悍然挑起内战，重置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战争期间，贵阳地区反蒋爱国民主斗争此起彼伏。隐蔽在贵阳的中共党员组织党小组，创办地下刊物，开展读书会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上级党组织派遣数路人员进入贵阳，建立组织、了解社情、发动群众。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省工委和“特支”遵循党中央“隐蔽发展，积蓄力量，调查研究，迎接解放”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城市，领导和开展了国统区爱国民主斗争。

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入黔作战，破关夺隘，一路雄风向贵阳挺进。黎明前夕，国民党贵州当局狂捕滥杀，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热血和生命呼唤解放。护城、护厂、护校，贵阳人民用生命护卫家园。

11月15日，天空彩霞飞舞，山头军旗猎猎。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贵阳南郊图云关入城。贵阳从此获得新生。

一、省工委再度建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为配合夺取全国政权，要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以便能有序地管理已开辟的解放区，同

时强调注意从国统区大城市中去吸收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

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恢复和建立城市党组织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西南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赖以负隅顽抗的重要基地，而西南地区的贵州是蒋介石实现“中央化”比较彻底的一个省份，被称为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圣地”。国民党对贵州苦心经营，妄图将贵州及省会贵阳建设成为“戡乱建国之重要根据地”。

1948年4月，蒋介石启用黔人治黔的办法，陆续抽调其亲信，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调国民党宪兵司令、安顺人谷正伦任贵州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调南京警察厅厅长、安顺人韩文焕任贵州省保安副司令，调贵州人黄国祯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把大量贵州籍国民党军人调派回贵州，任命何绍周为第六编练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张涛为三二九师师长，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陈铁为第八编练司令，项荣还为三四三师师长，并建立了贵州绥靖公署，统一指挥正规军与保安部队，由谷正伦兼绥靖公署主任，何绍周、陈铁、王家烈等贵州人为副主任，并将大多数厅、处长也换为贵州人，吹嘘“为桑梓服务”“集中意志力量，一致防共”。

蒋介石不惜一切加强西南的统治和军事实力，同时竭力镇压方兴未艾的人民民主运动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妄图据地自保，卷土重来。

面临严峻的形势，贵州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再度恢复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此前，贵州地下党的工作由黔北工委负责。黔北工委成立于1947年12月，由川东地下党特委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配合川东地下党在沿江山区搞武装斗争，建立川黔湘根据地。

张立负责黔北工委的工作。

张立是贵州普安人，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因皖南事变后局势变化，由贵州转移至重庆，在《新华日报》潘梓年的联系下开展隐蔽斗争。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驻重庆的公开机关撤回延安，张立的领导人何其芳也随中共代表团撤走。同年6月2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大肆逮捕共产

党人和进步人士，妄图一举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张立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在时局逆转的情况下，张立一方面组织部分人员到农村搞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动员在渝的贵州籍学生先仲虞、滕久荣、杨光文、刘端良等返回家乡德江、松桃、雷山、贵阳等地开展活动。1947年12月，张立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东特委。川东特委根据贵州情况，决定建立黔北工委，由张立负责。

黔北工委建立以后，川东特委陆续从川东派宋至平、周翔、董啸崑、李延伦等10余人到黔北、贵阳等地，加强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在黔北工委的领导下，黔北、黔东北、黔西南等地区迅速燃起了游击武装斗争的烽火。

1948年3月，张立由黔东北绕道黔东到贵阳，通过陈明道与刘永的介绍，了解到贵阳一批进步青年的情况。

6月，张立偕同金礼文再次由重庆到贵阳部署农村武装斗争。到贵阳后，与中央日报社职员张凤鸣、王舍人，贵阳师范学院学生周光辉、罗安仁等取得联系。8月，接收张凤鸣、王舍人入党后，派王舍人回家乡郎岱活动，由张凤鸣负责黔北工委与郎岱之间的交通联络。

王舍人临行前，张立对在郎岱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布置，要求王舍人与关岭、安南配合，与敌人周旋打麻雀战，稳住队伍，取得游击战术的经验后，才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待力量强大了再夺取城市，如形势不利则向云南边境党领导的边纵游击队靠拢。

张立对贵阳的工作也做了布置，将原在遵义的中共党员朱石林、施慕义调来贵阳工作，川东地下党又转来了隐蔽在省兽疫防治站的党员余渊的组织关系。

1948年底，川东地下党遭受破坏，张立又一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找党，他化装成商人，以推销云南白药精为由搭上熟人的商船，去上海寻找川东地下党的上级组织——中共中央上海局汇报和请示贵州工作。

张立到达上海后，在外滩公园约见了贵州籍地下党员蔡之诚，通过蔡之诚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由于川东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便与张立面谈。

鉴于贵州地下党情况特殊，上海党组织资助旅费，要求张立去香港直接向负责西南地区工作的领导钱瑛汇报。张立又登上南下的海轮，于1949年2月11日到达香港，找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的联络点。

在香港，钱瑛委派黄林（朱语今）接待了张立，详细了解了贵州的情况，张立还向组织递交了工作计划的书面报告。随后，上海局对张立作了明确的工作指示：

一、绝对停止在贵州的武装斗争运动。

二、与川东党的联系停止，直接由香港（指上海局）领导。

三、由张立、刘熔铸、蔡之诚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因蔡之诚未回贵阳，所以未到职），张立任书记。

四、将工作重点放在贵阳等大城市。

五、其他工作方针、步骤、方式可按张立的报告机动执行。

张立在与上海局接上关系以后，明确了工作方向和目的，肩负重任，踏上了返回贵州的旅途，于2月底回到贵阳。张立回到贵阳后，以省工委的名义向全省发出停止武装暴动的指令，重新部署了贵阳地区的工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贵阳，重点是搞好调查研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贵州的准备。

由于过去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贵阳地区的干部配备较弱，所以必须加强城市干部的配备，培养适应城市地下斗争的干部。

1949年3月，张立与原在贵阳工作过的地下党员王启霖、刘家祥取得联系，动员他们留在贵阳工作；为在《贵州商报》工作、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黄先和恢复了组织关系；与贵定县的谷平，安顺县的李志远，关岭县的蓝星，安南县的黄小穆、钱培炎，盘县的黄世琮等党员相继取得联系，并调他们到贵阳工作；安排国民党军、政、警、宪和参议会中的进步人士黄体贤、刘鹤皋、傅崇佑、郭礼堂等人负责搜集情报。

这时，在黔北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工作的宋至平来贵阳，向张立汇报黔北武装暴动失败的情况，省工委当即决定，将宋至平留在贵阳，把筹建、领导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交由宋至平负责。

省工委还先后从四川调张鸣正、张人均来贵阳工作（张人均来贵阳时，张立已转移，未接上头而重返重庆，未留贵阳），从黔北的松桃、德江等地搞武装斗争的党员中抽调张春涛、林茂德、谢焕耀来贵阳工作，为迎接贵州的解放在组织和干部配备上做了积极的准备。

国民党临近灭亡，在贵阳进行着重死挣扎，对我党和进步学生的迫害更加残酷。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混入学生队伍和进步青年中进行侦察和破坏，迫使党的斗争更加隐蔽、更加艰难。

省工委根据斗争需要，在组织发展上采取稳健的方针，在形式上尽量采取单线联系，避免多人集中活动。对新参加组织活动的人员要通过可靠关系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安排适当的工作。对要求入党的人，要进行党纲、党章教育和地下工作的纪律教育。

党组织采取由一人介绍、个别谈话、不填表格、不举行入党仪式的方式，谨慎稳妥地发展党员，以保证党组织的健康发展。有些写了申请和自传的，被省工委审查后随即销毁。由于当时涌现出来的进步人士较多，有的来不及审查，有的审查够条件还来不及办手续，或中途被捕，或转移他处等，因此，当时省工委所吸收的党员并不多。

二、团结青年建“新青”

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建党工作采取“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在慎重发展党员的原则下，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下称“新青”）团员。

张立根据在香港看到的党中央建议的《团章草案大要》，联系贵州实际情况，草拟了《贵州暂行团章（草案）》，并派出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老党员宋至平负责筹建。

宋至平首批发展幸必泽、金芳云、陈开秀、肖元乾等进步学生加入团组

织，并通过他们联系贵大、师院、中山中学、女中、女师等校的进步学生和部分社会青年，经严格考察后从中吸收一批人入团。在贵阳加入团组织的外地籍团员，先后和平坝建立了新青年社，在遵义建立了曙光社，在安顺建立了新青部，在织金、盘县等地展开建团工作。

团员在省工委的部署下，遵照党的贵州工作方针，开展学习、调查、联络等各项工作，成为省工委联系群众的助手，也是省工委当时在贵阳地区工作的主要力量。5月，省工委研究通过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贵州暂行团章》，并刻印散发到青年手中，以此健全“新青”的组织，指导“新青”的活动。

《团章》规定了“新青”在地下斗争中的主要任务：1. 竭尽一切所能，领导青年群众，积极为有利于全面（主要是贵州）而彻底解放的各项工作而奋斗；2. 努力学习并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以求扩大而深入地教育与影响广大的青年群众；3. 努力精通业务，掌握科学技能，提高文化水准；4. 加紧对敌、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

与此同时，省工委机关刊物《真实》也成为团的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真实》所登载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性文章和分析时局、指导工作的文章，成了团员们的精神食粮，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安定了民心。“新青”团员们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为党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新青”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在贵阳建立起工作据点。

1949年3月，刘永从郎岱来贵阳向张立汇报郎岱暴动的情况，同时将复兴巷活动点的情况报告给张立。同月，宋至平代表省工委与金芳云等取得联系，并明确这个活动点今后直接由张立领导，金芳云单线与张立联系。不久，活动点4个青年都加入了团组织，在活动点为党传递信息、传递文件刊物，接待郎岱暴动失败后返回贵阳的人员。

郎岱暴动失败后，“新青”团员金芳云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到敌人眼皮底下找到隐蔽在镇宁的郎岱暴动负责人王舍人，传达了张立要

“新青”团员肖元乾、陈开秀在中山中学建立了读书会，团结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在护校斗争中，他们按省工委的指示对学校的财产、教师状况及学生动态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写成书面材料交给党组织。肖元乾、倪嗣文等还在六广门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为“新青”筹集活动经费。

中山中学的“新青”团员幸必泽接受党的指示，回遵义与进步青年潘名辉联系，以曙光社的名义在遵义发展“新青”团员，组织武装，加强川黔边区游击队的力量，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遵义的准备。

“新青”团员黄恒德被派到平坝，以原朝气社王沛、邹慧珍为骨干建立新青年社，发展社员。同时，安顺地下党员李志远经张鸣正转达张立建团的指示后，发展高克敏、杨德富、叶先儒为“新青”团员，建立大硐口团支部，杨德富任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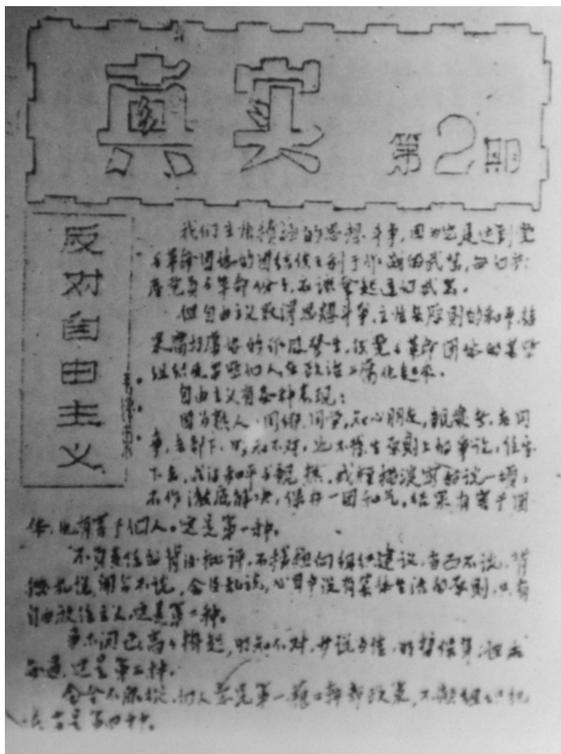
临近解放，贵阳的斗争形势十分险恶，广大的“新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省工委的领导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省工委建立后，为发动群众，团结人民，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动摇和瓦解敌人营垒，省工委在宣传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贵阳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省工委编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农村调查》《新民主主义政策》《怎样调查研究》等小册子，发到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手中，指导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1949年6月，省工委创办了刊物《真实》，由张立、宋至平、张鸣正、王启霖负责编辑。《真实》的文章除了转载党的文件外，还发表地下党员撰写的文章，内容包括思想认识、对时局的看法等。张立以李寿昌、高扬，张鸣正以李应宙，宋至平以赵明诚为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

特别是张立的《共产党会腐败吗？》一文，用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回答了部分人因对共产党不了解而产生的疑惑，并得出结论“中共是永远不会腐败的！”



省工委编印的革命刊物《真实》

《真实》仅印发了两期。从《真实》的内容看，着重在两方面：一是号召贵州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反动派统治的江山搞垮，重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除人们思想上的顾虑，安定人心。《真实》第一期还刊登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在1949年3月以“贵阳人民解放工作委员会”名义印发的《告贵州人民，认清敌我、争取人民解放早日胜利》和《不要再糊涂了》两份文告，给贵阳各界以极大震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党部队广泛开展争取工作，一些党员和知名的爱国人士也利用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交往的机会，劝说国民党部队将领弃暗投明，归向人民。

贵州兴仁专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是一个比较正直且有头脑的

军人。虽然他是黔军将领，但非蒋介石嫡系，长期遭受排挤，对蒋介石专横独裁早就心生不满。

谭本良是贵州普安人，张立以同乡关系早年就与谭本良有所交往，谭也受到张立进步思想的影响。1937年5月，张立在南京开办平平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和进行进步活动，遭到特务逮捕，书店被国民党查封，谭本良曾设法营救。在重庆时，张立曾落脚在谭本良家，张人均、田伯萍、张鸣正经常去谭本良家会见张立，当他们在谭家楼上研究工作时，谭夫人便在楼下客厅为他们作掩护。当时，谭家实际上已成为张立与地下党员碰面和接头的一个可靠之处。

1949年2月，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亲自到重庆邀谭本良回黔担任兴仁专署专员兼地区保安司令。谭本良立即将此情况告诉张人均，得到张人均的同意并征求张立的意见。张立早有策动谭回黔工作、伺机起义的计划，对谭此行积极支持。

1949年3月，谭到兴仁就职前，先到贵阳会见张立，研究到兴仁后的部署。张立派省工委委员刘熔铸以谭夫人表弟的身份到谭本良手下工作。3月下旬，谭本良任命刘熔铸为兴仁专署视察员。从此，刘熔铸以视察员身份经常和谭本良一道出巡，暗地为起义做准备。

1949年12月20日，谭本良率部起义，为解放军进军云南开辟了道路。

在统战工作上，每个共产党员、“新青”团员都肩负工作任务，运用各自的家族、同学、朋友、同事、同乡关系，宣传党的政策，通过这些关系，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敌情、介绍社会职业、解决交通、掩护地下活动等方面作出贡献。

三、“贵阳特支”与“新联”

在南方国统区中，西南和两湖是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地区。

1948年下半年，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正面作战，积极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指示平津学委，动员一批党员

和非党积极分子，利用各种关系，转到南方国统区开展工作。

根据党组织的派遣，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共产党员梁燕和姚国安（姚重华）分别于1948年8月和9月到达贵阳，以清华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48年12月，安粤（安毅夫）受党组织派遣，从上海返回贵阳，与原认识的进步青年取得联系，以“西南少数民族解放同盟”的名义，在社会青年中开展工作。

1949年2月，当时还互不认识的姚国安和安粤分别接到组织来信，通知他们前往香港。上海局钱瑛和朱语今会见了姚国安和安粤，朱语今把安粤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姚国安。钱瑛和朱语今向姚国安和安粤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贵州敌特控制严密，敌人灭亡前必然疯狂挣扎，因此，要加倍提高警惕，不要犯冒险主义错误，要注意积蓄力量，并且指示姚国安和安粤回贵阳后建立中共贵阳特别支部（下称“特支”），直接由上海局领导。

特支的主要工作是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下称“新联”），个别发展入党，独立开展工作，不要与其他组织发生横的关系。

3月初，姚国安回到贵阳，中旬发展朱厚泽入党，接着又发展杨光文入党。4月，上海局为了加强特支的工作，派遣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共产党员黄培正来贵阳。

特支由姚国安、梁燕、安粤、黄培正、朱厚泽、杨光文组成，姚国安任支部书记。

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有一群追求进步、思想活跃的学生，姚国安和梁燕决定先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以清华中学和贵州大学为重点，发展一些可靠的、要求进步的、愿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学生和教师加入，充实革命的力量。

1949年春，经姚国安、梁燕共同研究，由姚国安执笔，拟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明确规定“新联”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和教育进步青年，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民

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章程》还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入盟条件和入盟手续，规定了盟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新联的组织、纪律等。《章程》连同部分马列、毛泽东的著作等进步资料，由姚国安、梁燕、朱厚泽、殷以睿分别刻印成册，在进步青年中秘密传阅。

这些革命书籍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成了清华中学进步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和行动准则。

3月，“特支”发展了赵西林、梅德生（梅放）、陈庐山、李惠华等一批新联成员。以此为基础，“特支”成员做了分工，分成四条线进行活动：第一条线，由朱厚泽负责在清华中学开展工作；第二条线，由梁燕负责在贵州大学开展工作；第三条线，由安粤负责在贵阳市内开展工作；第四条线，由黄培正负责与杜蓉及其周围青年的联系。



中共贵阳特支的主要活动点——花溪
清华中学

第一条线是“特支”开展工作的重点，原因是姚国安、梁燕都在清华中学教书，黄培正也住在清华中学，并且在师生中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新联”的领导下，清华中学进步学生还利用其与市内各中学的进步青年相互走访的惯例，把革命影响扩展到校外。他们邀请师院附中高二级同学到清华中学参加联欢会，随后清华中学同学又回访联欢。会上，除表演文艺节目外，还交流了对形势和国家前途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新联”组织迅速壮大起来，为迎接解放积蓄了力量。

1949年3月，贵阳市大中学校学生掀起反饥饿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特支”立即召集成员商量对策，要求对运动既不能泼冷水，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尤其是贵阳，国民党聚集了大批特务，要注意隐蔽斗争，掌握方式方法，一切以迎接解放为重。

“特支”书记姚国安拟定了几条很详尽的调查提纲，布置负责贵大工作的梁燕做好调查，以便把握斗争方向。在反饥饿运动中，“特支”牢牢把握“要支持，不要干扰”的原则，积累下了独立开展地下斗争的经验。

面对众多血气方刚的学生，“新联”领导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编辑《理论与实践》，以此来团结广大“新联”成员，指导“新联”成员的活动，对“新联”成员进行理论教育。

《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学习文件、工作经验总结和工作方法介绍、新华社播发的新闻。每期刊物蜡纸的刻写，由“新联”领导小组成员分担。《理论与实践》遵循“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领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一指导思想，每期的文章都有鲜明的针对性。

《理论与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前出了6期，新中国成立后出了2期，在指导“新联”成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提高理论修养，培养实践工作能力，磨砺战斗意志，迎接解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9年6月，清华中学“新联”成员李惠华得知国民党特务在打听姚国安住处的消息，便立即反映给了组织。姚国安、梁燕、黄培正商量后，决定立即转

移。姚国安把“特支”和“新联”的全部关系和工作交给安粤后，在清华中学校长凌中青和教师王鸿逵、肖醒球的帮助下，离开贵阳经香港转移到了武汉。

姚国安等撤离后，面对敌人的大逮捕，安粤根据姚国安的意见，与朱厚泽共同商定，贵州大学、清华中学的“新联”成员利用暑假转移到市内活动。注意斗争策略，除了可以利用某些公开合法的组织进行一般活动外，主要以分散交朋友、读进步书籍的方式，继续隐蔽发展“新联”成员，团结广大青年，做好调查研究和护校、护厂等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7月中旬，特务包围了安粤家，但没抓到安粤。安粤在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把“新联”的工作交给朱厚泽，也离开了贵阳。朱厚泽与赵西林、梅德生、李惠华、陈庐山组成“新联”领导小组，坚持斗争，直到贵阳解放。

四、民主斗争呼声疾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告败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全面崩溃，加速了财政金融的破产。

据当时的《贵州商报》报道：1949年1月以来，银圆虽不是法定通币，但在市场上仍是实际使用的币种之一，2月初每枚银圆值金圆券50元，3月底即达7000元，到6月25日国民党行政院即规定银圆1元等于5亿元金圆券。

货币的贬值，金圆券在短期内变成废纸。

在贵阳市场上，中等大米零售价，1月每市斗计金圆券18.18元，2月192.07元，3月888.85元，4月34695.8元，5月7721727元，6月131026667元，是1月价格的7207187.4倍。

贵阳校园内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老师，老师，力竭声嘶！教员，教员，贫病相连！薪水，薪水，不够喝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职员工及广大人民群众之贫困生活。

为了求得生存，为了唤起民众，贵阳反饥饿运动倏然爆发。

（一）贵州大学：反饥饿运动，始于贵大

1949年春，贵州大学（下称“贵大”）师生生活十分困苦，尤其是教师、职员和工人，靠微薄的薪水难以养家糊口。很多教授处于贫病境地，家属和孩子被迫上山采摘野菜充饥，一般职工已经开始断炊，学生三餐难以果腹，教师已在酝酿罢教。

3月20日，在贵大丁道衡、陈述元、乐恭彦、金春祺等教师的推动下，贵大教授会、助讲会经过激烈辩论，宣布罢教。罢教的决定得到学生们的支持，学院里贴出了“支持罢教”的标语。贵大进步社团高原社负责人、学生史健发起召开各院系的学生代表会，得到广泛的响应。

3月22日，贵大召开了第一次各院系代表大会。会议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会议决定发起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选出以史健为主席的主席团，下设宣传、纠察、联络和总务等机构，分别由朱文达、陈勃如、杨宗贤、刘裕周等同学具体负责。会议通过了向省政府提出改善教师待遇和实行全面公费的议案，并要求省政府限期答复，否则实行罢课的决定。动员全校同学到贵阳请愿、游行、宣传和义卖，游行时间定于3月26日。

中共贵州省工委从城市斗争的复杂性考虑，派出地下党员岳景宗与贵大“新青”团员朱文达和贵阳女师的进步同学联系，引导学生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注意团结广大教职工，争取中间状态的同学，避免流血牺牲。

3月26日，贵大反饥饿运动爆发，1000多名学生高举“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的巨幅横标从贵大出发，经花溪向贵阳前进，沿途写标语、呼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一些教职工为学生的正义行为所感动，纷纷加入学生队伍。

国民党当局从太慈桥起就派持枪军警，沿途加双岗警戒。学生们不顾反动派的阻挠，昂首挺胸，队列整齐，高呼口号，从次南门进城，经大西门、大十字，直指省政府。游行震动了贵阳市，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特务混在群众中企



贵州大学师生游行队伍



贵州大学游行队伍在省政府门前静坐

图乘机破坏，并调动大批武装宪警，荷枪实弹，加岗加哨，却无法阻止游行队伍的行进。游行队伍来到省政府门前，省政府紧闭大门，门前架起机枪。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出面游说，学生们不予理睬。压力下，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答应接见学生代表，以史健为首的几位学生代表进入省政府与谷正伦谈判。史健等代表唇枪舌剑、义正词严，谷正伦只好答应拨大米救济师生，同时威胁代表必须回校上课。学生们由省政府回到暂住的“师院”，主席团决定27日在贵阳宣传一天。

3月27日，贵大学生组成若干宣传队在贵阳街头宣传、义卖，得到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大家纷纷捐款捐物。主席团还在省府路贵大办事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下午，队伍集中到大十字，朱文达在岗亭上宣读《告全市父老书》，感谢贵阳市民对贵州大学学生运动的支持和援助，然后全体回校。

反饥饿运动兴起之后，中共贵州省委提出了三点要求：1. 掌握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原则，不宜过早提政治口号；2. 团结教职工，争取广大中间状态的同学；3. 争取贵阳师院、贵阳医学院联合行动。

3月29日，贵大“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大会”在《中央日报》上刊登鸣谢启事，感谢各界人士对“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的大力协助和慷慨捐助。同日，《贵州商报》发表了《救救大学教授》的社论，文中谈道：“大学生们，为着老师最低生活的保障，他们结队游行，悲愤呐喊，这是正义的激发，热烈的行动，是真理的发泄！他们自愿花费宝贵的时光，去卖报纸、擦皮鞋，因为这是‘尊师重道’的表现，也是爱护学术的象征。”

回校后，史健等认为只有通过学生自治会的合法形式，才能开展经常性的活动，便与刘光草拟了《贵州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草案）》。主席团经过分析，认为谷正伦不可能接受学生的要求，罢课势在必行，决定改选运动领导成员，由朱文达任反饥饿运动大会主席，史健、班必儒、纪运卓等任副主席，彭祖年负责宣传股，刘可负责学习股，刘裕周负责总务股，甘凌杰负责生活股。在4月初召开的第二次各系代表会上，通过了“无限期罢课”的提案。

罢课后，反饥饿运动大会各股紧张地工作。宣传股出了会刊《大家看》，指导运动的发展。学习股刘可组织了进步书刊展览室，陈列了《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等报刊。高原社组织了团结晚会，唱进步歌曲、扭秧歌等。衡岳学会等组织共同举办民主讲座，由陈述元教授讲授《饥饿与反饥饿》《政治与民主》，陈兆畴教授讲授《论权威》。

1949年4月1日，南京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造成两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南京“四一惨案”消息传来，贵大学生沉痛地为死难同学默哀。各系代表会决定举行“反饥饿、反迫害，支援南京‘四一血案’”运动，成立罢课委员会，选举朱文达任主席，再次宣布罢课。

在罢课斗争的进行中，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学生运动的破坏，煽动学生离校，以瓦解学生的斗志。而担任领导职务的学生缺乏斗争经验，提不出新的战斗口号和有效措施，出现了思想混乱的现象，群众热情逐渐冷却，不少师生陆续离校，进步学生逐渐暴露。针对这种情况，中共贵州省工委和中共贵阳特支重申上海局隐蔽斗争的方针，分别指示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和“新联”的成员，立即组织复课，以便集合师生，聚集力量，准备迎接解放。

朱文达和甘凌杰提出复课时，有的学生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形势和地下党的工作方针，反对复课，并批评复课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针对这种情况，梁燕写了《转捩点》一文，甘凌杰写了《退一步进两步》的文章，分别张贴在团结晚会的大门上和饭厅里。同时“新青”和“新联”的同学到各宿舍与进步同学交谈，经过反复地做工作，消除了意见分歧。全校师生在5月中旬通过了复课决定，贵大反饥饿运动到此结束。

（二）贵阳师范学院：示威游行，震撼山城

在贵大酝酿反饥饿运动的同时，贵阳师范学院（下称“师院”）学生自治会收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寄来的反饥饿运动材料和标语口号，武汉大学也寄来了反饥饿运动的传单。经过秘密串联酝酿，由学生自治会和各系学生负责人

组成“反饥饿运动”领导小组，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宋森公开出面领导，其余人员秘密进行工作。在与贵大等校联合行动被阻挠的情况下，师院的学生为贵大学生提供住宿并供应茶水，部分学生还参加了游行。

师院对反饥饿示威游行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和紧张的准备。彭述纲负责起草师院《反饥饿运动罢课示威游行宣言》，一些同学负责誊写付印；一些同学负责画漫画，其中一幅画了一个戴着眼镜、骨瘦如柴的老教授，愁眉苦脸地靠着书桌，旁边有一个饥饿的孩子，手拿着碗在喊：要吃饭！知识分子都已饿得无路可走，可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是无法形容了。简单的漫画，激发出广大师生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懑之情。

刘弼负责发动和组织工友参加游行。经过发动，院本部、先修班、附中和附小的师生都表示踊跃参加这次运动。接着，师院全体学生“抢救教职员工学生饥寒运动大会”在学院礼堂召开。当宣读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来函和标语口号时，群情激愤，一致决定于3月29日举行示威游行。

3月29日这天，参加游行的队伍，以师院本部先修班为主体，还有附中、附小的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共1000多人。此外，贵阳高级工业学校、贵阳师范学校和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高举“反饥饿”的横标，扛着漫画，手执各色三角旗，从院本部操场出发，浩浩荡荡地奔向贵州省政府。他们沿途散发和张贴罢课示威游行宣言，愤怒地高呼“反饥饿！”“不能让老师空着肚子上课！”等口号，高唱“薪水是个大活宝，要和物价来赛跑，物价一天涨一天啦，公教人员活不了！”，以及《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和《古怪歌》等歌曲，震撼着贵阳山城。

游行队伍过雪涯路、都司路到大十字，道路两旁站有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宪兵，气氛十分紧张。附小的学生高呼“要吃饭！要穿衣！”的口号，越喊越感动人，使许多同学和观看的群众流出了眼泪。当游行队伍抵达省政府门前请愿时，国民党军警已在大门两边墙上架起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便衣特务到处乱窜，寻机破坏。学生们不怕恐吓，要求谷正伦出面答复学生的要求。谷

避而不见，指使省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出面应付。

这天下午，师院学生在民教馆维周球场举行篮球义赛，观众甚多。晚上，又在省艺术馆礼堂进行义卖演出，社会各界踊跃购票入场。第二天，学生们又走上街头擦皮鞋，到商店募捐，通过这些活动来揭露国民党当局不顾师生死活的行径。

3月30日，师院学生代表到省政府同谷正伦谈判，并把师院全体学生以“抢救教职员学生饥寒运动大会”名义写的信交给谷正伦。这封信提出的要求无可辩驳，谷正伦只好逐条批示“可”或“照贵州大学例办理”……但没有实际解决问题。

在学生掀起反饥饿运动的同时，3月底，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举行三院教授联席会议，决议申请教育部调整待遇。4月4日，三院校教授联席会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了《教授会联合要求改善待遇宣言》，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一切待遇，均请按照本省政府呈报之实际生活指数发给”“照京沪区配发实物”等项要求，希望政府在两周内予以解决，如不获圆满结果，即全体停教，以待社会公断。4月15日，师院职员会正式成立，并给教育部发电报，要求“一视同仁，自本年元月份起比照讲师助教，拨发进修补助费，以示公允”。同时，贵阳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联合发起了一场名为“尊师运动”，实为“讨饭”的运动。

（三）贵阳医学院：联合行动，扩大影响

贵大的反饥饿运动兴起之后，贵大学生代表来到贵阳医学院（下称“贵医”），通过学生戴瑞芝的介绍与学生会的同学见面，将开展运动的消息传到贵医。紧接着贵大3月26日反饥饿示威游行后，3月27日，贵医的学生提出要为饥寒交迫的老师呼吁，并商定于第二天早上举行游行。“新青”团员陈开秀向贵医护士学校学生做动员工作，并参与组织了贵医的反饥饿运动。陈开秀向护校和其他学校学生开展串联发动工作，连夜赶到太慈桥校址与陈文光等同学做

好了次日晨上街游行的安排。

3月28日清晨，贵医学生齐集河滨公园门口等候贵大学生一起游行，但因情况变化，未能与贵大学生联系上，贵医学生便手持标语，直接上街，冒雨前进，高呼“学生要上课”“老师要吃饭”等口号，一直游行到省政府门前，返回时沿街进行劝募活动。贵医师生还在三圣宫礼堂及民众教育馆举行游艺晚会及舞会三场，将所有收入援赠教师。

在这次全市性的反饥饿运动中，贵医教师们纷纷起来采取联合行动，与贵大师大院一道，自4月13日开始停教待命，时经半个多月，仍未得到解决，为顾及学生学业，只好在5月2日复教。为扩大反饥饿运动的影响，贵医于4月21日至23日停止门诊三天，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四）贵阳中学：省立八校，联合游行

大学生们的反饥饿运动，是正义的行动，轰动了全省，也激发了广大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贵阳的中学生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当时的贵阳有8所省立中等学校：贵阳中学、贵阳高级中学、贵阳女子中学、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高级工业学校、贵阳高级农业学校和贵阳高级医士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八校”），“新青”和“新联”在这些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发展了成员。3月26日贵大游行后，掀起了反饥饿运动的高潮。当时，省立“八校”的教师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薪水，许多教师在何锡周、肖之亮等老师的动员下，成立了省立八校教职员联谊会，并向当局请愿，但请愿没有结果。

“老师要吃饭，学生要上课”成为广大师生的共同呼声。女师学生写出了《不能让老师在黑板前默默地倒下去》的文章。要求改善老师待遇、要求正常上课的传单和壁报在“八校”广为张贴。

“八校”的学生自治会共同派出代表到教育厅请愿，毫无结果。“八

校”学生代表先后在高中、贵中、女中和女师召开会议，决定联合行动。“新青”“新联”成员传达了党组织的意见，“从贵州实际出发，抓住教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的合理要求，争取社会同情”。“八校”决定于4月16日举行联合游行。4月16日，8所中学共4000多名学生会合于大南门，高喊“教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等口号，举着标语，走上街头，向社会呼吁，向贵州省政府请愿。

学生反饥饿的游行队伍由大南门、中华路、铜像台转富水路齐集省政府门前大操场上，并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漫画、标语。传单上写着：“诸位同胞！请伸出你们的同情之手来，给予我们道义上的援助，我们发出的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只不过要求政府立即解决最近所造成的困难，使教师们不致沦为饿殍，学生不致中途辍学……”学生们的呼唤在情在理，打动人心。在学生的压力下，谷正伦命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写下5天后解决问题的字据。

第二天，《贵州日报》刊登消息说：“本市八个中等学校学生，在目前物价狂涨，老师待遇微薄，生活濒于绝境，特于昨（十六）日午后一时联合冒雨游行，向社会呼吁，沿途秩序良好，深获民众同情。”各地报纸也刊发消息，报道了贵阳学生反饥饿运动。

贵阳大、中学生的反饥饿运动，在国民党认为是非常安定的西南圣地——贵州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成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贵阳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重地打击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贵州当局，同时锻炼了一批追求光明的革命青年，也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认识，逐渐抛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反饥饿运动在贵阳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五、护城护厂保家园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4月，毛泽东亲自草拟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

短几个月内强渡长江，乘胜追歼国民党残敌，势如破竹，步步紧逼西南。

中共中央上海局于年初向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和中共贵阳特支书记姚国安做了相应的布置，要求抓紧群众中普遍酝酿的自发斗争与迫切要求解放的情绪，发动群众，把提高群众运动的质量和群众的政治觉悟作为工作的中心一环；在“反破坏、反出卖、反屠杀”的基本口号下，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散、反迁移、反裁员的斗争，进行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等具体斗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针对国民党贵州当局的“应变计划”，贵阳的地下党组织团结各阶层人士，发动群众，开展了护城、护厂、护校斗争。

（一）迎解放地下党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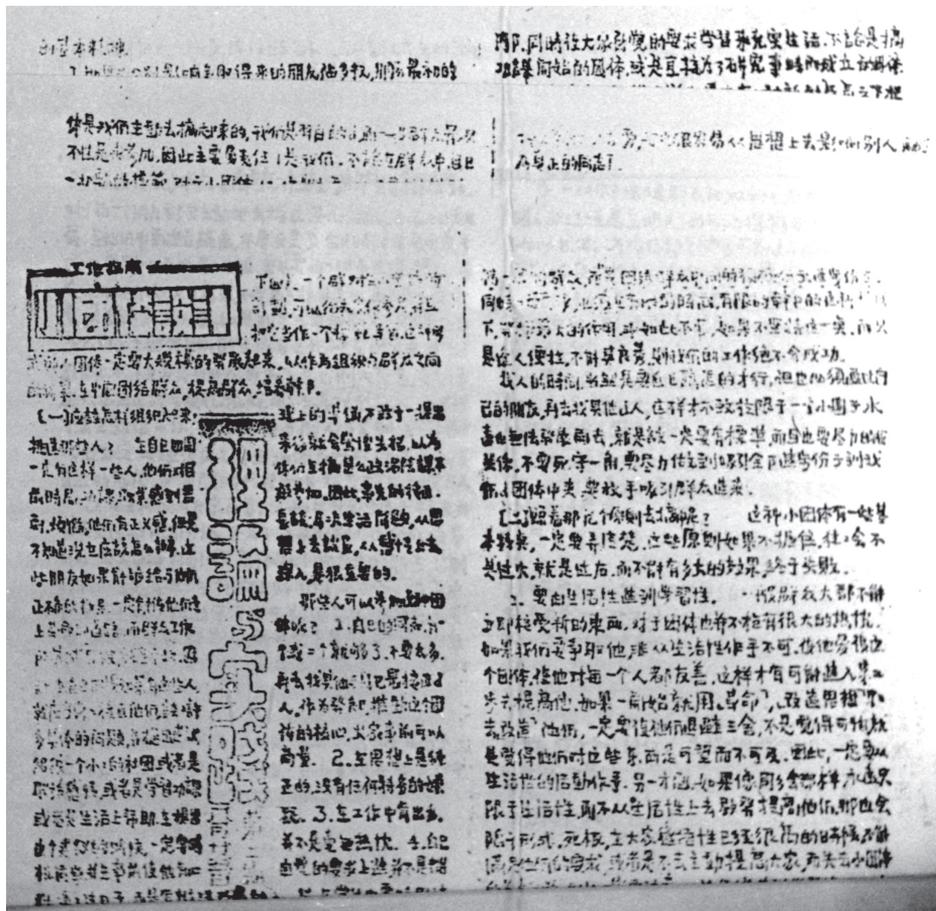
1. 调查掌握敌情，揭露破坏阴谋

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工委发出搞好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揭露国民党溃逃前的破坏阴谋，开展护城护厂护校斗争、迎接贵阳解放的指示，要求党员及“新青”团员认真执行，开展广泛而细致的城市调研工作。省工委印发了《调查研究提纲》《农村阶级调查》《农村调查提纲》等文件。按照省工委的统一部署，贵阳党员和团员先后整理出了《中央日报调查》《文通书局调查》《小龙井调查》《中山中学调查》等调查报告。

“特支”及“新联”在《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怎样进行学校调查研究》等文章，并在1948年11月12日刻印和散发了《告本市市民书》，全面宣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号召全市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保卫贵阳，保护工厂、学校，粉碎敌人的破坏、捣乱企图；刻印并散发《告贵阳电厂工人书》，教育引导电厂工人为保护工厂、保卫家园而斗争。

“特支”发动少数民族党员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向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梁聚五（苗族）、杨汉先（苗族）、杨砥中（彝族）等人宣传党的政策，并通

过这些上层人士的关系搜集国民党内部的情况，整理出《贵州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情况》的调查报告。



《理论与实践》

2. 武汉入筑工作，赢得学生信任

1949年3月，中共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城工部派肖良汉和郑亚宇到贵阳。

肖良汉原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因参加进步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由地下党组织从武大疏散到湖北天汉县解放区，再从解放区派遣回贵阳。

郑亚宇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948年8月19日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逮捕，同年10月经地下党营救出狱，转移到汉口，输送到天汉县解放区。

1949年2月，肖良汉与郑亚宇同时在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面临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党组织派遣他们到贵阳开展工作。肖良汉和郑亚宇的党组织关系直属鄂中地委城工部，不与当时贵州的其他地下组织发生横向联系。接受任务后的肖良汉和郑亚宇，在交通员和警卫班的护送下，分别从汉川出发，经湘、桂、黔线，于1949年3月到达贵阳。



肖良汉、郑亚宇组织青年开展读书活动

肖良汉获得中山中学代课教师的职务，取得合法的社会身份；郑亚宇以“南京吃紧、返家乡就读”为由，转入贵州大学读书。由此，他们利用教师、学生、亲友、同乡等关系在贵阳开展活动。

他们将从解放区带回来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论》《西行漫记》等文件和进步书籍借给一些进步同学阅读，同他们交换学习心得，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青年学生中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3. 收听电台广播，刻印战况传阅

肖良汉与郑亚宇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师院理化楼上，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将重要消息、战况、文告、社论记录下来，并马上刻印出来，在青年中秘密传阅。

为了防止国民党溃逃前的破坏，他们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写标语、印宣传品、张贴文告，号召全市人民护厂、护校，维护社会秩序，迎接贵阳解放。

他们印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宣传品，还沿街张贴“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严防坏人破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护厂、护校，保护一切公共设施，保护国家资源”等标语。积极争取上层人士建立维持贵阳治安的机构，保护城市安全度过“真空”时期，保护贵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肖良汉和郑亚宇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敦请卢焘（爱国民主人士，曾任贵州省省长）老先生、张彭年（爱国民主人士、贵州省参议）老先生牵头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保护贵阳城市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打入敌军内部，掌握“应变计划”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派李思源、涂光弧从武汉到贵阳，与打入国民党贵州保安司令部的涂月僧组成工作组，李思源任组长，负责搜集贵州的政治、军事情报，并建立一条从贵阳到重庆的地下交通线。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全面掌握了国民党军所谓的“应变计划”及国民党

破坏贵阳城市设施的具体措施；涂月僧还利用司令部秘书主任的身份，获取了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和贵州8个保安团，以及各县保安队的人员编制和装备分布情况。他们把了解到的军事、政治情况绘在一块白布上，缝藏在万少武的鞋底里，由其秘密离开贵阳，赴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汇报。

涂光弧等人坚守在贵阳，以“中国共产党贵阳城市工作组”的名义，编写了一些宣传材料，向一些较大的工厂、商号和有代表性的人士宣传，要求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稳定下来，共同保护贵阳。

5. 确定五大任务，保障贵阳安全

为全面了解贵阳的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派出以董学仁为领导的侦察小组，化装成逃难商人，于1949年7月潜入贵阳，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取得了联系。

侦察小组向省工委提出五大任务：一要做到贵阳水电设备不受破坏；二要保护贵阳不被火烧；三要筹备粮食物资接待解放军；四要想办法做好侦察工作，争取敌军起义；五要保护云贵之间的桥梁不被破坏。

侦察小组在省工委的配合下，多次拜会了贵阳社会名流卢焘、张彭年，希望他们维持社会治安、保护贵阳。这些建议得到了卢焘的首肯。

（二）揭阴谋保贵阳无虞

1. 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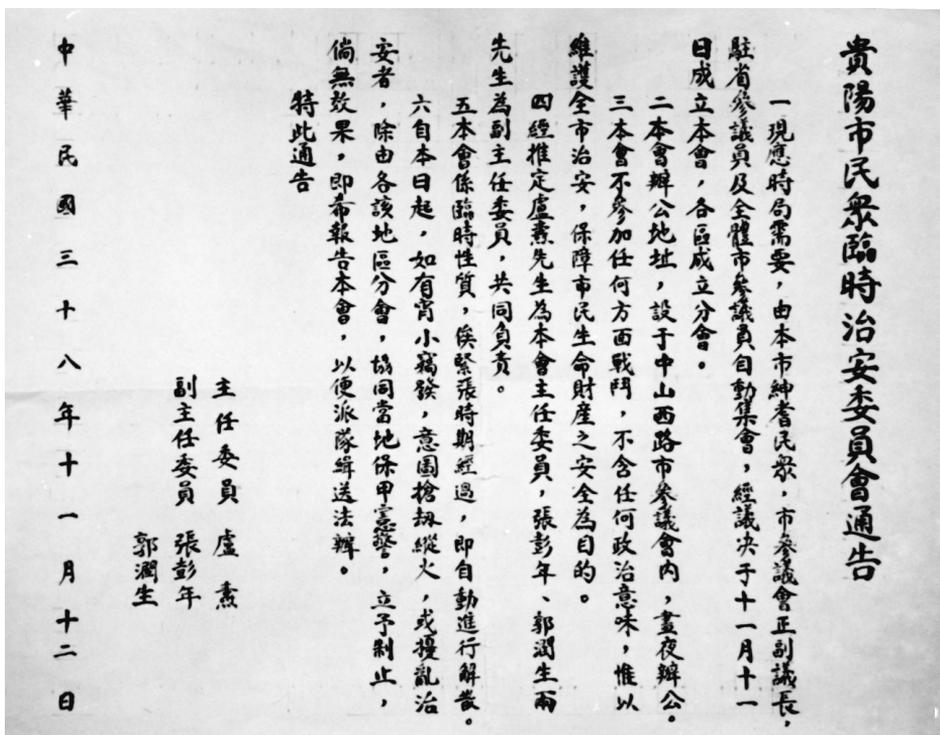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自湖南向贵州挺进，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谷正伦和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组织所谓“应变计划”，妄图顽抗。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谷正伦等不敢在贵阳久留，将贵阳库存的金银搜刮一空后，向黔西南、昆明方向逃窜。这时，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率部进驻贵阳，妄想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来控制日益混乱的局势，并准备在非常时刻炸毁贵阳。

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聚集各方力量保护贵阳、维护治安，与国

民党实施破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地下党组织的动员下，知名人士卢焘、张彭年等挺身而出，牵头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下称“临治会”），担负起贵阳治安管理的重任。

11月11日，卢焘、张彭年邀约郭润生、林子贤、司季武、陈方、邓占奎、赵正一、高可亭、孟翼卿、张荣熙、陈职民、蔡森久、冯程南、李福祥等知名人士，召开了“临治会”成立大会，选举卢焘任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正式启动“临治会”的护城工作。12日，“临治会”在全城张贴《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通告》，明确告知“临治会”组成情况和工作目的，宣称：“本会不参加任何方面的战斗，不含任何政治意味，唯以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目的。自本日起，如有宵小窃贼，意图抢劫纵火，或扰乱治安者，即须报告本会，以便派队缉送法办。”

“临治会”筹集到步枪422支、轻机枪12挺、短枪15支和其他杂牌枪多支，子弹40箱、手榴弹4箱。组织有190余人参加的自卫队，日夜轮班巡逻全市。“临治会”还采取措施，保护仓库和贵阳电厂，制止了第四十二补给司令部炸毁宅吉坝军用仓库的企图；要求水利林牧公司、盐务局、西南公路局等公用事业单位，集合员工，力图自保；派专人看守已无人看管的一些仓库、机关、学校、寺庙、公房等，增加临时路灯；要求沿街各住户从户内拉出一盏电灯，以利于守望巡逻；准备鼓乐、彩牌、标语，做好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各项工作。“临治会”措施得当，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所以贵阳市在新旧交替之际未出现严重的骚乱。



《貴陽市民眾臨時治安委員會通告》

正当“临治会”积极发挥作用时，11月12日，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下令撤销“临治会”，并撕毁“临治会”张贴的通告。11月13日，刘伯龙声称他已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城防司令，并贴出布告说：本司令官坐镇贵阳，尔民毋惊扰，如有不听命令者杀，造谣生事者杀，投敌通匪者杀。同日晚，刘伯龙约卢焘、张彭年、郭润生等谈话，刘蓄意寻衅，指责不该成立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并逼卢焘立即筹集20万银圆充作军饷，卢焘愤而与之争吵，不欢而散。

14日晨，刘伯龙派汽车去卢宅，声称请卢公马上去三桥开紧急会议。卢焘坦然登车，车行至二桥转弯塘，卢焘被特务骗下车杀害。当日，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写信给“临治会”，对卢焘先生为贵阳解放作出牺牲的精神表示敬意，

对国民党残酷杀害卢焘先生表示愤慨，并赞扬“临治会”的工作。“临治会”虽然受到刘伯龙的威胁，主任委员卢焘先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临治会”不畏强暴，坚持工作直到贵阳解放。

2. 护厂

针对国民党贵州当局成立疏散指挥部，实施破坏工厂、学校、广播电台和公用事业设施的阴谋，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贵阳特支及“临治会”团结各方力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贵阳电厂直属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管理，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时任贵阳电厂厂长韩得举正在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下，即来电任命电厂管理师奚长年为代厂长。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要求，原资源委员会电业处负责人陈中熙以个人名义向尚未解放的贵阳电厂发来电报，指示奚长年“千万勿离职守，惟确保事业而后能确保自身”，要求其保护好电厂。

不久，奚长年收听到解放区电台播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使他领会到保护电厂是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奚长年审时度势，在进步工人的支持下，从8月下旬开始组织贵阳电厂技术工人秘密修理存放在仓库里的旧枪支，为护厂斗争做准备。

11月8日，进步教师丁益智打听到敌保安司令部即将对电厂进行破坏的消息以后，立即转告奚长年。奚长年当机立断，在电厂营业处礼堂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国民党要破坏电厂的消息，动员全厂职工准备武器，公开进行武装护厂。护厂队白天黑夜轮流放哨、巡逻、值班，并在大门口设立护厂指挥部。

工人们连夜赶装高压电网3道，挖掘战壕700多米，装置电话相互呼应。护厂队进入临战状态，并严密监视驻厂宪兵的动向，两个护厂队员监视一个宪兵，还在一号机房后面的制高点和厂门口设置瞭望哨，安装了一台探照灯和一部专供联络用的电话机，组织了流动哨，发现情况速报护厂指挥部。

11月11日，长期潜伏在电厂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廷维向奚长年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与奚长年共商护厂措施，在职工中提出了“护厂保家”的口号，将职工和家属全部搬到厂里，生活由公司统一安排。在严密的防范措施面前，特务的破坏计划根本无法实施。



—○—
贵阳电厂

电厂还与“临治会”协商，由“临治会”负责维持电厂外面的秩序，电厂如有紧急情况，“临治会”将全力支持。而电厂则保证不停电，沿街各户装置门灯，电厂不收费。

11月14日，刘伯龙运送两卡车兵力和大量炸药，准备再一次破坏电厂，但见工人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只好狼狈逃跑。贵阳电厂职工勇敢护厂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贵阳电厂是全国6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电厂职工勇敢护厂的英勇事迹，受到燃料工业部的表彰。

谷正伦在逃离贵阳时，企图把贵阳的通信设备拆下搬走，以截断贵阳与外界的通信联络，变贵阳为死城。贵阳电信局的职工知道这一消息后，纷纷行动起来，将比较重要的机器设备先行拆除，有的藏在宿舍里，有的搬到家中。

11月14日拂晓，两辆满载国民党士兵的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进电信局，国民党士兵端着枪守在各处机房和路口，并在门口的一个制高点架起一挺机枪。国民党八十九军参谋长吴行中带着士兵到各机房，看到除了搬不动的设备外，机房几乎都空了，顿时大发雷霆，强迫工人搬剩下的机器。

工人们故意把早已落后的笨重的重锤式电报收发机慢慢拆、慢慢装，尽量磨洋工、拖时间。这位参谋长焦急不安，一面催促职工赶快拆搬，一面派人向龙里方向打探解放军进军的情况。当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抵龙洞堡，这位参谋长再也顾不上什么设备，慌慌张张地爬上汽车逃跑了。

电信局的机器设备由此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将贵阳变成一座死城”的计划，使新中国成立后的贵阳与各地通信联络畅通无阻，保证了军事、接管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前的贵州广播电台，是国民党在贵阳的一个重要宣传机构。该台有保安部队驻守，警戒森严。当解放军逼近贵州时，台长黄天如妄图拆毁机器，疏散人员，抗拒解放。

“特支”发动广播电台的进步职工以“拖延”的方法，抵制国民党的拆运

计划。还以“李代桃僵”的计谋，在包装箱内塞进一些破烂废机，以应对国民党军队的抢运。

11月10日，台长黄天如派出两部车来抢运设备，进步职工邓俨、巫瀚澄发动职工以车少家属多、迁不走为理由，向黄天如索要安家费，拖延装车时间，并在混乱中将黄天如写给省保安司令部的信悄悄拿走。黄天如被纠缠之际，有人大呼谷正伦跑了，他惊慌失措，只抢到一些收音机和唱片就逃跑了。

黄天如在写给保安司令部的密信中报告了发射台设备位置，请求派兵炸掉。邓俨组织职工严密防卫，日夜轮流值班，直到解放军接管为止。

设在贵阳中曹司的国民党第三十兵工厂一分厂，是一个以制造手榴弹壳及修理枪械、炮弹为主的兵工厂，全厂有300余人，其中工人160余人。当解放军逼近贵阳时，该厂主任管毓岱不仅私吞了全体职工3个月的“遣散费”，还强迫职工跟着他外逃，而且极其卖力地执行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的命令，积极配合八十九军刘伯龙部实施破坏兵工厂的计划。

管毓岱的做法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抗，工人们自发地团结起来，把家属搬进工厂，组织起有38名工人参加的自卫队，日夜在厂门口和厂周围山头上巡逻放哨，保护工厂。他们挖断公路，阻止管毓岱逃跑，最终迫使管毓岱妥协，同意发枪发粮，同意工人们组织起来保护工厂。

护厂队经过斗争，获得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20支，子弹若干。

11月12日，国民党八十九军破坏队奉命前来破坏工厂时，护厂队已将最好的设备全都隐藏好，将国民党破坏队带到堆放已淘汰的旧皮带车床的工房，国民党士兵往工房里扔了一枚炸弹就跑了。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又开来3辆卡车要运送机器，见护厂队的枪口居高临下地对着他们，便灰溜溜地掉头走了。全厂的设备被全部保护了下来。

3. 护校

贵阳各大中学在“新青”“新联”成员的带领下，投入了以保护学校财产为主的护校斗争。贵大的“新青”“新联”成员报请学校成立“贵州大学学生

应变自治会”（下称“自治会”），借应变之名，以实现“自卫”“自济”护校的目的，将国民党当局的应变改为革命的应变，防止国民党势力对学校的破坏。

“自治会”制定了章程和保护学校的各项措施，并函请教授会、助教会、职员会推选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保护学校事宜，杜绝了国民党党团组织及学校训导处派人插手并掌握护校主动权的可能。

师院的地下党员和“新青”团员也迅速行动起来，团结动员一大批进步同学开展巡逻、保护学校的工作，严防国民党撤退前的破坏，自始至终未出现任何问题。

花溪清华中学的师生们在“新联”成员的带领下，组织成立护校队，昼夜站岗，驱散了多批到学校抢粮食的国民党溃兵。永初中学的学生每人发了童子军棍，准备了大量石头，严阵以待，随时迎击前来破坏的特务。中山中学的校长弃校逃跑，学生“自治会”便承担起护校的重任。

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便衣队闯入学校捣乱破坏。师生们便组织起来，将图书、仪器搬到教学楼上封存，将课桌、家具、电器搬到教学楼锁起来，把学校大门封闭起来，日夜守卫，直到解放军进城。

由于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精神已深入人心，贵阳地下党在贵阳的学生中已形成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各个学校师生都行动起来投入护校斗争，使贵阳公、私立学校均未遭到破坏。

六、万众欢腾迎解放

1949年9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下称“五兵团”）从上饶出发，开始了向大西南的历史性伟大进军。部队经南昌、长沙，于10月上旬到达湘潭。

根据中央和二野前委的意见，“五兵团”召开会议，酝酿由苏振华、杨勇、徐运北、郭超、申云浦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委员会，苏振华任书记，报请中央批准。同时，决定将1700多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

10月20日至27日，“五兵团”在到达邵阳后，召开了师级以上干部和中共贵州省委成员联席会议，再次明确进军的总任务是：解放贵州，然后支援解放大西南；步骤是：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接管城市，收缴武装，安定秩序，随即接管农村；斗争策略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

在邵阳，“五兵团”在讨论解放和接管贵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时，根据中央关于“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造”的接管政策，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接管要包下来，对留用人员，要给工作，给饭吃，教育他们为新政权服务；第二，必须坚决打击顽抗的残余匪帮和顽固势力；第三，认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分化敌人，扩大团结面，搞好接管工作。

强调要发现并团结民主人士，扫除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依靠和发动工人群众迅速恢复工矿企业生产。会议还传达了中央关于增补陈曾固为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的指示，同时决定了一些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和地委、军分区、专署的人选，委派秦天真、汪乃贵、杜恩训、朱煜如（不久由肖岗接替）、夏页文5人组成中共贵阳市委，秦天真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杜恩训任副市长，并决定从军队中抽调110多名干部接管贵阳。

在军事上部署了入黔作战计划。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入黔作战的具体方案：“一刀子插到贵阳”，先攻占黔东南和贵阳，接着直驱遵义、毕节，以大迂回之动作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大道，决定以第十七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

11月1日，川湘鄂边作战和黔东作战同时发起进攻。当日，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一面发表动员文告，“贵州保卫战序幕拉开，希望全省军民共同奋斗到底”，并宣称“黔省地险天堑，可单独与共产党作战”；一面做好了仓皇出逃的准备。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土崩瓦解，解放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11月12日，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在马场坪的甘粑哨新街截获由柳州、独山经都匀企图逃往贵阳的国民党联勤总部汽车36辆。部队在

准备乘车向贵阳开进时，还通过长途电话向贵阳电信局职工询问贵阳情况。贵阳电信局的值班员接到解放军的电话后，激动地说：“谷正伦、何绍周都逃跑了，欢迎你们赶快来。”

11月14日夜，解放军经过入黔以来十多天的千里大追击，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贵阳油榨街。

11月15日，五兵团十七军五十师进驻贵阳，贵阳宣告解放。

14日夜先期抵筑的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连夜乘车前进，于15日拂晓前攻占清镇，巩固了贵阳外围，保证了贵阳的安全。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为标志，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在贵州统治的覆灭。

贵阳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贵阳各族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标语贴满了贵阳的街头巷尾，振奋人心的爆竹声持续不断。

地下党员肖良汉、郑亚宇等人，为了让广大市民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解放军的动态、城市治安等问题，就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义，以号外的形式编出《解放快报》第一期，铅印5万份，于15日下午3时与广大市民见面，上面刊载了“人民解放军昨晚开抵贵阳，今日已继续西进穷追国民党匪军”“维护贵阳治安，市民注意事项”“解放军入城花絮”等报道。16日、17日又连续出版了《解放快报》第二期、第三期，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告中小学教师书》《欢迎歌》及卢焘先生遇害的报道，还刊出邮电、交通、电厂、自来水公司照常作业的报道，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11月17日上午8时，接管贵阳市的部队举行入城仪式，成千上万的工人、职员、学生、市民齐集南门外，结队欢迎。贵阳电厂的职工抬着毛主席画像，举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电信局的职工深情地唱起歌曲《你是灯塔》，表达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中华路大十字街心竖起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团结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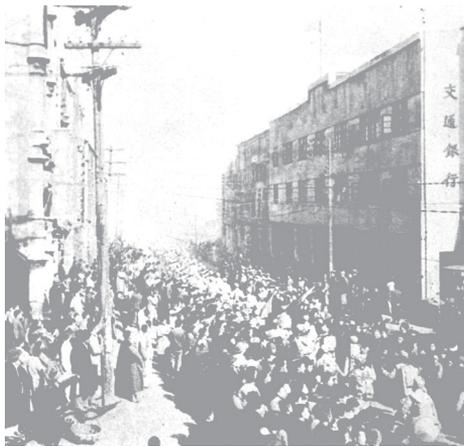
11月17日，中共贵阳市委主要领导随军抵筑，开始工作。

12月18日，贵阳市工农兵学商与各机关团体和附近苗族、彝族同胞6万余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大会。大会首先向毛主席致敬，向死难烈士致哀。接着苗族和彝族同胞、电气公司职工、商业及同业公会等先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及贵阳市军管会献旗，旗帜上分别写着“人民解放军是苗彝人民的救星”“导向正确的新途径”“民众武力、军民团结”等字样。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苏振华在讲话中号召全体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肃清隐蔽敌人，建立革命秩序，希望全体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坚决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

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秦天真、学生代表、苗族彝族同胞代表、工人代表、市民代表、商会代表、教育界代表都相继讲话，表示要团结起来，警惕残匪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大游行。在游行队伍中，屡建战功的炮兵部队最引人注目，汽车拖着缴获的美制榴弹炮，战马拉着野炮和山炮，在鲜红的国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后徐徐前进，群众不时发出欢呼声，充满着对子弟兵的敬爱和解放后的喜悦之情。



贵阳人民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贵阳各族人民向解放军敬献红旗

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即，召开了旧政府市属机关人员大会，宣布接管命令、军代表职责、对旧人员的政策和交接中的具体要求，责成旧市政府各单位负责人办理移交。

贵阳市的接管工作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于25日派出24名军代表、138名联络员组成16个接管小组，分别接管了旧市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公安、法院等机构，以及9个区政权。因国民党贵阳市市长张致祥在11月9日随谷正伦逃离贵阳，改由旧市政府主任秘书徐泽庶办理移交。到12月底，全市的接管工作基本结束。与此同时，将原来市属9个区划为7个区，相继建立了区委会和区人民政府。

11月24日，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斗在贵阳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贵阳特别支部，与进城的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接上关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将贵州地下党党员名单交省委组织部部长郭超接收；朱文达将“新青”团员名单交团省工委书记汪行远接收；朱厚泽将中共贵阳特别支部和“新联”的关系交省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连治洁接收；肖良汉、郑亚宇亦向贵州军管会刘星报到，投入了新的工作；涂月僧等人的关系亦由肖岗向省委作了汇报，李思源由华中局安排新的工作，涂光弧留在十七军工作，涂月僧调军管会工作。

链接：

“双十一惨案”

解放战争时期，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和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在贵州设有公开和秘密两重系统，并由南京、重庆调来一大批特务聚集贵阳。

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的特务编制，于1948年11月陡然增加七倍，加强了情报研究工作。为强化决策机构，处理所谓的“特种重大案件”，“贵州省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黔特会”)由谷正伦亲自主持，省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及情报处长、省党部主任委员及调查室主任、民政厅及教育厅厅长等参加。“黔特会”2至3周召开一次会议，交换情报，汇报案情，制订行动方

案。1949年3月，因修文事变爆发，“黔特会”停开以后，所有“特种案件”都直接由中统、军统签呈省主席谷正伦处理。

谷正伦到任后的一年半任期内，网罗党羽，任用亲信，企图在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崩溃之际，以贵州为基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策划“应变计划”，制订“贵州总体作战方案”，同时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破坏地下组织，图谋“净化”贵州。

1949年夏，一场大逮捕从贵阳开始，不久遍及黔省各地。这场逮捕从花溪贵州大学、清华中学下手。

由四川涪陵来贵大借读的学生陈默，因在学校召开的团结晚会上教同学扭秧歌，引起特务注意，认为他负有秘密使命。5月30日，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情报处特务在花溪公园门口将他绑架。

6月初，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在“花溪小憩”设立指挥所，对贵大师生伸出血手，先后逮捕“新联”成员甘凌杰，贵大教授丁道衡、陈述元，助教金春祺，清华中学教员肖醒球等师生员工30余人。贵大学运领袖史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掩护下逃离花溪。7月1日，特务追踪至安顺范永发家，将史健胸部、足部击伤后逮捕。

6月17日深夜，隐蔽在六广门杂货店（“新青”的地下联络点之一）的地下党员倪嗣文带着进步书刊行经中华中路时，被省会警察局二分局视作小偷，拦截检查，发现倪携带进步书刊，当场将其逮捕。次日，“新青”团员肖元乾和店员马毓藻同时被捕，杂货店被查封，牵连被捕者10余人。

6月23日，中统“特情”肖开勤发现王启霖的行踪，派军警特务搜查白沙巷王宅，捕走王启霖、刘家祥夫妇，年仅1岁的女儿思梅亦随妈妈进了牢房。特务还逮捕了由黔北调来贵阳工作的地下党员谢焕耀。王启霖被捕后，谷正伦除增加特务活动费外，又增拨中山公园蔡唐二公祠为中统调查处监狱。此后，案情逐步发展，凡与王启霖接近者均属侦捕对象，先后被捕者有乐恭彦、肖家驹、郭可诨等四五十人。



为严密控制公路运输系统职工的言行，内政部调查局西南区办事处在西南公路运输总局第十运输处（下称“十运处”）设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调查室，1949年8月扩编为川滇黔铁路公路调查处。

贵阳解放前夕，“十运处”的特务组织与贵州调查处的特务合谋，先后在贵阳、重庆、昆明逮捕进步工友22人，其中关押在贵阳的有陆永忠、黄厚文、徐绍敏、何自达、邱淑镒等人。

大逮捕从贵阳逐渐扩大到省内20余专县。从5月至11月，仅贵阳地区被捕的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志士就有90余人。被捕者主要关押在文昌阁、鸭子塘和中山公园监狱。这是“黔特会”和军统专为关押政治犯而设的秘密牢房，内情鲜为人知。

鸭子塘监狱坐落在贵阳岳英路，原系陈孝子祠堂，背靠大西门古城墙。狱中阴暗潮湿，暑天砖墙上也会结硝霜。公开挂的牌子叫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战时青年招待所，实系“黔特会”看守所。内有3间大牢房、1间小牢房、3间黑牢房，以及审讯室、狼犬室、宪兵室、所长室等。院内除大牢房有狱吏守门外，还有巡逻哨，大门口设双岗，戒备森严。

中山公园监狱，设在公园侧门入内的蔡唐二公祠内，是国民党内调局贵州调查处看守所。监狱中四壁无窗，中间为巷道，两排分隔成5间牢房，牢房尽头，毗连1间长方形的大屋子，系刑讯室。管理中山公园的特务是中统贵阳区主任曾映贤，他是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动辄对政治犯施以酷刑。

国民党特务滥捕无辜，使监狱人满为患。十几个平方米的牢房，竟拘押10余人，要像木楔似的交叉插入才能躺下。牢饭每顿只有一小碗，饭里杂有老鼠屎、绿霉和砂石，难以下咽，勉强维持性命，没有蔬菜副食，也很难吃上食盐。

如此牢狱生活环境，加上严刑拷打和精神摧残，不少志士惨死狱中。地下工作者李谦，身患肺病，既无医药，又缺营养，几经刑讯折磨，被迫害致死。和成银行经理韦文莹，为拒绝特务的敲诈，也被诬指为异党嫌疑逮捕入狱，备受折磨，愤然撕下枕头布吊死床头。

贵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陈述元，被捕后历经百日监禁，侥幸得释，曾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题为《血海深仇》的诗歌：“离别了年迈爹娘，来自天各一方，非刑种种苦难当：坐飞机、上双杠、石灰水、‘辣子酱’，还有那‘茅台酒’给你尝……这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愤怒控诉。”

反动派由于已处于穷途末路，对革命者的镇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志士们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出卖同志和朋友，虽遭长期折磨而不动摇决心，坚信革命必胜是他们的巨大精神支柱。

刘端模的祖父刘少樵与谷正伦是远房表亲，八姑父胡一民又是谷正伦的机要秘书。刘端模被捕后，经亲友托情，谷正伦有意开释，要他具结悔过。刘端模宁死不屈，在“悔过书”上大骂国民党腐败，祸国殃民。

贵大领导史健遭枪伤被捕后，在狱中又被施以压杠子、烙胸部、夹手指、灌石灰水等酷刑。他对难友坦诚地说：“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酷刑，我没有组织关系，绝不牵涉到任何人……”

对审讯他的特务朱肇基则大义凛然地说：“若要杀我，任你等栽诬；否则，绝无其事。”其正气令特务瞠目结舌。

王启霖在狱中被刑讯10余次，每次提审回牢房时，都被折磨得脸色苍白，步履蹒跚。因多次受刑，两腕伤痕斑斑，两腿染满血渍，胸前还有一个项链形的创伤。牺牲前两个月，他告诉难友，他没有供出任何人，也不幻想会被释放，但相信自由是会得到的。他经常鼓励难友坚持斗争。

与王启霖一起被捕的谢焕耀，是省工委书记张立从黔北调来贵阳工作的地下党员。敌人向王启霖追问谢的来历和身份时，王启霖始终只承认谢是重庆乡建学院的学生，是探亲路过贵阳来看望老师，掩护了谢焕耀同志，使谢免于难。

宋至平是省工委撤离贵阳后，留在贵阳坚持工作的“新青”负责人。他掌握的关系很多。敌人已查知他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便软硬兼施，用各种狡诈伎俩企图诱出口供，宋至平同志坚定不移，保护了组织和隐蔽下来的许多同志。

郭谨诚被捕时，敌人曾从他家中搜出第十运输处的财产、车辆统计表，这是李邦永提供给他的情报。敌人追问时，郭谨诚一口咬定是自己“偷”的，宁冒被敌人枪杀的危险，也绝不出卖朋友。

曾任《力报》总编辑的顾希均，因背部受刑过重，只能俯身睡觉。他被戴上脚镣，虽疼痛难忍，却不皱眉头，体现了坚韧不拔的意志。难友们为了了解外面的情况和战斗形势，常常利用放风倒马桶的机会，在垃圾堆里翻捡残缺的报纸。顾希均使用罐头皮做成笔尖，根据这些残缺的报纸写时事剖析，供监房难友们传阅。

有的难友手边藏有《左传》《诗韵》《李杜诗选》和一些英文书籍。他们胸怀大志，不甘沉寂，组织自学英语、经济学、新闻学，或作诗填词，锤炼着斗志。

许多难友以其旺盛的斗志而给同监者留下深刻印象。乐恭彦、刘家祥组织难友唱歌、做游戏、打小皮球、练太极拳。

聂汝达用私藏的剪子为难友理发。彭祖年告诉难友：“罢课的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发光发热最为强烈的一段，将来哪怕被杀死，我也死而无怨！”

金芳云在酷刑拷问时厉声痛斥：“你们这群狗！等待人民的审判吧！”狱中经常可以听到难友们感人肺腑的细声哼唱：“度过寒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不要为枯枝失望，鲜花就要开放！”

在敌人监管严密、岗哨林立的中山公园和鸭子塘监狱，革命志士还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进行了两次越狱斗争。“十运处”进步工人邱叔镒被捕的第三天，利用放风时间，推倒厕所篱笆，从靠近中山公园的民房窗户中逃出。地下党员张春涛利用放风时间，趁鸭子塘监狱的看守集中于前院时，鼓励同监难友李邦永说：“快解放了，关着是死。这机会难得，跑吧！”两人迅速爬上屋顶，揭开瓦片，沿民房逃出牢笼。虽然他们再度被敌人捕回，但其坚韧的斗争精神，却使难友们深受鼓舞。

经过狱中难友坚持不懈的斗争，国民党特务没有达到压制和软化革命者

的目的。在他们濒临覆亡之际，终于拿起屠刀，对这批爱国志士进行了血腥屠杀。

反动当局的屠刀首先对准了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影响较大的学运领袖史健。

1949年9月28日，贵州省保安司令部以“参加叛乱组织，煽动学潮，从事叛乱”为名，并捏造了“在贵州大学杀害学生李志远”等“罪状”，将史健捆绑在黄包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杀害于马家坡。

史健遇害后三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从公开杀害史健到贵阳解放为止的一个半月里，国民党贵州当局又先后5次在贵阳秘密杀害革命志士共42人。

10月4日深夜，王启霖、宋至平、岳景琮、张春涛、郭谨诚、蒋士忠等9人被活埋于贵阳北郊八角岩侧关刀岩下。

10月中旬，杨光文、廖崇美、金春祺、彭祖年、陈默等7人被秘密杀害于贵阳南郊图云关。

10月下旬，肖元乾被秘密杀害于大西门外的荒郊。

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逃离贵阳前，批阅了省保安副司令、代省主席韩文焕提供的大屠杀名单。

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国祯到韩文焕家，韩匆匆拿出处死者名册要他签字，说是谷正伦批阅过的亟待处理的案件，黄国祯签字后，当天中午，特务们即从鸭子塘和中山公园监狱用卡车押解24位革命志士，分别杀害于沙河桥和马家坡。

在沙河桥殉难的烈士有：张凤鸣、杜蓉(女)、金芳云(女)、陈开秀(女)、毛克诚、高言善、陆永忠、黄厚文、徐绍敏、何自达。

在马家坡殉难的烈士有：乐恭彦、刘家祥(女)、戴绍民、顾希均、刘端模、王天行、袁克勤、郑德霖、黄英琪、张乾、聂汝达、柏辉文、王永年、唐正福。

在沙河桥边殉难的革命志士被警察草草挖坑掩埋，殉难于马家坡的革命志

士则被弃尸荒野。

“双十一惨案”前后，全市人民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护城、护厂、护校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以满城光明迎接了解放。在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时，人们清醒地记着：这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我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地来捍卫它。

卢焘——撑起危局，功在筑城

1882年9月1日，卢焘出生于广西宜北县(今环江县)一个农民家庭。

青年时期，我国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卢焘耳闻目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民族的深重灾难，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1904年8月，卢焘在庆远投济字营龚捷三统领的幕中做事，结识了张铁城，两人朝夕聚谈，渐闻革命事。1905年，张铁城加入“同盟会”之后，介绍卢焘参加，两人一起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他们先在怀远(宜山)创办半夜算术科，后在罗城县开设竞化学堂。革命党人易麦秋、陈晓峰等纷纷应聘到学堂任教，宣传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

1907年，孙中山和黄兴共谋在南方起义，卢焘和张铁城积极响应，在柳州以开办樟脑公司和富贵升旅馆作掩护，广泛联络各地反清同志，扩大队伍，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可惜，他们从香港密运武器返柳州途中被查出，遭清政府下令通缉，起义未成。为躲避追捕，张铁城出走奉天，卢焘辗转到达昆明，欲继续革命。

1909年，卢焘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李云鹤、范石生等，共同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秘密传阅《洪秀全演义》等书籍，鼓舞同学们的革命勇气。

1911年，卢焘于讲武堂毕业，正值武昌起义，云南响应独立，他在蔡锷部任独立大队队官，出兵援川，转战于泸州、重庆间，为促进四川独立贡献了一份力量。

1914年，任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团团副的卢焘，与团长王文华和其兄王伯群，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终究要恢复帝制，为应付突发事变，必须掌握武装力量，培养军事骨干。

1915年4月，卢焘邀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璜、范石生等10余人相助，成立了新军模范营，他任营长。12月，袁世凯卖国。为挽救共和，反对复辟，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人民共同“戮此民贼”。护国军兴，人心大振。1916年1月，滇、黔两省护国军誓师北伐。王文华为东路支队司令，出师湖南。卢焘任团长的第二团为东路左翼，进兵湖南溁头司，击溃北洋军第六师，攻克麻阳，迫使敌师长马继曾自杀，黔军威名大振。

1917年护法运动，贵州通电拥护。卢焘时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奉命出师湘西辰州，与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相遇于桃源。冯玉祥虽为北军，但不愿与孙中山先生为敌，致信卢焘，提出希望免战，和平相处。卢焘信相约“剿匪保商，安境息民”，为冯所采纳。从此，彼此通信往来三年，结为莫逆之交。

1920年10月，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去职赴沪，由卢焘代理总司令。次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卢焘奉孙中山电令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1923年2月，卢焘在广东协助范石生部向叛军陈炯明部进攻，迫使陈在滇桂军的合击下退出广州。其时他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干，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恰逢他的老母病故，他离开广州，息影于贵阳北门外“半日山庄”，在家守制。

1924年10月，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在重庆准备兵分五路回黔，驱走滇军唐继虞(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兼省长)。为避免战祸，卢焘出面调停，日夜奔忙，促使袁祖铭和唐继虞达成协议，和平解决，使贵州免遭一次战祸。后来，他又致力于发展贵州的公路交通事业，亲自去桂粤聘请工程技术人员，从香港购买汽车，大力组织修建贵州境内的3条公路干线。

对于共产党的事业，卢焘一直持同情态度。

1928年，朱德带部分起义部队由广东转战湘南，派王佐带信请卢焘与范石生联系，让范不要与红军为敌。卢焘接信后，即写信给范石生说：“大家同学，不必为敌也。”并希望范石生设法接济朱德军火物资。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时，卢焘将大洋一万元汇寄淞沪前线慰问十九路军。1936年五六月间，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起倒蒋运动，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鉴于日寇已侵占东北和华北，已显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为顾全抗日大局，卢焘即赴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三次会晤，劝说他们大敌当前，要以团结为重，共赴国难，如果一味同室操戈，祸起萧墙，必遭外侮。经他奔走调停，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向南京议和。

同时，卢焘于广西南丹组织了“贵州抗日救国军”，以支持广西当局，形成逼蒋抗日之声势，并且通电冯玉祥、李烈钧、何应钦和程潜等人，呼吁和平。这些倡议和措施受到各方欢迎，南京方面派程潜、朱培德、居正三人飞往南宁议和，达成和平协议，一场厮杀被制止于萌芽之时。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国民党贵州当局制定“应变计划”，成立所谓“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特聘卢焘为委员。次日，卢焘退回聘书，并在家中笑谈：“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失掉民心，必亡。共产党得民心，必胜。如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府当局自身难保，何以保民？这是自欺欺人啊！”

中秋节前后，解放军二野司令部芷江工作组派侦察员化装成湖南商人到贵阳，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地下党联络员赵和璧两次密访卢焘，希望他出面联系地方人士，为解放贵州出力，他欣然表示接受。

当时，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韩文焕策划毁灭贵阳，指派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实施。

11月10日，国民党部队及其党政机关逃离贵阳，全城处于“真空”状态。关键时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宣告成立，公推卢焘为主任。他任

取后，整天奔走呼号，防御和抵制种种破坏活动。

13日，刘伯龙在逃跑途中折回贵阳，指责卢焘等人不该搞治安委员会，并要卢焘马上筹集20万银圆作为他的军饷，卢焘当场拒绝。14日上午，刘伯龙借开会之名，将卢焘从家中挟持上车，行至贵阳二桥转弯塘时将其杀害。

贵阳解放后，全市各界人士和群众隆重举行了解放贵州死难烈士和卢焘的追悼会。

哀悼卢焘的挽联、挽诗、唁电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来。朱德和李济深发来唁电，杨勇和苏振华等送了挽联，称道他“为社会而牺牲，先生堪拜”，“起撑危局，功在筑城”。对卢焘的崇高品德和牺牲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深切的缅怀。

卢焘，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他一生热爱祖国，支持进步事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贵阳解放前夕，他拒绝出任国民党所聘“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却满腔热情地担任迎接解放的“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由于他和全市人民的努力，贵阳市的工商界资金没有外流；公职人员保护了档案和国家财产，等待解放，听候量才录用；贵阳市没有发生大的骚动和破坏。

杜蓉——身居斗室，心系革命

1923年的重阳节，杜蓉出生在贵阳市一个贫苦的家庭。

杜蓉在进入省立贵阳女子中学（下称“女中”）读书时，受国文教师王诗农的影响，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王诗农倡导自由评议时政，开阔了杜蓉的视野，革命的种子在她的心中发芽。

杜蓉参加了筑光音乐会，和同学们一起，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传递、阅读进步书刊，发展筑光会员，她还女扮男装登台演唱山歌剧《送郎打日本》。杜蓉喜欢朗诵诗歌，和同学们泛舟花溪河上时，她站立船头，沐浴着月光，朗诵臧克家的诗句：“十月的天空布满了雁行，排成人字，飞向温暖的南方……”接着她激动地说：“我也要插上理想的翅膀，飞向真理的战场！”

杜蓉的一举一动，表露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

中共“女中”党支部书记刘家祥，长期观察杜蓉后，对同一支部的杜龙源讲：“杜蓉不错，要注意培养。”杜龙源有意识地接近杜蓉，还给她交办一些事情。后来，杜龙源又曾几次提出介绍杜蓉入党，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上级通知成暂停发展党员，杜蓉才没办成入党手续。不过，党组织对杜蓉很信任，已经从“女中”疏散转移的杜龙源，因有要事又秘密回到花溪，就住在杜蓉家，对外的一切联系都由杜蓉承担。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

在“女中”，敌人也加紧了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一些党员师生开始疏散转移，刘家祥同志被学校勒令退学。杜蓉便与留校的个别党员和进步同学一起坚持斗争。她们秘密读书小组讨论时事的记录本被学校搜走，杜蓉只身一人，镇定自若地进入校长室，巧妙地抽走那个本子。有个教师给她们班出了一个带有反动性质的作文题，杜蓉带头不写。因她平时与班上同学很团结，有一定威望，全班同学也都不做题，学校又查不出带头人，只好不了了之。

1942年，杜蓉在“女中”毕业，和同学程敬学在茶店小学教书，并与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于是在朋友朱文达的陪同下，和程敬学一起到距贵阳六十多公里的开阳县枇杷哨陶祖元家暂避。一路上，一会儿瓢泼大雨，一会儿烈日当头，三人足踩泥泞，低声唱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步行两天才到达目的地。

1942年秋，杜蓉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社会系。她更加勤奋地钻研历史，并结合历史批评时政。她在壁报上发表的《评武则天》，说理透辟，言辞尖锐，思想激进，很引人注目。

杜蓉在花溪时，由于经常蹚水过河上学，受了风寒，两腿落下病根。后来生活又不安定，病情逐渐加重，到她考入大学后不到半年，就行动艰难，只好休学回家。1944年冬，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一片混乱，她的腿疾转危，到中央医院(今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时，因许多医生和重要医疗器材已经转

移，她不得已截除了双腿。

一下子难以接受的杜蓉，曾想用药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战友们的开导启发下，她把病床当成战场，谱写了自己人生史上璀璨的篇章。

杜蓉伤残以后，用假腿练习走路。但是，两腿向前挪动一两步，伤口就疼痛难忍，满头大汗，有时竟磨破膝盖周围的皮肉。她从不在他人面前流泪，总是满怀信心地说，要争取重新站立起来，独自行走，革命胜利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杜蓉不为自己和家庭的不幸沮丧，却为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遇害而悲痛万分。

一次，她听说贵州大学一个学生背着斩条游街示众，竟潸然泪下。随即她唱道：“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愿你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刚开口唱，她就哽咽起来，然而，她还是流着泪唱完：“开遍中华！开遍中华！”杜蓉用《棠棣之花》中这首悲壮动人的插曲遥送战友，安抚英灵。

杜蓉身居斗室，却心系广阔的世界，情系众多朋友。

战时中学的学生梅堃和司机陆永忠、黄厚文等都是她屋里的常客。他们给杜蓉捎来《新华日报》，带来外界的消息，同她交谈，离别时又从她这里带走书刊和歌单。朋友彭卢总是将弄到手的《新华日报》先拿给杜蓉看，革命的报纸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和鼓舞。她多次对朋友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能得到自己胜任的工作。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她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她对彭卢说：“革命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有10多个青年学生，从1946年到1949年杜蓉被捕为止，几乎每周六都在她房里聚会，交流思想、探讨学问、议论时政。

学生们热烈地谈论巴金的《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书中的悲剧人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并不明白这些人悲惨命运的根源。每逢此时，杜蓉就会讲书中的历史背景，讲人物的性格形成，指出书中的悲剧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或者俄国贵族社会的牺牲品。她还常借书给大家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的

《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

杜蓉截肢不久，朱文达去看她时，轻手推开房门，不禁呆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侧身坐在她的床沿，杜蓉半身盖着床单，正和小女孩头顶头地念英语单词：“Com—mu—nism……”（共产主义）认真而安详。朱文达盯着那盖着断肢的床单，一阵心酸，不禁流泪。杜蓉却爽朗地笑着说：“嘿！二十几岁的男子汉，又不是林黛玉！”她接二连三地问朱文达在农村工作的情况，就是不让朱文达开口问她。发现朱文达盯着她身上的床单，她猛地掀开：“切掉它，我自由了，也能工作啦！”

1949年初，经丁颖同志介绍，杜蓉加入了中共贵阳特支领导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接受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向周围同志宣传进步思想，讲国民党快要倒了，青年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支持共产党。

杜蓉订了一份《贵州日报》，当同学们围在她身旁时，她一手拿着地图，一手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做记号，边画边讲：“报上登载，‘××地方已经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共匪扰乱’，那就表明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了；报上登载‘××地方共匪猖獗’，那就是说那个地方已开展了游击战争。”有时她兴奋地说：“这么多地方都画上了红圈，革命力量发展得多快啊！”

杜蓉为贵阳中学的女学生办的壁报取名《燎原》。她和女学生们讨论妇女问题，为她们修改稿件，希望女学生们深刻理解平等的含义，探寻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及造成妇女若干悲剧的根源，启发同学们思考作为一个中国女青年应尽的责任。

1949年7月2日午夜，敌特闯入杜蓉家搜查，并且逮捕了杜蓉。

最初，杜蓉被关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与她同牢的一个同志年轻气盛，一进牢就绝食。杜蓉劝她，绝食没有用，反而弄坏了身体。要保护身体，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

后来杜蓉被转送到中山公园的牢房。她以女性特有的细心，精心照料同牢刑重的难友。当有人被提审时，她总是用慈爱和坚定的目光深情相送。夜间，

有同志被提审，她就一直等到同志归来，小心照料后才肯睡下。每当敌人追问有关组织和同志的情况时，她都拒不招供。中秋之夜，杜蓉在狱中带头唱起：“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将除尽，万丈光芒在前头！”

1949年11月11日，贵阳即将解放，敌人狗急跳墙，将杜蓉和其他一批难友杀害在贵阳北郊的土地上。

11月15日，贵阳解放了，人们从红边门外沙河桥挖掘出杜蓉的遗体。这个没有双腿的姑娘身中7弹，双眼已被挖去，身上留下被烧烙的斑斑伤痕，头骨不全。

在追悼会上，“女中”全校师生的挽联写道：烈血不虚抛为吾黔人民而死 正气应长在是我校同学之花。贵阳中学的挽联是：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生死 求真理求自由英勇可风。

杜蓉只活了26岁，她短暂的年华是丰盈的。她不愧为伤残者中的英雄豪杰，不愧为亿万妇女中流芳千古的忠魂。杜蓉的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王启霖——以笔为刀，字字锋利

1915年农历八月二十五，王启霖出生于贵阳，1933年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

当时的中山大学，一方面是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着校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控制，某些封建遗老遗少又大肆鼓吹读经复古。王启霖在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极为不满，对学校的坏风气也极为反感，曾在校内刊物上撰稿抨击“读《孝经》复古礼”之类的论调。加之他对所学专业感到志趣不合，于1934年休学，到上海、杭州一带见世面和自学文学。

王启霖读的书很多，特别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决心医治人民大众精神疾患的选择，对他的影响颇深。

1936年，他带着极大的希望去日本深造，先在东京学习日语，准备投考大

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热情回到广州，10月回到贵阳，随即投入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5年2月到1939年初，王启霖担任《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他利用文艺阵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春天，王启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他与何战白、蒋蔼如三名党员组成一个小组，由他负责，主持我党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社座”（即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在蒋蔼如随校迁往远郊花溪，何战白到卫生人员训练所工作以后，又值形势恶化，“社座”被迫转为秘密活动，王启霖排除艰难险阻，将“社座”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冬。

其间，王启霖同时负责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工作。1938年底，他与高滔、于治常作为分会代表，出席了中苏文协总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他还担任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1939年至1940年春末，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

1940年秋，疏散转移到桂林的王启霖与刘家祥结为夫妻。婚后，他们立即投奔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王启霖在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刘家祥在新三团政治处工作。

不久，他们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侥幸逃脱后去到香港。香港沦陷后辗转桂林、重庆、昆明、湖南衡山和贵阳等地，以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为掩护，利用讲课、讲演、组织读书会，以及同学交友谈心的形式，向青年学生灌输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王启霖的创作热情很高。他和妻子到达香港，刚一找到住房，就开始写作。由于在事变中和在流亡途中有了充分的构思，不到半年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与当时在生活书店工作的邵公文商量，定名为《煎》。文稿交当时任香港《大众生活》周刊编委的茅盾审阅，茅盾答应待夏衍的《春寒》连载完后即连载《煎》。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王启霖将《煎》的稿子藏在当地，不幸在战乱中遗失。

在香港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启霖夫妻取道澳门去广西。几经周折，刘家祥又在小木船上分娩。

1942年暮春，王启霖拖着疲惫的身体，携带产后数日而又患病的妻子，抱着初生的儿子思强，来到抗战后方的文化城桂林。一住下，王启霖不顾疲劳体弱，继续拿起他战斗的笔。白天时间主要花在照料产妇和婴儿上，夜间，当母子睡去，他便在昏暗的桐油灯下伏案疾书，半年后完成了《煎》的创作。当时茅盾也来到了桂林，《煎》又送到他的手上，由于国统区不能出版，他答应转交解放区。但在白色恐怖严重与解放区交通险阻的情况下，《煎》稿不幸再度遗失。

两次失去几十万字的稿件，这样令人痛心的遭遇，没有使王启霖有任何踌躇。

一个偶然的时机，王启霖和亲戚在桂林特察里路上，遇到前来纠缠的妓女，他的亲戚将妓女推倒在地，还说见了她们就恶心。王启霖却说该恶心的是使她们失去做人资格的肮脏社会。

这件事触发了他写一篇反映这一黑暗角落的小说的动机，得到妻子的赞许，又得到在《广西妇女》月刊工作的同学黄成养的帮助，两个青年妇女扮成男装，在夜间陪王启霖去到了一所“青楼”。鸨娘接过他们的钱，便把3个女人叫来。刘家祥她们脱下帽子，露出真容，并说是妇女会记者，6个人紧闭屋门，一直谈到东方发白，泪水湿透了她们的手绢。不久，王启霖在《广西妇女》月刊上发表了扣人心弦的短篇小说《迫害》。

1943年至1944年间，王启霖写成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原稿在重庆时经茅盾和他的好友王诗农看过，在给茅盾的信中，他还提到对这部书稿的修改情况，说原书名含义不明确，决定改为《苍山夷乱流》，可惜没有机会发表。1945年9月，他又以自身经历写成中篇小说《狂雨》，在送上海某杂志社的途中，不幸被朋友遗失。



王启霖从事文学创作，不是单纯的兴趣，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选定的一种战斗方式。他的作品脉搏，总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发表了《告密者》和《朋友，向我伸出你强力的手吧！》几篇短篇小说，无情揭露了汉奸的卖国罪行。

王启霖的创作指导思想和他的教育指导思想，同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在教学上，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希望同学们不仅得到知识，而且学会怎样过健全的生活”，也就是说，既要教书，也要育人。在文学创作上，他为青年一代呐喊，为被压迫者呐喊，他呼唤光明，他给人们鼓舞。他曾在《由自杀到自杀》这篇杂文中指出，要解决被压迫者自杀这类社会问题的日子就在不远了。抗战胜利后，他曾一度以为社会状况应该有所好转，然而，“再生活，再思想，封建势力的温床可曾捣毁？教育可曾有些儿新生？于是，便勉力写下去”。

《狂雨》手稿遗失之后3年，王启霖在教育界又经历了一些变迁。

在重庆一个寂静而酷热的日子里，他突然想起《狂雨》，连忙找出底稿，从头读起，仍感到烧灼着自己的心。他想：“这不也是在写目前吗？”他回顾往事，思量现实，认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实在太多，深信《狂雨》非个人呻吟。于是，为教育、为青年着想，他决心再次修改《狂雨》。

1948年8月，正值重庆最闷热的酷暑季节，王启霖住在友人王诗农处，每天一早，夹着稿子到罗斯福图书馆去，黄昏才回到住所。时经一月，将改好、订好的稿子交给王诗农。新中国成立后，当冯雪峰正在主编《文艺创作丛书》时，王诗农将《狂雨》推荐给他，随即被收入这部丛书，1951年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启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如此坎坷，然而，他是那样无私无畏、坚定热情地一往直前。

1949年初春时节，王启霖与妻子在贵阳家中度过寒假，起程回湖南衡山

师院去，途中被当时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张立留下，又返回贵阳。任务是同张鸣正、宋至平编辑出版地下油印刊物《真实》。他不仅从事编辑工作，而且还自己写稿，在第一期上就以“方江”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论革命者的思想学习》。

1949年6月23日上午，下着大雨，国民党特务闯进白沙巷王启霖家的宅院，查抄之后，先捕走王启霖，接着又捕走刚从外面回来的刘家祥。年仅一岁多的女儿思梅，也随妈妈进了牢房。王启霖夫妻在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理想、信念，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他们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刘家祥——一心为党，坚贞不屈

1922年9月8日，刘家祥出生在贵阳，1934年升入贵阳女中（下称“女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贵阳成立“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下称“学联”），刘家祥投入“学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贵州当局为镇压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于1938年2月19日逮捕“学联”骨干7人。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贵阳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慨，刘家祥与进步师生一道参加了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联”遭破坏后，刘家祥转入由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筑光音乐会”和“沙驼业余话剧社”，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无论是在街头演唱，还是到农村宣传，凡是“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所到之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和抗日救亡的歌声。

1938年4月，刘家祥经高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派遣，她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地方队部”（下称“民先”）。8月13日，国民党贵州当局借通知“民先”开会编队之名，再次镇压贵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一天下午，70余名“民先”队员在贵阳甲秀楼集合，高唱“民先”队歌，集队前往民众教育馆，当队伍走到民教馆时，遭到特务组织的反动学生的冲

击。当时刘家祥等排在队尾，被阻隔在场外，在混乱中，有人将“民先”的一捆待发的传单递给她，她将传单塞进衣服内，挽着另一名共产党员文宗秀，在人群中往来穿梭，悄悄地把传单散发到围观群众的手里，然后挤进会场，与同学们一起勇敢、机智地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斗争。

刘家祥在“女中”读书时，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还是篮球队队长，球艺精湛。她通过体育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把进步同学组织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篮球队的多数同学成为抗日宣传队的骨干。

在党的领导下，刘家祥组织读书会，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同学中的不同思想认识，分别向她们推荐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通过读书会这一组织形式，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39年“二四轰炸”后，“女中”搬到贵阳近郊花溪镇，这时刘家祥参加了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她利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的身份，团结进步同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在组织农村识字班活动中，刘家祥夜提马灯，往返于泥泞的乡间小路，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和文化知识送到农民家中。下半年，她担任了“女中”支部书记，这正是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贵阳地区也笼罩着白色恐怖。一天，学校训育主任找她谈话，劝她少参加活动，被她义正词严地驳得哑口无言。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干事会组织各校会员到花溪排练《黄河大合唱》，准备正式公演，“女中”会员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当局策划进行破坏。

当城内的“筑光”会员刚到花溪时，特务当场逮捕“筑光”负责人，宣布不准排练，第二天国民党省党部在报上勒令解散“筑光音乐会”。此时，刘家祥已被特务监视。临近高中毕业，学校宣布：“奉教育厅之命，勒令刘家祥退学。”这样，刘家祥不得不离开战斗学习了几年的“女中”。

离校前，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刘家祥将党支部的工作交给了杜龙源。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方针，决定将党内外有可能被捕杀的一批同志疏散转移外地，刘家祥与爱人王启霖撤离贵

阳到桂林，同年11月，他们又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王启霖被分到军政治部文化小组工作，刘家祥被分到新三团政治处工作。

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刘家祥夫妇被俘。押解的途中，他们利用给敌人扛稻草的机会逃脱。历尽艰辛又回到桂林，在共产党员邵公文和黄慧珠的帮助下辗转到了香港。

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刘家祥消瘦了，然而她受到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意志更加坚强，生活更加充实。为了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悼念死难的战友，鼓舞人民坚持抗日救国的斗志，她和丈夫商讨构思，王启霖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煎》的创作。

之后，在香港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夫妇离开香港，于1941年暮春又回到了桂林。他们夫妇二人立意写一篇反映黑暗角落的小说，得到王启霖在《广西妇女》月刊工作的同学黄成养的帮助。两个青年妇女乔扮男装，陪王启霖到一所青楼采访，鸨娘接过他们的钱，便把3个妓女叫来，刘家祥、黄成养脱掉外面的衣服、帽子，露出妇女真面目。她们向妓女说明是《广西妇女》月刊的记者，6个人紧闭房门一直谈到天亮。

不久，《广西妇女》月刊发表了王启霖为被压迫妇女呐喊的动人心弦的短篇小说——《迫害》。

1945年至1947年，刘家祥夫妇在重庆。王启霖在民兴中学和乡村建设学院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领导下的学运工作，刘家祥从各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1945年上半年，王启霖的姐姐王紫非由延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请他查访王启霖夫妇的下落，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到延安学习或工作。王若飞回信说，你弟弟和弟媳已经找到，党的关系已经接上，因为工作需要，现在不能去延安。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重庆大肆逮捕，王启霖与其他30余名乡村建设学院的进步师生遭到逮捕。不久，经营救

获释，在组织的安排下，一家人到了昆明，王启霖在昆明南菁中学教书，继续从事学运工作，刘家祥以师母的身份与学生交朋友，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48年秋，他们带着孩子到湖南衡山国立师范大学任教。

1949年春，一家人回贵州省亲，在返回湖南的途中，刘家祥夫妇与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相遇并接上了组织关系。张立要刘家祥夫妇留在贵阳工作。王启霖协助宋至平、张鸣正等办省工委刊物《真实》，刘家祥负责交通联络和文件保管。刘家祥接受组织分配的工作之后，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奔忙。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特务闯进贵阳市白沙巷王启霖家，逮捕了王启霖。刘家祥闻讯返回家时，也遭暗藏的敌人逮捕，连一岁的女儿思梅也一起被带走，关在岳英路监狱。

在狱中，刘家祥多次遭受酷刑。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她向女难友们宣传“天快亮了”，鼓舞大家和敌人作斗争。

一天放风时，有人从垃圾堆上拾到一小张破报纸，从“国军在我省边境节节胜利”的字里行间，知道解放军已进抵贵州。消息很快在狱中传开，刘家祥抱着女儿思梅向同志们点头微笑，表示已经知道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

1949年11月11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贵阳山城之际，敌人对关押的一批同志下了毒手，刘家祥殉难于贵阳南郊马家坡。

金芳云——严守秘密，掩护同志

1928年农历八月十七，金芳云出生于贵阳市乌当区。1944年，她提前一个学期考入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下称“女师”）。

金芳云的父母是文盲，认为一个女孩子长大了就要嫁人，不需要多少文化，认得几个字就行，读那么多书干啥，多次阻挠其上学。为了得到父母支持，金芳云每天尽量多做些家务事、打草席，把卖草席的钱用来缴学费，每晚打席子到深夜。

接着，金芳云就亮着一盏菜油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阅读大量进步文

学书籍，看了鲁迅、巴金、艾青等人的作品。父母看她废寝忘食地学习，自己解决学费，加之亲戚好友劝说，终于同意她继续读书。

随着年岁增长、知识增加，金芳云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有了一定的看法。那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抓丁派款是常事，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家，越能凭借势力逃避，越是穷苦的农民，越是遭到沉重的压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些事更增加了她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恨。

抗战胜利之后，金芳云和伙伴们为了便于学习，租了一间小屋，大伙居住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金芳云参加了国统区的地下工作，承担起了支援解放区的任务。

1946年下半年，损害中国航运等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签订。金芳云参加由金礼文、肖元良组织的反对签订《中美商约》的斗争，并在女师同学中进行宣传鼓动，揭露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罪行。

为了帮助赴解放区的同志筹集经费，她与伙伴们毫不吝嗇，节衣缩食，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菜是辣椒拌盐巴，连仅有的换洗衣服都拿去典当了，把凑集起来的钱，全部捐助给去解放区的同志。

1947年夏，金芳云从女师毕业，到贵阳实验小学任教。1948年4月，刘永在重庆向中共黔北工委书记张立汇报了金芳云等一批进步青年的情况，金芳云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贵阳担负与郎岱的联络工作。她们的联络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后来以“神仙洞”作为这个联络点的代号。

1949年3月，张立亲自发展和批准金芳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4月，由于工作需要，张立派金芳云到镇远执行任务：通知郎岱暴动领导人王舍人转移至盘北游击队。当时，从贵阳到镇宁沿途笼罩着白色恐怖，交通要道设卡盘诘，气氛紧张。金芳云沉着机智，勇敢大胆，顺利地通过了一道关卡，最终完成了任务。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要冒极大危险，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金芳云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经常考虑的只是战友们的安全，时时处

处替战友们着想。她常利用公开的教师身份作掩护，把党的文件和革命理论书籍捆扎包装成教学书籍，运送进城。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张立决定将“神仙洞”联络点成员逐步疏散去游击队工作，指示金芳云完成通知地下组织同志转移的任务后立即离开“神仙洞”。

7月9日深夜，坚持到最后时刻正准备转移的金芳云由于被特务跟踪，不幸被捕，关押在中山公园监狱。

在狱中，敌人哄骗诈诱等手段不生效，就用竹签钉进金芳云的指甲里；用子弹壳卡在她的手指之间狠命地夹，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痛得咬破嘴唇，晕厥过去。她始终咬紧牙关，总是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但只有我一人”，始终不暴露其他同志。

残忍的敌人急于得到口供，把金芳云作为重点，卑鄙地扒光她的衣服，将电流通到她全身，她凄厉地惨叫，全身抽搐，昏倒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再施电刑。

最后，敌人使用最残酷的“烙刑”，用烧红的烙铁烙金芳云的身体，她大义凛然地呵斥：“你们这群狗，等着人民的审判吧！”

敌人反复的侮辱和酷刑摧残，终究没有使金芳云屈服，无法从她口中得到“材料”。

尽管金芳云受尽侮辱折磨，任凭敌人怎样残酷拷打，她始终牢记党的教导：“宁愿牺牲自己，也决不出卖同志。”

1949年11月11日，敌人实行“双十一”大屠杀，金芳云在敌人的大屠杀中就义于沙河桥，年仅21岁。

宋至平——血沃金筑，长颂英名

1916年，宋至平生于湖南省原湘阴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宋至平决心投笔从戎，考入长沙军械人员训练所，结业后被分配到设在浏阳的兵工署第七军械库工作。

1938年5月，宋至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冬，长沙大火后，宋志平偕未婚妻李兰瑞，随第七军械库到贵阳，在太平路租了间民房居住。

宋至平在第五分库任中尉库员。这时，他与贵阳地下党组织尚未建立组织联系，因此，他在库内独立活动，与刘震白、路景彦、吕祥华等几位比较进步的年轻军官接近，经常把自己保存的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看，并向他们介绍说：“到城里生活书店或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店员不会赶你走的。”

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宋至平准备给军械库的士兵上文化课，便让刘震白联系其担任分库长的姨父段微模。段微模碍于情面，同意了宋至平的请求。宋至平给库兵上课非常认真，而且又有耐心。除了教库兵们识字外，还讲时事，讲政治。

一次，段微模把刘震白找去，质问刘震白宋至平为什么讲共产主义，刘震白以孙中山先生说的“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为由搪塞，段微模无言可答。后来，刘震白离开了军械库，段微模便向总库长告密，说宋至平是共产党。总库长焦东山倾向进步，为避嫌，把宋至平调到遵义第二军械库。

1940年8月，宋至平到了遵义。第二军械库与内迁的浙江大学相邻，宋至平很快和浙大的一些进步同学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活动，引起了军械库负责人的注意，他不得不离开遵义。

1942年8月，宋至平辞去库职，转移到开阳县，在县立中学任教导主任，引导学生建立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籍。

不久，宋至平打入国民党开阳县党部任秘书。当时张学良将军正被软禁在开阳县，宋至平教过的学生在一次郊游中与张学良有所接触，引起特务对宋至平的怀疑。1943年3月，宋至平返回贵阳，住在同乡傅崇佑处。通过同乡的关系，宋至平在省政府财政厅会计处谋到个职务。由于他办事能力强，几个月后被升为股长。

在此期间，宋至平认识了在财政部贵州直税局工作的罗迅青和在西南公路

局工作的周邦立，以及印刷工人张世品三位地下党员，之后，他们组成了临时党小组，宋至平任小组长。

遵照南方局制定的“三勤”方针，他们广泛搜集情报，秘密翻印和散发我党的重要文件和材料。为了地下斗争的需要，他们研究了两种通信密码。宋至平拟定了嵌格通信法，周邦立拟定了电报密码。

1943年六七月间，打入国民党电台活动的共产党员梁宜苏调桂林途经贵阳时，在张世品住处与临时党小组的同志商讨密码的编写问题。宋至平等还请梁宜苏将密码带去桂林交给浙大毕业的许良英，因为他们曾邀许良英一起在贵州山区打游击。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宋至平对学习非常认真。在贵阳时，他经常出入贵州省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即便是外出接头，口袋里也都有文学作品或古典诗词之类的书籍。在家里或宿舍无人时，则是“贪婪”地阅读马列著作，潜心攻读。通过自学，他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学会了许多地方的方言。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借助在国民党各种机关任职的机会大量收集情报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党组织，准备武装暴动，积极为党工作。

由于地下斗争的需要，宋至平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作活动经费，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加上他经常外出活动，行踪神秘，造成了妻子对他的误解，导致了家庭的离异。对此，他只有与临时党小组的同志在一起时，才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向同志们倾诉。他引用古人的诗句“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来说明自己的处境。

1943年冬，宋至平在街上突然碰上开阳县县长、中统特务陈国桢。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宋至平决定离开贵阳，他对傅崇佑说：“若等待下去，要出危险。必须离开贵阳，以免不测。”就这样，宋至平怀着家庭破裂的悲痛，孤身一人踏上了去重庆的旅程。

1944年春，宋至平到了重庆，在上清寺资源委员会会计处任会计，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南方局刘光手里。刘光将宋至平与在重庆白石驿空军第二总站电台

工作的梁宜苏、江北21兵工厂技术员吴作和、正谊书店店员张晓江、《新华日报》营业员黄铁梅等编成一个地下特别工作小组，由宋至平任小组长。他还担任梁宜苏与刘光之间的联络员。

在重庆特务云集的情况下，宋至平领导特别工作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赞扬。

1944年底，日寇进犯贵州独山，南方局派部分原在贵州活动过的中共地下党员由重庆回贵州，准备打游击，开展武装抗日。宋至平被派回贵阳。

宋至平路过遵义时，介绍浙大的同学认识了一处子弹库库长马连元，以备开展游击活动时弄到枪支弹药。后因日寇退出贵州，宋至平亦返回重庆。

1945年3月，刘光派宋至平与吴作和去綦江电化冶炼厂工作，宋在总务科工作兼管警卫。綦江当时驻有国民党青年军，宋至平到綦江不久，被人认出，被迫转移到贵阳。他以平坝中学为立足点开展活动。

抗战胜利后，宋至平返回重庆，在我党办的中国化工原料公司（裕中行）工作，随后，参与张立创办的《活路》月刊工作。他撰写了很多犀利活泼的短小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当时宋至平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建川中学的教师，他每天上完课后，就匆匆忙忙赶回编辑部修改稿子、撰写文章，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由于办刊资金不足，1946年夏，为解决办刊经费，宋至平回到家乡，多方筹措，募集到一笔资金，带回重庆作办刊使用。1947年2月，《活路》刊物被国民党当局查封，6月，敌人在重庆大逮捕，宋至平受党组织派遣避于南充、达县等地活动。

1947年秋，张立派宋至平与同住德江的党员先仲虞去黔东北活动，宋至平化装成商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30余天，步行到了德江。宋至平借助先仲虞的关系，在杉园乡十字关自办补习班，借此指导黔东北各县的工作。不久，领导关系明确，成立黔北工委，属川东特委领导，张立为主要负责人。

宋至平在黔东北活动不到一年时间，有的县恢复了党的组织，有的县建立了党支部。张立又由重庆派董啸喟、李延伦等一批同志到印江、德江、松桃等

县活动，同时发展了一批党员。群众性组织“齐心会”“同心会”“翻身会”相继建立。

宋至平还以娄山山脉、梵净山脉为依托，建立了两支游击武装。他日日夜夜为武装暴动做准备，绘制地图，草拟文件，组织力量。

1949年1月，宋至平等人在松桃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宋至平化名岳军，任纵队司令兼政委，曾三次筹划武装起义，但均未成功。

1949年2月，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组建，宋至平受书记张立调遣，到贵阳领导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下称“新青”）的工作。他参与起草了《贵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暂行团章》。他以永初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四处活动，发展“新青”团员。

五六月间，宋至平与张立、张鸣正、王启霖负责编写刻印省工委的地下刊物《真实》。宋至平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时局的一些模糊看法，化名宋明诚，写了《弄清几个时局问题》，刊登在《真实》第一期上。为了迎接解放，他广泛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动员在省政府工作的傅崇佑把重要文件带出来。布置曹志文、曹志轩兄妹调查贵阳各大印刷厂情况，并通过在《贵州商报》工作的地下党员黄先和的介绍，到《贵州商报》做一个月的临时校对工作，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6月，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在贵阳大肆搜捕地下党员，为保安全，张立暂时转移，将贵阳的工作全部移交给宋至平。宋至平不负重托，精心安排张立和其他同志安全转移后，与黄先和张凤鸣坚持在贵阳工作。

8月初，特务破坏了地下党普陀路联络站，搜出了一张重庆来的人去永初中学找宋至平的条子。8月2日，特务闯入永初中学，逮捕了宋至平和张春涛，关押在中山公园的黑牢里。

宋至平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决定公开与敌人展开斗争，以保护战友。敌人向他追问张立的下落，他回答道：“我亲自把他送到游击队里去了，

你们只有到游击队里找他。”

尽管敌人采用种种方法，软硬兼施，想从宋至平入手破获贵阳地下党组织，结果是枉费心机。随着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加快，宋至平知道敌人会对自己下毒手，他对同牢房的曹志武说：“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告诉朋友们，莫要担心和挂念我，我要给家庭争气，我要对得起朋友们。”他还义正词严地对审问他的敌人宣告：“全国就要解放了，你们应该放下屠刀，弃暗投明，立功赎罪。”

1949年10月5日，一群特务闯进宋至平的牢房，说是给他“换个地方”。宋至平明白，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献身的时刻到了。他站起身，轻轻整理一下衣服，昂首阔步地走出牢门。

当天，宋至平与其他8位同志一道被特务活埋在市郊八角岩下。

11月15日，贵阳解放，组织上立即派人寻找宋至平等烈士的遗体，可是当人们掘开烈士的土冢，只看到一大堆杂乱的骸骨，根本无法逐人收殓了，人们目睹惨状，声泪俱下，悲痛不已。

宋至平在入党后的11年中，有8年战斗在贵州，8年中又有4年活动在贵阳。他几次出入贵阳，为党的事业，他义无反顾，出生入死，最后血沃金筑。

专章一 解放初期贵阳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解放贵阳，随后主力入川、滇作战，继续进行解放战争。1950年初，隐藏盘踞在贵阳城乡的国民党残军、特务、恶霸地主、土匪认为时机已到，趁机集聚作乱，袭击解放军运粮军车，武装攻打基层人民政府，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农村进行剿匪，在城市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最终取得了剿灭土匪、镇反斗争的完全胜利，在贵阳巩固了党领导建立的新生人民政权。

一、土匪作乱概况

土匪作乱是有所预谋的。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贵州省的国民党党政军组织预感到他们的统治不会长久了，于是，就谋划制定了一旦撤退后由潜伏下来的残余势力实施的“应变计划”，以破坏和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此，国民党贵州省党政军从1949年8月至10月，在省城贵阳举办全省三期“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共训练反动特务、地下游击军各级骨干分子、土匪头子等共1600余名，从反共思想，到实施方案，到游击战经验等做了系统的训练。潜伏下来的势力受国民党中央特务机构派遣的高级特务领导。等待时机，进行暴乱。

解放军解放贵阳后不久，主力部队继续前往四川、云南。解放战争结束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警特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大肆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3月2日凌晨，匪首杨江纠集的400余匪徒对鸡场的中共白云区区

委、区人民政府进行突然袭击，当时在基层蹲点开展工作的贵州省委工作团与白云区委、区政府的同志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李英、任守藩等13位省委工作团和区委、区政府的同志壮烈牺牲。土匪血洗鸡场，猖狂至极。3月5日，匪首陈伯琴率土匪200余人，仗着对地形熟悉与人多，在贵阳郊外的野鸭乡李家坟一带设下埋伏，对过往的解放军押运的两辆物资军车突然开火袭击。解放军指战员当即英勇还击，但因寡不敌众，激战中除1名突围报信的解放军战士外，十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英勇牺牲。随即土匪洗劫物资，逃离现场前，残酷地将解放军遗体和汽车全部点火烧焦，残酷至极，令人发指。3月18日，中共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解放军营长吴传佑率领的剿匪小分队走到板桥峡谷地段时，遭到千余土匪包围伏击。解放军剿匪部队英勇抗击，但因所处地势不利，且寡不敌众，王涌波等32名指战员在激战中英勇牺牲。3月19日拂晓，朱导江匪部数百人袭击贵阳市公安局第六分局驻蔡家关的武装班，公安干警英勇奋战，连续击退土匪的6次进攻，武装班长贺尚喜、战士陈国祥英勇牺牲。3月29日，匪首杨平舟率匪众800余人突然攻打息烽县城，守城军民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县机关干部撤往乌江。当晚，匪众冲进县城，放火焚烧政府办公楼，文书档案均被焚毁，城中居民财物被抢劫，土匪所过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3月27日，匪首李永芳纠集息烽、黔西的股匪1500余人，大张旗鼓地疯狂攻打修文县城，遭到已有准备的守城军民的顽强抗击，匪徒被毙伤30余人后撤走。第二天，土匪又发动第二次攻城，再次遭到守城军民的重创，死伤数十人后退走。4月1日，不甘心失败的土匪第三次攻城，仍然遭到守城军民的英勇打击而死伤20余人，逃走。4月份，千余土匪猖狂攻打清镇县城，遭到解放军驻军和联防队击溃。4月13日，匪新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潘方侠率匪1000余名攻打贵筑县，打死打伤贵州大学学生及工友8人，绑走66人。4月19日，匪首杨平舟纠集匪徒3000余人，大肆攻打开阳县城，被守城军民顽强击退。4月26日至5月2日，杨匪又纠集邻县股匪2000余人攻打开阳县城，在守城激战中，县公安局局长陈圭璋和侦察连副班长周忠昌不幸牺牲。同日，以惯匪杨江、张树轩为

首的所谓“中华人民反共军新编十九兵团”1700名匪徒，包围三桥攻打市公安局第七分局，七区区长崔国桢、公安局长张满顿带领全体干警英勇反击，市公安局及公安三分局闻讯前往增援，土匪退去。公安三分局武装班副班长李文海壮烈牺牲。

二、剿匪斗争与镇反运动情况

面对土匪猖狂地向新生人民政权发动的进攻，根据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精神及西南局的贯彻指示，贵州省和贵阳市党政军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在农村剿匪和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具体方案。

国民党特务、残余军警、土匪在贵阳城市和郊区农村大肆进行的破坏活动，表明农村的剿匪与城市里面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侦察情报及群众揭发材料获悉：隐藏在贵阳城内的国民党特务勾结城郊土匪，预谋于3月25日在贵阳搞武装暴动，意图夺取省城，猖狂至极。对此，省委、省军区、省政府、省公安厅、贵阳市委、贵阳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市公安局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迅速作出了“先发制敌”的决策和部署，将省、市党政军干部统一编成若干个战斗小组，于3月23日晚全城武装戒严，盘查过往人员。3月24日凌晨1点开始，对贵阳市全城实行武装大搜捕，这一突然的大动作，打得特务、土匪措手不及，一夜之间共逮捕所谓“中国人民救国军”司令钱济渊、匪首王通海、曹伯森等249名特务、土匪，搜查出枪支、弹药、电台、密码、暴动联络符号等大量罪证。在城外埋伏准备25日攻城的上万名土匪慌忙逃跑。4月3日，贵阳市军管会临时军事法庭公审枪毙了匪首钱济渊、王通海、曹伯森等，极大地震慑了各地土匪。在贵阳“三二四大搜捕”的数天内，就有军统特务296人、中统特务142人及其他反革命分子161人，合计599人向市公安局登记自首。

3月31日，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地方党政群众配合下，对集结在清镇县暗流

乡下坝一带的土匪1000余人进行围剿，大获全胜。4月6日，解放军剿匪部队在修文县下堡对土匪实施合围战斗并取得胜利，击毙所谓“贵州省救国自卫军修文县指导委员会”军事组长范德林，活捉匪首李永芳，匪徒死伤73人。4月27日，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枪决李永芳等4名匪首。4月17日，在省军区参谋长潘炎的指挥下，集中省军区、贵阳警司等兵力围剿青岩潘方侠匪总部，经过激战打垮土匪，解放军冲进镇里，除发现一部分被击毙的土匪外，未发现持枪土匪的踪迹。于是，解放军将镇上所有的人集中起来，当众宣布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号召大家指认土匪。深受其害的群众勇敢站出来指认，解放军当场将混入人群中的200多名土匪一一抓获，并搜出武器。4月26日晚，匪首黄少安、袁树奎纠集匪徒200余人突然袭击第七区公所和公安七分局，区公所干部和公安干警沉着应战，英勇机智地与土匪展开激战。后警备区驻军和市公安局的援军赶到夹击土匪，击毙匪首黄少安，匪徒仓皇逃跑。5月29日，贵阳市公安机关破获“中国国民党贵阳市策动委员会”匪特机关，11名主犯全部落网。6月，省军区集中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两个剿匪指挥部，分东西两路合围大股土匪，各地组织和群众积极配合行动。7月12日，杨平舟等64名匪首在解放军组织的“金沙合围”中被俘，后被枪决；27日，解放军组织对开阳县羊场的赵国臣匪帮进行合围，连毙匪首多名，匪众溃散。9月21日，贵阳市公安局破获“西南区游击司令部直属新十二军”匪特组织，32名匪特分子落网。至9月，修文县共进行剿匪28次，歼灭土匪1439人，缴获各种枪支356支、土炮39门、子弹3015发、手榴弹61枚。10月9日，贵阳市公安局将潜逃市内的匪首杨安华、杨恩华抓获，后押回贵筑县白云地区公审枪决。10月10日，市公安局破获所谓“中华人民剿共军新编第19兵团”和“全民民主党”匪特组织，并逮捕匪首及骨干分子12人。至1951年2月，第一期“镇反”运动结束。这期间，相继进行了贵阳附近县境的一系列剿匪战斗，共251次，毙伤敌匪900余人，俘虏迫降4000余人。

从1951年3月至1952年11月进行“镇反”运动第二期。1951年3月17日凌晨，市公安局和解放军贵阳警备区部队实行全城戒严，进行第二次大搜捕，逮捕了杨伯楹、鲍以庄、黄凤鑫等187名匪特、反革命分子。这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期间破获了一系列敌特组织。

1952年12月至1953年7月进行“镇反”运动第三期。以打击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为主，逮捕犯罪分子117人，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三期“镇反”运动期间，主动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的匪特数以百计。

1953年7月，贵阳市公安局作出镇反判定总结报告，对五个方面的敌人进行打击的情况是：土匪652人，打击649人，占99.54%；恶霸123人，打击123人，占100%；特务742人，打击668人，占90.03%；反动党团437人，打击397人，占90.85%；反动会道门681人，打击680人，占99.85%；其他反革命274人，打击271人，占98.91%。全市反革命骨干分子2939人，打击前死30人，实际打击2788人，总打击程度达到95.8%。国民党土匪特务曾叫嚣：二十年前共产党能够打游击，今天我们也能够打游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办不到。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能取得胜利呢？一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实行土改将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公开声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建立的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层中有工人参与，让工商界企业恢复营业，这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少群众积极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提供线索、带路等；而国民党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却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过去早已造成了盘剥人民的印象，现在又把民众视为共产党的“帮凶”，肆意抢劫和枪杀人民，失去了民心；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处于军阀混战或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情况，而新中国初期全国大陆基本统一，这也是重要的条件；从军事上讲，对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其规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早已熟悉和掌握，因此，剿灭匪特势所必然。剿匪镇反的

胜利，彻底剿灭了自近代以来长期危害人民群众的匪患和特务恶霸，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贵阳的执政地位，巩固了党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安居乐业的新环境。

专章二 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纪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七十余年前唱遍了贵阳山城，唱响了中华大地，回荡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响彻亚洲上空。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刚刚洗尽百年屈辱而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面对疯狂侵略朝鲜，野蛮轰炸我东北边境城乡，叫嚣“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毅然于1950年10月19日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大后方之一的贵阳市，这里的人民和全省、全国人民一道，心系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一、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树立必胜信念的教育运动

面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任务就是动员、组织人民全力以赴地支援前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为此，首先就要在人民的思想树立起战胜美国的坚定信念。在中共中央、贵州省委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贵阳成立了“贵阳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运动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贵州省贵阳市分会”。中共贵阳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开展了以树立必胜信念为目的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运动。

二、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确保全民参与的公约运动

为把教育运动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落到实处，全市开展了爱国公约运动。爱国公约是抗美援朝支前运动的制度保证，它是在开展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各界群众提高爱国觉悟的情况下，自愿制定并履行的旨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公约”，党因势利导，把它推广为全社会的爱国运动。

三、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争取前线胜利的支前运动

开展教育运动、公约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全市人民全力以赴地开展支援前线运动。支前是整个抗美援朝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战争进行与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条件。支前运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人力上，兵源对于战争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在贵阳市委、市政府的动员号召下，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涌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面，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贵阳市（现行政区划）共有15606名青年参军，其中有部分奔赴抗美援朝战场英勇作战，产生了特等功臣1名：袁绍伦，一等功臣：丁朝忠等9名，二等功臣：欧志才等14名，三等功臣：刘开录等258名，立功英雄共有282人。他们是贵阳人民的骄傲！据《贵阳地区烈士英名录》记载统计，本地区赴朝作战中牺牲的有于传芳等234名志愿军烈士，他们的英名永载“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册”暨“贵阳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史册”！

2. 医疗上，医疗救护，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贵阳市的医务工作者不惧战火，积极报名，在省抗美援朝分会的领导下，组成志愿赴朝骨科手术队和内科医防队，先后奔赴朝鲜，为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救死扶伤。以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教授杨洁泉为队长的骨科手术队由11人组成，他们在朝鲜前线为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伤病员做大小手术1188次，收治住院病员1899

例，经医治痊愈的1341名。在朝鲜，金日成将军亲自接见他们，并表示衷心感谢！以贵医附院内科主任、教授杨荣勋为队长的内科医防队由10人组成。他们在朝鲜前线抗击美国细菌战中，有7人立了8次三等功。这两支医疗队成员中，有贵医的杨洁泉、鲍镇美、王敬三、朱四维、杨再英、杨荣勋、祝庆平、邹彩华、刘宏芬，有省医的孙其发、冯天骏、王榕、李立邦、许在纯、张兴樵、姚仁里、谢墨昼，有省慢性病院的王本立，有省卫校的王明海、姜国珍和民族卫生巡回工作队的刘轶凡。他们不仅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而且是战火硝烟中英勇无畏的战士。骨科手术队和内科医防队的壮举亦永载贵州暨贵阳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史册！

3. 财物上，从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就有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界群众主动地、自觉地进行捐款。这里仅举两次有组织的捐献运动：第一次是1951年1月24日，为响应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的《关于在全省发起募集运动以慰劳在朝鲜前线冰天雪地里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全市广大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捐款，募集运动到2月下旬结束。仅一个月时间，共捐款2.15亿元人民币，还有数以万计的慰劳袋、无数封慰问信。第二次是捐献飞机大炮运动，1951年6月1日，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普遍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由此进入高潮，市委、市政府提出把捐献与增产节约结合起来，开展“爱国增产捐献运动”，各单位成立“增产捐献委员会”。此外，为方便广大群众自愿捐献，在市内大十字、铜像台（今喷水池）等当街要道口设立了100多个“献金台”。许多工厂制订了“抗美援朝工作时、工作日”或“抗美援朝捐献日”的计划，工人们喊出了“多生产一件成品，就是多消灭一个敌人”“人人都来抗美援朝”的响亮口号，他们把增加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用来捐献；机关干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大中小学生、农民和街道居民纷纷捐献；不少人还捐献了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全市人民只有一个共同心愿：捐献给我们最可爱的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根据贵阳地区（现行

政区划)抗美援朝运动的资料记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贵阳市人民共捐款达108.05亿元,如果以当时15亿元可购买一架苏联战斗机计算,全市人民向志愿军捐献了7架战斗机!

支前运动成为整个抗美援朝运动最基本的特征,集中体现了贵阳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贵阳人民和全省、全国各地人民一道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爱国支前运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和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四、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激励前线士气的优抚运动

战争需要物资支持,战场上更需要鼓舞士气。士气是军队的灵魂,从根本上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这种精神的力量源于广大人民和自己的亲人。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贵阳市各界人民在召开有关抗美援朝运动大会和逢年过节期间,都要致电致信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表达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鼓励他们继续英勇作战,并告诉他们人民群众在后方一定加倍努力生产,全力支援他们。此外,贵阳人民还推举了自己的代表与全省、全国各地人民的代表一道,奔赴朝鲜慰问英雄的志愿军,带去了祖国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贵阳市的代表有任省赴朝慰问分团副团长的顾光中(贵阳师院副院长),成员刘从龙(贵阳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夏淑雯(市女中学生会主席)、尚家兰(烟厂工人代表)等。优抚运动为战争胜利奠定了主观精神与情感基础。

五、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促使朝鲜停战的和平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与捍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贵阳人民与全省及全国各地人民开展的和平运动,增强了国际和平政治斗争力量,成为世界东方阵营和平运动的组成部分,从策略上配合反战斗争,促使战争向着停战及实现和平的方向发展。和平运动包括:

1. 国际斗争。1950年6月至9月，贵阳人民率先在全省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共有21万人签名；7月23日至29日又举行了“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运动周”，并多次发表支持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抗议美国侵略的声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屡遭挫败，于1951年2月欲征用日本兵。贵阳人民响应国际倡议，开展“拥护中苏美英法缔结和平公约”与“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签名运动，共有24万多人签名。1951年五一节贵阳召开了有各界人民代表16万人参加的大示威游行大会，与全省、全国和东方阵营各国，以及世界和平国家的人民一道举行的五一一大示威游行，促使美国决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运动还挫败了美国征用日本兵的图谋，为朝鲜战争实现停战与和平奠定了基础。1952年初，美国军队不甘心失败，在朝鲜战场上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疯狂进行细菌战。贵阳成立了“贵阳市卫生工作者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争委员会”，发出了《贵阳市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5万余人民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迫于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联合国大会的公论压力，1953年3月，美国被迫停止使用细菌弹。国际和平力量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2. 国际合作。这是进行国际斗争的重要条件。1952年贵阳市委组织人民开展“中苏友好宣传周”与“中苏友好月”活动，报纸开辟介绍苏联“专版”，全市各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文化馆举行苏联图片展览等。各界组织观看学习，明确中苏友好与加强国际合作对朝鲜战争实现停战和平的重要性。1952年2月18日，朝鲜人民代表团访问贵阳，受到全市人民的热情欢迎；6月25日市各界人民团体响应国际倡议，联合致电朝鲜人民，对他们抗美援朝争取和平的事业表示全力支持。总之，和平运动从策略上为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尽快实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开展树立必胜信念的教育运动是支前运动的思想基础，开展全民参与的公约运动是支前运动的制度保证，开展争取战争胜利的支前运动是抗美援朝运动的中心及战争胜利的物质力量，开展激励前线士气的优抚运动是战争胜利的精

神力量，开展促进朝鲜停战的和平运动是配合战争胜利的国际条件。五项运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组成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有机统一的整体。

贵阳市抗美援朝运动是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缩影，贵阳市人民和全省、全国各地人民一起，共同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链接：抗美援朝故事

一张带血的朝鲜纸币：两代人跨越71年的找寻

71年前，刘俊清烈士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临终前的心愿是把一张染着自己鲜血的朝鲜纸币交给自己的亲人；71年后，战友子女遵从父亲的遗愿，最终找到刘俊清烈士的亲人，完成父辈的约定。

——痛心一幕，战友牺牲在他怀里

费晓成1927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宝堰镇王家渡村一户贫农家庭，幼年就给一户人家放牛。1937年冬，日军侵占宝堰后，距集镇只有3公里的王家渡村常遭受日军洗劫。1944年，时年17岁的费晓成参军入伍，被编入茅东县大队九宝区中队，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

“哥哥是老五，我是老八，哥哥比我大9岁。”87岁的费连娣说，父亲在她6岁时就去世了。尽管家里有8个孩子，但只有他们兄妹俩存活下来。哥哥离家参军后，她便与母亲相依为命。费晓成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0年，他被抽调到吉林通化集训，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在这里，他认识了战友刘俊清。

刘俊清是吉林通化人，家住通化火车站附近。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奔赴朝鲜前，费晓成跟着刘俊清回了一趟家，见到了其家人。刘俊清家有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妹妹扎着小辫子，很可爱。他们在家里吃了一顿饭，离开时，刘俊清的两个妹妹都哭了，她们都不舍得哥哥走。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费晓成担任连指导员，刘俊清担任排长，他们一起



负责运送物资到前线。1951年7月的一天，连队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轰炸。费晓成从车上下来后，有个战士跑到他面前，喘着气说：“刘俊清负伤了。”费晓成跑到刘俊清身边，发现他被炮弹击中腹部，全身都是血。“二排长，你坚持住！”费晓成抱着刘俊清喊道。但此时，刘俊清已很虚弱，他用最后一口气说：“指导员，你回国的时候，跟我爸爸妈妈讲，我在朝鲜牺牲了……”随后，刘俊清把手伸进裤兜里，想往外掏什么。可还没完全掏出来，就牺牲在了费晓成怀里。后来，费晓成顺着他的手去摸，摸出一张带血的朝鲜纸币，当费晓成拿出来时还滴着血。当天，费晓成把刘俊清就地掩埋后，写下了一篇日记：“亲爱的战友刘俊清同志，光荣地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这一百元朝鲜币，是刘俊清同志的血染红的……刘俊清同志，你安息吧，你未完成的革命工作，我来代替你吧。”

刘俊清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将这张朝鲜纸币交给他的家人，成了费晓成最大的心愿。

——老父辞世，子女接棒继续寻找

费晓成回国后，通过多种方式寻找战友的家人。1958年前后，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去过一次吉林通化，但记忆中的通化火车站附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这样，这张朝鲜纸币成了他们家最珍贵的东西。他们家先后搬家30多次，这张朝鲜纸币始终被保管得很好。费晓成总教育子女说：“这上面有你们刘叔叔的鲜血，是比我的命还重要的东西。”

2018年，费晓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依然惦念着寻找刘俊清的家人。央视《等着我》栏目组得知后，请费晓成老人赴京录制节目，但此时他已病重，无法成行。2019年，92岁高龄的费晓成老人带着遗憾走了。

费粤博是费晓成的女儿，她说，爸爸19岁当排长时，一次战斗中一发炮弹打过来，将他的右脚踝骨炸断。从19岁一直到90多岁，他的脚踝部位一次次溃烂。“我知道，没有亲手把这张朝鲜纸币交给刘叔叔的家人，没有亲口告诉他们刘叔叔是个英雄，是爸爸最大的遗憾。”考虑到刘俊清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没

有子女，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找到他的亲人，2021年，费粤博同兄弟姐妹商量，为刘叔叔找了一块墓地，为他做了衣冠冢。“安葬的那一天，我们把这张朝鲜纸币翻印过塑，当作刘叔叔的遗物下葬。”刘俊清的墓与费晓成的墓相距不远。

几经努力没有结果后，2021年12月，费粤博向央视《等着我》栏目组发出寻人求助。《等着我》联合头条寻人、吉林省通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媒体联盟，寻找刘俊清烈士的家人。令人遗憾的是，节目录制前后，央视《等着我》栏目组没有找到刘俊清家乡的亲人线索。

——时隔71载，烈士与亲人终“团聚”

此后，《等着我》栏目组联合多方力量，继续扩大范围寻找。2022年6月，最终在吉林省通化市找到了刘俊清烈士的家人。“这是我哥哥刘俊清，好几十年没看见哥哥了！”刘俊清烈士的小妹妹，当时93岁的刘素兰奶奶看到照片后，第一眼就认出了费晓成。

寻人团及时同刘俊清烈士的家人沟通，了解到这一家人真是满门忠烈，刘俊清烈士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大哥刘俊锁和刘俊清兄弟俩都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后双双牺牲在朝鲜战场。二哥刘俊清参军之后，没能给家里留下一张照片，刘素兰奶奶也是在71年后，从费粤博珍藏的照片中，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二哥的样子。谁知就在栏目组准备促成这两家人早日相见时，8月初，身体一直不太好的刘素兰奶奶病情突然加重，抱憾离世。

2022年8月16日，费粤博和姐姐、弟弟、妹妹一行四人抵达吉林通化，与刘俊清烈士的外甥女见面，共同完成父辈们的约定。为了让珍贵的文物能够得到更好的收藏和发挥更大的价值，刘俊清烈士的家人决定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纸币捐献给抗美援朝纪念馆。费粤博也决定将父亲的抗美援朝日记本一同捐赠。

鸭绿江畔，断桥弹痕累累，江水静静流淌。70多年前，费晓成和刘俊清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70多年后，两家的后代再次来到这里，缅怀父辈、缅怀先烈。

丁朝忠：从普通战士到彭德怀警卫营营长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丁朝忠，1927年出生于河南省鹿邑县前丁一个贫困家庭，随家人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1937年，年仅10岁的丁朝忠加入中国人民革命军队，开始了他在战场上的烽火青春。此后，他先后参与了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和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23岁的丁朝忠作为警卫人员随彭德怀司令员先于志愿军大部队几小时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入朝前，他被任命为志愿军某警卫营营长，任务就是保卫志愿军总部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安全。

——三次舍命护彭总

第一次：1950年10月20日下午，他和彭德怀司令员乘坐的吉普车正常行驶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正在张望是从什么方向来时，美国飞机已经到了上空，正向下投炸弹。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刻，他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彭德怀司令员下车。刚把彭德怀司令员护到一棵树后面时，一颗炸弹刚好投在离他两步之处。见到炸弹尾部叶片还在转，他便起身飞快抢抱着炸弹就跑，刚跑了几步就把炸弹投向一个坑里，“轰隆”一声爆炸后，丁朝忠被飞土全部掩埋了。当彭德怀司令员反应过来后，就向爆炸声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叫“小丁子、小丁子”。这时丁朝忠才从土里爬出来说：“我在这里。”彭德怀司令员和随行人员帮忙把他从土里拉出来后，就说：“小丁子你不怕死呀，那可是炸弹呢。”他抖抖身上的土笑着说：“只要司令员安全就好，哪里管这么多呀。”

第二次：一天，美国飞机来偷袭抗美援朝总指挥部，丁朝忠正在巡查。当看到飞机向总部飞来时，他二话不说跑去一号指挥部拉起彭德怀司令员就往外跑，刚跑到安全区就听到身后一连串的爆炸声，回头一看六个坑道的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全部被炸平了，只有五号、六号没被全部炸毁。等美国飞机走后，彭德怀司令员说：“小丁子，你又救了我一次呀。”随后又说“美国人想要我彭德怀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第三次：在去前线战场上，有一次正在走着时，突然飞机来轰炸小吉普车，美国飞机在前面轰他们就往后倒车，美国飞机从后面来轰炸他们就往前加快地跑，这时一个炸弹在车后爆炸，炸弹的气浪把车掀翻了，他保护着彭德怀司令员往旁边跑，这时美国飞机对着大家扫射，他忙把彭德怀司令员按在自己的身体下，不一会儿就感觉背部一下疼痛，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美国飞机飞远后，彭德怀司令员把他推开看到他身上全是血，才知是他用身体挡住了美国飞机枪射出来的子弹，随后就马上叫来卫生员赶紧抢救。等他醒来已经是第三天了，彭德怀司令员听说他醒来后马上跑过来看他，并对他说：“我的生命有一半是你给的呀。入朝以来到现在你救了我三次了，每次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

——孤军入朝探敌情

1950年10月19日夜晩，丁朝忠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援朝作战的第一批部队，趁着夜色掩护，越过鸭绿江进入异国。在过江的密集人流中，有一辆小小的吉普车，这辆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吉普车里面坐着的人，就是志愿军的总司令员——彭德怀。

入朝后打响的第一次战役中的云山战役，是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首次交锋。当时，为了尽快熟悉前线的战场形势，彭德怀司令让部队按计划有序向战区挺进，而他自己把指挥部和大部队甩在身后，只带着丁朝忠和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及一辆载着电台的卡车，提前过江入朝，孤军深入探敌情。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的指挥下，率先在清川江以北的德川、宁远一带建立一条防御线，有效地阻挡住了美国和韩国联军，为志愿军寻机破敌奠定了基础。

保护总司令，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就在彭德怀司令入朝探敌情的第二天下午，韩国一支先头部队便与他们的车辆擦身而过。察觉危险后，彭德怀司令处变不惊，带领丁朝忠及其他随行人员利用复杂地形，继续“大摇大摆”地向北挺进。

美国和韩国联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竟然就藏在他们眼

皮底下。他们一行人机智地绕路北返，昼伏夜行，最后，在距离北镇三公里的一座叫作大榆洞的金矿，见到了金首相和其他朝鲜领导人。

——英勇智斗王牌军

云山是朝鲜北部山区的入口和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拿不下来，以后的战斗将十分困难，因此，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拿下云山。

10月25日，志愿军主力迅速集结，云山战役在两水洞地区打响。彭德怀司令在了解前线情况后，利用敌人分兵冒进、摸不清我军实力的有利战机，决心在运动中歼敌，坚决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出国威军威。

丁朝忠也在这场战斗中，一开始，志愿军以为打的是韩国军，但打起来才发现是美军的王牌军。在总攻之前，志愿军开始对云山周边的高地进行炮击，在经过小规模激战后，才发现云山的敌人竟然不是韩国的第15团和第12团，而是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第八团。

当时，负责进攻云山的是志愿军39军，军长是吴信泉。由于并不知道美军已经进入云山与韩国军队换防，志愿军误以为敌人要跑，于是将总攻云山的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当得知面对的敌人是美军后，英勇的39军没有犹豫，反而越打越勇，原定提前2小时的总攻照常进行。而对面的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则完全低估了志愿军的实力，异常骄傲自大。

39军派116师346团5营4连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直接摸到了美军的营部。随着一声令下，4连对美军营部发起了突然袭击，打得美军措手不及，吓得他们赶紧撤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想利用云山重要的位置一战定乾坤，迅速击溃志愿军，向鸭绿江推进，所以才会拿出王牌部队。事实证明，沃克的想法太天真了。

——不灭光辉永传承

参加过鲁西南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云山战役、清川江战役等大大小小战役300余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获一等功1次、三等功1次……退伍后的丁朝忠深藏功与名，在贵州省北斗山监狱任职。几十年来，他鲜少对别人提起自己获得过的荣誉。

“上了战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更何况是个人荣誉。”丁朝忠说，一线的战友打到没人了，警卫员、炊事员也要补充上去，绝不后退一步。那些出现在电影里的炮火轰鸣、枪林弹雨的场景，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在他看来，个人荣誉不值一提，那段用青春和血泪浇灌的珍贵岁月，连同所有志愿军前赴后继、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一起镌刻进了曾佩戴在胸前的军功章里，永远熠熠生辉。

专章三 贵阳市“三线建设”情况概述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1964年至1978年间展开，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是在四川、陕西和贵州等西部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信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以抵御外敌入侵的战略性建设。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提出要“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在长远规划中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同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集中力量搞“三线建设”。沿海和“三北”地区的重要工业搬迁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西南和西北地区，通过“三线建设”对中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一次重大战略调整。贵州地处三线腹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由此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四川和陕西，居全国第三位。贵州历时十多年完成的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省特别是贵阳市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加速了贵州省，特别是贵阳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实施“三线建设”的原因

总体来讲，党中央实施“三线建设”的原因主要归为两个方面，即国际形势方面和国内生产力布局方面。

一是国际形势方面。中苏交恶：1958年，以中苏“长波电台”和“联合舰

队”为标志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越南战争：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扩大对我国南方越南的侵略战争，我国为巩固边防，进行了援越抗美战争。核武器发展：1945年，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此后核武器迅速发展，已经达到可以在远距离发射导弹摧毁别国设施的目的，随后派遣地面部队入侵，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二是国内生产力布局方面。1964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从备战的角度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全国14个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人口、铁路、桥梁和港口均集中于大城市，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基于以上分析，196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作出了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等省和河南、湖南西部等地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我国工业布局、生产资源配置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



1958年，贵州铝业公司举行庆祝开工游行

二、“三线建设”在贵阳的发展阶段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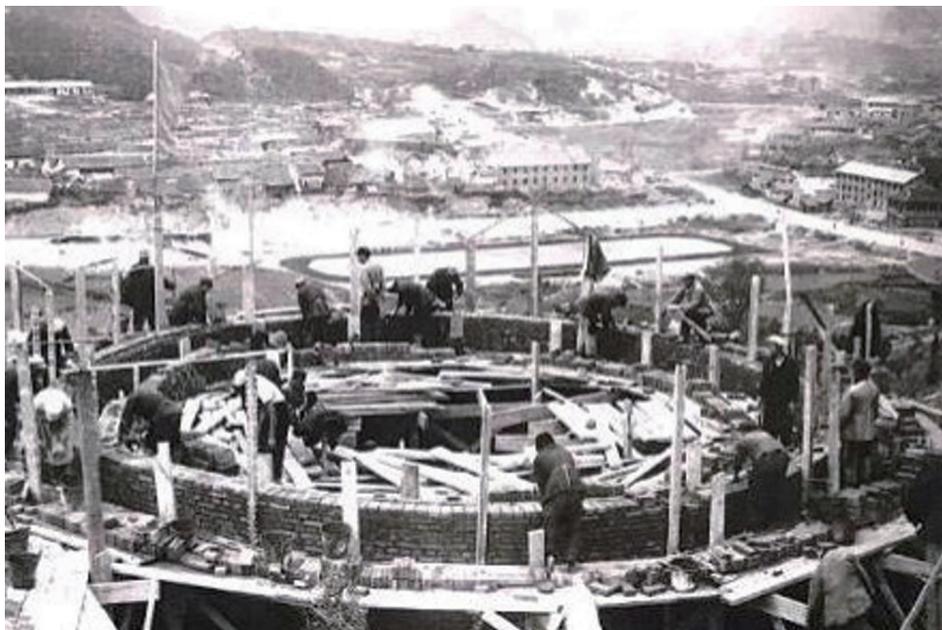
贵阳地区的“三线建设”是从1964年9月开始，至1978年12月基本结束。历时14年，可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三线建设”在贵阳的初期（1964年9月—1969年2月），是大部分三线企业的搬迁及建设时期。初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勘察选点、部分企业搬迁建立或合并重建或扩建阶段，时间为1964年9月至1965年12月；后一阶段是三线企业大规模搬迁、落户与建立阶段，时间为1966年1月至1969年2月。

1969年9月中旬，国家有关“三线建设”各部委分别组织下属相关企业及科研单位，派出人员组成企业勘察选点小组，到贵州省各地进行勘察工作，正式启动“三线建设”在贵阳的工作。10月9日冶金部决定：将贵阳钢铁厂（简称“贵钢”）由生产普通钢改造扩建成年产10万吨规模的特殊钢企业，并将大连钢铁厂的两座50吨电弧炉和本溪钢铁厂的两台锻锤，以及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搬迁到贵钢，在贵钢厂内成立“搬迁指挥部”，10月14日，搬迁工作正式开始，拉开了三线搬迁工作在贵阳的帷幕。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首批搬迁到西部的三线企业中有24个到贵州省，其中又有13个被分到贵阳地区。分别是上海大中华橡胶厂（部分内迁，与贵州橡胶厂合并，扩建为新的贵州橡胶厂，1965年11月建成投产，1966年1月改称贵州轮胎厂）；上海光学仪器厂（部分内迁，建立改称为贵州新添光学仪器厂，简称“新光厂”）；河南省郑州冶金建设公司（部分内迁，与贵州冶金建设公司合并，组建为中国有色金属第七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七冶”）；天津拖拉机厂（部分内迁，与贵州农具厂合并组建贵阳农机工具厂）；上海电表厂、上海第二电表厂、上海华球电表厂（部分内迁，建立西南电表公司）；内迁后组建的还有贵州柴油机厂、贵阳耐火材料厂、贵阳铸造厂、贵阳气象仪器厂、贵阳华成橡胶厂、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永胜电表厂等。与此同时，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铁路建设正抓

紧进行，对1956年就开工修建的川黔铁路（成都至贵阳段）加大投资与施工力度，于1965年10月1日国庆十六周年之际建成通车。此外，军队也进入三线战备建设，1965年5月26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下文决定：在贵阳市花溪区境内建设飞机修理厂，计划年修理飞机30架，以战斗机为主，第二年11月建成。

“三线建设”初期的后一阶段是从1966年1月至1969年2月。这一阶段开始了三线建设企业的大规模搬迁及建设，形成高潮。有内迁至贵阳的永青示波器厂、第六与第七砂轮厂、铁道部贵阳车辆厂、贵州电工总厂等；还有不少厂及总部后来搬迁或划入贵阳地区，如万江机械厂、兴红机械厂、永光电工厂、贵州化工厂等。这期间对1958年8月开工修建的贵昆铁路（贵阳至昆明）加大投资与施工力度，至1966年3月建成通车。同时，先期搬迁建立的企业已投产



20世纪60年代，贵阳火电厂进行扩建

并出成果，有的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1966年11月贵阳新光厂完成国家下达的“803工程”，成功研制出我国海军潜水艇用的第一台潜望镜。

“三线建设”在贵阳的中期（1969年3月—1972年1月），是大部分三线企业在贵阳地区建立后，按计划投产、出成果的时期，也是“三线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是在中苏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促成的。1969年3月2日至15日，苏联对我国进行入侵行动的序曲——两次入侵珍宝岛，均被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英勇击退；随即苏军又突然袭击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杀害我38名边防指战员，并在临近我东北、西北边境上陈兵百万，大兵压境，虎视眈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定沉着，自尊自信，绝不向苏联屈服，毅然领导全国军民积极备战。虽然处于“文革”时期，中央与军委下令：“文革”中的造反派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冲击部队和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军工企业。同时，国家加大对三线企业的投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到1970年，贵阳地区工业总产值达10.5844亿元，比上年5.8648亿元增长了80.47%；1971年，工业总产值再增长为10.9148亿元，成为“文革”时期工业生产各年该项的最高值，同时期，铁路干线湘黔铁路正抓紧施工建设。

三线建设在贵阳的后期（1972年2月—1978年12月），是基本建成我国战略后方地区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生产由高潮恢复到平稳发展时期，时间为1972年2月至1976年9月；后一阶段是生产出现了多年未有的高潮时期，时间为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世界形势趋于缓和。这不仅深刻影响世界，也影响着中国，当然也影响着“三线建设”。这期间重要铁路项目湘黔铁路于1972年10月建成通车。后一阶段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爆发出冲天干劲，三线企业也不例外，1977年贵阳地区工业总产值达11.0506亿元，超过“文革”期间工业总产值最高年份1971年的10.9148亿元；1978年再增至15.1375亿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制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作为备战目的而进行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三线建设”工程基本结束。

三、贵阳在“三线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

“三线建设”在贵阳，基本建成了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大大提升了贵阳的工业经济水平，主要涉及铁路、军工、冶金、机电、化工、发电、光学仪器等配套工业行业。

（一）建成铁路网。铁路建设对于地处云贵高原的贵州省的开发，对于西南部和中南部地区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运输具有重大意义。1965年10月建成的川黔线，打通了贵州与四川之间的铁路通道；1966年3月建成的贵昆线，打通了贵州与云南之间的铁路通道；1972年10月建成通车的湘黔线，打通了贵州与湖南之间的铁路通道。以上三条铁路和1958年12月建成通车的黔桂线（贵阳至广西柳州），组成了由贵州通往四周省区的铁路网，极大地改善了贵州省与外地的交通状况，贵阳市也因此成为全省铁路网的中心，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二）建成机械机电工业。在贵阳新建或扩建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有铁道部贵阳车辆厂、贵州轻工业机械厂、贵阳电工总厂、永安电机厂、永新机模厂、永光压铸厂、永胜电表厂、新添光学仪器厂、赤天光学仪器厂、贵阳轴承厂、贵阳铸造厂、贵州柴油机厂、贵阳电线厂等。“三线建设”填补了贵阳机械机电企业及许多产品的空白。

（三）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三线建设”初期国家加大投资的贵阳钢铁厂，设备更新、生产率提高、规模扩大，成为全国最大的钎钢生产基地。贵州铝厂在国家大力投资的支持下，扩大了规模，成为全国三大铝工业基地之一。化学工业相继建成投产的贵州化肥厂、贵州有机化工厂、贵州轮胎厂、申一橡胶厂、橡胶配件厂等大中型骨干企业。

（四）建成军工企业。军工企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在战备思想指导

下，先后内迁扩建了贵州黔鹰机械厂、贵州铝厂、761矿、贵州花溪机械厂、贵州涟江化工厂、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贵州化工厂等，生产军用武器及其配件。

（五）扩建电力、煤炭工业。贵阳电厂扩大，清镇电厂建成并发电，电力工业为贵阳地区的企业发展与民用提供了先决条件。开采南山煤矿，能源工业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推动贵阳建立发展若干个工业小区。三线企业搬迁到贵阳市，不仅增加了地域内的工业经济增长总量，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而且在贵阳市促成了若干个工业小区。在云岩区形成三桥、马王庙、阳关工业小区；在南明区形成油榨街、龙洞堡、太慈桥、甘荫塘等工业小区；在白云区形成闻名全国的铝工业基地；在乌当区形成以光学精密仪器为重点的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园区；在花溪区形成了以军工企业和机械机电为主的工业区域。工业小区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市场、学校、住宅、医院、文化设施等也在各工业小区纷纷建立、配套与完善。

（七）增强科学技术力量。随着三线内迁及相关科研单位的迁入，带来了大量的科技专家、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也带来了大量先进的工业机器装备，这些成为完成三线建设任务的重要人员和物质技术力量，也带动了本地企业的科技人员的培养，为贵阳工业及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八）解决广大青年的就业问题。随着三线内迁企业的竣工投产与本地具有三线项目的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补充大量的生产人员。贵阳市革委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组织和协调相关部门单位与三线企业配合，仅从1970年至1972年的大招工中，贵阳市就有62243名青年学生进厂当了工人。

（九）贵阳市经济快速增长。1978年是“三线建设”在贵州进行战备后方基地建设基本结束之年。据统计，这一年贵阳市的工业总产值达15.1375亿元，比“三线建设”开始前的1963年的工业总产值3.3723亿元，增长了4.49倍；地方财政收入2.5761亿元，比1963年的9496万元增长了1.71倍。“三

线建设”加快了贵阳工业化发展的速度与进程，促进了贵阳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较大地增强了贵阳市经济的整体实力。

（十）塑造一种精神。塑造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三线建设”建成的动力，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



1988年10月建立的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从1964年至1978年，“三线建设”在贵阳地区大规模开展，极大地改变了贵阳的经济产业结构，提高了工业文明程度，带来了众多的企业、设备、技术、人才、文化与企业精神，为贵阳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线建设”作为一个时期的备战任务虽然结束，但企业生产并未结束，它们的人才、技术仍在发挥作用，这些企业又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二次创业。

四、三线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概况

1978年是“三线建设”的结束之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开启之年。中央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三线企业也逐渐转到民用产品的开发和试产上，探索新的路子。由此，三线企业（以下简称“三企”）逐渐步入了“军转民”的新轨道，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的新时期。三企在新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4年），为改革开放初期军转民的过渡时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三线企业制定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以及下达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一系列文件指示精神，三企在继续生产传统军工及配件产品的同时，开始部分自行开发生产民用产品并自找销路，也是开启了三线企业的第二次创业。由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生产计划逐渐转变为下达指导性的指令计划。在这个转变过渡时期，三企中有的转变得较早较好，有的转变得较晚且不顺利。

第二阶段（1985年至1992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重点改革管理体制时期。1985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至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工业企业是重点，三企由主要增加生产民用产品的改革进入到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即全面推行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转为厂长（经理）企业法人制。1985年至1995年间，中央财政出资15亿元帮助贵州省内36个布局过于分散的三线企业调迁到贵阳市，1995年后又增加三线调迁企业数量。贵州省和贵阳市以军工企业和其他三线企业为基础，抓住三线企业调迁机遇，组建了贵阳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贵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调迁近百户三线企业进入园区，为调迁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如都匀、凯里的083基地总部及其部分企业迁入贵阳市乌当区后，改称为中国振华集团总公司。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初期，以

深化改革体制与完善经营机制为核心，构建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的时期。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根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不久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在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是自负盈亏的三企，除少数企业的某些项目由国家定产外，绝大多数企业以销定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一时期，有的企业成就名牌产品，前景可观；有些企业勉强维持，不断摸索；有的企业连连亏损，负债累累，不堪重负，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破产。

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工业标本，激情燃烧的“三线建设”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成为历史。但在强国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三线精神仍然激励着后人继续为建设伟大祖国而奋发图强，“三线建设”的丰碑将永远屹立于贵阳大地。

链接：三线企业

“黔鹰”蓝天任翱翔：国营黔鹰机械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08厂，又名国营黔鹰机械厂，空军编号：空军第26厂，是喷气式战斗机修理厂，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工程部，是为了适应作战需要，保证各大军区具有飞机修理能力而兴建的。

1964年，空军工程部派人来贵州初探厂址，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确定：5708厂厂址在花溪境内。

1965年3月2日，空军工程部组成工作组，赴贵阳勘察厂址。由于厂址与跑道的落差太大，拖机道坡度无法处理，经多次选择，最后改选在附近地势较平的一个地方。5月26日，经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批准，在磊庄机场以西建厂，代号5616工程。任务以修歼-5型飞机为主，按年修30架进行设计。总建筑面积不超过18000平方米，全厂职工控制在500人以内。

工厂距贵阳约37公里，距磊庄机场约3公里。有公路通往贵阳、清镇、平坝等地。

1965年5708厂开始筹建。1967年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的土建项目。1968年试修成功第一架米格-15比斯飞机。1971年完成飞机修理32架，3年达到并超过了设计要求。

1972年8月30日，空军后勤部转发总后勤部《复贵阳5708厂扩建任务书》，同意工厂由年修歼-5型飞机30架扩建为年修歼-6型飞机100架，增加职工1400人，扩建面积41 000平方米，总投资控制在1000万元。1973年7月，经总后勤部批准，总投资为1437万元，共48项，总建筑面积53 444平方米。1975年第二期全面开工。1978年，试修成功歼-6型飞机3架，1979年10月第二期工程土建基本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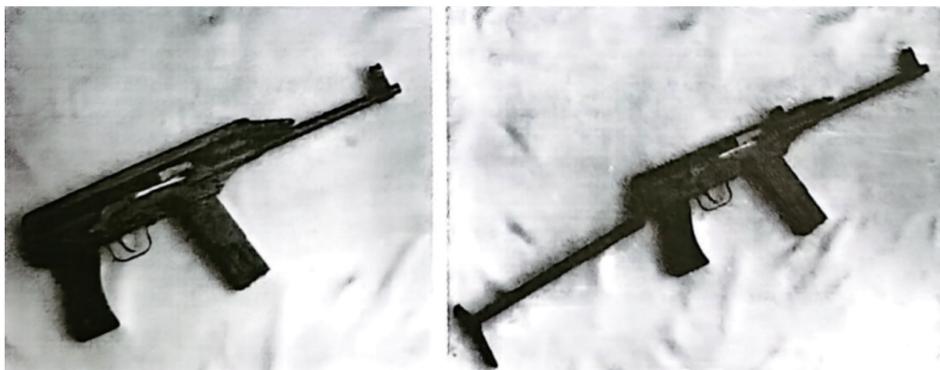
到1985年底，5708厂共修理飞机1036架，其中米格-15比斯飞机406架、乌比斯和乌米格飞机313架、歼-6飞机317架。为部队修理附件778件，为外厂生产航空零备件1060项361276件，创工业总产值7680.59万元（含民品产值98.46万元），实现利润2049.5万元，上缴利润1767.77万元。1979年，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和省政府分别授予该厂“大庆式企业”称号。1983年，被省政府重点表彰。

一枝独秀冲锋枪：国营346厂

国营346厂，又名贵州花溪机械厂，建于1965年，是贵州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的直属军工企业，“79式”轻型冲锋枪（下称“79式”）在这里诞生。

1970年，为贯彻“科研生产要平战结合”的方针，五机部和上级有关部门指定由346厂、208所、空军某部共同研制“132”丛林冲锋枪，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国家轻武器定型委员会先后下文要求“抓紧时间定型”，并命名为“79式”。“79式”轻型冲锋枪便在346厂孕育。

1970年，346厂建立了“132”轻型冲锋枪的科研机构，组成百人科研队伍，在208所、空军某部等单位有关科研人员的配合下，展开了对“79式”长达13个春秋的攻坚战。



“79式”轻型冲锋枪

1977年，按计划要求，工厂要试产100支枪交部队检验试用。经原昆明军区的高温试验，原沈阳军区的低温寒冷试验，原兰州军区的风沙试验，特别是越南战场的实战考验，该枪得到好评，但也存在不足，需要改进。针对这些问题，科研人员采取积极改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试验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1978年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符合设计要求。1982年“79式”正式投入试制，2月，送样枪去208所做定型前的精度、常温、高温、低温、综合寿命和扬尘、淋雨、扬尘后淋雨及浸河水等摸底试验，出现了机匣导轨崩掉、枪机枢裂纹和拉不开枪栓、不供弹等问题。科研人员立即组织专门班子进行技术攻关，使问题得到解决。

1982年10月至12月，“79式”样枪送国家靶场作全面检测及各种条件下的试验。结论是：经技术检查，除枪重超出7克外，其余基本符合资料要求。经试验，射击精度及综合寿命的各项指标均达到生产定型的指标要求，但在常温、低温、淋雨及浸河水条件下出现卡壳故障，机构动作不可靠。不过，总的衡量，该枪不低于1978年设计定型试验时达到的水平。针对“79式”在国家靶场试验中出现的问题，科研攻关小组逐一攻克。

1983年5月，“79式”轻型冲锋枪申请定型的报告，经轻定委来厂再次组织

试验鉴定合格，批准生产定型，投入批量生产。至此，孕育13年后在轻型武器制造中独树一帜的“79式”轻型冲锋枪终于诞生。

1984年至1987年，“79式”投入批量生产，年均产量达10 000支。1988年以后，形成年产30 000支的生产能力。

“79式”批量生产12年来，产量达数十万支，誉满军中，销售覆盖面达全国20多个省区市，广泛装备空降、边防、公安与武警部队。

东方交响有振华：振华电子集团

振华电子集团是由三线建设期间形成的电子军工基地〇八三基地演变而来。

1964年9月至11月，国家国防工业第七踏勘组对贵州的黔南地区、黔东南地区、贵阳以西地区、湘西地区和滇东地区的9个专区44个县197个点进行了踏勘。最后确定在贵州都匀市、凯里市沿线先期筹建19个军工电子企业和3个研究所。从1964年至1975年，开始了大规模“三线”建设。

1970年12月28日，“七厂一院”验收大会在凯里黔东南州大礼堂召开，久达机械厂、群英无线电器材厂、永华无线电仪器厂、华联无线电器材厂、新云器材厂、宇光电子厂、永光电子厂和418医院全线建成，并正式交付国家验收投产使用。至1975年，先后在贵州都匀、凯里、遵义建设起30余家企事业单位，完成基建投资5.1亿元，基建竣工面积达132万平方米。计算机、雷达、无线电专用设备、电子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等几大制造业逐步形成，〇八三基地初具规模。

细数振华集团（〇八三基地）的历史，从创立至今，就一直致力于国防建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参加了“集成电路”“331工程”等大会战，为“东方红一号”、东风系列、巨浪系列、洲际导弹发射、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国防重点工程和军队现代化升级提供了产品配套和技术支撑。

共有200多个型号的产品为“两弹一星”“东方红一号”“探月工程”等60多项国家重点工程提供配套，无一失败，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

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生产了国内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为东方红一号卫

星发射作出贡献；建成了国内第一条单电容器贯军标生产线，为两弹一星进行配套；建成了国内第一座地面卫星接收站，为我国通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生产出国内第一支耦合腔行波管，为洲际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作出了贡献；生产了国内第一支玻璃钝化二极管，填补了国内空白。

特别是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提供了2000多个规格近100万只高可靠的产品，做到了万无一失。

“九五”“十五”期间，10余人次荣获航天一等功，20余人次荣获二等功，30余人次荣获三等功。2006年6月，原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联合授予中国振华集团“‘十五’军用电子元器件科研生产先进单位”称号。2011年6月，原总装备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授予贵州中电振华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十一五’军用电子元器件科研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克难制胜看新光：新添光学仪器厂

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光学仪器厂（下称“上光厂”）承接了研制生产海



“新光厂”老厂房

军潜艇潜望镜的“803工程”，要求在1966年以前完成试制阶段，做好成批生产的准备，而厂里缺乏适合803产品装校、试验的场地和设备，需要新建。国家一机部几经选址，最终确定803工程建设在贵阳乌当境内，并同时建设计量光学仪器生产厂——新天光学仪器厂（下称“新光厂”）。

1965年1月，一机部确定“上光厂”以一分为二的形式将设备和人员内迁。当时，按照内迁设计纲领的要求，内迁产品除803工程的潜望镜外，还有计量仪器7种，设计年产值720万元，并要求当年内迁、当年投产。“上光厂”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划分、调整、拆卸、装箱等工作。其中调至内地新厂的不少设备是当时国内光学厂稀有的进口机械和仪器，如西德平磨、超精磨床、螺旋纹磨床、泰曼干涉仪、刻度机、大型落地照相设备等。

1966年7月至10月，“上光厂”800多名内迁职工来到贵阳，开始艰苦创业。“新光厂”投入生产后，当年11月出产品，年底还装出了第一批计量仪器，实现了“当年内迁，当年投产”的目标。1966年11月，一机部四局派人到“新光厂”进行企业投产的验收工作，验收合格，批准投产。

“新光厂”建成后，经过两年多生产，基本上已达到建厂时的预期目标



“新光光电”公司大门

(年产值720万元)。1969年开始第一次扩建工程，总投资550万元，新增生产面积11 900平方米，建成了油漆、热处理、电镀车间和铸锻木工车间，完善了生产的配套。新建宿舍4000平方米，新增职工400多人，使“新光厂”的生产能力成倍增长，当年生产任务完成1400多万元。

1968年，一机部还决定在贵阳市乌当区境内建造以生产物理光谱仪器为主的新添第二光学仪器厂(后改名为赤天光学仪器厂，下称“赤光厂”)，仍由“上光厂”援建。

1979年3月，“上光厂”“赤光厂”合并组建公司，定名为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公司组建后，固定资产总值达3770万元，占地31万平方米，拥有主要设备920台，仪器仪表762台，人数达3003人，当年产值达3088.5万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用光学仪器企业和我国机电行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被部局确定为光学仪器行业的“排头兵”。

高原铝城：贵州铝厂

1957年12月，冶金工业部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和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决定利用贵州丰富的铝矿、石灰石矿、煤矿和水资源，在贵州兴建一座大型铝厂。

1958年3月，选择贵阳市西北郊17公里处作为贵州铝厂的厂址。同年5月，国务院批准冶金工业部《关于贵州铝厂设计任务书以及厂址选择的报告》，贵州铝厂的建设规模为年产氧化铝30万吨，一期20万吨，相应的矿山规模为年产铝矿45万吨，年产石灰石矿30万吨，年产铝锭5万吨，相应的阳极糊规模为3万吨，氟化盐为5000吨。

筹建之初，贵州铝厂称为贵州铝业公司筹备处，1959年3月更名为贵州铝业公司，1965年改称三〇二厂，2002年2月分为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和贵州铝厂。

1958年至1960年，贵州铝厂职工人数逐年增加，1960年骤增近2万人。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怀着尽快建成贵州铝工业基地的决心，积极投身于工程建设。截至1961年5月，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024万元，其中建筑安装6444万元、设

备购置4439万元、其他基本建设1141万元。

铝是生产飞机的基本材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贵铝的建设发展。

195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在遵义听取了贵州铝业公司（下称“贵铝”）筹备处副主任阮焕中的汇报；1959年10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贵州期间，在贵阳听取了“贵铝”党委书记王乐亭的汇报；1959年11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视察贵州期间，在贵阳听取了“贵铝”企业党委工作汇报；1960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到“贵铝”视察；196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到“贵铝”视察。

1965年进入国家“三线建设”时期后，贵铝在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中恢复建设。1月，国家计委复函同意电解厂的铝锭和阳极糊分别按3.26万吨和1.8万吨规模进行建设。2月，冶金部决定将贵州冶金修造厂划回三〇二厂。3月，冶金部下达三〇二厂1965年基本建设计划，要求重点建设电解厂和水、电、道路等辅助工程及矿山、氧化铝厂的建设准备工作。4月，冶金部批准三〇二厂建设规模为“铝氧40万吨/年，其中一期15万吨/年；铝电解6万吨/年，其中一期3万吨/年；铝矿石100万吨/年，其中一期40万吨/年（小山坝露天矿25万吨、林歹15万吨）”。7月1日，第七冶金建设公司贵州指挥部（原贵州冶金建设公司）召开了隆重的电解工程开工誓师大会，贵铝一期电解铝工程复建正式启动。在贵阳铝镁设计院、第七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七冶”）、三〇二厂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一期电解铝工程于1966年9月建成投产，10月1日正式出铝。

1976年至1978年，“贵铝”的生产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主要产品是铝锭、机械产品、精铝、高纯铝、碳素制品，其产量一年比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大

力发展有色工业，优先发展铝”的决策，使贵州铝厂的生产发展步入大发展时期。1979年10月，国家“六五”期间重点成套引进的22个项目之一的贵铝8万吨电解铝工程开工建设，到1981年12月，首批26台电解槽建成通电投产，1982年底工程全部建成投产，使贵铝的电解铝生产技术装备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产量跃居全国首位。

后 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宝贵的贵阳历史文化资源，2023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决定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程。

为保障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共贵阳市委成立丛书编纂工作协调机制，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办公室设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单位承担具体编纂工作；组建丛书学术委员会，对丛书编纂质量进行评审及学术指导；引入总审订团队，从整体性和规范性上进一步提升了丛书编纂质量。

编纂这套丛书，凝聚了各方智慧，汇聚了多方力量，得到了省内外多位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滕伟华同志的悉心指导。省内相关行业的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撰稿，以融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与普及性于一体为目标，力争将丛书打造为促进贵阳历史文化繁荣发展、提升贵阳人民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文化读本，让贵阳这片土地更加厚重，让贵阳这座城市更加灵动，让贵阳市民更加自信，让外来游客更加向往，让贵阳未来更加美好。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承担丛书之《筑城红韵》的编写任务。为此，市委党史研究室精心组织、精心创作，扎实有序推进编纂工作。历经数次重大调整，《筑城红韵》最终正式出版。

在《筑城红韵》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对省、市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学者的关心与指导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对各位撰稿人员和参编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最

真挚的感谢！对各位评审老师，特别是总纂团队专家的宝贵意见表达最衷心的感谢！囿于时间和水平，本书难免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各界读者谅解并予以批评指正。

编者

2024年12月